史无前例的年代

纪希晨

目录

前言：历史告诉未来

列宁说："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的灾难，就会给未来带来祸灾。

"文革"过去了三十多年。亲自经历了那场浩劫的中老年朋友，回忆起那段痛心的历史，至今还心有余悸。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由血泪写成的。"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不仅给人留下伤口，更留下深刻的教训。我们不应遗忘。遗忘历史的民族必然丧失前途。人民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平文选》第3卷272页)

正是从这个基点，我在十多年内利用业余时间，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以比较广阔的视野，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真实的记录下那段历史。

1937年，我15岁加入党的战斗行列，1938年到延安，从此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五十多年。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血和火的严峻考验。全国解放以后，我又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特别是任职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时，1959年被错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那场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热情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期待通过"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美好，更强大。

但是，我的梦想很快破灭了。

当我看到千年文物毁于灰烬，千万老干部受到残酷批斗，许多领导人被扭坐"喷气式"的时候，我的心流血了!

我迷惑，我苦恼，我不理解：昨日的功臣，为什么瞬间变成了罪人?我看见贴满大字报的东、西长安大街上，许多老干部站在机关门前，向毛泽东像"请罪"……

一天，我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上班。躲过播放着口号奔驰而来的宣传车，刚踏上报社的台阶，一个念头突然从我的脑海闪过：这不就是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里批评过的左倾错误吗?乱打乱杀，"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时，我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聆听过领袖的教诲，整理过领袖的《谈话》记录，

目击过左倾错误给吕梁山区带来的血泪。往事记忆犹新。

联想历史，看看现实，我猛然感到：“文化大革命”恐怕又是一次左倾错误啊!

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文革”的问题，有意识地去捕捉事实的真相。在汹涌激荡的漩涡里，用眼睛观察风雨，用手记录下见闻。

“文化大革命”开始，鉴于我刚从新华社四川分社、人民日报社四川记者站调回人民日报编辑部，没有当权，所以，有关同志送我两个尊号，一曰“革命群众”，二日“漏网的走资派”。

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我没有像许多老干部那样被打倒，住“牛棚”。十年间，除一年下放五七干校锻炼，大部分时间都奔忙在采访一线。经历了“文革”全过程，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实际，深入生活，扩大视野，积累材料。

为了解历史事件真相，我还访问过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谷牧、杨成武、华国锋、王力、王洪文等人。他们为我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1980 年，我参加审判“两案”的采访。因工作需要，我看到一些专案材料，也阅读了一些党的文件档案。这些都为写这本书提供了丰厚的沃土。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历史科学的生命。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本书引证的材料经过反复核正。我一向认为，党和人民的记者，是人民的公仆，真理的信徒。写作应对历史负责。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再现历史。作为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依实写出这段历史，也是完成自己对历史的一份责任。

我的感受是，一个新闻记者的最大幸福，是能够亲身经历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同时代的老同志，是新中国的奠基者。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将我们个人的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许多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中，受到冲击和迫害。但是我们没有个人的私怨。即使受到打击，也从不气馁，而坚信人民的胜利必将到来。飘扬在我们心中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红旗！

1968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曾问在座的中央委员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一生。他的悲剧在于演奏了这支“小插曲”，并且始终不肯承认错误。我们党对自己领袖的严重错误，在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凡是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也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也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从头到尾都铭刻着毛泽东的烙印。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在毛泽东看来，在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解决。他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次又一次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内耗损伤了党和国家的肌体。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主席，在个人崇拜的浪潮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他损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实行人治，没有法治，以致全党无法监督自己的领袖。血的教训，启示人们的认识，只有从人治转向法治德治，严纪治党，以法治国，以德治国，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我们的党和人民从挫折和错误中学到许多东西，变得更加成熟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要我们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一定能够达到现代化的光辉前程!

第一章 暴风雨前的闪击

大风起兮云飞扬，

政治风暴兮人遭殃。

在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代里，第一个遭受阴谋陷害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

它像暴风雨前的闪电，预示着动乱年代的到来!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在 1967 年 1 月 15 日的中共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说：这回尖锐的阶级斗争(笔者注：指“文化大革命”)，首先就从军队开始的，从反对罗瑞卿开始的。

1、首当其冲的将军

在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 28 天，与社会上公开批判吴晗的同时，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5 日，在上海，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了党内军内对罗瑞卿将军的批判。

毛泽东对自称是“主席警卫员”的罗瑞卿，一向很信任。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林彪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之后，中央任命林彪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毛泽东还按林彪的提议，将罗瑞卿大将从公安部长调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

怀有政治野心的林彪，总是处心积虑，揣摸毛泽东的心态。

林彪利用他的职位，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狂热地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之后，林彪又相继创造一系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口号，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万寿无疆”，等等。

这一切，当时都使毛泽东高兴。他不仅把林彪看作是自己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而且还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1965 年 12 月 2 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的一个报告里，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这个“批示”，实际是不点名的点名。相距不过 6 天，12 月 8 日，在上海开始了对罗瑞卿的批判。

笔者看到这个文件时，正在北京市房山县五侯公社担任“四清”队长。当时感到很奇怪：“批示”的矛头是指谁呢?莫非军队也要搞“四清”吗?

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5 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会总计 61 人，其中军队高级将领 34 人。

中央常委的同志全到了，但是除毛泽东本人外，事先谁也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议，不知道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

贺龙以为要开作战会议，从北京随身带了作战地图去，

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问贺龙：开什么会?

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周恩来总理说，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开紧急会议，但不知道开什么会。小平、彭真等也都不知道开什么会。

罗瑞卿 11 月 25 日到上海。这时上海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罗瑞卿得知这篇文章是经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消息之后，立即电告北京，指示《解放军报》提前在 11 月 29 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根导火线，竟给全党全国全军及他本人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在上海，罗瑞卿向毛泽东请示说，他要到苏州去看林彪。

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到苏州跟林彪作了一次谈话。妻子郝治平问他谈得怎样?罗瑞卿说：谈得很好。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罗瑞卿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

1980 年 11 月 6 日，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家中告诉笔者，1965 年 12 月 9 日，她同罗一起从上海到达昆明。罗是奉毛泽东之命到云南边界看地形的。而在他到昆明之前的 8 日这天，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但是将军却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罗瑞卿到达昆明的第二天，12 月 10 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

这是为什么呢?开会的事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为何会有这样奇妙的安排和保密呢?他满怀疑虑地打电话问北京。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

12 月 11 日下午两点，罗瑞卿夫妇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的子爵号专机从昆明到达上海。在飞机上，罗瑞卿一直伏身在地图上办公，直到秘书喊他，才知道上海到了。

罗瑞卿同夫人郝治平在虹桥机场走下飞机，发现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郝治平告诉笔者说：这天，吴法宪一改往日奴颜婢膝的模样，满是横肉的脸孔，冷若冰霜，罗瑞卿感到有点异样。往日，吴法宪见到罗瑞卿，总是低头哈腰，毕恭毕敬，连开汽车门、穿大衣、脱大衣这些小事都做。

过去，吴法宪曾肉麻地对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说："苏联人把斯大林称作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作父亲。"

吴法宪，今日怎么改变了面孔呢?

罗瑞卿夫妇怀着满腔疑虑，被安排到建国西路 618 号，后来是波兰领事馆的小院里。周围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将军失去了自由。

2、将军失去自由

1980 年 11 月 6 日上午，郝治平同志沉痛地回忆着这段往事，详细谈到上海会议前后的情景。这位 16 岁投身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长得端庄、白净、漂亮、大方，谈起丈夫受的摧残，禁不住热泪淌流。她对笔者说：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失去了自由，连续八年过着惨遭磨难的生活……"

罗瑞卿被勒令交待问题。当天，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找他谈话。周恩来总理说罗

是没有罪的，是林彪揭发罗的问题。林彪揭发，今年二月罗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林彪下台的四点意见。这四条意见，叶群在这次会上做了揭发……

罗瑞卿头上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他交待反林彪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后，当妻子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罗瑞卿流着泪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罗瑞卿整夜没有合眼。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林彪呢?罗对郝治平说：这几年，我为了工作，也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有些事情直接请示了毛主席或军委其他副主席。对此，他是多疑的，也是不满的，但这说不出口。其次，我和贺龙同志打交道，他怀疑我和贺龙有什么暗中活动。在林彪看来，我不应该“超”过他去请示主席，不向他直接汇报工作，引起他的嫉妒忌恨。

1959 年，林彪推荐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后，曾对罗瑞卿说，我的身体不好，又不常在北京，你有事情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可以不经过我而直接去向党中央请示。

但是，当罗瑞卿真的这样做了的时候，林彪却又不满意了，断然下了整掉罗瑞卿的决心。

郝治平说：林彪为什么要整掉罗瑞卿?正像后来罗瑞卿所说：“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来，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罗瑞卿 1906 年出生于四川南充，早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1928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 年由党中央派到苏区，参加工农红军，历任红军大队长，纵队、师和军政治委员。1932 年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被敌人打伤了腮部，自称是“摸了一回阎王爷的鼻子”，“死”而复生，身负重伤，仍继续指挥作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罗瑞卿相继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为保卫党中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 年起，任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为党培育了大批治党治军的人才。

1939 年他率领部分抗大学员深入敌后。1940 年，任八路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艰苦的岁月里，转战太行山区。抗战胜利后，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面对面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复杂的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罗瑞卿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参加解放平津等重要战役。

建国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9 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

邓小平代表党评价罗瑞卿说：“罗瑞卿同志是为人民所热爱、为敌人所惧怕的祖国安全

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

但是，像罗瑞卿这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也难于逃脱劫难的袭击。尽管他是上海会议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却被抛在上海会议之外，像一头猛狮囚禁在铁栏里。

3、诬陷的迷惘

1965 年夏天，林彪、叶群在一部分人中散布谣言，诬陷罗瑞卿“有野心”，“有事不跟林彪商量”，“不向林彪请示”，“正在组织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蛊惑人心，煽动要“注意罗长子”，对他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听信林彪的谣言诬陷，加深了对罗瑞卿的不满，甚至政治上怀疑罗瑞卿会“搞政变”，而这正合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的论断。因之，他没有同中央其他同志商量，断然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给林彪写信，编造诬陷罗瑞卿的材料。信中说：“1962 年 5 月到今年 7 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笔者按：指罗瑞卿)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做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特别是你提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搞了些伪装。……直到今年 7、8 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万岁》和修改罗总长 9 月 3 日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他不仅骄傲懒散，根本瞧不起军委常委的其他同志，而且对你有反感，竟然还想在文中造成和你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你的形势。”

在苏州养病的林彪接到诬告信后，于 1965 年 11 月 30 日，立即要叶群带着这位副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的 9 件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乘吴法宪派的飞机到杭州，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林彪在信中写到：“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叶群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杭州之行后，还谈到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关于折中主义的批语，说这既是对 1965 年 11 月 18 日林彪来信的答复，又是对叶群到杭州汇报的书面答复。毛泽东信中说的“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指的正是罗瑞卿。

4、深刻的分歧

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长期并肩战斗。长征中，林彪任红军一军团长时，罗瑞卿是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1959 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提议调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两人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曾经有过较好的感情。

罗瑞卿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斗争：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他那高大强健的体

魄，惊人的精力，出色的工作，深受上下级的爱戴。林彪曾经期望借助罗瑞卿的才华和魄力，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对他又拉又打。

但是，罗瑞卿是个正派人。他坚持原则，不信鬼，不信邪，不看林彪眼色行事，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起初林彪对罗瑞卿越过他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心里不满意，但又不说出口。这些年来，他因身体不好，经常外出养病，不在北京。后来，他发现罗瑞卿与贺龙元帅关系不错，进一步对罗瑞卿产生了猜忌。

罗瑞卿对叶群这个被称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十分看不惯。50 年代部队评军衔，叶群伸手要评大校。罗瑞卿没买她的账，认为她在军队没多做工作，因此，只给她评为上校。叶群对此一直怀恨在心。

林彪提倡“突出政治”，实际上就是突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主观意志，是毛泽东倡导的左的“政治挂帅”的新发展。1965 年 11 月，林彪在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作指示时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林彪的这些过分赞誉毛泽东的话，在一个时期内，深得毛泽东的喜欢。他多次表扬林彪，认为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说，那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在毛泽东鼓励支持下，“突出政治”像狂风似的刮遍全国。是否突出政治，不仅成了辨别提拔干部的标志，也成了打倒所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棍子。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遭到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同志的反对。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说：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

罗瑞卿对“突出政治”，搞个人崇拜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65 年 6 月，在讨论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再版所写的前言时，罗瑞卿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 ‘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罗瑞卿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讲，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

实践证明，罗瑞卿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在 1966 年 7 月也说，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这类提法了。

罗瑞卿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和组织群众性的练兵运动。1964 年开展“大比武”，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先后 13 次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推动军事训练，显著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

但是，林彪却诬陷 1964 年群众性练兵运动，“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冲击了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说什么“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罗瑞卿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统一，针对林彪的谬论，指出：“不能乱冲一气”。“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他说：“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他认为，1964 年的军事训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不能因为练兵中出现一点毛病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林彪得知这些情况，对罗瑞卿更为不满了。一次林彪刚从外地回京，立即打电话叫罗瑞卿来见他。当时罗瑞卿正在开会，回话说：“知道了，待会儿我就去。”

林彪听完秘书汇报，气得大拍桌子，急得在屋里直转圈子。他突然停下来，抓起一张白纸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了!

1965 年，林彪要把“突出政治”的“指示”印发到部队中去，并且提出要在前言中标榜他的老婆叶群如何发现了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罗瑞卿认为这样不好，坚决删去了当时在军队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叶群的名字。对此，林彪十分恼火。在林彪看来，罗瑞卿越来越不听话了，骄傲了，开始在工作中寻找机会刁难罗瑞卿，给他脸色看、小鞋穿了。

1965 年 5 月，在一次作战会议上，经有关同志议定，要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林彪知道后大发脾气，指责罗瑞卿超越了他，说罗“搞背后活动”，逼令罗“在什么范围活动的就在什么范围内消除影响”。

事后，林彪又指使他老婆叶群拉拢罗瑞卿。叶群说，林彪只是对最亲密的人才发脾气，要他不要介意；还说林彪那时身体不好，要不是罗瑞卿，军队不会出现当时那样的局面。

林彪还诬蔑罗瑞卿“封锁”他，不给他送文件。1965 年 5 月 2 日，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一同乘飞机到上海，看望病危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当天晚上，罗瑞卿也去看望了林彪。

5 月 3 日傍晚，罗瑞卿同杨成武在驻地花园散步时，坦率地对杨说，昨天晚上林彪批评了他，向他人发脾气。

林彪说，罗瑞卿“封锁”了他，不给送文件。又说，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说明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提毛泽东、刘少奇，没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其他老帅。

林彪还批评罗瑞卿独断独行，不向他汇报工作。又说对他搞“突然袭击”，是存心“折磨我这个病人”。

如何处理和林彪的关系，成了罗瑞卿工作中很感头痛的问题。他有时按林彪规定时间去汇报工作，林彪常以病为借口，拖延不见。若是直接去了，又说对他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

对于这种情况，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在《我的父亲与林彪》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突然袭击……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又说故意搞疲劳战术，想把人累死。1965 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林彪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

5、死无对证的“四条”

郝治平回忆说，林彪要整罗瑞卿是早有预谋的。

1962 年，林彪为拉总参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要肖向荣单独向林彪汇报工作。肖向荣感到有问题，不便单独去，就说：“你俩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是总参谋长，怎么叫我汇报哪?”

林彪气愤地骂肖向荣：你真蠢!

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后，林彪要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员。林彪说，空军是个肥肉，你当司令员，这是个实权不能丢。林彪还将吴法宪由六级提升为五级。为此，叶群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胖子，林总多关心你呀!

毛泽东点名要既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军队负责人的叶群，从苏州直赶到上海开会，并且点名要叶群发言。

叶群一到上海就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到上海开会。

吴法宪到达上海叶群住处时，恰好正碰上总参作战部某副部长从她的屋子里出来。吴法宪刚进门，叶群就板着脸孔，要他揭发罗长子的问题。她告诉吴，林彪说，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彪，应该考虑考虑。你的发言不但应该作自我批评，而且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也交待出来，以表示你真正同罗瑞卿划清界限。

叶群的话，吓得吴法宪连声说：请报告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长子划清界限。

叶群当即告诉吴一些材料，供吴在会上发言：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的“突出政治”，海军揭发很多材料，送给了林彪，罗长子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二、我到杭州去向毛主席汇报，就是用海军揭发的材料，给毛主席看了原文；三、罗长子和郝治平两人到苏州搞突然袭击，要见林彪和我，事先没有通知，突如其来，使林彪很紧张。我们故意躲起来不见，使罗长子扑了个空；四、刘亚楼病重期间，向我(叶群)谈罗长子给他讲了四条，即林彪身体不好，应该让别人干，林彪可以退休，可以少管中央的事情，军委的事情交给别人管。

叶群进一步向吴法宪交底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要解决罗的问题。

吴法宪再次感谢林彪、叶群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告诉他这么多的材料。并表示一定在会上很好发言，向大家揭发，绝不辜负林、叶的期望。

1980 年 12 月 6 日，特别法庭公审吴法宪的时候，他说自己是“林彪的一条狗”。他确实丧失了道德和人性，如他自己所说的“以林彪的意志为意志”，在会上向罗瑞卿开炮了。

会议开始，吴法宪编在由邓小平总书记任组长的小组里。这个组包括总书记在内，都不知道罗瑞卿有什么反林彪的情况。开始没人发言。邓小平指着吴法宪说：听说吴法宪了解一些情况，你先讲讲嘛!

吴法宪的声音很小，作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发言。

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找吴法宪谈话，核实情况。

叶群听说刘少奇、周恩来都找吴法宪个别谈话，很不放心。她怕吴有所变，特地来到锦江饭店北楼八层，来看吴法宪。

叶群虽不是中央委员，但却成了上海会议的明星和主角。她连续作了三次长达近 10 个小时的发言，给会议投进了一颗重磅炸弹。

叶群沙哑着嗓子说：“同志们，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来，没有作好准备，讲一点我所了解的情况。”

近年来，她总把“四清”蹲点，挂在嘴上，显示自己深入农村，深入群众。

“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又不敢轻率上报……”

说到这里，她停下来，把目光转向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沾沾自喜地说：

“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1964 年后，罗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国庆节后，罗到家里来见林彪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彪同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

接着，叶群又信口开河，讲了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生前转告她的所谓“四条意见”，希望她转告林彪。

这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退也要退。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二、要我好好保护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这一点就靠你们了；

三、今后林总不要再管军队的事情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

四、部队的事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管。

叶群还诬陷说：“刘亚楼对我说，‘你如果办好了这些事，罗总长决不会亏待你的。’……这时林彪同志才说：‘罗长子是个野心家!’”

叶群怕谎言露马脚，发言后，立即指使吴法宪，一定咬住罗瑞卿的“四条意见”。吴法宪百依百顺，马上照办。他在一次会上，用手指着罗瑞卿，揭发说：“你罗瑞卿心怀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自己指挥军队做准备!你!你……”

12 月 25 日，吴法宪写信给林彪说：“罗瑞卿反林彪，向党伸手，夺取军权，跑遍全国看地形，是准备将来自己指挥军队……”

叶群还指使海军政委李作鹏，以海军名义向林彪控告罗瑞卿。叶群在保密电话上说，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位休息。叶群说，罗正在组建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李作鹏当即表态说，请你转告林总，请他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李作鹏随即纠合几个人，在 1965 年 11 月 27 日联名写信给林彪说：“总之，我们怀疑他们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有阴谋活动的，是想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倒算。”

李作鹏把这份材料当作重型炮弹，带到上海会议上去了。

当时，在上海开会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林彪、叶群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没有表态。刘少奇说：“未可置信”，陆定一说：“这真是奇闻!”

邓小平在上海会议结束前说：“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人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够不够，对不对，有出入的都可以提。”

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问题，邓小平严肃而慎重地说：林彪同志说有，罗则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嘛。

对这次上海会议，郝治平回忆说：16 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对罗瑞卿问题，主席还说：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使叶群、吴法宪慌了手脚。叶群立即指使吴法宪，要他逼迫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证明。

翟云英说，她当时满脑子都集中在刘亚楼的病上，根本没有听说过所谓“四条意见”，也没有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过“四个指头”。

吴法宪鉴于翟云英不肯为他写伪证，就对她下毒手。“文化大革命”开始，多次批斗翟云英，说她关键时刻不站在林彪一边，把她打成“反革命”。

6、“面对面的斗争”

上海会议对罗瑞卿问题，只“背对背”揭发，没有做出政治和组织结论。

作为上海会议的继续，1966 年 3 月 4 日至 4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由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3 月 12 日，罗瑞卿作了第一次检讨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他坚决否认对他的诬蔑。他说：“至于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同志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但请党严格审查。我坚决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这实际上，否定了对他所谓“野心家”的指责。他的检讨招来更猛烈的批判。

从 3 月 12 日至 16 日，相继有 35 人发言。这些发言，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许多同志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夸大其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有的看风转舵，有的人身攻击，批判步步升级，给罗瑞卿戴上反党、反毛主席、“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等大帽子。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要求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大区中央局及一些军区派人参加。到会人数由 42 人增至 95 人。

面对扑来的政治风暴，罗瑞卿要求核实材料，反对“凭猜测作结论”。这本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但却被看作是“进行反扑，准备翻案”，完全剥夺了他申辩的自由。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不堪忍受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和诬陷，他宁可骨肉迸裂，也不向邪恶的权势低头，用他的死来抗争，来呼唤。他给夫人写了这样一张纸条：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将军写下这份绝命书，放在抽屉里，然后换上一套洁净的睡衣，轻手轻脚地踏上住地通往楼顶的楼梯。

3 月 18 日，在战火里九死一生的将军，以他刚烈的性格，高度的自尊，昂着头，跳下楼，扑向大地，自戕……

但是，他没有死，他摔伤了左腿，死神又一次从他身旁晃了过去。

对此，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瑞卿同志确实以死抗争过。……在瑞卿同志看来，生命是宝贵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理想和信仰。”

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单独和联合发言 86 篇。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发言都是违心的，顺大流的。

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彭真同志，敢于顶歪风，仗义执言，为罗瑞卿伸张正义。

彭真要求大家，只讲站住脚的材料，凡是站不住脚的，无把握的材料，都不要讲。他说，绝不能使人感到讲过头了，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十分。

彭真针对会议表现的过激情绪，指出：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后会后悔的。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和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一样。

彭真在讨论工作小组就罗瑞卿问题向中央写报告时，尖锐地提出质疑：“这些结论，合乎不合乎事实，事实的根据够不够?”

历史证明彭真的预言是正确的，但他却无力扭转当时的局势。

4 月 30 日，中央工作小组做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且加了按语。指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反对林彪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按照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此以前，在上海会议时，罗瑞卿即已被调离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林彪通过整倒罗瑞卿，扫清了夺权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增添了用造谣诬陷手段整人的又一恶劣事例。

7、心脏还在跳动

罗瑞卿及其老人、妻子和 7 个儿女共 11 口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迫害。罗瑞卿本人被关押了近 7 个年头。但是，他始终保持铮铮气节，从不向林彪、江青一伙的淫威屈服。

1966 年 12 月 24 日这天，将军坐在柳条筐里被抬到北京工人体育馆里，同肖向荣、梁必业将军等一起接受红卫兵的批斗、示众。叶群化装成红卫兵，戴着大口罩，挤在 19 号看台上，观看着野蛮的血腥的批斗。

罗瑞卿被抬进会场。一滴滴血，从罗瑞卿受伤的左腿上，渗过柳条筐滴出来，从门口一直滴到主席台下边。将军不堪忍受侮辱，在喧天的狂叫中，他昂着头，挣扎着从筐子里站起来。筐子翻倒了，他高大的身躯，随着惨重地摔倒在地上。

正在这时，夫人郝治平也被撕扯着头发押来，站在他的旁边。她见到有两个人拿着照相机走来，不堪忍受这种侮辱，低着头不肯让他们拍照。

将军凛然地大喊一声："抬起头来，让他们照!"两人眼睛里喷射怒火，仰起高昂的头颅……

林彪、江青一伙叫嚣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一次次拖延对罗瑞卿左腿的治疗。1968 年 8 月 3 日，吴法宪接到专案组关于罗瑞卿需要作手术的报告后，立即向叶群汇报。8 月 4 日，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

"林彪不同意。到现在罗没有搞到什么材料，动了手术就不能审问了，现在不能动手术。"

吴法宪当即指示专案组："对罗要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把手术推迟到秋凉进行。"

罗瑞卿被改为"郝少平"的假名，被推上手术台，锯断了胫骨，去掉了股骨头，造成了终身残疾。住院期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仍一次次拉他去批斗。

病房变成了审讯室。专案组一次次审问他："你是不是假党员"?"你要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

他再也按压不住心底的愤怒，提起尿壶向审讯者扔了过去。

1966 年，在罗瑞卿初遭迫害的时候，罗瑞卿流着热泪对妻子说："长征时，我在一方面

军当保卫局长。解放后，我当过公安部长。我长期做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的老警卫员，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

1958 年，毛泽东要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罗瑞卿经过调查，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劝阻主席不要在那里游泳。罗瑞卿为了使自己能够在毛主席游泳时紧随左右，亲自保证主席的安全，他竟以 50 岁的年纪，刻苦学会了游泳。当他把这件事向专案组说明时，却被他们斥之为“反攻倒算”。

罗瑞卿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忍受着数不清的磨难，忍受着锯掉腿的痛苦，以惊人的生命力，燃烧着生的希望，终于盼来了黎明。

1976 年粉碎“四人帮”。1977 年 8 月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党中央任命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以 72 岁高龄，以久病伤残之身，勇于肩负起秘书长的重任。他坐轮椅，扶手杖，下基层，到连队，下坑道，出现在普通战士之中。他豪迈地说：“72 岁我要当 27 岁来过，一条腿我也要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

1978 年 7 月 18 日，罗瑞卿到联邦德国治腿。同年 8 月 3 日，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了一生!

第二章 点燃了导火线

1、迷雾里的北京

1965 年初冬，飞扬的黄沙，污染的烟尘，在首都上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特别使人感到不安的是政治空气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了。小道消息传出了隆隆的雷声。

尽管江青一伙人“严格保密”，吴晗还是听到了风声，说有人要批判他五年前的剧本《海瑞罢官》。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向他诉说：我听到一些风声，说有人要批判我，正在积极准备着。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彭真严肃地说：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嘛。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一切责任我来负。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杞人忧天嘛!

吴晗说：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彭真激动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这位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是山西省曲沃县人，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里，他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协助刘少奇领导了北京的“12·9”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 年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与领导了 1942 年开始的整风运动。1945 年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 月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北京解放后，他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达 17 年，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 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彭真的肺腑之言，使吴晗十分感动。

彭真送走吴晗以后，处理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又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线》杂志总编辑邓拓请到家里，向他了解情况。

彭真问：吴晗今天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重要心事，你清楚吗？

邓拓一派学者风度，宽厚和善的面容，总带着微笑。听到彭真一问，当即如实地说：吴晗同志听到风声，说有人要组织文章批判他五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官》。

彭真“哦”了一声，问：是谁要批?

“江青!”邓拓回答。

“又是她!”彭真沉思着。

邓拓进一步补充说：“她在北京找了两三个同志要写文章，有的人没有答应。听说，她到上海活动找人写文章去了。”

“《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彭真注视着邓拓：“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一个脚踏实地、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再说海瑞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刚直不阿的斗争勇气么，这又错在哪里?我说的对不对，邓拓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邓拓充满信心地说：“吴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在政治上很可靠，人也老实，批判他天理难容。

2、上头的“来头”

邓拓心里很清楚这种来自上头的“来头”。

1957 年邓拓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在反右派斗争里，早尝过“来头”的苦头。

笔者熟悉邓拓。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对笔者谈到了很多……

邓拓是个学者、诗人，是个政治上坚强、思维敏捷、逻辑严谨的人。可是，在那政治风云多变的年代里，却偏偏受到“来头”劈头盖脸的批评。什么“死人办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占着茅坑不拉屎”、“要收板凳折旧费”等等。1958 年后，邓拓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后，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联想到个人的亲身经历，他从批判吴晗的“来头”里已经感到，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难忘的 1959 年。

这年 4 月 2 日至 5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中工农业指标过高。有的同志不同意高指标，也不敢讲真话，提意见。毛泽东批评这种风气说，“大跃进”中，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下来的。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说，有个别同志怕鬼，不敢讲真话，有些高级干部怕失掉选票，没有这种勇气。他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他并且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

海瑞是我国明代著名清官，他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敢讲真话，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执法如山，被人称为“南包公”。他上书批评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不关心政事，大兴土木，吃喝玩乐，荒淫无耻，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上书前就准备被杀头，买好了棺材，同妻子家人告别。后来海瑞被关进监狱，但知道嘉靖死了时，还大哭一场，把吃的饭菜都吐了。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对嘉靖皇帝攻击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不仅把《明史》推荐给彭德怀看，而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他请吴晗来到家里，向他讲了毛泽东介绍看《海瑞传》，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现在缺少海瑞等。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吴晗是浙江省义乌人，1909 年出生，22 岁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28 岁在云南大学任教授，31 岁任国立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3 年 7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6 年到清华大学后，以学者、教授身份，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1948 年 11 月他和夫人袁震一同到了党中央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了毛泽东。

北京解放后，吴晗当选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1957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著名的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同党和人民一起并肩战斗。胡乔木谈话后，吴晗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并用刘勉之的笔名，刊登于 1959 年 6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前两个多月。

同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吴晗写的《论海瑞》。胡乔木修改这篇文章时，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同吴晗谈了。吴晗为了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把文章又作了修改。

他写道：“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文章指出：“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1960 年，吴晗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再三催促下，写成大型历史剧《海瑞》。在修改第七稿时，吴晗的老朋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在吴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大笔一挥，在封面《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二字。蔡希陶说：“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做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认为蔡希陶的意见很好，同意改名为《海瑞罢官》。

剧本于 1961 年初发表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时说：

“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当晚，马连良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称赞。

由此可见，发表于 1959 年 6 月 16 日的《海瑞骂皇帝》，同 1959 年 7 月 14 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及 1962 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吴晗不是算命先生，他怎么能在两个月以前就预见到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呢?怎么会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为彭德怀翻案呢?这不明明是造谣中伤吗?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真正目标，不是吴晗，而是从旁侧击当时身在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经毛泽东定稿的九大政治报告，也正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捣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3、“哨兵”发现了“敌情”

这要从 1958 年说起。

1958 年，毛泽东违背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力，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全国，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1959 年 7 月的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上书，对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拒不接受意见，反而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后，把“反右倾”运动推向全国，使许多敢于讲真话的、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

1960 年冬，党中央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2 年 1 月党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在讲话中说，“问题不是彭德怀这封信写错了”，“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

这样，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否定了 1959 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这一年，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则主张实行包产到户。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对“反右倾”的甄别工作是“翻案风”，主张包产到户是“单干风”。他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产生了分歧和不满。毛泽东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存在着“独立王国”。

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混淆敌我友界限，将革命同志和朋友错划为敌人。

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他甚至以历史小说《刘志丹》为例，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资产阶级企图复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在这场所谓“反复辟”的斗争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自称是个“哨兵”。她得意地夸口说：

“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巡逻，放放哨，有什么情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么一点工作。”

1962 年 7 月 6 日，休养了五年的江青，在北京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她凭着自己的观感，认定《海瑞罢官》有问题，是株大毒草。她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吃饭瓜菜代。在这个时候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要批判。她武断霸道地说：“这个戏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公演。”

毛泽东没有表态，并且对她说，你还是多读点书吧!

江青不甘心，她找到了军师康生。康生善观政治风向，认为“眼下时机不成熟”。康生说：“全国都在饿肚子，瓜菜代粮，谁还有闲心来关心什么罢官不罢官的问题。”

到 1964 年，经过“大办农业”，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能吃上米饭了，康生认为时机已到。

他找到毛泽东说：“我看这《海瑞罢官》，跟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自此，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青决心自己找笔杆子，写批判海瑞的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脸色看。

她找到了 1954 年敢于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被婉言拒绝。对此，江青又气又恼：“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正当这个时候，她听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1965 年 2 月，江青南下上海，找到柯庆施，力求他的支持。她当面恭维柯庆施：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参加了与江青的谈话。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 年生于一个职员家庭，小学毕业后，14 岁时，随父亲来到济南市正谊中学读书。1933 年，16 岁的张春桥参加了国民党的“华蒂社”，混迹于济南文坛，自命为“前进的作家”。

1935 年，张春桥到了上海，1936 年 3 月 15 日，他跟随国民党特务崔万秋，化名狄克，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章，攻击鲁迅“大题小作”，是“划小圈子”。4 月 6 日，鲁迅写《三月的租界》，痛斥张春桥的攻击。

1938 年，张春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转入敌后，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张春桥到了上海，后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8 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江青和张春桥在政治上的真正结合，是从批判孟超写的昆曲《李慧娘》开始的。1961 年 6 月 31 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江青看后认为这是一株毒草。然后，在上海通过柯庆施、张春桥的组织，于 1963 年 5 月 6 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之一。

江青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实际是毛泽东意见的反映。

毛泽东在 1963 年 12 月 12 日，对文艺工作做了极为严峻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批示一发，全国文联各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学习，纷纷进行检查。

1964 年，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综合各协会的整风情况，起草了一个向中央的报告稿，尚未经中宣部负责人看过，江青即借口她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要去，并送给毛泽东。

6 月 27 日，毛泽东阅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得更加严厉了：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的批示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违背了他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导致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

4、秘密的袭击

在上海，姚文元享受着特殊的优待，“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稿件。每次修改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

毛泽东在 1965 年 8 月审定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来，尽管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再改了，于是就批准发表。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是一次秘密的袭击。它的发表，像在突破口上升起一颗信号弹，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把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说成是为了“恢复地主阶级的罪恶统治”，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说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他硬把“平冤狱”，同 1962 年的所谓“单下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胡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海瑞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吴晗同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彭德怀同志，根本没有交往。但姚文元却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给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

这篇无限上纲的文章，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1966 年 4 月 22 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有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

话里，曾得意地讲到姚文元文章出笼的经过。她说：

“1962 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五位副部长(笔者注：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吴冷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打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同时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对此，1965 年 12 月 10 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海瑞罢官》问题座谈会上，也曾这样说：

“今年 2 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专家，我也没有碰过历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很不好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材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反复修改，8 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了，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那时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 1959—1961 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1967 年 2 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时，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江青出面到上海组织批判文章，选择文化学术界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5、最初的抗争

姚文元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以后，11 月 12 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七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 11 月 24 日至 26 日相继转载。

但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的报纸，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没有人打招呼，新华社也没有转发，许多省委不知道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所以在 18 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文章。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观点，认为姚的文章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

是借古喻今，联系 1962 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所以，吴冷西一开始就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姚的文章。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副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彭真当即告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彭真还进一步指名道姓地反驳：《海瑞罢官》这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草?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书》，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这几天，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也成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根神经跳动的焦点。《文汇报》驻京记者奔忙于各机关之间，并多次到报社征集对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意见。

吴冷西回话编辑部的请示说，中央决定不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理由是：一、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想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意思；二、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把学术问题硬拉到政治问题上，太勉强；三、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 1959 年 6 月 16 日发表的吴晗《海瑞骂皇帝》和 9 月 21 日吴晗《论海瑞》，这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晗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他找到市委书记邓拓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 1962 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完全同意吴晗的看法，他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正确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们说：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铿锵有力的发言，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但在逆流滔滔的日子里，它却变成了大批判的靶子。

6、“我偏要摸”

江青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径直走进毛泽东在上海的住宅，向毛泽东报告

说：

“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十分生气，问江青是否找过康生、伯达。

江青说：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也感到北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江青火上加油，大告彭真的状，并说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

毛泽东气愤地说：我偏要摸!

临走，毛泽东再次嘱咐江青去找林彪谈谈，可以过问一下部队文化工作方面的事。

7、轰动了全国

江青马上向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向他们交了底。

1965 年 11 月 24 日这天，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单行本的数字，但是在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前，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复电。

江青气得很。她气愤地对张春桥说，我们这些人到底还有个讲话的地方没有?我还不能死，我们还有很多仗要打。

印发小册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武器。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刚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真和刘仁：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单行本，急电北京市新华书店，问我们要订购多少。

彭真沉下脸说：我们一本也不订!

刘仁从邓拓手里夺过那张征定单，撕了个粉碎，说：电报都不回，看他怎么办!

彭真接着说，中央开会，没有一个决议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非要跟着上海跑不行?我们听中央的招呼，而不看什么人的眼色。

对印单行本，最初，北京市委和其他市委都不知道是毛泽东的意思。后来知道是毛泽东的指示，北京等地随即都印了单行本。对此，毛泽东在 1967 年 2 月 8 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

“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毛泽东对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他对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11 月 25 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到达上海。上海各报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曹荻秋考虑到同罗瑞卿有长期的战斗友谊，特地把毛泽东的谈话转告给罗瑞卿。

11 月 26 日晚间，罗瑞卿遇到江青。江青对罗瑞卿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接着又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政治上十分机敏的罗瑞卿，立刻领会到这是毛泽东的意图。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感到事关重大。回到住地，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彭真：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965 年 11 月 27 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

彭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问总理的意思。

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彭真说：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11 月 28 日下午 3 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会议。

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吴晗现在怎样?

邓拓严肃地回答：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周恩来脸带笑容，说：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用谩骂和恐吓，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

邓拓说：姚文元的文章是这种谩骂和恐吓的典型。

周恩来望着邓拓说：那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不予转载呢?发表出来让大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而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却对我们的文章怕得要死，拼命封锁。这能挽救他的失败命运么?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关键是写好编者按。

邓拓担心这样?吴晗的压力就更大。

周恩来总理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邓拓回答：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

彭真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地说：又是来头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周恩来望着彭真问：你看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

彭真没有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报刊负责人紧握彭真的手，几乎同时说出声来：你放心，我们一定按你的意见办。

8、形势突变

1965 年 11 月 29 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加了按语。

《编者按》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这是不表态的表态。

当时中央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曾有个排定，11 月 29 日《北京日报》转载、30 日《人民日报》转载、12 月 1 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考虑事关北京，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

但是，《解放军报》却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抢在《人民日报》的前一天——11 月 29 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在编者按语中说：

“1961 年，吴晗同志写了一本《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又说：“《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这个按语，受到彭真的批评。《解放军报》在讨论没有展开之前，就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

1965 年 11 月 29 日，人民日报在总编辑吴冷西主持下，根据毛泽东 1957 年 3 月 22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体起草编者按语，并送康生看过，由周恩来总理最后修改定稿。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在第 94 期《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刊出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1959 年 6 月 16 日)、《论海瑞》(1959 年 9 月 21 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的问题在报纸上开展一次辩论，欢迎历史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事实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华东以外省市(自治区)报纸普遍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9、“将有一场恶战”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下，很快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恶战”。

自 11 月 29 日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人员写来的四封信，主要反映对姚文元文章的怀疑、反对的意见。《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写了“引蛇出洞”的编者按。按语说：

“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

“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文汇报》在 12 月 6 日这天，和《解放日报》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刊登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文汇报》并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

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他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一块找到邓小平，向他汇报说：有人总在主席身边吹风，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就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

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政治结论呢?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进行，混在一起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路，堵塞言路!

为征求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彭真又一同来到刘少奇的家里。

彭真对刘少奇说：不光是我，文化界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不理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刘少奇沉思地说：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才好。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棍子，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将来学我们!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内出现过王明、张国焘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1965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的《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彭真指示写的，彭真鼓励他在这场“学术讨论”中“不要消极观战，而要积极参战”，“北京的理论工作者要走到各省、市前面去!”

彭真说：你们说姚文元的文章不好，我们能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实回答一下人

们关心的问题。像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把这些问题辩论清楚了，对大家的理论水平不也是提高吗?

邓拓的文章写出以后，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邓拓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把对吴晗的批判、封建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硬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1965 年 12 月 15 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上，刊出全国报刊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不同见解，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通过介绍讨论情况，推动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

10、“要害是罢官”

毛泽东住在西湖西南岸边的刘庄园林别墅庭院里。这里，三面环湖，黄墙绿瓦，到处飘扬着浓郁的花香。

1965 年 12 月 21 日，应毛泽东之约，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等五个人，走进一座雅静的客厅。毛泽东同他们谈关于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问题。在这次历时三小时的谈话里，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情况，谈到《海瑞罢官》问题。

毛泽东说：戚本禹写的文章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写得也很好，点了名，但是没有击中要害。

毛泽东望着大家：你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二十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1965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请艾思奇、关锋整理这次谈话时的记录。第二天，田家英看谈话记录，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不应把同彭德怀没有联系的问题整理进去。田家英当即删去谈话中涉及海瑞罢官要害的内容，并且删去毛泽东表扬姚文元、戚本禹的一段谈话。这样就形成了这次谈话的两个版本。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同一房间里，接见了彭真和康生。毛泽东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马上插话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直接联系。

康生紧绷着脸说：但起码是政治问题。

彭真激动地打断康生的话说：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嘛。

康生恶狠狠地瞅着彭真说：你别忘了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一点吧!

彭真十分激动地说：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当天，彭真给在北京的邓拓打长途电话，要他转告吴晗，请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吧。

1965 年 12 月 23 日，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同他单独进行谈话。在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以后，彭真说：如果抓住吴晗的几句错话，就肯定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戚本禹、关锋、姚文元都有问题。他们写的一些杂文，上了纲都可以定反党。

毛泽东认真听着彭真的谈话。深思一阵说：看来，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结论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

彭真随即跟毛泽东来到上海。1965 年 12 月 26 日，上海市委向彭真同志汇报工作。彭真当面批评张春桥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文汇报》刊登首都各报的编者按语，偏偏把《北京日报》放在最后?

在庆祝毛泽东 72 岁生日的宴会上，毛泽东把张春桥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身边，说：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旁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研究、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洋洋得意。他针对彭真对他的批评，当着毛泽东面说：可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好长时间竟不转载。

彭真解释说：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嘛。再说，对姚文元也要一分为二，他的文章也不是没有错误嘛。

张春桥挑衅地说：你们那篇以向阳生名义发表的文章也有问题……

彭真说：那是我让他们写的!主席说了要放，我们就要放他一阵子嘛，政治问题以后再说也不迟嘛。我可以保证刘仁、邓拓是左派！

1965 年 12 月 27 日，《北京日报》以两万字的篇幅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他在文章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

《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出于防人之心，在方求文后加了《后记》："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

1965 年 12 月 30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触及吴晗“自我批评”的实质，仍然认为把政治与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按语口气缓和：

“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一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我们希望进一步展开探讨。”

11、“诱敌深入”之后

姚文元的文章，给吴晗下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许多人看后，不同意这个观点。

著名学者胡愈之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

在这期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布置开展《海瑞罢官》的讨论。他们在记录上写着：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火大些，敌人不敢出来。”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开辟新战场。”

“总之，要调动敌人的兵力。”

他们怎么去调动“敌人兵力”呢?

首先，张春桥指示《文汇报》开辟专版，开展“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他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个够。”通过连篇的所谓“讨论”，制造假相，引出各种不同意见，“引蛇出洞”，然后“再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开初，一些知名人士因为有过 1957 年大鸣大放的教训，不敢出来“争鸣”。后来，张春桥要《文汇报》总编辑找到曾写来信的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进行个别辅导。这个天真的学生，在专人的帮助下，写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马捷的文章一刊出，果然引来了一些读者来稿。《文汇报》接二连三发表了一批反驳姚文元的文章。

但是，文学界、史学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却仍然按兵不动。于是，他们决定以《文汇报》

编辑部名义，发出请柬，在 12 月 31 日开座谈会，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座谈《海瑞罢官》问题。

会议主持者说，只是“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哪知会议刚一结束，马上公开发表会议发言记录，“把鱼钓住了!”

后来，凡是为吴晗鸣不平或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人，都遭到残酷的斗争。

著名学者李平心因为反对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吹鼓手”，遭到多次批斗，含冤逝世。

历史学家周予同因为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乱箭射人”，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受伤瘫痪。

最初那位被辅导写批评姚文元文章的中学生马捷，也被打成了反动学生。

《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一家四口人，有三人遭难。吴晗被打得口吐鲜血死去；妻子袁震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在劳改队全身瘫痪，受折磨而死；女儿吴小彦，头打破，牙打掉，关进精神病院，身心俱残，含冤离开人间；惟有儿子吴小彰，闯过重重难关，顽强地活了下来。

疯狂的虐杀，还曾波及曾在舞台上演过海瑞的著名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他在遭受拷打，游街示众，两次被捕入狱之后，同他的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夫人，一起受折磨死去。他的儿子、儿媳、孙女也都受到株连。

需要提到的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17 年的秘书田家英，也因《海瑞罢官》受到迫害。他因整理艾思奇、关锋执笔的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的内容，而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陈伯达、江青。他们派戚本禹、王力等人来到中央办公厅，在 1966 年 5 月 22 日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

5 月 23 日上午，年仅 44 岁的田家英，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悲愤地自尽了!

12、姚棍子的起飞

姚文元踏着许多人的尸体，飞黄腾达。

1966 年 6 月 12 日，张春桥、姚文元一同来到上海锦江饭店，再次会见江青。在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促膝谈心。他们从上海新编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的演出，到批判《海瑞罢官》等等，都做了广泛的议论。

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现在是旗开得胜，一马领先，万马奔腾。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早先，他们不是不登姚文元的文章吗?北京的报刊一直顶了 19 天不予转载。主席一发怒，他们还不是乖乖地全都刊登了吗?

张春桥说：这全靠毛主席支持啊!敌人还没有投降，我们绝不能麻痹。

姚文元说：是的，我们要发扬鲁迅的打落水狗的精神!

江青说：我现在是学姜太公钓鱼，采用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战术，让各种牛鬼蛇神充分暴露一下。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各方面意见很多，现在要把地下的，引他们到面上来，抓住目标，围而不歼，然后，出其不意，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一鼓作气，穷追敌寇，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

姚文元庄重地说：江青同志，这一次你在戏剧上学术上打开突破口，就会给修正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

江青关切地要姚文元注意身体，把身体搞好。还说，你的身体不是你个人的，是党和无产阶级的。你要永远做无产阶级的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那样，消灭一切害人虫!

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姚文元，很快成了打人的棍子。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浙江省诸暨县人，生于 1906 年。1927 年姚篷子在上海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篷子被推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 年 12 月，姚篷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南京狱中叛变，并在 1934 年 5 月 14 日《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宣言。自此以后，他就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担任经理。

姚文元 1931 年出生于上海。1948 年 10 月，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读书时，经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卢湾区宣传干事，住在上海香山路 2 号的团委宿舍。

这时，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恰巧住在相距几十米的香山路 9 号。姚文元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姚文元是姚篷子的儿子，这个原在 30 年代混迹于上海的张春桥，对他分外亲切，来往也日渐多起来。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同胡风的关系相当密切。由于作家书屋曾出过胡风的书，1955 年“反胡风”运动开展后，姚篷子曾被逮捕审查。在这期间，姚文元为表示自己与胡风集团及其父姚篷子“划清界限”，在张春桥鼓励和支持下，连续写了 13 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反胡风的英雄。

1957 年夏天，开始“反击右派”。姚文元从张春桥那里一得到信息，马上赶写了《录以备考——读报有感》，在 6 月 10 日的《文汇报》上登载出来。

毛泽东在北京看到这篇短文，非常赞赏，并指示《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同毛泽东亲自写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同

刊登在 6 月 14 日这天报纸上。

姚文元由此“起飞”了，红极于上海文坛。1958 年 7 月，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创刊，张春桥推荐姚文元担任《解放》编辑部的文教组长。该刊停刊后，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又把姚文元安排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张春桥还特别关照报社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日常的编辑业务，而能有时间去写文章。

在这期间，姚文元相继出版《细流集》、《田流集》、《新松集》、《在革命的烈火中》等评论杂文集。他不仅在报社工作，而且加入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上海作家分会党组成员。

姚文元以文坛“新星”自居。他“手里舞着棍子，屁股上藏着斧子”，断章取义，罗列罪名，大兴文字狱，称霸于上海文艺界。著名作家巴金、丁玲、冯雪锋、艾青，都在他的砍杀之列。例如，他竟以 50 年代的标准，诬蔑 30 年代巴金小说《灭亡》的道路“是一条和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相敌对的道路，和党的领导相敌对的道路”。

对此，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尖锐地批评说，姚文元“是个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他悲愤地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就会给震坏的。”

巴金的呼吁，并没能阻止姚棍子的起飞，他在上海市委书记、宣传部长张春桥的庇护下，打人的棍子挥舞得更加疯狂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仓库里的一条最大的棍子。

1980 年 10 月 15 日，巴金在《探索集》里，沉痛地剖析了“姚文元道路”：

“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在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姚文元在“大折腾”中，青云直上。

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经江青提议，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成员之一。而在此以前，他已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编委，跃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1967 年 1 月 4 日，张春桥、姚文元飞回上海，发动了“一月革命”，张春桥、姚文元同时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1969 年 4 月 24 日，姚文元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4 月 28 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姚文元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了主管意识形态舆论工作的“总管”，十年浩劫里处处留有他的罪迹。

第三章 打响了全面内战

1、《二月提纲》

1966 年 2 月 3 日，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召集五人小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

笔者在北京医院访问过陆定一。他说，这个五人小组，是 1964 年夏天由毛主席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主席那里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和周扬、吴冷西参加。毛主席在批评中宣部和周扬同志之后，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任组长。

陆定一说：主席，我见事迟，不能当这个组长。

主席笑着问：那谁当组长呢?

陆定一建议由彭真挂帅。彭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赞成。过了一会，康生也谈到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立即叫在场的康生和吴冷西也参加小组工作。

彭真在 1964 年 7 月 7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毛主席的意见，并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小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

在 1966 年 2 月 3 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上，彭真提出了放的方针。他说根据调查的事实，说明吴晗和彭德怀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吴晗是根据毛主席 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并在《人民日报》向他约稿的情况下，动手写文章的。那个时候，庐山会议还未开呢。庐山会议是在上海会议三个月之后才开的，也就是 1959 年 7 月才开的，而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上，才罢了彭德怀的官。从时间上说，两个会相差几个月。虽然《海瑞罢官》这出戏的剧本，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但动笔确实在会议之前，这是事实。《海瑞罢官》这出戏上演之后，毛主席还把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里做客，主席当面称赞马连良演得好，剧本也写得好。这些并不是凭我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从调查中来的。彭真认为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为了放，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同志还说，像郭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许立群、胡绳等七人列席了会议。许立群同志在会上发言说，关锋 1962 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他说，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许多人不敢讲话了。

陆定一同志还结合他个人的体会，叙述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他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参加会议的康生发表了同彭真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说，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要害在罢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主张：要依靠左派，培养左派理论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吴晗，要"打击右派"。在会上，康生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他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

这次会议上，两种思想的初步交锋，表明两种立场、观点的尖锐对立。彭真针对学术讨论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力图使批判《海瑞罢官》不要逐步升级、无限上纲，把讨论限制在学术问题范围内，抵制发表姚文元文章引起的一股左倾热流。

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当晚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在钓鱼台的秀才楼里，关起门来，连夜突击，第二天就提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彭真把《提纲》看了一遍，立即叫打印几份，发给 2 月 3 日的参加者人手一份。《提纲》明确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康生拿到《提纲》，看了一遍，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座谈《提纲》的会上，康生也没有表示与彭真对立和不同的意见。

对此，1979 年 7 月 13 日，陆定一同志在证明材料中写道：在人民大会堂讨论《二月提纲》时，康生并未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是一致通过的。这是千真万确。

1966 年 2 月 5 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听取了彭真对《提纲》的汇报。刘少奇提了一个问题：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究竟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彭真回答说，没有联系。刘少奇、邓小平都同意《提纲》的观点，正式通过《二月提纲》。这时，康生仍然一言未发。

会议结束时彭真请示刘少奇：可否根据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这个提纲已经在京常委讨论同意了。

刘少奇马上回答说：可以，就这样向毛主席汇报。

1966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他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学术问题讨论的领导，统一步调和认识，准备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已经中央通过，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毛泽东住在湖北武汉风景如画、碧波荡漾的梅园宾馆。2 月 8 日，彭真带着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同志，来到梅园宾馆。

待大家在主席会客室坐下以后，彭真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把提纲的内容汇报一下。

毛泽东说：那你就谈吧!

彭真把准备好的《二月提纲》，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听完汇报，立即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海瑞罢官》问题和彭德怀是不是有联系？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康生抢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彭真说：根据调查，不存在联系的问题。

毛泽东严肃地说：去年 12 月 21 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宫，彭德怀也是海瑞。接着，他又说：这是康生的发明权。

康生连忙奉承说：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

毛泽东再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

毛主席一连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说：不能算。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

说到邓拓，彭真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毛泽东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你们可以放，让不同的意见放出来。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主席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在毛泽东面前，康生也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二月提纲》的话。

参加汇报的胡绳同志 1979 年 4 月 16 日写的证明说，参加汇报的一行人，2 月 11 日离开武汉到了上海，2 月 15 日回到北京。在这一段时间内，同行的人都没有听到康生有任何反对这个提纲的表示。康生在“二月提纲”上要两面派。

彭真当场再次强调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陆定一也插话说：学术问题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彭真提议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到全党。”

毛泽东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彭真根据毛泽东没对提纲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当即委托随他前来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和胡绳执笔，于 2 月 11 日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并于 2 月 12 日晨电传中央。

这个提纲和批语，当晚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正看电影的康生，听秘书念了批语，还在上面画了圈。这个批语，原来署名只是五人小组，前面并没有“文化革命”这四个字。文化革命这个词组，是姚溱加上去的，是姚溱的创举。而“文化革命”这个词组的发明者，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迫害死了。

1966 年 2 月 12 日，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指示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强调学术讨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彭真说，学术与艺术，有政治问题的，应该按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他说，学术、艺术、文化方面的批评，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要使它萧条。

彭真大声疾呼：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日报》按照《二月提纲》精神，连续发表学术讨论文章，如《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罢官》、《对〈海瑞罢官〉剧的质疑》等。通过这种正反两方面意见的讨论，说明《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2、严重的分歧

在发出《二月提纲》通知的前后，林彪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泽东思想”的“顶峰论”。

1966 年 1 月 19 日，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1966 年 1 月 25 日，各报刊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报告引用林彪的话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

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我军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把毛泽东推到至高无上的“神位”了!

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意林彪的这些提法。1966 年 2 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要慎重。毛主席过去只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说“顶峰”、“最高最活”不一定很确切，要研究一个确切的提法。

这次会议结束时，吴冷西问邓小平，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你看了没有，可否发表?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提法，还要考虑，这篇社论不忙发表。现在全国各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地方上怎么说，由他们去说，人民日报不能随便跟着说，党内可以各说各的，公开宣传还是根据过去的口径。

在此以前，刘少奇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还说，学毛著要“自愿”，要“自由”一些，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愿意怎么学就怎么学，集体学，个人学都可以，不要统统都组织在一起，学一样的东西，那就成灾了!

在这期间，在同国际共产党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苏联共产党在召开“二十三大”。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了对“二十三大”的方针。刘少奇认为，这是苏共自己召开的会议，不同于兄弟党国际会议，去不去参加都不是大事，只是礼节性的问题。会上康生不同意参加，彭真则主张去参加。在给毛泽东的请示电报中说，倾向于参加。

第二件事是，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三月底来华访问。双方代表团经过多次会谈，对于在联合公报中是否公开点苏共名的问题，发生分歧，在北京的常委会议，认为应当照顾日本的困难，在公报中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

为这两件事，中央决定派康生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1966 年 3 月 28 日，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时，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和江青也参加了。

毛泽东听到中央常委同意派代表团去参加“二十三大”时说：他们同意，我不同意。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的话，批评说：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毛泽东看了同日共会谈公报的草稿，批评公报草稿是“无头告示”，不指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

毛泽东亲自在公报草稿上作了重大修改。据参加起草公报稿的一位同志回忆说，主席在公报上，公开点了苏修的名，强调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反对中日两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指出有人叫喊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宫本不同意这种修改，双方对公报未取得一致意见。

3、彭真挨批

1966 年 3 月 28 日，康生汇报完关于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会谈公报问题以后，把话题一转，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问题。

康生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他要死保吴晗。如果按照这个提纲做下去，全国学术界，就会鸦雀无声，一潭死水，还搞什么文化革命，倒是限制、压制了文化革命。

他进一步挑拨说：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彭真明目张胆地和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根本不尊重主席的意见。在他的眼里，还有主席吗?他们把北京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

坐在一边的江青和张春桥，连忙助战插话，火上加油。

毛泽东脸色突然阴沉下来，谈话变得严厉了。他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并说，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

3 月 30 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针对 3 月 11 日许立群根据彭真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询问上海市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 年十中全会做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说：去年 9 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像是放了一颗“政治原子弹”。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解决彭真、陆定一的问题了！

3 月 31 日，康生从上海一回到北京，马上向周恩来、彭真详细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

他还连夜把王力找来，要他帮助整理主席的谈话记录。并趾高气扬地说：我要马上传达主席的谈话!

王力说：是彭真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你怎么好传达?他建议请在西北视察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回来，由他主持传达。

康生当场拿起电话，向正在宝鸡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报告说，主席有重要指示，请你回来主持传达。

邓小平很快回到北京，主持了 4 月 9 日到 12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对彭真进行了批评，讨论了彭真的问题。

康生在会上说："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在会上，彭真一方面表示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确有严重的错误缺点，同时，又庄严声明：我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王力对笔者说，为取消《二月提纲》，他奉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通知：中共中央通知，1966 年 2 月 12 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看了这个《通知》，并且电告在上海的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通知》，很不满意，认为太简单，没触及实质问题。他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通知》不应当是技术性的，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选定王力，两人很快在钓鱼台写出了初稿。

康生在钓鱼台讨论通知初稿时，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认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地说：那好吧，要说就说个够吧!

《通知》修改以后，送到杭州。毛泽东看了一遍，仍不满意，认为还是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成立《通知》文件起草小组，到上海再起草。

毛泽东提名陈伯达当组长。十名成员中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起草小组住上海锦江饭店，由江青主持日常起草工作。小组每写成一段文字，即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到杭州，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然后再返送上海，直送张春桥，人们笑称他是秘书长。

4、康生的谎言

康生作为五人小组的重要成员，参加了《二月提纲》讨论的全过程，并且从未说过不同的意见。如今，他却摇身一变，要两面派，不仅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而且把《二月提纲》说成反革命的大毒草。

在康生参加起草的《5 •16 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

这是谎言。请看陈伯达受审时的交待：“《通知》中为什么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这是康生的意见。康生也亲自和我说过彭真怎么背着他搞的。说得那么形象。彭真是组长，康生是重要成员，康生那么厉害那么精明。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为了‘团结’，我就同意那样写了。”

康生利用中央文件散布为自己开脱的谎言，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怕别人不相信他捏造的谎言，还指使秘书与人合作写了一篇大事记，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全党，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康生原名张旺，山东诸城人。1924 年进入上海大学又改名张耘，受到地下党的教育，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改名赵容，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 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 年 7 月到苏联后改名康生，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团长王明的副手。康生在政治上极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则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在苏联的中共党员。1934 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之后，为了标榜自己“立场坚定”，利用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之职，制造冤案，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1942 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利用他掌握的反奸肃反大权，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坦白会，对前来延安参加革命的许多青年干部和共产党员，残酷地进行逼供信，“莫须有”地扣上特务、叛徒、敌探等罪名，严重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

1947 年康生、陈伯达还在晋绥解放区推行左的土改路线。他强调“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推行“挖底财”、“查三代”、“扫地出门”、“搬石头”。笔者在晋绥地区采访，亲闻目睹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被当作“绊脚石”和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在乱打乱杀中死掉了。康生违背党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大搞“化形地主”，错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错划为地主富农。他公开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极左口号，摧残了党的基层组织，严重地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

全国解放后，康生鼓吹“大跃进”，连续制造小说《刘志丹》等冤假错案。庐山会议之后康生不顾历史事实，又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陷吴晗为彭德怀翻案。

5、不平常的一天

1966 年 4 月 16 日，这是不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另一件大事是《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按语”。

北京市委想通过发表这篇材料，主动检讨错误，但是却被毛泽东认为是“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

这天新华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京日报》的版面、按语，播发全国。这引起了在上海的毛泽东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

17 日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从上海打电话给《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一再叮咛不要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并且说，新华社不经请示，擅自播发《北京日报》编者按语的版面，犯了大错误，要这位副总编辑特别谨慎，多请示。

4 月 19 日，中央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不要转载 16 日《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中央负责同志批评，北京市委 16 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

4 月 21 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

从 4 月 22 日至 26 日，北京市委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但这次会议被诬蔑为“四月黑会”。

4 月 22 日至 24 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判彭真。他在 22 日下午的讲话中说，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 月 28、29 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他对康生、陈伯达说：你们写了《通知》，我这次的增加，加油加醋。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都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毛主席再次讲，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

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可以看清楚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终将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他尖刻地说，彭真的本质就隐蔽了 30 年。

在中央有计划有步骤的部署下，5 月 5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着，按照预定的计划，解放军报 5 月 8 日发表了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写的《擦亮眼睛、识别真伪》的文章。5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又发表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的反动实质》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向全国发射的三颗重型炮弹。

它表明，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左派队伍，已经投入了声讨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战斗。这些“左”派依靠毛泽东的支持，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为打倒“右派”，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障碍。

6、空想的王国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个“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中国的纲领：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8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的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这个“大学校”的理想，商品交换没有了，“三大差别”似乎可以消亡了。全国的工、农、兵、学、商都可以变成“多面手”了。“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只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他幻想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达到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把全国办

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推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实施“五七指示”，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军营到各机关、学校、农村，普遍建立了“五七干部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关干部、教师、教授、工程师、科学家、专家，都离开城市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改造。许多五七干校结合“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一边劳动，一边开展大批判，大批革命干部遭到迫害。这些“大学校”，不少都成了变相的劳动集中营和“牛棚”。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表达的理想主义，早在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就有了。他认为，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穷是好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白则更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认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在他看来，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千万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可以组成“共产主义大学校”。

毛泽东从失败的“大跃进”中并未吸取教训，一直没有放弃他那美好理想。他认为，要实现那些设想，就要不断革命。对于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都“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毛泽东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按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

7、《5·16 通知》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5·16 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毛泽东依然在杭州，没有回京出席会议，但会议的部署是完全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安排进行的。他冷眼从外地观察着北京的动静。

会议违反正常的党的生活常规，由刘少奇副主席主持，但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共 76 人，这些人完全是在北京工作的，而其他在外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缺乏代表性、民主性，左倾的方针一开始即占据了统治地位，会议气氛自始至终剑拔弩张，十分紧张。

康生在 5 日下午和 6 日上午的座谈会上，连续谈了八个小时。他介绍了毛泽东同他三次谈话内容，讲了起草《通知》的经过。他说，毛主席一再提醒我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一个，彭真一个，杨献珍一个，杨尚昆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谈的剥笋政策。他说对各级领导干部要一层层地剥，一批批地剥，一次次地剥，给与会者以高温的政治压力，

6 日下午至 7 日上午，张春桥也在座谈会长篇发言。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 1965 年 11 月以后，罗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一大堆莫须有罪名，鼓动向“独立王国”开火。

陈伯达也在 7 日的座谈会讲话，揭露所谓彭真历史上的问题。他用新账老账一齐算的方法，说彭真在东北搞什么“桃园三结义”，尽力向他泼污水。

1966 年 5 月 16 日上午，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 通知》。这个《通知》，实质上是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颠倒敌我，以彭真为批判对立面，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的集体；它以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的姿态，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毛泽东对《通知》亲自修改了七遍。他写道：……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毛泽东在《通知》中号召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错误地把大批革命同志，当成革命的敌人。他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16 通知》还宣布：“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姚文元的名字，是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一次会议上由江青提出加上的。当时陈伯达觉得不妥，说：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中央文革辫子。

在场的人很惊讶。江青立即说：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第二天，江青在会上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主席同意了，谁还敢说不呢?

江青在四个副组长中名列第一，又称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江青是大权在握的组长。

江青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之后，江青跳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她的权位已经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重要人物了。

1967 年，《通知》一周年时，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通知。

为配合公开发表通知，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写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社论，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署名。

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这篇社论，并在社论最后加上这样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泽东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8、打倒彭、罗、陆、杨

通过《5．16 通知》的第三天，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讲话，无中生有地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政变。并把彭罗陆杨与“三家村”联系起来。

林彪讲话中用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说明当前世界政变成风。他说：“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无中生有地诬陷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笔者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接着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

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他耸人听闻地说：“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

林彪语无伦次，大讲反复辟，他说：“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反复地讲“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狂热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末了，林彪热泪盈眶地宣布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充满血腥气味的讲话，在党内外广泛流传。中共中央 9 月 22 日专门批转了这一讲话，并在按语中说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说它“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在林彪、康生等人的精心策划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陆定一进行了暴风雨般的围攻和批判。

林彪亲自出马，在一次小组会上，尖着嗓子，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

陆定一回答：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可以调查。

林彪恶狠狠地拍着桌子：你不老实!你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

陆定一用一句话顶他：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顿时火冒三丈暴跳起来说，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揭发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问题，是确有其事的。

严慰冰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1955 年，全国搞“三反五反”，有人背着陆定一，在中央宣传部找“大老虎”，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的儿媳，打成“大老虎”，在大

会上逼迫她们交待问题，不让她们申辩。严慰冰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1960 年，她到哈工大看望儿子陆德，得知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林在哈工大处境很坏，别的孩子假期都可以回家，唯独叶群却不准林晓林进北京。严慰冰对小林打抱不平，为发泄气愤，她即到处写匿名信揭发叶群，说她在延安同别人有男女关系……

叶群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她多次缠住林彪，要他为自己写证明，说明她是“处女”。林彪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副统帅，但在家里却受夫人的指挥。在叶群的再三要求下，他竟不顾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名誉，郑重其事地向政治局写了如下的证明，并在会上散发：

“我证明

(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恋过爱；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1966 年 5 月 14 日”

一个党的副主席，在庄严的党的会议上，竟然写出如此的天下奇闻，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吗?

彭真被迫于 5 月 19 日作检查。他表态性地讲了五分钟，拒不接受林彪在讲话中强加给他的罪名，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联系，请中央审查。

5 月 20 日，陆定一在会上发言，也拒不接受林彪强加给他的罪名。他说：我是高级干部，40 年党龄。我手里只有笔杆。我年已 61，身体不好，眼睛不好，我会搞政变么?似乎不会。

接着，他又对自己是不是埋在党的中央的一颗定时炸弹，作了巧妙的说明：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机一到，自己不想复辟，资产阶级会拥戴你复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黎元洪怕得要死，钻在床底下，被当时的起义者拖了出来，当了领袖。袁世凯做寿，说自己别无所求了，可是，发表了这一通宣言后不久，他就做了洪宪皇帝。陆定一说：我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说我是定时炸弹一点也不冤枉。把我这个定时炸弹挖去，对党对人民都是一次大胜利。所以，我对这次斗争，抱着欢迎的态度。

9、“匿名信”问题

谈到匿名信问题时，陆定一再三声明与自己无关。他说：我同严慰冰一起生活了 25 年，她写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这对于我，是有口难辩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确实不知道她写匿名信。在庄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不能说假话。现在严慰冰在公安部，请审问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写匿名信，哪怕只是一封，请把我当作反革命的主谋犯或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

对于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的问题，严慰冰的妹妹严昭，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做了详尽的叙述。特引述如下：

“严慰冰信中揭发林彪、叶群的恶行不是捏造而是事实，她揭发林彪为叶群开脱严重的历史问题；揭发他为叶群连升三级；揭发林彪有个人野心；揭发林彪抽鸦片；揭发叶群生活混乱。现在这些事都已为历史所证实。至于严慰冰直接写信给林彪的目的，她在信中也讲得很清楚，是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人们不知，有人知你们的阴谋’，不要有恃无恐!她的缺点是未用真名实姓向党揭发林彪的阴谋。为了此事，在她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曾问过她：‘为何不向党揭发?’严慰冰的回答是，‘林彪正红得发紫，揭发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又问：‘为什么不用真名写信?’她答道：‘怕的是会牵连到陆定一。’我又问：‘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干这件事?’她说：‘我不愿牵连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发了，也应由我一人承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严慰冰已为这个缺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关了 13 年，揪去了头发，打聋了耳朵，敲掉了牙齿，在狱中时，九死一生，出狱时体无完肤，还得了致命的疾病……”

林彪加给陆定一的“罪名”是所谓指使他老婆写匿名信。但真正的原因是，陆定一反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说“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陆定一却针锋相对说：“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什么问题，那是瞎吹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偶像，不要把毛泽东思想看成包罗万象，把它庸俗化。”“不要到处都贴毛泽东思想标签。贴标签好像义和团，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陆定一反对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

陆定一回忆当年情景时，深为感慨地对笔者说：当时，党风就不成样子了，罪名没有核实就起哄，这是从 1959 年批判彭德怀开始的。

在林彪、叶群直接操纵下写的《陆定一是严慰冰反革命信件幕后主使人》的大字报内，凭着主观臆想，把陆定一给严慰冰信中要买的防水、防震、防磁“三防表”，说成是他们之间要滴水不漏的“攻守同盟”，把半钢表说成“半讲”，只讲一半。陆、严的大儿子陆德，小名叫德德。而他们则胡编乱造，硬说第一个德是朱德的“德”，第二个德是彭德怀的“德”。朱、彭反对副统帅，因此，他们当然支持陆、严写匿名信的反革命活动……如此等等，构成陆定一、严慰冰以“502”为代号的专案。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5 月 23 日通过《决定》：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 月 24 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专案审查。

1966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并向他谈了正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中国现在出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的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外国朋友阐述“文化大革命”。

1967 年 3 月 4 日、5 日，三万六千人来到工人体育馆参加“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外，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杨、童大林、安子文、曾山、肖向荣、梁必业以及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等数十人。

这是令人发指的血腥场面。每个被斗争的人，脖子上都被挂上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碗口大的黑字，名子上都划上了×。每个人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他们的臂膀被这两个人扭曲着，头部向前弯，两臂向后扬，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折磨人的“喷气式”。

笔者目击了这场令人发指的批斗老干部的场景。它那丧尽人性的行为，激怒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笔者同一些人，中途退场了。

我们不必详述彭罗陆杨每个人遭到的法西斯式的折磨。这里仅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陆定一，说一说他遭受的苦难!

10、血泪的控诉

1966 年 9 月 30 日，陆定一被送北京卫戍区监护。

10 月 10 日晚，陈伯达指示专案组对陆定一要带上铐子、连续审讯。12 月 16 日，陈伯达又亲笔下令对陆：“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 12 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拆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 10 月起到今年被捕为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陈伯达先后 11 次对专案组发出指示，多次嘱咐专案组：“让陆定一写材料，从材料中看出破绽，再给他提问题，再叫他写。……一般不给他吃安眠药，……他不工作，吃什么安眠药!”

1968 年 5 月 23 日，经陈伯达等人批准“逮捕送监”。

陆定一被诬陷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 13 名副部长都遭到诬陷。有的致残、致死，难以瞑目!

1990 年 10 月 31 日，年已 85 岁高龄的陆定一同志在北京医院接见笔者。他头脑清晰，声音琅琅，对于往事记忆的特别清楚。他的错案被纠正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陆定一说，我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关了 13 年，直到 1978 年 12 月 2 日，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才从秦城监狱出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陆定一说，从 1967 年 12 月 9 日起，他开始被揪出来示众，先后在中宣部、文化部和一些院校遭到八九十次的批斗。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最大的一次，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号称 30 万人的批斗大会，每次都低头弯腰举手下跪，受到拳打脚踢……

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里，对几天挨批斗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为抗议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从 1966 年 12 月到 1967 年 1 月的两个月时间，他曾经三次绝食。一次严刑拷打后，60 多岁的老人，双手被戴上越收越紧的手铐，全身颤抖地瘫倒在洋灰地上!

在漫长的 13 年的监禁生活里，他被罚过筛煤、拣煤核的劳役。在呼啸怒吼的寒风中，老人在笼罩着煤灰与雪花齐飞的雪雾里，变成了雪人。

在监牢里，老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多次自我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想，哪怕天崩地裂，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有希望，我陆定一也有希望!

面对死神，陆定一在狱中学会"哈哈大笑"……他用"哈哈大笑"，嘲笑那伙吃人的魔鬼，他用"哈哈大笑"，奇迹般治愈了积闷腹中的硬块……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也惨遭折磨。这位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林彪在一份严案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示："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在秦城监狱关押 13 年。她的大儿子陆德，在监狱关了六年，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在秦城监狱关了六年、八年、九年。而她 70 岁的老母亲，则被折磨死在南京第一监狱。

1978 年 12 月 1 日，严慰冰走出监狱，重见天日。监狱长特地为她题写了四个字："坚强不屈!"

11、如此"窃听器"

中央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积累毛泽东的历史资料，用录音机记录主席的谈话。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 1985 年 5 月在《妇女生活》杂志撰文回忆，毛泽东召集开会或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身边没有记录的人。会议上发言插话者多，有的首长即席讲过的话，时间久了记不准，不好明确责任。六十年代初，就有人提议可以装个录音机，走到哪里都带上，把讲话录下来整理资料，经叶子龙同意，便采用了这种先进设备。

有一次，毛泽东见面前摆着麦克风，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秘书说：先进设备，录音用的，给首长讲话录音整理材料。

毛泽东说：我叫按的时候按，我不叫按的时候不要按。

使用录音，本是件正常的工作，但到 1965 年 11 月，这件小事却被夸大，诬陷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泄露大量党的机密，并且说他“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撤了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第一批大冤案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正式下达通知，宣布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彻底平反，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2、围剿“三家村”

在揭批“彭罗陆杨”的同一时间内，发起了对“三家村”的围攻，并说：“彭罗陆杨”是“三家村”的黑后台。

在政治气候乌云密布、硝烟弥漫的日子里，1965 年 5 月 16 日，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伙开了黑店”，说什么“不管是什么‘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什么人的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全国报刊奉命转载全文，从而开始了对《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的大规模围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千古奇冤!

什么是“三家村”呢?

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它同北京晚报刊登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三家村”的三家，指的是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他们三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也是全国文化战线、理论战线著名的作家、学者。

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18 岁投身革命，1930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1937 年他来到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命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经常在敌人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中打游击办报，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1949 年秋，他带着病弱的身体，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他知识渊博，日日夜夜，笔走蛇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撰写过大量的社论文章。邓拓还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1956 年，全国出现了左的冒进势头。邓拓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的授意，起草了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毛泽东尖刻地批评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面面反对，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避免。要分清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以后不要提反冒进。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反左、反冒进，实际上是反我。

1957 年反右派开始，“引蛇出洞”、带头鸣放的《文汇报》，被打成右派报纸；而被批评为“按兵不动”、“无动于衷”的《人民日报》，经住了考验。邓拓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了右派报纸，不仅大大有损于党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

1958 年邓拓辞去人民日报工作，担任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以后，建议报纸要提倡读书，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

1961 年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9 月，北京市委主管的《前线》杂志编辑部，为了使刊物内容丰富多彩，版面生动活泼，由编辑部出面，约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到北京的四川饭店商谈工作。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三四位同志。

邓拓对廖沫沙说:《前线》也搞个龚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邓拓提议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晗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谈到署名，邓拓提议：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马南村，出南字，廖沫沙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怎么样?

廖沫沙说：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

大家一致同意用吴南星来署名。并且约定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这样，1961 年 10 月，《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邓吴廖三位因为都有繁重的日常工作，平素很少私人交往。邓拓十多年只上过吴晗一次家门。廖沫沙因请邓拓识别一幅苏东坡画的真伪，才到过邓拓家一次。

《三家村札记》从开始到 1964 年 7 月结束，共发表 60 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悍，立意鲜明，文风清新。在内容上，大部分是歌颂党和人民新生事物新风尚的，也有实事求是地批评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但是却受到江青一伙人的诬陷和打击。

江青一伙采取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混淆视听的手法，有预谋地开展了对“三家村”的围剿。

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批评吹牛皮、说大话的恶劣作风，写过“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姚文元颠倒黑白，硬说这句话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

1961 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应《北京晚报》编辑之约，写几句迎春、鼓干劲的话，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要抓紧一年之始，搞好农业生产。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但姚文元却抓住文中“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大干一场”这两句话，诬陷说：“好一副进攻的姿态!……腊鼓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吴晗写了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杂文《说浪》。姚文元抓住“浪”字大肆造谣，说这“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毫无根据地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三家村”冤案迅速祸及全国。许多领导干部和教育、文化、新闻界著名人物，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围攻批斗。邓拓、吴晗、廖沫沙受到非人折磨。

1966 年 5 月 19 日凌晨，邓拓含恨离开了人间。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临终的遗书上，发出申辩和抗争的呼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 171 篇，有问题的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着，遗书又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在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邓拓写完遗书，熄灭灯，吞下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经党中央批准，1979 年 7 月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三家村”一案，惟一活下来的廖沫沙同志，是 1930 年入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他在重新出版的《三家村札记》序言里写道：

“我可以在这里指天誓日地宣告：《三家村札记》实在是一个无组织、无计划、也是无领导和无指挥的三个光人，三支秃笔自由而偶然地凑合起来一个杂文专栏，如此而已。”

13、砸烂“独立王国”

围剿“三家村”的目的，是砸烂所谓“独立王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北京市委、篡夺北京市委的领导权。

1966 年 6 月 4 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告：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一天，报纸刊载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了改组。从此，中共北京市委解体，停止了活动。

在宣传“决定”之前，成千成百的北京市区和郊区的造反派，佩戴着红袖章，拥进台基厂市委五层办公大楼。

一天，笔者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编辑部接到电话，说：有郊区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进驻北京市委，请记者们参加会议。

为了解真相，笔者亲到现场。只见市委大楼上下，全都挤满了造反的人群。走廊前、过道里、楼梯旁、雪白的墙壁上，到处涂写着“打倒彭真”“砸烂独立王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大标语。什么“红色造反团”、“追穷寇造反团”，等等，数不清名目的造反组织，全都拥挤在霸占的办公室里。杂乱的喧闹声，激烈的争辩声，如同骡马大会一样。我挤过杂乱的人群，终于在三层楼的一个套间里，找到了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

我无心听他们争辩，却留心着他们的神态和表情。一个穿黑布衣服的人，在一阵慷慨陈词之后，露出狐狸尾巴了。他竟公然提出“要翻农村四清的案，退赔四清的果实”。有的还提出，土地改革时分了土地的农民，是否也要退回土地呢?

这哪里是贫下中农呢?这些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沉渣四起了。他们抱着五花八门的造反动机，卷进淹没大地的造反洪流里。

造反派中流传着许多诬陷中央领导人的传单，为夺权制造舆论。江青、陈伯达、康生为陷害彭真、砸烂“独立王国”，也编织了许多谎言，加罪于彭真。

在所谓“独立王国”的罪名下，诬陷说：“彭真对地方是中央，对中央又是地方。北京的事情，谁也不能过问。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中央负责同志都不能在北京市做调查研究。胡说：“在彭真掌握下的北京市委，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工具，北京市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

北京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吗?是不让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市搞调查研究工作吗?

这是谎言!

14、“比西太后还坏”

这要从谎言的制造者江青说起。

据北京市委原宣传部长李琪夫人李莉告诉笔者，1964年4月16日，江青打着调查研究，打着京剧革命的招牌来到北京市。

这天，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她。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秘书长郑天翔、彭真夫人张洁清陪同接见。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首先传达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同志的问候和评价。毛泽东说：北京市的工作很好。

江青接着说，她想对北京市的京剧革命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北京市委很尊重江青。彭真、刘仁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京剧革命是党的一项事业，我们要认真对待，并且决定，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负责跟江青联系。彭真还找李琪做了具体部署。

随后，刘仁、郑天翔、李琪陪同江青在长安剧院观看京剧。中间休息时，江青说：你们看，演旧剧目，观众都走了，演新剧目观众就多了。

在这期间，李琪曾两次带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琪同志到上海看望江青。接见时，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京剧团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不要过问。

这是什么话?北京市委领导的剧团，怎么能不让市委宣传部长过问剧团创作呢?

当时，江青想入非非，硬要京剧团创作一个以重庆地下党为背景的剧本。要写一个从军队派到重庆的女干部，不通过地下党，而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去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种胡思乱想，根本不符合地下工作原则，编剧也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李琪不同意靠幻觉去创作。他说：照这样，没有生活也可以搞创作噢!

时隔不久，彭真把刘仁、郑天翔找到办公室，说江青向他提抗议了。她说：你们的宣传部长真厉害，不准我发言，李琪骄傲自大，眼里没有我，不听我的话!

后来郑天翔问李琪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琪说，江青唯我独尊，唯我第一，不准人讲话。她根本不是搞什么京剧革命，而是要兵临城下，称王称霸，指挥一切，剧团上演什么，不演什么，都要由她来定。

1966年2月，李琪同汪曾琪二次来到上海。江青把他俩叫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张春桥办公室。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当场血口喷人，诬陷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不听党的话!

江青恶狠狠地说：叫老子在这儿试验，老子就在这儿试验；不叫老子在这儿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

李琪对江青的专横跋扈，十分愤慨。1966年3月，他在给北京市委的信中说：

“江青比西太后还坏。她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对待我。”又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被杀头的一天!”

1966 年 7 月 16 日，李琪作为京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者，满腔悲愤，以身殉职。

15、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1967 年，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响应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纷纷进行夺权。

在此期间，国务院各部委也都相继发生夺权事件。

4 月 20 日，北京市在组成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时，热情鼓励，祝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里，吸收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参加领导工作。例如，原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韩爱晶，也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拥有很大权力。

1967 年 8 月的一天，笔者奉命列席谢富治主持的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在宽大的市常委会的会议室里，挤满二三十人。一阵喧嚷之后，谢富治满脸怒容地站起来了。他在问了北京市几位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之后，突然问到：“聂元梓同志来了没有?”

“来了，在这里!”笔者寻声望过去，只见一个年近 50 岁的女人，从后排的角落里站起来。啊!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元梓！

谢富治请她到前排来坐。她边走边说：我!今天是经过几次突围前来的。

连日来，北大、清华、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内部，多次发生派性纠纷。在分裂的天派和地派之间，相互抢夺地盘，不时发生武斗。

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几乎遍及北京市各行业、各大企业。互相争斗的两大派，你攻我，我攻你，有的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这天市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就是处理头一天夜晚发生的西单商场武斗事件。

谢富治讲了十多分钟，要求各派之间消除派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接着宣布，到会的同志立刻到西单去，笔者随同查看了商场的武斗现场。

这天，聂元梓穿着褪色的黄军衣，围着红卫兵袖章，右肩上挂着一只缝有红五星的布挎包，低着头，悄悄走在一些市革委委员的后边。在穿过围观的人群时，一群女学生发现了她。她们大声喊着：“看呀，老佛爷来啦!”猛力向她冲来，用十分难听的话，辱骂这位“造反派

领袖”，幸好有几位警卫同志出来保驾，聂元梓才躲过拳打脚踢。造反派领袖多么不得人心啊!

16、惨遭折磨的市委成员

在红色恐怖的日子里，彭真同志受到迫害。彭真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但康生硬要改为地主。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发火说：你们无能!彭真家明明是地主，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慑于康生的权威，县革委会被迫把彭真家庭成分划为地主。

北京的红卫兵专程到曲沃县，抄了彭真的家。把彭真同志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窑洞里扔到院内，连着摔打、日晒，很快折腾死了。彭真弟弟茂信是个残疾人，摔坏了腰，也和儿子一起被扣压起来折磨死了。

在疯狂的岁月里，彭真被大会批斗 200 多次。他坐了九年监狱，而后又被流放到陕西商县的大山里。他在狱中重读毛选、马恩文选、《资本论》。没有笔，彭真就把彩色的牙膏袋撕成细细的小条，贴在书上作读书的标注。

1980 年，彭真回到曲沃老家。他到各家串门，找家人，找乡亲，找批斗过他亲属的人谈心。他说，我这次回家就这么两件事，第一看看乡亲们，帮大家解解旧怨，劝大家把宿怨一笔勾销，团结起来干四化。第二给我母亲上坟，倒不是因她被斗死，主要是感谢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康生、谢富治诬陷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等出卖国家核心机密，叛党叛国。胡说什么北京市委的基本班底是“以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为基础，网络叛徒、特务、牛鬼蛇神及其他分子拼凑而成”。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是 1927 年入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 16 岁即献身革命，长期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和敌工部部长。北平解放后，协助第一书记彭真主持北京市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刚爆发，陈伯达、江青就公开点了刘仁的名……

一天夜里，一伙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市委大楼，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鞋都不让穿，抓走了刘仁，硬说他是“美国特务”。

1945 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决定同意美军情报处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地区参观，返回时，在我方要求下，留下美军随身携带的电讯器材。对此，新华社曾作过公开报道。康生为了陷害刘仁，把正常的工作诬之为特务活动，诬陷刘仁是反革命特务分子。

康生在 1968 年 1 月 3 日的一份专案组报告上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

康生的批示，造成严重的恶果。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同志，都无辜地被戴上手铐脚镣，被监狱关押多年，受尽法西斯残酷折磨。

在五年多的监狱生活里，刘仁受尽拷打，一身上下血痕。他面对铁窗、守卫，沉痛地对前来探望的妻子、战友甘英说：

“我这一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通过他们帮助传送文件，组织斗争……”

英雄的战士，卓越的市委领导人刘仁在法西斯的折磨下，1973 年 10 月 26 日，在自己的监狱里献出了生命。

刘仁的战友郑天翔，在《哭刘仁》的诗篇里，悲愤地写道：

“万家悲声怒问天，妖雾为何久狂扬。横行十载折栋梁，伤痕累累，行事费思量。”

谢富治、康生还诬陷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公安局长邢相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了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冤案，广大公安干部受到株连迫害。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肆虐下，北京有了位市委书记、六名副市长被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长期关押；全市有 12089 名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

这一页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北京市人民是永难忘记的啊!

第四章 开始了进攻

1、江青找林彪支持

对野心勃勃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名扬中外，打响了第一炮，在上海取得了成功，但她并不满足。在人们心目中，江青只是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第一夫人”，况且，许多人都了解她在上海滩的老底。所以，她的影响毕竟有限。她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需要有新的突破。

几番思谋之后，江青决定“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化人物”。她选中了人民解放军，选中了林彪。她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实现篡党夺权的“女皇梦”。

该从何处下手呢?

据原总政治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交代：江青亲口向他谈过，1966 年 1 月 21 日，江青从上海乘飞机到武汉，见到毛泽东主席。

江青向毛泽东请示，想找几个军队同志开个文艺座谈会，谈谈文艺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问：你在军队没有名义，怎么好开会?

江青说：我想请林副主席支持。

毛泽东说：那好，你去请求林彪同志，由他委托你开。

江青随即由武汉飞回上海。

回上海当天，1966 年 1 月 21 日，江青又从上海赶到苏州，会见正在苏州南园养病的林彪。

南园宾馆是座幽静的市内别墅，早先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的私人住宅。笔者专门访问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在这宽大精巧的庭院里，一进门就是一株高大的雪松。西北角有一座坚固的防空工程。密密的冬青，像绿色的墙，伫立在路的两侧。走进向东的大院，有一排门前种植樱花和海棠的平房，连通着五个豪华的套间、两个单间。

招待人员告诉笔者，林彪和叶群各住一个套间。这个地方绝对保密，连苏州人也不知林彪在这里居住。江青不约而至。林彪对江青的突然到来感到意外，气氛显得紧张。事后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对秘书张云生说，两人差点打起来。

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

林彪说：身体不好，正在养病。

江青说他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说：我不懂。

江青问：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彪答：看过。

江青又问：你对建国 17 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搬出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说话了。

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要我请尊神。

林彪仍然推说身体不好。

在这已经很紧张的气氛里，江青又看到林彪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唱片，马上对林彪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些都是坏戏、坏电影!

林彪解释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

从江青请“尊神”的这段简短对话里，可以看出这个骄横霸道的女人，即使在被她称为“尊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统帅面前，也是那么盛气凌人!

江青走后的当天晚上，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名义，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想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参加的不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名单同肖华商量好报来，座谈地点、时间，等江青同志通知。

刘志坚刚问：谈什么内容?叶群没有回答，就挂了电话。

刘志坚是 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的老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接到叶群电话后，他随即满心疑虑地把“林办”电话内容，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

肖华 18 岁就出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多次陪“第一夫人”审看《红灯记》等革命现代京剧，深知江青傲慢、多疑的性格。他想到毛主席近几年对文艺界的批评，猜想这次“会不会用批示精神检查部队文化工作呢”?

1982 年 11 月 31 日，笔者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访问了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肖华将军。他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事，是这样说的：听了刘志坚同志的汇报，我一时感到纳闷，摸不清江青的意图。为什么这时候要在部队开文艺座谈会呢?

经肖华同刘志坚商量，认为派部队同志到上海开会，要注意三个问题：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二、只带耳朵，听；三、江青如果提出问题，与事实出入大，暂不要与她争长道短，回北京后总政党委讨论。

肖华、刘志坚商定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代表军队文艺干部去开会。

1 月 22 日，刘志坚出发之前，叶群又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就逐字逐句念了林彪的话。

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的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

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叶群又叫刘志坚逐字逐句按他的记录，重述核对了一遍。她并且嘱咐刘志坚，一到上海就把林彪原话转告江青。

2、“把尊神请到了”

1966 年 2 月 2 日，刘志坚等四同志从北京西郊机场飞抵上海。晚上 7 点半，刘志坚由张春桥陪同，来到江青住的锦江饭店。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同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开始谈话。当时，张春桥也在场。

江青裹着一件黑色的大衣，一见到部队四同志，狂喜地说：春桥啊，我们把尊神请到了，欢迎欢迎啊!

说着，她把一叠文件，如：《毛主席于 1944 年在延安看〈逼上梁山〉写给评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材料，向刘志坚一推，便哇哩哇啦说起来了：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人听了。

江青提高嗓门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位尊神来支持我。

刘志坚趁机会从一个信封里，取出叶群传达林彪的谈话记录，念了起来。

江青听到林彪吹捧自己的话，“腾”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哈哈大笑着抖落身上的风衣，说：这是春风啊!

江青接着傲慢地说：你们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地方要好一些，但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我就亲自做调查，经常买票看戏，还戴上大口罩，坐在后排。她停了停，嗓门提得更高：我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经统治我们的舞台啦!到处是牛鬼蛇神，到处是一塌糊涂!

江青兴奋得着了魔，说话越来越语无伦次：他们在上海、延安都整我，想让我当阮玲玉第二。我是一个九级干部，就像叫花子一样，为搞点京剧改革，去求人家，去求演员。嗯，说起给我定级，定九级，是主席严格要求我，嗯……

江青的话头，终于言归正传：春节期间，我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支持我，我得到林总的批准，才找你们的。

林彪认为：《纪要》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并指示刘志坚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座谈会前后开了 18 天，会议期间，有 13 天看电影，看中外电影 50 多部，看戏剧三场。

江青个别交谈八次，集体讨论四次。会中多是江青一人讲话，别人只是记录而已。

2 月 11 日，江青给刘志坚打电话说：《纪要》我看了，本来打算议议就算了，没有想到要搞个什么文字的东西，你们既然已经搞了，就要搞好，要搞准确、完整。她还要原起草人陈亚丁去上海，她要亲自帮助修改。

陈亚丁 2 月 12 日又一次来到上海。第二天，张春桥将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

江青一见陈亚丁，就说：我把你们搞的那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同志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十分钟后，被江青称为“老夫子”的理论家陈伯达来了，他拿着《纪要》草稿，靠在沙发上，用浓重的福建口音说：提到了 17 年(指建国 17 年)来文艺专政问题，这很重要，但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的继续。陈伯达接着说：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 17 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

陈伯达又说：另外，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眉开眼笑地说：伯达同志的意见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当夜，陈亚丁把陈伯达、张春桥改的地方，顺了一下文字，改在一份稿子上。

陈伯达加上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一段是：“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2 月 14 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找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又看了修改稿，说：可以了。并对陈亚丁说：你可以先回去，把修改稿带几份回去。

3 月 10 日至 15 日，江青又把陈亚丁等叫去上海。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陈亚丁一起把《纪要》改出了第三稿。其中修改的一段，是“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队伍”，

并说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

3 月 19 日，江青对张春桥、陈亚丁等人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宾馆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张春桥，打听消息。

江青趾高气扬，跷着二郎腿，笑着说：难道周扬不明白，讲文艺黑线讲的是谁?周扬就是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他 30 年代的后台是王明，现在的后台是刘少奇。接着，江青又说：你们回去后，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

3、毛泽东修改三次

1966 年 3 月 19 日，江青要陈亚丁代她起草了一封给当时在上海的林彪的信，争取林彪的点头和支持。信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 2 月 2 日至 20 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 3 月 10 日至 15 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 17 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 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 年 3 月 19 日”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当然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军委副主席还有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善于“紧跟”的林彪，看了江青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自然很高兴。他马上找来刘志坚、陈亚丁，代他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各常委的信。信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 3 月 19 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

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 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 年 3 月 22 日”

林彪在这封信中，从政治上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他对毛泽东为他加上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不但心甘情愿地默认了，而且还在信末标明“以便报中央审批”，这意味着《纪要》将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向全国。

果然，1966 年 4 月 10 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

中共中央在对《纪要》的批语里高度赞扬说：“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文件。”要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1967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公开发表了《纪要》，在全国掀起大吹大捧江青的热潮。江青一跃从电影明星变成“文艺旗手”，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显赫人物了。

《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林彪、吹捧江青，把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至于一些投靠江青的文艺干将，更是肉麻地把江青吹捧到天上。

《纪要》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镇压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黑纲领：是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动员令，是林彪、江青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实行“全面专政”的信号!

在《纪要》的刀光剑影下，许多对《纪要》表示不同意见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文艺工作者，都被扣上“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迫害。

就在这一年，连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也都遭到无情的打击。刘志坚被江青、康生诬蔑为“刘邓在军队中的代表”，在“一月风暴”开始这天，被造反派撕掉领章、帽徽，挂上黑牌，押入监狱，过了八年铁窗生活。

就在这一年的 4 月 8 日到 6 月 11 日，在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看电影，抓黑线”，《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怒涛》等 64 部影片受到批判，62 位部队文艺工作者遭到打击。

会议过后，各大军区、省军区也都召开类似的会议，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 1979 年批转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撤销了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枷锁下解放出来。

第五章 制造天下大乱

《5·16 通知》宣布，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

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关，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成为毛泽东一人之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原有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全部陷于瘫痪了。

毛泽东号召对他艰苦创业几十年的大好江山，进行“天下大乱”！

这在中国和外国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1、“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康生得知毛泽东对《5·16 通知》做了多次修改以后，尽管中央还没有通过，他便抢先一步，在 5 月 13 日把消息告诉给老婆曹轶欧。

1966 年 5 月 14 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原北大哲学系的几个人到了北京大学。

据北大校长陆平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谈到，5 月 14 日中午，他刚端起碗要吃饭，有人打电话说曹轶欧已经来到学校。他马上赶到校党委办公室，见曹轶欧和一位秀才坐在沙发上，曹轶欧单刀直入对陆平说，来学校了解你们学术批判情况。

此后，他们鬼鬼祟祟地住进距北大二公里的西颐宾馆，利用调查组的名义，背着北大党委物色打手和帮凶，往上搞！

曹轶欧首先想到当时担任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

聂元梓是河南省滑县人。她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大哥聂真是个老革命，并把几个弟妹都引导上革命道路。1937 年，聂元梓 16 岁时来到山西太原，在国民师范参加山西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 年又在晋城参加华北军政干部班学习。

日本投降后，她来到刚解放的东北。1946 年 5 月，她 25 岁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区担任区委副书记。1947 年，调哈尔滨任区委宣传部长。1964 年调入北京大学，先任经济系副主任，1965 年调任哲学系总支书记。

哲学系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著名学者冯友兰、朱光潜、梁漱溟、汤用彤、任继愈等都在系里任教。这批老教授周围团结培养了一批新秀。

往北大工作期间，聂元梓感到校领导对她重视不够，嫌自己的官太小，常常小病大养，不上班。“四清”运动开始，她积极参加揭阶级斗争盖子，混水摸鱼，受到批评，写过检查。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笔者访问过聂元梓，当时她佩带着红卫兵袖章时，已是 45 岁的 12 级干部了。

5 月 20 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5・16 通知》。聂元梓一边听着传达，一边想着 5 月 14 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讲话。陆平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委的指示，认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要注意内外有别。他说：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

陆平原是铁道部副部长，1958 年调来北大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1964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聂元梓因为左得出奇，曾受过党委批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指出，聂元梓这是一匹害群之马，不彻底批判，教育不得安宁。

聂元梓一直心怀不满，总是想伺机报复北大领导人。现在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在聂元梓看来，这是她雪耻的机会。

曹轶欧听了聂元梓关于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明确告诉聂元梓说：《5・16 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可以写大字报。

聂元梓认为，曹轶欧的话决不仅仅代表曹轶欧个人。

聂元梓从西颐宾馆回来，分头向北大哲学系的五位干部、教师“吹了风”。这六个人秘密集中到 23 楼的一位教师家里，分析了北大和全国的政治形势，聂元梓坚决表示要写大字

报，大字报来得快可以引起注意。并且决定先从 5 月 14 日陆平的讲话开刀。

大字报经过六个人的三次改写，5 月 24 日晚最后定稿。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首先描述了北大的形势：

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接着对陆平 5 月 14 日的讲话逐条批驳，说：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坚决不答应!”

“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了吗?……告诉你们……这是白日做梦!”

大字报还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大字报用毛笔抄清以后，加上临时碰巧来的一位研究生,签名的共七人。

5 月 25 日下午 2 时，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贴到墙上，马上惊动了整个校园，一大群师生围上观看了。三小时后，反击的 1500 多张大字报，就在聂元梓大字报周围贴出来了。一些师生涌到哲学系门口，高呼口号,“要找聂元梓算老账”，质问聂元梓为什么要贴反对党委的大字报，说“聂元梓是赫鲁晓夫式的女阴谋家!”,“聂元梓是党的叛徒……”

当晚，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北大讲话，传达中央精神，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他说：“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党内党外要分开。”

第二天，校党委派人在临湘轩同聂元梓谈话，劝她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沉思一会说：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事情闹大了。师生不同观点的分歧，引起了辩论。激烈的辩论中，发生了扭打。

师生扭打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派秘书张彦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提出“注意泄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特别强调贴大字报

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严厉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

康生得悉周恩来对聂元梓等人的态度以后，马上叫曹轶欧派人要来了大字报底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直接写信给在上海的毛泽东，并附上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的抄稿。

6 月 1 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大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这天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打电话问康生，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

最后，毛泽东说：5 月 25 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毛泽东指示康生将大字报立即广播，6 月 2 日见报。

6 月 1 日晚八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原文，并配合发表关锋等人起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诬陷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中还诬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

聂元梓听到广播大字报和评论文章，欣喜若狂。她手舞足蹈地说：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了!

2、掀起的风暴

广播大字报，中央许多同志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急匆匆地去问周恩来总理：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

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全国播出。

康生喜不自禁地从幕后走到前台。6 月 2 日，他坐着高级轿车来到北大，东瞅西看地在校园里快步走着。当他来到 30 楼和 32 楼之间的空场上，喧闹的人群立刻把他包围起来，拥上讲台。他连咳几声，向师生讲话：“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他还说，大字报一经广播，聂元梓解放，他也解放了。因为当时支持这张大字报，他也受到压力。

1966 年 10 月 12 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小组会议上，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自我吹嘘说：

“聂元梓大字报出来以前，我让曹轶欧等同志组织了一个七人调查小组，任务有三条：

第一看彭真在各大学校里搞了一些什么阴谋布置；第二，发现革命左派；第三，组织写文章。七人到了各学校了解情况，到了北大就接触到哲学系，促动了聂元梓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煽动下，全国党政工财文教等各条战线刮起揪所谓“陆平式”人物的邪风。北京 55 所高等院校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被揪斗，许多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被打成反动权威、学阀，惨遭批斗和迫害。

清华大学发生了揪斗教授的“6・7 事件”。

北京大学发生了“6・18 事件”。

6 月 18 日这天，北大的 40 多干部、专家、学者，被拉上“斗鬼台”，戴高帽，游街，搞喷气式。全校 69 人脸上被涂墨汁，身上被贴上大字报，被罚跪、游街、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而且还发生多起污辱妇女的事件。

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制止了混乱。当天晚上，工作组长张承先向全校师生讲话，明确指出，工作组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行动，今天发生的乱揪乱斗，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这种做法会被坏人利用，而且已被坏人利用。今天的事件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他要大家提高警惕。

工作组将“6・18 事件”写成第九号《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报告党中央。20 日，刘少奇把简报批转全国，并且加了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但是，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6・18 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江青知道这个信息后，伙同康生、陈伯达连续在 7 月 22 日、23 日、25 日、26 日和 8 月 4 日，多次亲临北大，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

7 月 22 日，江青在群众大会上狂叫：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7 月 25 日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再次来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揭发批判工作组以“反干扰”之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路线”。江青在长篇讲话时由于过分激动，竟然失去自控，把主席家庭内部的矛盾也公开抖露出来了。

康生在万人大会上，指责派工作组是“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指责工作组长张承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又说：“张承先还有一个十天情况的报告，这完全是反动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

7 月 26 日，江青在群众大会说：“有同学问，‘6・18 事件’是什么事件?陈伯达同志已经代我们说了，‘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

从此，北大党委被推翻了，工作组的领导权也撤销了。在康生一伙的直接扶植下，聂元梓等人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

北大乱揪乱斗干部、教授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被当作经验，通过放录音、巡回展览、讲演等方式，向各省市推广。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各级党委，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据估算，从 1966 年 7 月 29 日到 8 月 28 日一个月当中，来北京大学串联的共有 200 多万人次。其中仅 8 月 12 日这一天，来北大参观串联的即达 17 万人。

北大成了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据点。

3、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

聂元梓等人炮制的大字报广播后，许多人给中央广播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认为大字报歪曲事实。“北大不是西安是延安。”康生看了电台的《情况反映》，立即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这些打电话的人，大多数是好人，也可能有少数坏人，但是他们还蒙在鼓里。

1966 年 5 月 30 日，为加强党中央对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信请示毛泽东，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

5 月 31 日下午 3 时半，有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间会议室里，召开首都主要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的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最后，他宣布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名单。

邓小平讲完后，对陈伯达说：老夫子，你讲讲。

陈伯达不讲，倒是康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中心讲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开展阶级斗争问题。

等康生讲完了，邓小平宣布会议结束时，大声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工作。

当天下午五点，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接管工作。陈伯达在干部会上当场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原来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的领导，明天开始由各部干部推选领导人，报工作组批准。

会上，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说下去了。

当天晚上，陈伯达要工作组成员按照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起草了题为《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夜 10 点，陈伯达、王力、关锋赶来审阅稿件，陈伯达在一张纸上勾画了很长时间，拟了几个题目，最后才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按林彪的“5·18”讲话精神，明确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

1966 年 6 月 1 日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布置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集体起草评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

随后，陈伯达这个自称是一个“小小老百姓”的人，坐上高级红旗轿车，到了北京大学校园，挤在人山人海的人流里，在灯光里看了一个多小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回到人民日报时，对工作组的同志赞扬说：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

陈伯达审改了本报评论员的小样，将标题改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 月 2 日清晨，《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全国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

当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咄咄逼人地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谁还能不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呢?

4、派出了工作组

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党委都被“踢开”了，许多院校党委书记以及著名的专家学者被连续揪斗了。

“天下大乱”，首先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乱起来了。

毛泽东这时仍不在北京。炎热的夏天，他仍然住在杭州、武汉、长沙等地，从远方冷眼观察着北京的动静。

为稳定局势，党中央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

5 月 29 日，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原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派出工作组就代表党领导。邓小平同志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支持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报告毛泽东同意后，5 月 31 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 月 1 日，张承先率

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接着，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各单位，都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大、中学校“代表党委治校”，控制运动维持局面，许多院校和机关陆续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

但是，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传达时，立即遭到一部分头脑狂热发烧的师生们的反对。工作组和造反的师生普遍发生激烈冲突。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张承先等，遭到造反派师生的围攻。清华、师大等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革命精神的队伍，一批批涌进北大。

北大工作组为维持校内秩序，6 月 7 日，宣布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反复劝告北大师生要“坐下来学文件，要听党的话”……北大造反师生根本听不进这一套，他们秘密串联，四处活动。当听到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之后，造反师生反工作组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6 月 12 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揪斗 1926 年入党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压制革命”。6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社论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跨、斗倒。”

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相继发生“6・20”事件。师范大学谭厚兰等 17 人贴出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的大字报，质问《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孙友余在广播电话中澄清了事实，批评错误意见。

在反工作组的热浪里，清华大学发生了“6・21”事件。

20 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出生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6 月 21 日，他在校内一张大字报的批语里写道:“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回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夺权!”

6 月 24 日，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批驳说，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6 月 26 日，校内广大师生举行“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把蒯大富定为右派学生。蒯大富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宣布进行绝食斗争，消息传出，清华园一下轰动起来了。

陈伯达闻讯，立即派人去慰问蒯大富。

7 月 20 日陈伯达同江青到北京大学讲话，宣布他一个月前说的北大“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陈伯达的话，对各大专院校的造反师生，无疑是火上加油。自此，各大学的反工作组浪潮更加高涨了。

7 月 22 日，刘少奇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邓小平支持说："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不赞成撤工作组。

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张，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恶毒攻击。张春桥恶狠狠地说："6 月 20 日的反动命令(指刘少奇对北大简报的批示)，是想把毛主席点燃起来的革命大火完全扑灭，是彭真《二月提纲》的继承和发展。"

5、"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北京发生的混乱情况，经江青、康生之手，接二连三地密报给隐居在湖南韶山冲滴水洞里的毛泽东。

滴水洞，不是洞，而是距毛泽东故居不远处的一条狭长的山谷。笔者走进幽静、清深、苍翠的山谷，鸟语花香，水声潺潺，仿佛步入别有洞天的仙境。

1959 年 6 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时，曾对湖南省委书记说：等到我老了退休，可以在这里搭个茅棚子住。

1960 年开始，这里开始修筑毛泽东的山间别墅。这栋舒适、安静、豪华的"茅棚"，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普遍饿肚子的时候筑成的。

1966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滴水洞。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小时候曾到这里放过牛，砍过柴，向大石鼓山上的一块石头娘娘，叩拜过头，在虎歇亭里憩躺过。

6 月 17 日至 28 日，隐居在滴水洞的毛泽东，冷静地思考着"文化大革命"。28 日他离开湖南到武汉。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态，7 月 8 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极为机密的"左右开弓"的信。

这封直至 1972 年 5 月批林整风时才印发的信，对林彪、刘少奇都做了批评。现摘要如下：

"……28 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

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在这封提倡“天下大乱”的信中，坦率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期望。周恩来、王任重看过这封信。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将信的内容转告林彪。林彪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把原信销毁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抄件。

6、“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7 月 16 日，73 岁的毛泽东，在 10 万人的欢呼声中畅游长江，表现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雄伟气概。

7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赶快前来求见，却被秘书挡驾了。捷足先登的陈伯达、康生，正在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次来见毛泽东。没等刘少奇谈几句，毛泽东就开始批评了。

毛泽东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群众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7 月 24、25 日两天，毛泽东连续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又增加来京的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家派人到中央?……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样怕?毛泽东又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撤出工作组。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派去的工作组，有些又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好下场。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消工作组。

26日晚，陈伯达来到北大，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撤销张承先工作组。他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他号召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江青在会上用已经嘶哑的嗓子说："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7 月 27 日，陈伯达、康生带领文革小组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他们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7 月 28 日，江青还在一次会上煽动武斗。当时有人向她反映社会上出现许多人打人、"喷气式"等野蛮行为时，她竟笑笑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7 月 29 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李雪峰宣读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后毛泽东修改、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的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周恩来在讲话中都说，"文化大革命"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讲话刚刚结束，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 118 室的毛泽东，突然从主席台幕后快速走到前台上来。据亲眼目睹现场的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穆欣回忆说："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拣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他没有说话)，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

工作组被撤销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揪斗工作组长的事情。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为揪斗工作组长，在国防科委静坐 28 个昼夜，轰动全国。各地学校相继发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的浪潮。从此，几乎所有的学校都陷入无领导、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学校门窗玻璃被打碎了，雪白的墙壁被涂污了，桌椅被打烂了，校长教师被揪斗了，读书声听不见了。在正常人看来已经乱得不能忍受的时候，江青、陈伯达一伙人却认为乱得还不够，乱得不深，乱得不透，他们到处奔走鼓动，要乱深乱透，越乱越好！

1966 年 10 月 5 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明确宣布要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要为"反革命"平反，要把"坏家伙"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紧急指示》还明确宣布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取消总政治部过去的有关规定。为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10 月 5 日、6 日分别召开军队院校 10 万人和地方院校的 10 万人大会。

1966 年 10 月，《红旗》杂志 13 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

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从此，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周恩来不同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并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经毛泽东同意，最后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毛泽东主持下，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重点，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责他们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在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的全体会议上，做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这个讲话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纲，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批判“怕群众，怕革命”，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国民党的‘训政’”，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大会上做检讨，承认在派工作组等问题上有“错误”。为了不使批判祸及他人，邓小平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10月25日，林彪讲话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说什么“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凡是过去认为是正确的，现在都被造反派看作是“反动”的。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善与美，是与非，全被颠倒了。抄家、殴打干部、捕人等非法行为，可以不受约束地任其横行，而干预制止不法行为的正当措施，却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全社会普遍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党政、企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各机关团体和企业普遍瘫痪、半瘫痪，党的基层组织活动都陷于停顿。

毛泽东对这种严重的社会混乱状态，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认为是“合理”的，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乱”表现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7、一幕丑剧：《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1966年7、8月，烈日炎炎。首都市区蒸腾的热气，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通往北京大学的公路上，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和步行的红卫兵，混交一起，践踏着焦干、滚烫、发烧的道路。笔者挤在汗水淋漓的人群里，听人们谈论着新近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北大青年团的一名干部，公然在大字报里说，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北大联系，要在 44 号楼里住一部分军队，还要在人民大学住一部分军队。他说，这是贺龙、彭真、刘仁企图搞“武装政变”的准备。

在那些日子里，一些被“怀疑一切”迷魂药弄得神经过敏症和近乎癫狂的年轻人，热衷于从书刊的封面上，发现反毛泽东的敌人；从报纸印刷正面和反面的缝隙里，发现反革命的可疑踪迹，以致闹出一幕幕造谣惑众的丑剧。这篇“政变”大字报只是其中之一。

大字报的“政变”消息，迅速传到海淀区武装部，传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传到各机关团体，闹得北京满城风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北京卫戍区的同志事后告诉笔者，事情真相是这样的：

1966 年 2 月 4 日，中央军委指示，为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北京军区新建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承担民兵训练和维持社会治安任务。卫戍区为集中训练新兵，先派人到房山、大兴、通县等地为部队寻找住房，均没有适合住地。这时，海淀区武装部同志建议说，现在有些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参加四清，有些空房子可以暂时给部队借住。负责找房子的同志，先后到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等校交涉借房。人大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认为，军队住进学校，影响学生的学习，同时，参加四清的学生也要很快回来学习，学校没有空房可以借出。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绍文也感到，军队住在学校不大合适，决定让部队在南苑部队营房里，挤出一些房子给新建的团队。他们还通知学校，军队不再进学校借房了。

这件极普通的事，却被野心家当作煽风点火的热点了。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个学生，看了从北大抄来的“政变”大字报，马上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质问当时已调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大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他认为，从中央到北京市委都有人在搞二月兵变……

当时在北师大担任工作组长的孙友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挑拨，在大会上对大字报进行了批驳。

野心家康生听到这件事，马上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在 7 月 27 日赶到北京师范大学，不经任何调查，在师大群众大会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

“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个营的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

他在讲话中公然污蔑孙友余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是在替彭

真辩护。康生还说：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回事。

康生还把郭影秋叫到钓鱼台，在中央文革小组质问郭影秋：北师大有人写大字报，说有人要搞二月兵变，在人大、北大要驻一部分军队，你知道吗?

郭影秋说：没有看过大字报。这件事我知道。

康生：你知道，汇报过没有?

郭影秋：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

7 月 28 日晚上，人民大学师生听了康生讲话，一些师生信以为真，连夜冒着大雨到北京市委把郭影秋揪回学校。在深夜一点多钟的批斗会上，给郭影秋戴上高帽子，连续地揪斗了几个钟头……

为了戳穿康生的阴谋，保护一大批干部，当时处境已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在 8 月 2 日的人大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说：

“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接着，他又说：“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惟恐天下不乱的康生，却继续血口喷人。8 月 4 日，他再次到北京大学讲话，强调所谓“二月兵变”确有其事。他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事后交待，康生为打倒贺龙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怕别人不相信，还讲了兵变的细节，说贺龙“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

1968 年 4 月 27 日，康生还凭着个人主观的幻觉，对中央专案办公室的人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七百条。

1968 年 5 月 24 日，康生又对专案人员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在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康生“由此及彼”的株连法，诬陷迫害了许多干部。贺龙在康生信口雌黄的诬陷下，被设立专案审查，其中重要罪名之一就是搞“二月兵变”。

身为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委员的许光达大将，就是被所谓“二月兵变”株连的牺牲者。

1967 年 1 月中旬，海军政委李作鹏在海军大院向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和三总部

造反派代表讲话，诬陷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

许光达对揪斗他的造反派，平静地说：“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在“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久经战火的大将，挺直胸膛，幽默地高声说：

“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

顿时会场上有人笑了起来，也有人大嚷大叫起来。他的家被抄了。8 月 14 日，他被捕了。审讯时，他被拳打脚踢，打得遍体鳞伤。有几次因心脏病发作，当场昏死过去，弄醒后又继续打。有两个打手边打边说：“你许光达是大将又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就让你知道一下革命小将的厉害!”

1969 年 6 月 3 日晚上 8 时，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了!

第六章 第二次战役

1966 年 3 月底，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提出“向中央进攻”的方针。

为什么要“向中央进攻”呢?

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开展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1、炮打司令部

1966 年 8 月 1 日到 12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按照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开两次会议。可是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在党的十中全会过了近四年之后，才开党的十一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继续得到发展，他以个人领导取代了党中央的集

体领导。按照当时的说法，通过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定了最坚决、最忠诚、最彻底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

8 月 2 日，刘少奇到他的联系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讲话。谈到工作组问题，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

8 月 3 日，刘少奇在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8 月 4 日，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讲话，检讨说：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

8 月 4 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尖锐批评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人员十分震惊。尽管他在会上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实际上他对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已经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无限上纲，萌发了“残酷斗争”！

参加党的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 141 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 47 人列席了会议。根本不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曹轶欧、聂元梓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等人，却没有参加会议。

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刘少奇、李雪峰等人相继检讨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

对刘少奇的检讨，毛泽东很不满意。8 月 5 日，他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直指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

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写在 6 月 2 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边角上。

当天，毛泽东的秘书把大字报用毛笔抄写在两页信纸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注明时间是 1966 年 8 月 5 日 3 时。

8 月 7 日，这张大字报印发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志。会议的气氛更加紧张。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在小组会争相发言，指名攻击刘少奇。原来曾是刘邓大军的谢富治，马上改变面孔，转过头来，猛攻他的首长邓小平，成为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人。

8 月 17 日，《炮打司令部》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迅速传遍全国。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一个“炮打”中央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省市领导机关的狂潮。

8 月 6 日，毛泽东在他写大字报的第二天，指示秘书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火速来京。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林彪乘专机回到北京。

林彪一回北京，马上在 8 月 8 日晚接见中央文革成员。他宣布“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他说：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的威信扫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 月 8 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十六条》指出：这场革命的任务是：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在 1964 年《二十三条》中也曾明确提出过。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再次“把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向外公布了。

2、从信任、分歧到打倒

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种分歧，是经过逐渐演变而公开化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经历了信任、怀疑、警觉，到一棍子打死的几个时期。

我熟悉的原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出狱后，曾在北京医院对笔者说：“毛主

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是有历史根源的”。

张子意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搞农民运动。1931 年任中共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长征。1937 年底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0 年回国经新疆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1946 年后任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对党的历史十分熟悉。

1939 年 7 月 8 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后来，这个讲演同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等，被列为《整风文献》。

在四五十年代，毛泽东多次赞扬并大力支持刘少奇的工作，并且在不同场合提出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1941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称赞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的“正确的领导人物”，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1945 年 4 月 20 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1945 年 4 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做完整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一次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

1953 年 12 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主张，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活动，诬蔑刘少奇有“圈圈”。毛泽东明确指出，刘少奇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要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政治报告。

1956 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副主席，名列四位副主席之首。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情况时，说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

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扳起指头评价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 年加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和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

1958 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再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59 年，毛泽东主席本人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我应该退到后台去了，让别人干。

经党中央讨论和毛泽东同意，1959 年 4 月 28 日，刘少奇被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分歧，是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发展，逐步扩大起来的。

1958 年毛泽东提倡的“大跃进”运动，历时三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1961 年 5 月，刘少奇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炭子冲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到灾难的严重情况。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

刘少奇认为，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他经过亲自调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尽管如此说，他对刘少奇的话却很不满意。

林彪的讲话则是别有心意。他为骗取毛泽东的信任，掩盖真相，大肆吹捧说：“凡是按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们就胜利，革命就发展；凡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遭受挫折，事业就会受到损失。”对最近几年由“大跃进”造成的困难，他说：“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林彪的弦外之音，就在掩盖毛泽东的错误。

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作用，但对成绩和错误的估计上，中央领导核心仍存在着分歧。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他发现我国财政存在严重的赤字，就提出当时是处于非常时期，应采取非常政策。他提议由陈云同志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同时，在政治上对 1958 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搞错的干部给以平反，对 1959 年反右倾受到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也大都平反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后来实践证明，他是不满意的。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是右了，刮了“翻案风”、“单干风”，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

1962 年 9 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的“采取快、准备慢”的形势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邓子恢、陈云支持的“包产到户”，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历史问题，批判为“翻案风”。毛泽东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讲话，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以经济工作为主，变成了以讨论阶级斗争为主。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说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刘少奇不同意这个观点，特别是不同意“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他认为，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联想到这次会议刚开始时，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出于好意，曾说过“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了”的话，产生了疑心。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大发脾气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十分关注。有几位同志找刘少奇谈话，劝说刘少奇应主动向毛泽东检讨，不应该在毛主席讲话时插话，并说，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

刘少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后来他还在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但是毛泽东仍然不满意。他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问题。”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对洛阳拖拉机厂的一个文件的批示中，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他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他说，“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住了问题”。

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坦率地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毛主席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看作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说，“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公开了党内领导核心的分歧。从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被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对这次会议，许多人想不通，思想上存有种种困惑和怀疑。连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也承认：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1967年5月，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又说：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

尽管思想不通，迫于形势和政治压力，一些人还是投了赞成票。会议批准通过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中央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对于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起了“前车之鉴”的示众作用。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都不敢讲，只好随大流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 11 人。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陈云外，新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进了中央常委。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中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由毛泽东的所谓“亲密战友”林彪取代了他。

原来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后面的邓小平，在江青找了林彪后，改排在第五位。陈伯达排在第四位。江青不满意，说：“老夫子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陶铸成了第四位，邓小平成了第六位!

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却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却都榜上无名了，报刊和党的文件都不再提及他们的副主席职务。

林彪在 8 月 13 日至 17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这就是“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宫，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林彪的三条罢官标准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林彪还在讲话中提倡盲目服从。他说：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并且确定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至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完成了组织准备和程序。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巨澜，在全国开闸泛滥了。

3、阴谋与骗局

1966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2 时到 4 时，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向清华大学造反派司令蒯大富布置说：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回到清华园，立即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旨意。19 日，在蒯大富主持下，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公开叫嚷：“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

1966 年 12 月 25 日，“井冈山兵团”开始把“打倒刘邓大行动”的计划，推向全北京市。

这天上午，寒风刺骨，沙尘弥漫，蒯大富带领五千余人，从清华园来到天安门广场。然后，他又兵分五路，由广播车嘶喊着开道，分别拥向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地，喊口号，散传单，在北京街头到处贴满“彻底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从中央滚出去”“打倒刘少奇”等大字报、大标语。

中南海造反派贴出诬蔑朱德的大字报，高呼“炮轰朱德”的口号，扬言要把朱德及其家属“轰出中南海”！

1967 年 1 月 6 日，蒯大富一伙排演了一场“智擒王光美”的丑剧。

这天，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放出谣言说，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汽车轧断了腿。刘少奇、王光美听后十分焦急，立即赶到医院，方知他们被骗了。

王光美严肃地对一伙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

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望着头顶的天花板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一月上旬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家里，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了大标语，在批斗会上，他们逼着刘少奇当场背毛主席语录。刘少奇镇定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

造反派被刘少奇说得无言可答。他们喊叫一阵口号之后，哄闹着散去了。

1967 年 1 月 13 日深夜，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去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接着，刘少奇诚挚地向毛泽东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自己日夜考虑的要求。他说：

“一、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思不语，只是连续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从两位老战友当面热诚友好的谈话里，刘少奇怎么会想到等待他的，会是更加强暴冷酷的批斗风暴呢?

过了两天，中南海的一批造反派，又一次冲进刘少奇的家里。他们强迫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折磨侮辱他们。刘少奇迎着刺骨的寒风，镇定地面对着乱嘈嘈的人群，响亮有力地说：

“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严酷的冬天里，也有春天的信息。1967 年 1 月 16 日深夜 12 点以后，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听到这无限温暖的话语，王光美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谢意。

17 日清晨，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他的电话。刘少奇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去阻拦他们，斩钉截铁高声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

第二天，这伙人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扯断了电话。

从此，刘少奇断绝了同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从此，作为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再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

4、无耻的诬陷

1967 年 3 月 30 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

4 月 1 日这天，人民日报和全国报刊都刊登了戚本禹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

这篇按照毛泽东意图写成、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文章，混淆是非和敌我关系，诬蔑刘少奇“不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气愤地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4 月 6 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勒令他必须自己做饭、

打扫卫生、洗衣服。他们还根据戚本禹文章中的所谓“八大罪状”，向刘少奇提出质问，要刘少奇回答交待。

刘少奇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

当质问到所谓 61 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刘少奇一下子发了火。他满腔怒火地说：这个问题简直岂有此理。61 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4 月 7 日，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抄送上报，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但是几小时后，这张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林彪、江青一伙，完全剥夺了刘少奇讲话答辩的一切权利。在斗争会上，每当刘少奇用事实进行答辩，造反派就用《毛主席语录》的红小书，敲打刘少奇的嘴和脸，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刘少奇讲一句话。刘少奇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矛头直指刘少奇，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

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举行了 30 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指使下，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旗袍，戴上用乒乓球穿成的项链。王光美随同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奈温将军曾赠送王光美一条金项链。这次他们就给她戴上用长串乒乓球穿成的“项链”，对她进行侮辱，用下流无耻的语言谩骂她，并对她拳打脚踢。

造反派来揪她去清华大学时，王光美同清华的来人在办公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刘少奇的秘书回忆，造反派要王光美必须穿上她随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国穿过的衣服，而她坚持不穿。王光美严肃地对他们说：要我去检查，为什么要我穿出访的衣服?

造反派蛮不讲理地说：你出访时穿戴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次去检查也必须包括这些内容。

王光美愤怒地说：我去检查也只能穿我在那里参加运动时穿的衣服。

王光美愤怒抗议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会上，有人逼迫王光美，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王光美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永远不反!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

王光美回来后，向刘少奇倾诉了满腔的愤恨和冤屈：“他们打人、骂人、侮辱人都干了，他们批斗我，为什么还要彭真、薄一波、蒋南翔等同志去陪斗，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是在侮辱我们的党，侮辱我们的国家!”

5 月 8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中央随即发出通知，说明 5 月 8 日文章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5、刘少奇：“我失去了自由!”

1967 年 7 月 18 日，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指使下，中南海造反派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会前，江青在戚本禹的批斗刘少奇的报告上划了圈，并划了一道线，表示同意。康生圈阅后并写了“同意”。

陈伯达亲笔将报告中“少奇”二字圈掉，加上“邓陶夫妇”四字。这样一笔之下，就把批斗范围从刘少奇一人，扩大到刘、邓、陶夫妇六个人。

7 月 18 日凌晨四时，戚本禹急急忙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动员中南海的造反派斗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会上，戚本禹尖声叫嚷：江青发火了。中南海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最前线，外边搞得轰轰烈烈，中南海冷冷清清，像什么样子。要立即组织批斗大会，大打人民战争。战斗一开始，火力要猛，用力要狠，杀气腾腾，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两只脚!

动员会开过之后，紧接着在中南海分两个会场，批斗了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按照江青的部署，批斗会一边还在进行，一边即派刘少奇专案组冒充“造反派”，抄了刘少奇的家。刘少奇的亲笔文稿、照片和往来信件，片纸不留。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广播打倒刘、邓、陶大会的情况。

第二天，中南海的所谓“革命群众批斗刘、邓、陶指挥部”，专门出了第一期《战报》。报载：

“批斗刘少奇大会于 7 月 18 日 21 时 20 分，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召开，至次日零时一刻结束；到会的有三百多人”，批斗时，刘少奇“被打得汗流浃背”。

刘少奇这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被造反派按着头，弯腰站了两小时。当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时，造反派一掌把他的手绢打落在地。

同日，批斗王光美大会于夜晚 21 时 3 刻，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召开。这次批斗会一直到次日凌晨结束。

据同期《战报》记载：“会上王光美的气焰十分嚣张，翘鼻子，瞪眼睛，指手划脚，……

群众质问她，她抵赖说：‘我没有这回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讲，‘我不能乱说呀’等等。群众令她住口，她还叽哩哇啦地继续讲。不仅如此，她还公开为刘少奇和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过去就反对过……”

8 月 5 日，江青、康生指使一伙人，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各家院落里，举行批斗刘、邓、陶大会，呼应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人大会。

刘少奇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批斗会上，被暴徒揪着头发，打得鼻青脸肿。他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脖子上还挂着画有绞索的漫画，被人推来推去。

一位目击者写道：“批斗会搞得目不忍睹，极尽摧残之能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揪头发、大弯腰，一片混乱……”

面对造反派的种种诬陷和压力，刘少奇坚持原则，心平气和，对一些诬陷之词，给以严正驳斥。当一些人喊打倒老干部的口号时，有几个人揪着刘少奇的头发，质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喊口号。

刘少奇大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批斗会结束以后，刘少奇同志被押回办公室。他把机要秘书叫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怒地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他愤怒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激愤地说：“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准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8 月 8 日，刘少奇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他亲笔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说：“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在他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正式用书面形式向毛泽东提出辞呈，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毛泽东：“我失去了自由。”

1968 年 10 月 13 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了。在这次会上，专案组用他们炮制的伪证据、假材料，用栽赃陷害等手段，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帽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千古大冤案。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后，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道：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不要以为搞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不可能的。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在分组讨论时，康生点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纺织部长、中央委员陈少敏大姐表态。他问陈少敏：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陈少敏平静而庄重地回答：我不知道!

康生又紧逼一步：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你知道不知道?

陈大姐大义凛然，寸步不让：少奇同志即使有错误，还可以检讨嘛!

康生狠盯着陈少敏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可要考虑后果！

10 月 23 日，十二中全会的《简报》里这样记载："陈(少敏)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表态……一些人对她提出了严肃批评，说她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

10 月 31 日，大会举手表决。陈少敏顶着政治高压，闭目沉思，不理会周围发生的一切，坚决不举手!

这位铁骨铮铮的女英雄，是几百个与会委员中唯一不举手的人。

1968 年 10 月 31 日，适逢刘少奇 70 诞辰。恰在这天，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刘少奇从广播中听到给他头上戴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大帽子后，体温突然上升到 40℃。他趴在床上，怀着无比的愤恨，气得浑身颤抖，爬不起来……他一连多天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

1967 年 7 月 18 日，刘少奇对夫人王光美说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在心底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灾难的折磨。

6、"阎王爷请他喝烧酒"

江青为迫害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直接控制、主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

1967 年 7 月 18 日，为调查刘少奇"叛徒"材料，江青亲自批准派人到沈阳查档案。他们组织四百多人，历时两个月，查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阅了 245 万份档案，没有发现刘少奇一件"叛徒"材料。

可是，江青却血口喷人。1968 年 9 月 16 日，她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注，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这个美特身份是有足够证据的。"

9 月 29 日，林彪写信对江青所批的诬陷之词，表示“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 年 9 月 18 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讲话时，忘形地叫嚷：

“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实在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呵，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剐!”

十年后，当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的时候，法庭值庭人员播放了她的讲话录音。笔者当时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清楚地听到值庭人员问江青：这是否是你的声音?

江青点点头，说：我听出是我的声音！

为制造刘少奇是“大叛徒”的伪证，从 1967 年 5 月到 10 月，由江青亲自决定逮捕关押了 11 人，长期进行监禁。他们还对被捕的人进行“突击审讯”，刑讯逼供，制造假材料，迫害致死四人，株连受害的，仅北京市就有 64 人。

孟用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1929 年 8 月 22 日下午，他同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沈阳奉天纱厂同时被捕。

江青指派人连续向孟用潜逼供。孟熬不过连续逼供，按专案组的口供编造了假证。后来，孟在狱中二十次写信声明，说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但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准上报。

当时任满州团委书记的王鹤寿，坚强不屈，顶住压力，鉴于当时团委没有遭受破坏，所以写材料证明：“因此我没有理由推断刘少奇在被捕后叛变了。”

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丁觉群担任满洲临时省委书记。他几次派杨一辰到狱中了解刘少奇、孟用潜的情况。江青、康生、谢富治、陈伯达就以他是刘少奇的重要知情人，将其关押。

丁觉群被逼供后不久，就翻了供。1967 年 7 月 27 日，他在狱中写给专案组的信中声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

1967 年 7 月 27 日，江青、康生等人批准逮捕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专案组在报告上写道：“为清查刘少奇 1929 年被捕叛变问题，我们曾多次与杨谈话，杨的态度极不老实，根本不谈实质问题。为了查清刘的问题，取得旁证，我们意见将杨一辰调来北京，交卫戍区监护隔离审查。”

江青圈阅同意。

天津市香港路一号居民王广恩，已 74 岁，1929 年他是奉天纱厂协理。专案组在向江青的报告中写道：“王广恩是策划参与逮捕刘少奇、孟用潜重要当事人之一，对刘、孟被捕叛

变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但王的态度极不老实，只讲刘、孟被捕的一般经过，实质问题只字不露。我们派人协同天津市公安局先后同他谈了八次，均未突破。”因之，报告提出“将王广恩拘留起来，突击审讯，为突破刘少奇叛变问题提供旁证”。

江青圈阅同意。王广恩被拘留后，经过多次“突击审讯”，迫害折磨，扣留后不到四十天，于 1967 年 8 月 27 日因突患感冒，发高烧，高血压复发死亡。

江青为逼供知情人供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还“监护”了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

王世英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党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在他半身不遂、身患肺癌、生命垂危的时候，江青批准对他“加紧突击审讯”。

王世英说：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在 1968 年 3 月 26 日被迫害致死。

对王世英的死，江青大发雷霆。她在 1968 年 3 月“在八个专案组会上讲话”中说：

“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没有死，你们右倾。”又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7、无休止的审讯

江青为打倒刘少奇，把魔爪伸向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诬陷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江青为制造王光美是“特务”的诬陷材料，连续不断地审讯迫害所谓“知情人”。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的张重一，解放后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夫人袁绍英，杨认识王光美。这种隔了几层的熟人，竟也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留起来，连续审讯。

张重一身患肝癌，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但江青、谢富治却批准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匆匆赶来的老卫士长李太和，轻轻贴近躺在地下室过道地板上的老首长的遗体。他身上盖着一条白布单，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抹去眼泪，为他修剪胡须，修剪足有一尺长的白发……

15 日深夜 12 点，刘少奇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车厢容纳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露在车厢外边……

火化时，没有亲人哭声，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刘少奇 123 号的骨灰盒上，改写成“刘卫黄”的假名字。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职业革命家，骨灰证上却填着“无业”。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千万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化身！

1980 年 2 月 23 日至 29 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纠正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历史证实了刘少奇的千古真言：“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8、最大的“保皇派”

在“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日子里，1966 年 6 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长，负责宣传文教口、组织口的工作。

这个 1926 年入党，参加南昌暴动的共产主义老战士，热情爽朗，心胸豁达，能文能武，有人情味，受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热爱。他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即在 1966 年 8 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会议期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了能把这次会开好，江青特地先来向陶铸“交底”，动员他带头向刘、邓“开炮”。江青说：“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是向左派交底。”接着又说：“我喜欢打炮，你也喜欢打炮。你是最有资格打炮的。”

陶铸严正拒绝说：“我不行，讲不出什么，更不能开头炮。”

政治局的生活会上，谢富治带头开炮，猛轰刘少奇、邓小平，批评刘、邓“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面对一边倒的批判发言，陶铸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茶，好像一株挺拔的青松，一言不发。后来他对妻子曾志说：

“1954 年我在党代会上就讲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的了，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

陶铸说，说我保刘、邓，我承认。可我并没有私心。我跟刘少奇 1942 年才认识，还朝他开过炮，谈不上渊源。我对他的好感是在实际接触中渐渐增加的。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

粮库搞得粒粒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他的观点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又反过来骂他，那我还算什么人?

“一屁股坐在刘、邓一边”的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可是，他根本看不惯江青、陈伯达一伙的“那一套”，经常在文革碰头会上或接见各省市代表会上，同他们“大吵大闹”。

一次，文革碰头会上，江青跷着二郎腿，喊着陶铸的名字，盛气凌人地质问他为什么不去社会科学院宣布某人为革命左派?

陶铸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认为此人确有历史问题，不能随便封他为“革命左派”。陶铸摇着头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不料这句话却激怒了江青。她挖苦道：“至于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被江青的无知和敌意的挑战激怒了，像火山爆发一般怒吼起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是什么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江青万万没有想到，敢于“放炮”的陶铸，第一炮竟然是打她这位“第一夫人”。她愤怒，她羞愧，感到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大面子。她猛地从沙发里跳起来，对着陶铸尖叫：“你给我去，到学部去，你非去不可!”

陶铸毫不退让。他睁圆眼睛，像一头猛狮，随手拍着茶几，一下从沙发里跳起，高声说：“我就不去!”接着又吼道：“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大哭大叫了。她嘶哑着嗓子：“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是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会开不下去，周总理只好宣布散会。

对于陶铸的这种“不合作”态度，江青怀恨在心。江青授意关锋用给她写信的形式，诬告陶铸。

1966 年 11 月 27 日，关锋果然写信给江青，攻击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还列举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

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

在这期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也调来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由于工作过分劳累，他的肝炎病更重了，加上常遭江青一伙人的围攻，身体一天天坏下去。陶铸出于对王任重的关心，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调王任重回中南休息养病。

1969 年 10 月 18 日夜晚，身患胰腺癌的陶铸，在病痛的严重折磨下，被一架专机送到合肥。但他的亲密伴侣曾志却不准与他同行照顾，反被发配到广东农村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他唯一的女儿陶斯亮也被流放大西北。一家骨肉三口人，在他临死前都没能见过一面!

1969 年 11 月 30 日 22 时 15 分，陶铸被折磨死在合肥市一间不见阳光的黑屋里。逝世后，那双燃烧着仇恨火焰的大眼睛，仍然圆睁着，不肯闭目!

他的遗容没有修整，他的遗体没有覆盖红旗……

他的遗体用一床白布裹着，迎着哀号的寒风，在火焰里化为灰烬!

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40 多年的钢铁战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BT1〗第七章　啊!红卫兵

1966 年的夏天，首都东西长安街的柏油路晒软了。匆匆行进的燥动人群里，大都是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大中学生。这些血气方刚、幼稚的年轻人，到处大喊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毛泽东在武汉说：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有冲破旧势力的勇气。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

在“疯狂的年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汹涌彭湃的洪流里，红卫兵起初像搏斗在暴雨中的海燕，继之就被野心家转化为极左路线驱使的犬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蒙骗操纵的工具。他们“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到处横冲直撞，施虐天下；最后淹没消亡在自相残杀的武斗中，殉葬在一幕幕血与火的历史悲剧里!

9、“造反”的产儿

笔者访问过许多红卫兵。包括所谓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尽管他们各人的经历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

红卫兵组织是“造反有理”的产儿。

红卫兵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在一代青少年头脑中的反映。

红卫兵是左倾的观念在组织上的体现。

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所谓“火红的年代”。

请看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北京清华附中高中学生卜大华，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1986 年第 10 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他的《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在这篇自述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红卫兵运动从发起、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卜大华这样描述着诞生红卫兵的历史社会环境：

“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4 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卜大华的分析和反思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的实际。六十年代，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动向，在一代青少年中引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痕迹，阶级斗争的烙印。

“1966 年 5 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到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学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 1957 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五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绝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话剧来。”

5 月 29 日夜晚，卜大华等清华附中十多位同学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废墟上，决心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确定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多数人赞同“红卫兵”。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

同一天，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保卫党中央，为

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张大字报末尾署名红卫兵的后面，有一百多个同学签了名。

6 月 2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大字报一贴出去，震动了工作组和全体师生，工作组非常紧张，问青年学生对"造反"二字如何解释?他们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

卜大华不慌不忙地拿出一篇评论文章，文内引用了毛泽东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从此，"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切活动的理论基础。

第七章 啊!红卫兵

7 月 25 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他明确宣布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犯了错误，压制学生，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

而在此前，所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却被当作反革命组织，一度被勒令解散。

不屈服压力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恐怕第一张大字报阐述得不清楚，决定再写一篇大字报。于是就有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 月 27 日，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同前两论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些华丽的词藻，并且说：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红卫兵感到有压力。但卜大华等人反复琢磨，认为："我们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

于是，7 月 28 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把"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

8 月 1 日至 12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复信给清华

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小将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

毛泽东在信中说：红卫兵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在信中同时指出：“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信，在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为第二个文件广为散发。在这封《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还附着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两论”。

8 月 3 日，当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者们召见到钓鱼台，并给他们看了全会的第二个文件时，这些年青人惊喜万分。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1、天安门上的接见

红卫兵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他们成群结队涌向清华附中去看大字报，并纷纷署名红卫兵写大字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热烈支持。

一些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北大附中、八一学校、地质学院附中、北京市 25 中等学校，为了区别八月以后一哄而起的红卫兵，自称是老红卫兵。

8 月 17 日，毛泽东为鼓励北大造反的学生，给北大校刊题写了《新北大》的刊名。毛主席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热潮中的革命师生。8 月 24 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

真正的高潮是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和师生。

这天，天不亮，各学校的学生和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到天安门广场。

这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同许多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天，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上军装，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带着兴奋激动而严肃的表情，从东侧走向西侧，俯视着欢腾的人海，频频地向欢呼的人群招手。笔者站在金水桥边，目击了动人的情景。

在天安门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把红卫兵袖标戴在满面红光的毛泽东的左臂上。她兴奋而紧张，以至有些慌张。戴好以后，正当她回身要走时，却被毛泽东叫住了，问她：

“叫什么名字啊?”回答说：“彬彬”。

“文质彬彬的彬吗?”

女学生点点头：“是”。并伸手在手心写了一遍。毛泽东笑着对她说：“要武嘛!”女学生当天改名“要武”。第二天，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讲为什么改名“要武”的短文。

从这天起，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即使是旧军装，也都成了那个时代最时兴的时装。

8 月 19 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出通栏大标题新闻:《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新华社在这条长篇新闻里写道：“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头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新闻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看到百万群众的动人场面，心情很激动。他对并肩站在天安门上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数十万红卫兵挥舞着红色《毛主席语录》，像是一片烈火在燃烧。

清华附中学生周晓春跳着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卫兵把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看作是对红卫兵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使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处处受到抵制的形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可以说，红卫兵的出现，真正开创了毛泽东希望出现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天下大乱”的新局面。

毛泽东从接见红卫兵和师生的狂热场面里，看到这些被称为“勇敢的闯将”的青少年，是一支可依赖的“革命造反”的突击力量。为了使他们能在更大范围内“造反”，从 1966 年 8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他曾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达一千多万人，使对他的个人崇拜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

周恩来怕来京串联的人太多，把铁路大动脉搞乱，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说：这有什么关系?不要紧，都要让来，管饭，乱就乱一阵!

2、“向旧世界宣战”

“8·18”大会上，党内第二号人物、居于副统帅地位的林彪，同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上，首次发表了煽动打倒一切的讲话。他说：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在这里林彪连着讲了要打倒的几个“一切”!

接着，他又号召“展开猛烈的进攻。”他说：“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的讲话，经过了毛泽东审阅。

林彪相继在 8 月 31 日、9 月 15 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鼓动红卫兵和青少年，冲破一切阻力，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他说：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当红卫兵从校园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开始大规模破坏的时候，林彪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再表示：“坚决支持你们!”他鼓励说：“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好，做得好!”

1966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在《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对这种“在空前未有的广阔规模上发动的对旧世界、旧思想的批判”，错误地美化为“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说什么“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号召“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认为经过空前广大的批判运动，“一个七亿人民尽舜尧的伟大新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动听的预言，狂热的煽动，疯狂的野蛮的破坏，带来的是泪水横溢、血迹斑斑!

7 月，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有人贴出宣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的还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辩论血统论时，许多学校出现“红五类”(指出身好的)学生歧视、污辱、斗争“黑五类”(指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事件。红卫兵运动出现了分裂。

8 月 19 日这天，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

卫兵在街道上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布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全是“旧世界”。“我们要造旧世界的反!”大字报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裤不穿!……”

紧接而来的，是红卫兵在大街上拦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许多妇女被戏弄、侮辱。她们穿的各色裙子、窄裤管也被剪开。街头一片混乱。绣着精美图案的传统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里，纵火焚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红色风暴越刮越烈。8 月 20 日开始，蜂拥街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造反歌，到处打、砸、抢，刷标语、贴传单、贴大字报……

8 月 23 日夜，一个红卫兵组织竟然勒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在 72 小时内解散。

8 月 24 日，首都红卫兵召开 40 万人的大会，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吼声中，将前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扬威路改为反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挂了 70 多年的招牌的全聚德烤鸭店，在砸了招牌以后，改名北京烤鸭店。

有一批红卫兵，竟然勒令改变首都交通的红绿灯。他们认为红是革命，只准红灯通行，绿是反革命，禁止通行。

天真的青少年们，以为只要这么一改，这可以同传统的旧观念“彻底决裂”，就可以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中央报刊电台对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极左盲目行动，不去说服引导，反而火上加油，倍加称赞。1966 年 8 月 2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11 期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一文中，高度评价、歌颂红卫兵的造反。人民日报 8 月 23 日还同在一版，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配合新华社 22 日播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新闻，鼓舞红卫兵更加走向极端。

1966 年 9、10 月，各地省市委普遍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西安、太原等地的造反派在“造反”活动中，有极少数人乱呼口号，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有的游行示威群众把毛主席像撕碎踩在脚下。林彪听秘书念各地区来的“快报”，马上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

毛泽东当夜就把文件批退回来。他在林彪批的纸上写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等古迹，被加上封资修的罪名，肆意破坏了。1300 多年的古刹戒台寺，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 6843 处文物古迹中，有 4922 处被毁掉，各类文物 53 万 8 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1958 年 9 月被打开的时候，笔者同其他记者曾一块进入这座“地下宫殿”参观。陵内全部由大块青白石砌成，有两层楼高。明朝第 13 位皇帝万历和他的两个皇后，躺在三个巨大的棺椁里。从这里出土的千百件宝物，供人参观。但是到了 1966 年 8 月，定陵的造反派却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三具尸骨，从陵寝中抬了出来，放在定陵门前的广场上，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用石头将三具尸骨砸得七零八碎，接着又把尸骨烧成灰……

灾难遍及全国各地。闻名世界的洛阳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被砸去了头颅。一向被中国人尊为始祖的湖南炎帝陵全部遭到破坏。四千年前带领人民治水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在安徽合肥，一千多年来人们年年祭扫保护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北师大的红卫兵，南下山东曲阜“砸孔庙”。1966 年 11 月间，在孔子故乡毁坏文物 6000 余件，砸烂历代石碑 1000 多块，烧毁古书 2700 册，字画 900 多轴。

许多专家、学者、作家、科学家和民主党派人士、共产党的老干部，被称为牛鬼蛇神，遭到打骂和抄家。据北京市不完全统计，1966 年 9 月底，被抄家的达 32600 多户。著名作家老舍，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投湖自尽，终年 67 岁。著名国画家徐悲鸿把全部画卷捐献国家，即使这样，他的家也被抄了 60 多次。著名画师刘海粟，家居南京，被抄了 24 次，什么东西都抄走了。1980 年，他在一张清单上写着：“一件鎏金古董作价 15 元，一只钻石戒指作价 35 元，还有六朝、唐、宋造形陶瓷器 20 多件，宋、元、明、清以及自己的书画七八十件，都没有下落。”

上海抄家规模遍及大街里弄小巷。据不完全统计，被红卫兵抄家的 84222 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作家巴金，从北京来的红卫兵闯进他的家。他的夫人萧珊为保护他，到派出所报警，民警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打，同巴金一起关进马桶间里。后来，她和巴金都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扫马路。她在疾病的折磨下，死于“流着血和泪的日子”。

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将军和老干部，不甘忍受侮辱，用他们被迫的自杀，抗议“无法无天”的暴政，结束了倔强的生命。他们之中有李立三、阎红彦、南汉宸、范长江、金仲华、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等等。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因病得不到治疗，被活活折磨致死。

中外知名作家冰心，被民族学院造反派描绘成“吸血鬼”。这位年过 60 岁的身体瘦小的老太太，冬天冒着严寒，夏天顶着烈日，到文联大楼去扫厕所。面对灾难和恐怖，她沉着、冷静。即使是在被批斗的时刻，她仍表情坚强而宁静。她手拿一本英语小词典，一个人沉湎于念英语单词，像尊洁白的女神伫立在“红海洋”中。

冰心原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1951 年和丈夫吴文藻一同回国。红卫兵批斗冰心时，强迫要她交待：解放初你为什么回国?是不是受什么人派遣?对此，冰心总是从容地回答一句话：“我爱我的祖国!”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人们称为语言艺术大师。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文艺黑线的一面大黑旗等五顶大帽子，逼迫赵树理承认，赵树理拒不承认。

造反派“啪”地一掌朝赵树理打来：“赵树理!你说你是什么人?!”

赵树理想了一想，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打手更火了，又“啪”地一个耳光：“你再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又是一个耳光向赵树理打来：“胡说!”

赵树理说：“不对?那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另一个打手又给赵树理一个耳光。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还是……”

几个打手高声喝住赵树理：

“住口!你写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么多毒草，毒害人民，还说你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赵树理反驳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种呢!”

赵树理的幽默，代表了亿万人民对嗜血者的讽刺和嘲笑!

在“矫枉必须过正”和“造反有理”的思想指导下，发生许多起打砸抢抄的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开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会议上鼓吹打人。他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他还提倡：“民兵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在谢富治怂恿下，大兴县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在 13 个人民公社、48 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 325 人。在这次目无法纪的乱打乱杀事件中，据北京日报《宣传手册》记载，“死者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是 38 天的婴儿，有 22 户被杀绝”。市委发现后，很快制止了事件的发展。

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8 月 29 日，人民日报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里，公然赞扬乱揪乱打。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

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为宣扬“红卫兵的功勋”，1967 年 6 月 2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这是根据林彪 1966 年 10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而举办的。

笔者接到通知，仔细参观了展览会展示的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等各部分图片和实物，真可谓“战果辉煌，琳琅满目”。其中仅是拳头大的金元宝就有数十个。据 1987 年报纸公布的材料，仅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就抄走黄金 10．3 万两、白银 34．52 万两，现金 5545．99 万元、文物和玉器等 61．36 万件。

全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怖里。当人们感到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许多并没有被红卫兵抄家的人家，由于惊恐害怕，为了保全性命，把本来不是“四旧”的文物、财物，也悄悄地“自我销毁”了。这种秘密销毁的社会财富，数量之大，更是无法计算的。

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老同志告诉笔者两件事。

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是经营中药材的乐家老店的后代。这家从明代起经营名贵中药的大商家，贮藏许多名贵药材，其中犀牛角图章就有几十个。乐家一位女婿说：“文革”风暴一来，他亲自把一抽斗犀牛角图章，全都倒进粪坑里了!

琉璃厂什坊街的“怀古斋”，是家著名的老古玩店，库藏有大量宋、元以来的古玩瓷器。这些造型美观、玲珑剔透的青瓶大盘，如今却成了店主人消灭的对象。每当夜深人静时刻，家里人都要偷偷将青瓷器砸碎，一连七夜，把“无价之宝”当成垃圾倒掉。

3、“西纠”的崛起

在红卫兵狂热的浪潮里，在人心惶惶的日子里，红卫兵内部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长期受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青年学生，面对天天发生的打、砸、抢、抄事件，面对广大群众的抵制、恐惧和不满，他们开始问自己：难道乱打乱砸就叫革命行动?一心保卫红色江山的好人为什么被打倒了?革命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判别是非的能力，他们渐渐从“造反有理”的迷惑下觉醒过来，对动荡混乱的局面，对无法无天的过火行动不满起来，厌恶了。

1966 年 8 月 6 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行为。

8 月 27 日，由清华附中署名的《红卫兵战报》，发表了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严厉谴责打人抄家以及对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的行为，要求红卫兵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

1966 年 8 月，首都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共同协商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西纠”，在其活动的短短一个多月中，从 8 月底到 9 月底，陆续发布了十几个通令。这些通令，针对社会上的具体情况，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武斗、体罚，以至保护民主人士，接待外宾等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规定。

周恩来总理对“西纠”维护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很快给以充分的肯定。他说：“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

他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西纠”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行动(也曾有过火行动)，以及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多群众参加运动的倾向，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西纠”遭到江青一伙的残酷镇压。

1966 年 12 月 16 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江青叫嚷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她说，“西纠”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扑灭革命造反烈火的消防队。江青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同志是“西纠”干坏事的黑后台，叫嚷：“周荣鑫就是西城纠察队的高参，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看看!”

周荣鑫被点名走到前台示众了。

江青如此仇恨周荣鑫，是因周荣鑫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千方百计保护国务院部长一级的老干部。一次，一位部长被某学院学生揪走，穿着演京剧的蟒袍玉带，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周荣鑫闻讯赶到会场，同学生们谈判五六个小时，终于把这位部长解救了出来。

“西纠”成员陆续被投入监狱，受到逼供。

4、“联动”的斗争

“西纠”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勇于探索真理的一部分红卫兵，继续坚持斗争。

1979 年 3 月 21 日下午，笔者撰写的披露“二月逆流”真相的长篇通讯发表之后，有几位参加“联动”的老红卫兵，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他们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在怀仁堂斗争中对“联动”的支持，并激情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们的斗争和遭遇。

几位红卫兵告诉笔者，1966 年 11 月 27 日下午，北大附中教室二楼的会议室里，聚集了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八一学校等 18 所中学红卫兵的 20 多个负责人。这些血气方刚、思想纯真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代表，热烈讨论着形势问题。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什么意见提不得?”

“现在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联合组织叫什么名字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诞生了。会议委托北大附中的同学，归纳大家的意见，起草成立宣言。

1966 年 12 月 5 日，“联动”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大附中。

这天，“联动”为扩大声势，成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跑进京城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指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的讲话”，“坚决反对资反路线新的表现形式”。北京工学院附中的同学还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12 月 7 日，廖承志在民族宫主持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筹备会。以左派自居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代表，提出联欢活动应由他们独揽。“联动”代表不同意他们独揽，并把“三司”代表轰了出去。

会上，廖承志用自己的经历，深情地鼓励同学说：“你们要懂得做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的时候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是一直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接见外宾。”

廖承志的肺腑之言，教育了青年，但却遭到江青的斥责。12 月 9 日，她在有周恩来出席的中南海小礼堂会议上，首先发难逼着廖承志检讨。12 月 16 日，她在体育馆的万人大会上，斥骂联动“保爹保妈，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12 月 26 日，“联动”代表在北京展览馆开会。群情激愤中宣读批判中央文革的传单，高呼“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联动四处活动，很快同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四五百名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联系。他们以“四大”作武器，向中央文革开火，公开贴出向中央文革和向江青质疑的大字报。

“联动”的行动激怒了中央文革。1967 年 1 月 17 日，江青、陈伯达支持蒯大富、聂元梓等，调动 13 个大专院校的一万多人，调动三辆消防车，把石油学院附中地下室灌满水，砸抄“联动”。接着又包围北大附中等校的“联动”学生。1 月 25 日，谢富治又指挥大批警察，包围八一学校，捣毁教室，拔掉联动最后一个据点，先后逮捕卜大华、马小军等 139 人，关进半步桥第一监狱。清明节这天，到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的“联动”红卫兵，又遭到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逮捕。

5、大串联和新长征

伴随着造反热潮，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

字报），以铺天盖地之势，冲击着每个角落，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汹涌澎湃的“不实之词”，像洪水泛滥一样淹没着人们的灵魂，腐蚀着社会的风气，成为一些人随意诬陷打倒别人、篡夺权力的工具，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为了达到“天下大乱”，毛泽东提倡运用“大民主”。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动员各地学生大闹北京。他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学生，在中央报刊舆论的鼓动下，效法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纷纷炮打各省市党委的第一二把手，发生了骚动。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进行了压制。这样就更加深化了各地领导与学生的矛盾，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学生纷纷前来北京告状，“请党中央毛主席评理”。

天津大学等校部分师生，因为造反受压，徒步到北京取经。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呼口号，唱歌曲，向北京进发。中央文革小组闻讯，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迎来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回想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的情景，学生们特地起名“8·13”红卫兵。

各地上访串联的学生，云集北京。8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筹划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热烈支持大串联。他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费，由国家财政支出。

从此，全国兴起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联!

从此，全国各地成千成万的红卫兵，像奔腾的海潮涌向北京、井冈山、韶山和大寨。在天寒地冻、缺粮缺被的日子里，拥上井冈山的10万红卫兵，不得不靠军队紧急空投大饼、衣服、毯子，才解救下山。

鉴于大串联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人民日报》10月22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徒步行军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

笔者在北京、在外省，在平原、在山野，到处都看见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背着背包，唱着歌，日夜兼程行进。当我怀着敬佩而又不理解的心情，同他们深入聊天时，才知道这些

年轻人的心灵多么纯真忠诚。

红卫兵怀着好奇和梦幻，游荡在祖国大地。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红卫兵，同他的伙伴穿越无数的山野森林，足足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北京。路上，他们一路向群众赠送毛主席语录。当一位同伴在深山病故时，他们用乱石砌成坟墓，埋葬了战友，又忍着饥饿前进了。

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两个红卫兵，背着老乡送给他们的饼子、锅巴、炒面，越过黄河，爬上吕梁山。饱经战争创伤的老区人民，用玻璃瓶灌了满满一瓶吕梁山的溪水，托延安娃娃带到北京，将溪水倒进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让它在北京陪伴毛主席。

许多红卫兵，一路走，一路进行着不同观点的大辩论。一位来自西安的红卫兵说，他的哥哥在火车上同另一红卫兵辩论，对方用水果刀刺进哥哥的喉咙，顿时流血不止。当他俩就近下火车走进医院时，哥哥已不能说话，用笔写字告诉弟弟不要照顾他，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比他的生命重要，要弟弟代表他去见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他们在北京受到热情接待，住吃、游玩、坐车一律免费优待。每个红卫兵都把能见到毛主席，看作一生最大的幸福，载入个人成长的史册。

通过大串联，掀起了狂热的个人崇拜。在神化毛泽东的红海洋里，毛泽东思想被一些野心家吹捧成宗教、信条。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印制、佩带毛泽东纪念章，到处竖立毛泽东巨大塑像。许多单位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形式主义风行全国。

对这种反常现象，毛泽东一方面对斯诺说：“讨嫌!”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推波助澜。

周恩来对个人崇拜是做过抵制的。1968年12月，周恩来为扭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状态，经毛泽东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他在会上作报告时，针对林彪、江青搞的形式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发行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当他听到有关部门要再调5000吨铝去制作毛主席纪念章时，立即加以制止。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口袋装着《毛主席语录》，成为狂热的浪潮。几乎人人都有小红书，几乎人人都有毛泽东像章。“语录”和“像章”，不仅成了“突出政治”的“三忠于”的标志，而且也成了日常交往的礼物和风尚。各色各样的像章，精彩夺目，大的、小的、夜光的、塑料的、铝合金的，到处流传交易。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等告诉笔者，叶群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曾多次化装到北京街头进行像章交易，有时竟像“抢”一样，把像章弄到手。她把收集的一万枚不同样式的像章(包括他人赠送的)，放在精制的木盒里，准备在毛泽东 73 岁寿辰这天，赠送给毛泽东。

6、夺权引起武斗

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的红卫兵，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同观点的两派，争相

夺权，内战烟火由此而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上下大乱，群众组织中出现了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广大干部党员对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火做法感到困惑，不理解。昔日的革命干部，为什么转眼间变成了革命对象?绝大多数人对运动持观望、抵触态度。为克服这种阻力，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解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16 日下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狂热地歌颂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他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归纳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路线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

10 月 25 日，毛泽东讲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10 月 28 日晚，周恩来在总结讲话中提出：大串联徒步进行；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不准冲击解放军；不能干扰法院、监狱、公安等专政机关；不能干扰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不应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扣人、抄家、打人、体罚等。

但是，红卫兵对这些规定，根本置之不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一下火车、飞机，就被红卫兵揪走了。各级领导机关再次受到猛烈冲击，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混乱状态，无政府主义遍及城乡各界。

1967 年元旦刚过，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掌权的造反派同未掌权的造反派，相互夺权争权，引起全面内战。武斗之风日盛，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遍及全国城乡各地。骨肉同胞的血，流洒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北京、上海、武汉、沈阳、重庆、南宁、淮南、沙市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广。

重庆是武斗的重灾区。1967 年到 1968 年，美丽的山城一直笼罩在内战的炮火中，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动用了坦克、迫击炮、登陆艇和各类轻重武器。仅在一次残酷的武斗里，就打了一万多发炮弹，有 600 多人血溅山城。其中牺牲时最小的红卫兵只有 14 岁。

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重庆红卫兵墓，是血和火的历史见证。沙坪坝公园西南土岗上的红卫兵墓，113 座埋着 500 多具红卫兵的骨灰或尸骨。风格各异、大小不一的墓碑，有的顶端像尖尖的利剑，有的像熊熊燃烧的火炬。一座墓碑上还刻着墓志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可挨打，可挨揍，誓死不低革命头。”

另一墓碑上刻着：“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 8 • 15 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 8 • 15 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握!”“头可断，血

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在红岩巅上，歌乐山巅。”

碑文里的豪言壮语，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格，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的贫乏和愚昧。这些年青的生命，竟会为不同观点的争论，去忘我地火并!

每年清明节都有亲人来扫墓。他们站在墓前，悲痛地怀念着死者，思考着那毁灭人性的年代。他们不会忘记这些天真单纯浪漫的青年学生，是在被深深愚弄受骗后才被推进了坟墓!

在内战烽火四起的日子里，笔者参加了一次“中央首长”对“五大领袖”的接见。

1967 年 8 月 7 日晚，我突然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通知，要在 10 点赶到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耀眼的灯光下，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等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

开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向“五大领袖”和其他市单委会委员，通报了首都红卫兵参加大串联和夺权的情况。

这时，江青由姚文元陪同走进会场。她脱下披风，露出新军装，热情地微笑着向五大领袖招手。她一会说韩爱晶你是我非常喜爱的孩子，一会说，蒯大富爱说谎，一会说，聂元梓我对你寄托很大希望，一会说，谭厚兰你不要飘飘然。当说到红代会拒绝中央文革派记者参加会议的时候，江青突然大发脾气，痛斥他们几人封锁中央，愤怒斥责：你们几个老子天下第一，连我们都瞧不起了，把自己置于中央之上。你们不跟主席走，工农兵跟主席走!她警告他们：要革命的来，不革命的滚开。我担心你们会走向反革命!

在江青盛怒之下，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个人，一个个胆战心惊地站起来，低着头，弯着腰，奴颜婢膝地请求江青原谅……

“五大领袖”们的丑态，顿时使笔者心里一阵恶心：这些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凶手，原是一伙被人驱使的狗!

7、枪声震动了毛泽东

尽管毛泽东多次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他的话变成了人们耳边的风。

1968 年 7 月 27 日上午，由北京 60 多个工厂组成的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制止武斗，整顿秩序，开进了蒯大富盘踞的清华大学。这个在百日大武斗中死亡、伤残百余人的高等学府，被武斗的枪声、爆炸声，弄得满目凄凉，血痕斑斑……

几千人的工宣队，刚开进学校，即遭到蒯大富为头头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突然袭击。下午一时，蒯大富拔出手枪，喊叫要和工人拼了!红卫兵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工人队伍冲杀过去，五名工宣队员当场惨遭杀害，731 人负伤。

清华大学的流血事件，震惊了全京城，震动了毛泽东。

最高统帅决心亲自制止武斗。

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他和亲密战友林彪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亲自召见红代会核心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五人。忙于参加武斗的蒯大富迟到了几个小时，很晚才走进大会堂。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

毛泽东和几位红卫兵领袖一一握手。寒暄几句后，立即把话转入武斗问题。

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居民、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毛泽东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毛泽东满怀希望地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谈到产生武斗根源，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央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到中央，而是中央斗争反映到社会。

另据国际关系学院一份录音材料记载：迟至 7 月 28 日早 7 点半，才赶来的蒯大富，一走进门就哭了。毛泽东同他握手时，坐在一边的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省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说：这是危险的道路啊，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今天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重要、最正确、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如果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去。

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90％以上，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

毛泽东说：我们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的。你们脱离工人、农民，脱离大多数的学生，脱离你们自己的人。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不要打了。

这次接见之后，五个人联名整理印发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一致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最高统帅的讲话，对制止武斗起了一定作用。

横行一时的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后来都堕落成了反革命罪犯，于 1983 年 3 月 16 日受到历史的审判。

8、学会在地上看世界

1968 年 9 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

大专院校和许多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积压在大学的数十万应届毕业学生，同千万以上不能升学的高初中学生，聚集在城市里。这些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现在都成了没有学业的劳动后备军了。

知识青年到何处去?正当千万青年陷入既不能升学，又难于就业的困境时，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千万知识青年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热情投入上山下乡运动。自此，以“反修防修”开始的红卫兵运动，又以戏剧性的“反修防修”而告终了。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锻炼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头头外，绝大多数始终同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跨越过曲折、艰苦的历史道路，在实践中茁壮成长!

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发起人的卜大华，上山下乡时到了陕北农村，经过几年锻炼，认识了社会。后来，他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

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在地上看世界……

千百万青年，经过十年动乱的反思，从迷乱中醒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八章 一月风暴

1、社论：“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6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的 73 岁生日。12 月 25 日，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七个人到家中吃饭。

姚文元首先举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并对“文化大革命”发出“最高指示”，预言下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根据毛泽东“最高指示”精神，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撰写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

“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 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 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 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伴随着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全面“夺权”，加深了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全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

2、上海滩的“造反司令”

在庆祝毛泽东生日的家宴上，据姚文元后来交待，毛泽东谈到上海形势时说：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学生起来了……

毛泽东称赞的“形势大有希望”，指的是上海“天下大乱”了。

“大乱”的头目之一，是上海国棉 17 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这个 1935 年出生在吉林长春郊区贫苦农民家中的青年人，16 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五年以后，复员到上海，在国棉 17 厂任基干民兵连长。

就是这个民兵连长王洪文，1972 年 12 月，笔者在上海访问他的时候，王洪文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会议了。这天，他从北京回到上海，由上海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陪同接见笔者。他就上海民兵武装的诞生和“一月风暴”侃侃而谈。在谈了上海夺权经过和武斗事件之后，他还特地批准在电视台为我放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现场纪录片。这样，就使笔者对“一月风暴”有了更系统、更深切的了解。

1966 年 6 月，北京首先刮起“史无前例”的狂风骤雨。狂风吹到上海，王洪文找到几个人，于 1966 年 6 月 12 日上午，在国棉 17 厂医务室旁，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贴出“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等三条大标语。

1980 年 6 月 5 日，王洪文受审时对写这张大字报有如下交待：“……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厂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哨，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的……”

王洪文接着交待说：“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说：“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这时，市纺织工业局派来一支文革工作队，王洪文说：“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席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

市委工作队进厂十天，王洪文转过头来，把炮口对准工作队，贴出轰动全厂的大字报——《市委工作队滚出去!》

八月，来上海“大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穿着没有领章的黄绿军装，佩戴红袖章，戴着军帽，斜背着书包，举着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像潮水似地涌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一部分红卫兵喊着“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涌进了国棉 17 厂。

王洪文受到红卫兵“停课闹革命”的鼓舞，决心到北京去取经。

王洪文对此交待说：“10 月上旬，我和其他 13 人到北京上访，告厂党委、工作队的状。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三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王洪文说：“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洪文等人在北京大串连 10 天，“提高了路线觉悟”。他说：“回上海后，厂党委已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队领导，我对工作队的情绪更利害了。”王洪文对工人们说：“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工厂工人很快分裂成“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和“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两大派。

王洪文领导的“永忠队”贴出“工作队靠边站”的大标语，写出《工作队十大罪状》的大字报。

11 月 4 日，“永忠队”占领了工厂的广播台，宣布《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涌进上海市的红卫兵，不断炮轰上海市委。蒯大富领导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出“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四处活动，联络各系统的造反派，召开“上海工人串联经验交流会”。

“11 月 6 日，国棉 31 厂黄金海到我厂通知说，有一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找了一部分工人，串联了上海机车修配厂、上钢三厂、良工阀门厂等十七八个单位，在上海华山路开会，叫我去听听。我带了四个人去，头头是我。

会上，××分析上海市委曹荻秋讲话是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我同意××的观点。他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湖北、江苏已经组织起来了。接着，大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人少怎么办?先筹备领导人。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我是筹备组的负责人。”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王洪文还当场提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王洪文说，“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他又说：“我是党员，我是保卫干部。”这样，他就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

这个司令一“上班”，立即打砸抢。当晚，抢了上海八仙桥边大祥布店和金陵东路棉布批发部的红布和“四清”档案。

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这天，来自各单位的造反派，乱哄哄地涌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会上相互对立的各派代表，你争我夺地辩论发言。万多人的会上，有人高喊，把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揪出来，勒令他到会上“接受批判”。

曹荻秋根据中央关于“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的指示，根据市委讨论的“不参加，不泼水，不支持”的决定，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消息传到会场，激起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不满，会上多次呼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

对这次大会，王洪文在13年后这样交待:“这个大会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没有，两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时间多。会上，还通过工总司的成立《宣言》。《宣言》是北京红卫兵起草的。当时，工人参加是少数，筹备工人组织，实际上是红卫兵的作用。《宣言》事先我不清楚，工总司还未成立，公章已出来了。”

王洪文说：“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

宣言说：“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夺权，向谁夺权?

向上海市委夺权，向市委书记曹荻秋夺权!

晚上九时多，王洪文煽动会场上留下的四五千群众，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王洪文当即领着扛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红旗的群众，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进发，冒着阵雨，深夜把市委包围起来，再三要求曹荻秋接见。

曹荻秋继续坚持“三不”，拒不接见。

聚集在马路上的群众一夜未眠，情绪更加激昂。王洪文为进一步扩大事态，鼓动大伙说：“我们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去!”

造反派群众齐声呼应。大伙立即举着红旗，迎着黎明的寒风，高呼：“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喧闹着向上海火车站涌进。

3、安亭事件

两千多人的造反派队伍，分别由潘国平、王洪文、王秀珍、张宝林带领，冲进上海北站，

涌上了开往郑州的69次特别快车。他们高声朗读着毛主席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口号声、语录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北站的上空。

10日黎明时，列车得到命令，开动了。

特别快车飞速前进。但是行至嘉定县的安亭车站，上海调度突然通知，69 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至上午8时17分，列车停在离安亭车站几公里的岔道上了。

上海市委得知“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冲进车站、占据列车北上以后，对扩大的事态十分焦急。为了不使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扰乱首都的秩序，市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打电话给在安亭的602次列车，劝告造反派回上海，有问题在上海解决。

当时，一部分头脑清醒过来的人主张：“还是回上海去解决!”但是，他们立即被激进的人斥为右倾，有的还煽动说：“一回上海，你们各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造反“司令”王洪文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认为还是要北上，并且提出要拦车北上!

正在这当儿，648次列车从上海开来了。王洪文带着一部分工人，走近铁道两侧，挥着帽子、衣服要求停车。司机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急刹车。只在这时，很多人才跑到铁路道轨上，站的、坐的、躺的，黑压压一大片。

列车长走下列车，听说工人们要搭车北上，坚决拒绝。经过近两小时的谈判、交涉，648次列车又开动了。

一计不成，王洪文又施一计。他煽动大家：14次是京沪特别快车，拦14次快车!

14次特快12时刚到安亭，马上被造反派团团围住了。

沪宁线被卡断了，铁路大动脉被切断了。一列列的货车、客车停止运行，堵塞在安亭车站。

这件事，立即惊动了上海，惊动了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接到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马上找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以两个人的名义，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求：“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王洪文看了转来的中央电报。接着又收到许多沿线车站抗议切断铁路的电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等负责同志也赶来劝说他们回上海。不少造反派也劝王洪文，不要再蛮干。王洪文在内外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放行14次列车。切断了20多个小时的沪宁线终于恢复了通车。

14次列车放行了，可是，王洪文等一伙人，仍然坚持不肯离开安亭，扬言："我们走路也要走到北京!"

另一派工人造反派则主张回上海。正当争论不休的时候，陈伯达的又一封电报送到安亭车站。电报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工人阶级的大局……"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活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陈伯达的电报，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泼了冷水。为了稳定军心，王洪文同北京来的红卫兵头头等人立即商量，要造反队员继续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对于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王洪文在日后受审时曾这样交待：

"安亭事件和工总司的成立有联系。安亭事件对全国生产、政治、经济都造成很大损失。……如果不成立工总司就没有安亭事件。由于成立工总司才要求上海市委接见，上海市委不接见，就拦劫火车上访……"

"市委韩哲一第一个到安亭车站做工作，放了第一辆火车。当时大家坐在铁轨上，工作难做，要挟市委来人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韩哲一说，把火车放了，可以考虑你们北上。当拦第二辆火车时，就无力工作，我只好等市委商量，后来，市委没来人，经做工作，第二列火车也放了。张春桥去的时候，火车已放了……"张春桥从天而降

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奉陈伯达之命，乘坐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穿过黑茫茫的夜空，向上海飞去。

12 日凌晨，张春桥穿着一身草绿军装，在上海北郊军用机场走下飞机，解决安亭事件问题。

张春桥背着上海市委，首先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联系。

此人是王洪文的谋士和战友。通过他的联系搭桥，张春桥认识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副司令潘国平，并同他们会谈。

12 日上午，张春桥来到安亭火车站，站在一辆大卡车上，面向聚集在车站的两千多上海工人讲话。他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公然宣布："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

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12 日下午，张春桥自安亭返回上海市内。

13 日中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开碰头会，张春桥参加。会上，张春桥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组织，不承认拦截火车、中断铁路是革命行动。

碰头会上，曹荻秋当场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电话，张春桥也接了电话。听了陶铸同志要支持上海市委的指示，不要承认跨行业组织。

但是，到了 13 日下午三时，张春桥突然违背中央指示，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同以潘国平为代表的“工总司”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五点要求”。这就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群众组织；

二、承认“11・9 大会”以及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

三、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勾结王洪文，王也由此入股，投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结成“四人帮”做了第一笔交易。

“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小的安亭车站，被封为“革命基地”。

4、《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在上海点了一把火，但是上海并没有大乱起来。

1966 年 11 月 15 日，王力受江青的指派，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受到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江青说：“上海是华东最大的城市，影响很大，上海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华东全局，我们要是打算要上海，就得派红卫兵去支持上海工人、学生造反。”

派准去呢?据戚本禹交待，聂元梓造反最早，同江青的关系又好，江青决定让聂元梓带人去上海。

江青在长途电话里，亲自告张春桥说：“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聂元梓等三人，于 19 日窜到上海。聂元梓立即向“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

提出，要见张春桥。嗣后，在“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所在地延安饭店，张春桥单独会见了聂元梓。张春桥为她出谋划策：“你要打倒常溪萍，要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打倒常溪萍，是聂元梓上海之行的目标之一。常溪萍当时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5 年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时，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在“四清”中保过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聂元梓因此与他结下仇冤，多次扬言要打倒常溪萍，才解心头之恨。聂元梓四处煽动：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的，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

王洪文同聂元梓谈话以后，12 月 13 日，聂元梓召开“打常(常溪萍)会议”，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

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同一行动”，“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 15 万到 20 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

11 月 25 日，聂元梓在“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叫嚷：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发表长篇讲话后，高呼口号：“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后第三天，1966 年 11 月 29 日深夜，上海爆发了第二次影响全国的事件，即持续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

这天深夜，简称“红革会”的三百多年轻人，佩戴袖章，手拿已经出版九期的《红卫兵战报》，冲进了上海市邮电大楼，要求将他们的第九期《红卫兵战报》，同《解放日报》一块发行，并说《解放日报》放了很多毒，《红卫兵战报》要跟着“消毒”。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因此，提出要把两家报纸夹在一起发行。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怎么能允许同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呢?这个无理要求，当即遭到报刊发行处同志的拒绝。

所谓发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解放日报》打开缺口，把中共上海市委打垮。聂元梓煽动红卫兵冲进解放日报社。与此同时，王洪文、陈阿大操纵的“工总司”调来大队人马，强行占领报社大楼，停止了《解放日报》的发行。

少数坏人的捣乱，激怒了上海人民。在九天九夜里，一百多万群众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把解放日报大楼团团围住，日夜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为保证党报的正常出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被迫到解放日报社同王洪文等人进行谈判。1966 年 12 月 10 日，由市长曹荻秋签字，答应了“工总司”的“四个条件”，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12 月 11 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 60 万人参加的“反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曹荻秋等人再次被批斗并且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曹荻秋还公开违心地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次表态，激怒了“赤卫队”。“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作赤卫队”，是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为骨干，于 11 月 26 日宣告成立的。他们为表明自己不是“保皇派”，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的口号。12 月 23 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向曹荻秋提出“八项要求”。曹荻秋于 24 日签字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拥有 80 万人的“赤卫队”，同拥有 60 万人的“工总司”，形成尖锐对立。12 月 25 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又被迫宣布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处在两大派夹攻中的曹荻秋，在风暴漩涡中左右为难。这个 1929 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市长，是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第三任上海市长，他本不愿支持“工总司”，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了，不得不表示支持。他本认为应支持“赤卫队”，但是不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精神，又得违心表示不支持。他就这样，被两大派夹攻着，吃尽了苦头。

12 月 28 日，“赤卫队”得到曹荻秋撤销支持“赤卫队”的消息。一万多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就在这时，张春桥乘乱挑起康平路事件。

5、康平路事件

12 月 28 日，张春桥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听到马天水向他汇报流传的谣言“赤卫队抄了他的家”，当天夜里打电话给王洪文。

他要他们警惕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革命口号，“乘机捞取造反派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指示他们立即调动人马，向“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天深夜，“工总司”调动车辆和十几万人，将进入康平路的不足三万人“赤卫队”，一层层地包围起来。

王洪文说：“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就站不稳脚跟。对‘赤卫队’就是要砸!”

30日凌晨二时，康平路喊声四起："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震天的喊声中，"工总司"十万人发起了总攻，打垮了赤卫队，使上海变成了工总司一派的天下。

"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据记载："30日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91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100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遍体鳞伤。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命令"：把"赤卫队"各级领导干部抓起来。全市各机关企业有240余人被捕，单是上海国棉17厂被捕的赤卫队员就有25人。

张春桥对他指挥的这场武斗，十分得意。1967年3月8日，他对山西太原市造反派进京代表说："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跨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跨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正在这时，自鸣得意的张春桥被他女儿打了一巴掌。在"赤卫队"被"踏平"的这天，张春桥的女儿写了一张《造谣派破产》的传单，在上海流传开来。传单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笔者注：即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家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传单"揭露了谣言。张春桥知道后，打电话给妻子说："抄家不是孤立的，这是政治斗争，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抄家的说法，不利于造反派，是右倾。"

后来，尽管"工总司"和张春桥妻子一再声明，否认"传单"，可是却无法掩盖铁的事实：上海大乱了。

镇压了赤卫队之后，张春桥又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倒打一耙，诬陷康平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指使他"要各个群众组织快点商量，揭露市委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

6、"后院起火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之间，上海市委机关内部还发生一起所谓"心脏爆炸"和"后院起火"事件。上海市委写作组徐景贤、朱永嘉等，配合"工总司"，从市委机关内部起来造反。

早在1966年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就对来北京的朱永嘉说："你们应该造反，从市委内部把市委搞乱。"

朱永嘉立即打电话回上海，把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向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汇报了。

11 月 28 日，徐景贤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起来造反。张春桥听了，说："很好。"

第二天，姚文元给徐景贤回电话，具体指示写作班子造上海市委的反。

12 月 12 日，姚文元又给徐景贤打电话，催问市委写作班子："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鼓励他们立即起来"造反"，"上前线"，踢开上海市委，把写作班子转变为夺权的工作班子。

14 日晚，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徐景贤，询问写作班子"造反"进展情况，并指示说："不能停留在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要搞得更深!"

徐景贤当即汇报了 13 日秀才们深夜开会的情况。他说："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杀市委的回马枪，里应外合，抛出陈丕显、曹荻秋的材料，从内部向上海市委夺权!"

28 日，上海文化广场举行"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杨西光和常溪萍被当作"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会场上高呼"炮打上海市委""揪出曹荻秋""火烧陈丕显"等口号。徐景贤发表长篇造反演讲后，宣读了《造反声明》，宣称：

"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对这场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导演的"后院起火"，"心脏爆炸"，张春桥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受到了震动。上海市委从此不神气了!"

7、一月革命

在"康平路事件"中受到血腥镇压的"赤卫队"员们，气难平，恨难消。他们一部分突出包围，有的乘火车，有的乘卡车，有的步行，纷纷到北京上告。1966 年 12 月 31 日下午，王洪文闻讯后，立即组织人马追赶到昆山，强令"赤卫队"解散组织，制造了打伤多人的"昆山事件"，又一次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

消息传到北京。1967 年 1 月 1 日凌晨一时，张春桥打电话给正在养病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找各造反派解决铁路中断问题。

陈丕显明知这是故意给他出难题，但他仍立即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市委开会。凌晨三时，陈丕显在紧急会议上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恢复铁路交通和革命秩序。

就在这时，徐景贤也接到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把给陈丕显的电话内容通知他，并

且阴险地说：这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当然不是支持陈丕显”，“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王洪文在陈丕显召集的会上一气不吭。第二天，他和陈阿大飞到了北京。

1 月 3 日夜，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王洪文、陈阿大说，对陈丕显“应该拖他出来幕前表演”，“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然后把他打倒。张春桥对王洪文说：“上海的桃子熟了!”

“安亭事件”后，上海的煤炭告急，整个城市瘫痪了。

上海影响全国。鉴于上海市委已不能工作，为解决上海问题，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上赞扬过的谭震林同志，去主持上海市委工作。

但是，江青却要张春桥、姚文元先走。据姚文元交待，江青对张、姚传达说：“你们可以回上海了。煤炭问题这么紧张，不要等谭震林同志了，你们可以先走。”

1 月 4 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共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飞抵上海。张春桥在离京赴沪前，曾与江青商量过，到上海后与华东局划清界限，不沾上海市委的边。

张春桥、姚文元一下飞机就到康平路招待所，找“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朱永嘉等人，指示他们马上组织一个班子，以联络、控制各造反派组织。张春桥向他们交底说：“我们这次来，是听说上海要进行夺权。我和姚文元听到这个消息都坐不住了，所以特地赶来上海想同你们谈谈。”

1 月 4 日，《文汇报》夺权。这是安亭事件后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就一个单位说，这是全国的第一个夺权。它在《告读者书》中说：“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1 月 5 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宣布夺权。

这天，张春桥对“工总司”造反派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 月 6 日，天空飘着雪花。“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开始了。几万人在刺骨寒风里，目睹陈丕显站在木箱上，曹荻秋被押上主席台批斗的情景。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也被揪来陪斗。

会上，王洪文声嘶力竭地叫嚷：“‘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大会宣布了三个《紧急通告》，不再承认曹荻秋同志为市委书记和市长，对他监督改造，勒令陈丕显“在七天内交待反革命罪行”，“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对这次大会，姚文元 1 月 6 日向中央写了《情况通报》，内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干部、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限一周内交待自己的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笔者注：“魏、韩”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马、梁”是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梁国斌。)

大乱的上海，一时涌出 32 个造反派组织，他们把成千成万的老干部、学者、专家，戴上高帽子，揪斗游行，逼迫许多机关企业的“走资派”，在“补充工资”的经济要求上签字，而造反派自己则瓜分国家的动产和不动产，发横财!

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1967 年 1 月 8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 日造了反，《解放日报》6 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1 月 9 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且发表了编者按语：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 年 1 月 11 日，按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 32 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由毛泽东亲自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次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推上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平起子坐的高位。贺电说：

“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

“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 年 1 月 12 日上午，上海几十万人聚集人民广场，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彻底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一再自称是“小学生”的张春桥说：“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揭开的。”他在几分钟的讲话里，竟 32 次提到毛泽东，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

大会刚刚结束，王洪文就抓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并把上海市长曹荻秋押上一辆卡车，让他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夺权风暴刮遍全市。从 15 日起，三天内有 49 个机关被夺权。1 月 15 日凌晨三时，“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闯入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市委的大印!

各机关、团体也都卷入“夺印”的浪潮中来。有的造反派把夺得的一大堆木头印章缠在腰间，边走边喊：“夺权!夺权!”

“一月革命万岁”的标语贴遍全上海。1 月 19 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 月 5 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变成了百万人的海洋。张春桥、姚文元讲话中对“公社”大加赞扬。大会不仅通过了“公社”的宣言——《一月革命万岁》，而且宣布夺旧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切权利。

大会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一号通令》里，疯狂叫嚣要把一切大权“统统夺回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回来!”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上海人民公社”一连几天没有发表。这是为什么呢?人们都在纳闷。

街头上，出现了“红革会”质问“上海人民公社”的连续《十问》的大字报。

2 月 12 日，王力在电话中向姚、张二人传达了毛泽东不赞成“人民公社”名称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急忙飞往北京。

据姚文元交待说：“刚下飞机，毛主席就把我们接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王力也去了。着重谈机构问题。”

“毛主席讲，上海现在叫人民公社，其他地方叫革委会。你们上海不是孤立了吗?如果都用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全国是否还要成立总的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字?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要把人民公社的名字改过来。”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把最反对的人封成官，把反对你们的人团结起来。

姚文元交待说，毛主席实际指的是马天水。于是我们回去做马天水的工作，吸收他参加“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2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分别担任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全面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他们在宣言中说：“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

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他在接见上海市革委会教卫组负责人等人谈话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张春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统统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有人问：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冷冷地说：不是说了吗，统统搞掉，一个不留嘛!怎么?你还觉得有点可惜吗?老实讲，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么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动指使下，上海市有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获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8、血腥的镇压

张春桥一伙人从“全面夺权”开始，对上海人民实行了“全面专政”。他们排除异己，支一派，压一派，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打入深渊!

张春桥为镇压群众，他亲自秘密操纵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前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后来被张春桥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的游雪涛，像一只豺狼一样，秘密横行在上海滩。他带领一小撮人到处伸手，无孔不入，搜罗大量情报，编成“简报”“动态”“动态增刊”共300多期，制造大批诬陷材料，制造冤案、假案26起，其中直接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计有183人，致死五人，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而被株连的达816人。

1968年9月，游雪涛在送给张春桥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们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奋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搞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在笔记本上写道：“张春桥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1967 年 1 月和 1968 年 4 月，上海人民冲破高压，两次“炮打张春桥”。游雪涛“扫雷纵队”成员四出搜集“炮打动向”，密报张春桥。

1967 年 1 月 24 日，上海繁华市区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 个问张春桥》、《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主持写大字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当他们发现张春桥是攻击鲁迅的炮手，是两面三刀的危险人物时，1 月 29 日，在复旦大学礼堂联合召开八个组织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中央文革给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扣上发动“反动逆流”的罪名，残酷加以镇压。许多参加“炮打”的学生，后来普遍遭到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迫害。

参加“一月夺权”的“上海革命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红卫军团司令部”，也被张春桥一伙认为是与“工总司”对立的组织，不利于他们一派掌权。二月底，由“工总司”出面策划 35 个群众组织，发表“告全市人民和红卫军战士书”，提出对红卫军“必须彻底砸烂”。全市统一行动，拘捕红卫军干部 251 人。

7 月 18 日，上海柴油机厂工具车间两个群众组织的部分群众，因贴大字报引起争吵，发生武斗，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在武斗中被打伤致死。对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这一不幸事件，理应教育双方消除派性，增强团结。但是，身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却令政法指挥部发表通令，宣称：“上柴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死了人，并特令交出杀人凶犯名单。8 月 3 日，陆海空军宣传队进厂，“联司”不接受，把军宣队赶了出来，人也被打了。王洪文认为：“如果不解决‘联司’，上海就要乱下去，下决心要砸。”

对砸“联司”一事，1980 年 6 月 12 日，王洪文交待：“8 月 3 日晚，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联合大会，控诉‘联司’一小撮人打死‘东方红’的支部书记。8 月 3 日下午，‘总司’开了小会，决定调动四万人参加，实际参加十万人‘砸联司’。下半夜，天快亮了，队伍出发，我坐汽车到了现场。‘联司’一部分人上房顶，一部分人在外边，下边人受了伤，发了火。我动员大家把围墙推倒，冲到楼上去，把‘联司’的人抓起来，……抓住后打伤 200 多人。这是上海最严重的一次武斗，是我直接布置的。”

8 月 4 日凌晨，东方还未破晓，王洪文打着“工总司”的旗号，调动十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和一千多辆汽车，集合到军工路一带的郊区，从水上、陆上把上海柴油机厂层层包围。王洪文亲到现场指挥，下令让几百名“敢死队员”进入厂门口，开始了进攻。

“上柴联司”的群众防守在工厂的房屋顶上，一边向下抛石头，打弹弓，喷硝酸，迎头反击，一边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王洪文看到正面攻打进展不快，把主力转移到厂门左侧，用大型铲车和大木头，撞开了工厂围墙，用 25 吨大吊车开路，攻入了厂区。

他们首先占领食堂，断了联司群众的水源和粮源，接着用长矛、木棍、铁棒，打伤“联司”数百人。

在众寡十分悬殊的对垒下，被割据守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继续抵抗。“联司”总部所在的四号楼，抵抗尤为激烈。王洪文严令“敢死队员”在天黑前结束战斗，并且下令调来 17 辆消防车，动用了高压大型水龙头，从一千米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守楼的“联司”群众猛烈喷射。

“联司”群众个个成了俘虏。对抓获的“联司”人员，一律“头上开花”，“面上挂彩”，男俘全部剥去上衣，女俘全部撕破上衣，当场打死一人，关押 650 人，100 人受重伤，有 11 人被关押八年之久。

“8·4 事件”这天，毛泽东、张春桥都在上海。毛泽东听了关于“8·4 事件”的汇报。一个多月后，9 月 25 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了毛泽东视察上海时的重要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7 年 9 月，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他利用所谓“补课”和清理队伍，把参加“联司”的许多群众，打得重伤致残，不少干部、工人被活活打死。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制造“中农公司”大冤案，因此案迫害致死 17 人，株连 300 余人。

9、“夺权”演变成内战

继上海“一月革命”之后，全国许多省市响应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开展夺权的活动。

1967 年 1 月 14 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原山西省的党政大权，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 月 29 日，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刘格平，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而原省委书记卫恒在被关押之后自杀身亡。这是继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之后的第二位自杀的省委领导干部。

1 月 25 日，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根据江青的指示，支持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2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庆祝贵州的夺权。

1 月 31 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支持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祝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1 月 17 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康生之子张子石等人来到北京，受到陈伯达、康生、王力的接见。康生在三个小时的交谈里，再三鼓励他们夺权。1 月 22 日，青岛的造反团体在王效禹导演下夺了青岛市委、人委的一切权力。2 月 3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在这前后，一些省市相继夺权。广东 1 月 22 日夺权，江苏 1 月 22 日夺权，安徽 1 月 26 日夺权，1 月 28 日北京市夺权……

这些夺权都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的。

夺权以后，各省市、各单位都普遍长期陷入派性斗争中。你争我夺，你咬我一口，我踢你一脚。往往这一派刚夺了权，不久又被另一派夺了去。有的甚至像走马灯一样，一日数起夺权。

夺权斗争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矛盾，渐渐由口头的争辩，进一步激化成武斗，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松辽原野，沿海之滨，到处陷入全面内战的深渊!

第九章 枪杆子下的“革命”

1、“支左”大军

1967 年 1 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各省市普遍刮起夺权的狂风。从中央到基层，从内地到边疆，全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国家政府机关瘫痪了，党组织活动停止了，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基本失去作用了，成千成万的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了。全国唯一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只有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人民解放军。他希望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威信，贯彻他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1967 年 1 月，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组织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帮助保护会场，防止对立派前来冲击。

安徽省军区马上电示中央。1 月 21 日，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

“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周恩来当天向军委碰头会传达了这个批示。

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严肃批评一些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乌七八糟，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他要求军队要善于区别情况，在夺权斗争当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

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左派”，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1 月 25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3 月 19 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抽出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从此，在全国全面展开“支左”工作。全国先后有 280 万人民解放军，背着背包，先后离开军营，浩浩荡荡，公开地、大规模地进入陌生的国家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村和大、中、小各类学校中去了。

至 1970 年底，当时参加“支左”的解放军约有 40 余万人。其中担任县和相当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有 4．9 万余人(其中干部 4．8 万人)。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三支两军”在全国的规模!

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活动。广大群众把解放军看作“最亲爱”的人，看作“最突出政治”的人，看作党和政府的代表，热烈欢迎。

随着解放军“支左”的脚步声，伴着林彪一伙的号令，鼓吹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当时风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人人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处处都闻语录声”。用《毛主席语录》制作的标语，更是遍布城乡。用各种材料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男女老幼人人佩戴，成为最时尚的装饰。

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的程度。风靡全国的“表忠心”、“红海洋”，以及跳“忠字舞”等花样繁多的活动，漫天飞舞的所谓“一言一行让毛主席放心，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满意”的形式主义，给人民带来精神的桎梏。许多机关每日上下班前要列队站立在毛泽东画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有的还在行进的火车上，也要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2、“支左”变成支派

“支左”的目的是什么?一位“支左”的高级指挥员曾告诉笔者：“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许多省市造反派都是在解放军全力支持下进行夺权的。

“支左”，即支持左派。可是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呢？怎样正确的划分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的“左派”和“右派”呢?这是各部队“支左”中最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没有明确指出“左派”的标准，许多部队开始都支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劳动模范多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而这一派，往往因为“造反精神”不强，被对立面的一派称为“保守派”。那些所谓“造反精神”强，敢冲、敢斗、敢闯的则被视为“革命派”，即“左派”。开初，许多军区都因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而受到批判。

夺权中，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为稳定军队，稳定形势，在决定“支左”的同时，1967 年 1 月 28 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规定“不得擅离职守”、“不许冲击”、“不许抓人”等等，但各地都没有执行。因为既要全面夺权，就不可能“坚守岗位”、“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事实上，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敌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军队，在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后，改变了“软弱可欺”的形象。但是，由于认识不统一，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多次引起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之间尖锐对立和冲突，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 年 2 月 23 日，青海省军区认为《青海日报》社掌权的“8·18 红卫兵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后，接着又实行武装包围。他们按照“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 月 23 日这天，竟然采取错误行动开枪打死群众 169 人，打伤 178 人。这次武装镇压群众的“赵永夫事件”，后来被林彪定性为“带枪的刘邓路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隔离审查十年，“8·18”则被宣布为革命群众组织。

继这个震惊全国的武装镇压群众的事件之后，28 日又发生了青铜峡流血事件，打死打伤群众 100 多人。

四川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连续冲击军区机关，提出要“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2 月 17 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发了致造反兵团的公开信，并用飞机在全省散发，不但得不到呼应，造反派反而加紧了对军区的围攻。成都军区在退避三舍之后，也抓了许多人。这样矛盾更加尖锐了。5 月 7 日，中共中央做出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8·26 战斗团”等是“革命群众组织”。可是两大派的矛盾并未由此解决。围绕着“革”与“保”的分歧，大规模的武斗相继在中江、泸州等地爆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

为统一“支左”认识，排除“支左”中的混乱，中央军委于 1967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会上，林彪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吹捧红卫兵是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而对于“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仍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3、两条命令

4 月 6 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修改批准，发布强调爱民的“十条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正确对待群众”，“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等等。一些曾被军队支持的组织，对十条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是给反军派打气。尽管如此，十条命令还是缓和了军队和群众组织的矛盾。许多“支左”部队按照毛泽东“拥军爱民”的指示，进行自我检讨，转变“支左”方向，“掉转屁股”，受到造反派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政治风云的“反复”、突变和“走向反面”，使许多“支左”人员感到困惑。许多地方的“支左”工作，在“转弯”中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乱状态。四川、广东、福建、河南等省市的“支左”部队，相继发表声明，否定前一阶段的“支左”工作。这样，正如毛泽东说，弄得“支左”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

许多“支左”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卷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纠纷，“支左”又变成了支派。驻山东省的人民解放军，在青岛夺权以后，一开始并没有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却支持了另一派群众组织。后来，康生直接插手山东，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山东“支左”部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支左”部队被迫公开检讨。

“支左”的同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工矿、交通、铁路、航空以及报社、广播等机关都普遍实行了军事管制，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军事机关甚至也被实行了军事管制。例如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许多军事院校都曾经实行过军事管制。

9 月 25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在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后回到北京。中央报刊相继传达了他的最新指示：两派“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10 月 7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党、政、军的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管党、政、军。又说，军管的时间不能太长，要过渡到“三结合”。

所谓“三结合”，即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这种以军人为主体的“三结合”，从党中央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一直延伸到党政机关的基层组织。军队的权力，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达到了最高峰。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21 名政治局委员中，有 12 名是军人，超过半数。

在各省市，至 1968 年 9 月，全国有 29 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上将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韦国清等军队干部，分别担任 20 个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北京市占 78％，广东省占 81％，辽宁省占 84％，山西省占 95％，云南省占 97％，湖北省占 98％。全国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的，达 5193 人。

这说明军队已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各地区领导权，不仅直接领导了各地的运动，而且介入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各方面。军队“支左”人员成为“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实际执行者。在那些日子里，军装成为荣耀的标志，权威的象征。

鉴于各省市党政机构陆续恢复工作，1972 年 8 月 2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支左”部队撤出地方工作，“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在历时五年的风浪里，“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在极其复杂的困难情况下，为稳定局势、缓和紧张混乱的局面，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保护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减少了许多损失。对支撑全国大局，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支左”工作也带来不少“消极的后果”。一位长期参加“支左”的同志，深情地对笔者说：我们都是握枪杆子的，我们对干地方工作和群众组织都是很陌生的。尽管我们也曾进行拥政爱民工作，但在整体上，军与民是过着两种生活。“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声令下，我们都投入了“支左”。我们既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也不了解“支左”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实际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一件件都迫使我们这些新的当权者来表态。盲人骑马，不能不犯错误啊。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间的纠纷和对立，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有些支左人员作风霸道，骄气傲气十足，有的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在革命的口号下，“瞎指挥”，干了不少傻事、错事，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损害了革命军人的形象和荣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啊！

1984 年 5 月 18 日，《解放军报》在评论员文章《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一文，引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问题的评价，同时也引用邓小平同志对“三支两军”的全面的评价。邓小平说：

“对‘三支两军’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很多坏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

评论员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战。‘文化大革命’的各派都是错误的。因此，‘三支两军’中的‘支左’是支派，不管支那一派都是错误的。”

4、草木皆兵

1967 年 6 月 14 日，北京钢铁学院“5·16 兵团”张建旗等人，同北京外国语学院“6·16 兵团”刘令凯等，联合起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 5·16 兵团”。

这个人数不多的反革命组织，总是在夜深入静之时，四处活动，张贴攻击诬陷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小字报。例如，《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等。有的还把周恩来与“王明路线”、“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这些错误活动，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8 月 18 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76 个院校的红卫兵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声明表示要与“5·16 兵团”战斗到底。

8 月 26 日，首都和全国各地来京的一千多个红卫兵代表，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 5·16 黑匪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1967 年 9 月 1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5·16 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5·16”，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9 月 5 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来京的红卫兵代表。江青说：要拥护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要揭露“5·16 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1967 年 9 月 8 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了一段话，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文章说：“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一份材料称，为动员宣传好《评陶铸的两本书》，9 月 7 日凌晨一时，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专门会议上，陈伯达、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等连续发表讲话。

戚本禹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是中央的重要战斗步骤。”

江青说：“这篇文章是个典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说：“这篇文章是从批陶铸到批‘5·16 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5·16’是陶铸极‘左’的发展。”他要求各新闻单位，20 日以后要大讲特讲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大讲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过国庆节。

江青的“9·5 讲话”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向“5·16”发起总攻的信号弹。9 月 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江青 9·5 讲话”。一时全国上下，军内军外纷纷举行集会和座谈会，讨论揭发所谓“5·16”的罪行。

9 月 18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核心组、外交部党委及对外文委

等代表，有一篇长篇谈话。他严厉批评姚登山："我看你有些昏昏然，你干扰了外交部的行动，你到处做报告"，"我那天病又犯了，连我的医生都看不过，要造你的反，你就坐在那儿看我，对我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

周恩来在谈到"5・16"问题时说，姚文元文章说的很清楚，"5・16"是个反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接着，他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就是那些不准确的、错误的、不存在的关系。"5・16"说它有八个方面军是吓人的……它没这么多人，只是少数的小头头。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强调指出：第一，"5・16"不要扩大化，不要到处去抓"5・16"。……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不要给人戴"5・16"的帽子。群众是受蒙蔽的么!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5・16"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别的单位不要干涉，不要去管他……

周恩来在讲话中，清醒的估计了形势，正确的指出了方针。但是却遭到中央文革的抵制和反对。

1970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央随即成立"5・16"专案领导小组，在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清查"5・16"运动，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致使清查"5・16"集团的斗争，演变成全国性两派群众组织的大混战，加剧了两派群众尖锐对立的派性斗争。

在此以前，1970 年 1 月，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教育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这是继 1967 年 1 月 13 日《公安六条》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肃反。《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反革命行为。"

2 月 5 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按照中央打击反革命的《决定》，凡是有"三指向"言行的都定为"反革命"，定为"5・16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把在"三忠于"、"四无限"现代迷信里，说过错话，写过错字的人，都打成"现行反革命"、"5・16 分子"，闹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尽管毛泽东强调：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但是由于清查工作是在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运动一开始，两派之间就相互你揪我、我揪你，相互攻击，相互指责对方为"5・16 分子"，把不同观点的人打成"敌人"。有些单位重复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号召"坦白交待"、"个别突破"，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群众，在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里，受到残酷的迫害。

在"全面内战"里，几乎人人都遭受整的"洗礼"。著名作家夏衍在"文革"中一直被

“整”，但他处之泰然，并且对“人整人”的“混战”，以诗为乐曰：“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短诗，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70 年 2 月至 11 月间，十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 万名，逮捕 28 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许多是冤假错案。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

另据 1981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罪而被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

“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因“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错案，竟达 24．9 万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 100 万以上。江苏南京市是 100 多万人口的城市，抓“5·16”扩大化，竟抓了 27 万人。扬子江机械厂 6000 职工，有 2000 人被当作“5·16”分子抓了起来，占了三分之一。被抓的人，没一个说得出“5·16”是干什么的。许多机关干部连家属在内，都因涉及“5·16”问题，实行“连根拔”，强制到农村落户。

对清查“5·16”分子，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文内，根据她个人的见闻，曾有以下记述：

“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记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个‘5·16’坦白大会。1966 年横眉立目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5·16’，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二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这个单位“下干校 1700 人。已经揪出‘5·16’竟达到 400 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5·16’抱有右倾思想!”

作家冯骥才在一篇《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的真实故事里，详细记述了云南某城市发生的事。

有一天，两派进行大联合谈判。一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刊有毛主席照片的《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方发现了，立刻把这个头头戴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

还有一次，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公安局来查，认定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动标语。于是就在市委大院抓了一个八岁的女孩。孩子的爸爸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参加了一派。他们用各种办法吓唬女孩，要她承认反动标语是她写的，可是女孩死也不承认，后来，他们把小女孩弄到市委大院批斗，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们威胁女孩说，要枪毙她。“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可是女孩摇摇头，硬是不承认。

于是，就把女孩带到刑场上，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猛然一阵枪响，女孩旁边的犯人，全都栽倒了。那个陪绑的八岁女孩，没有死，吓得昏倒在地!

5、人人过关

伴随着“清查 5·16”，北京、上海等许多单位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

最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问题的是江青。1967 年 11 月 27 日，她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上海市马上响应江青的号召，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借用整党和反“右”倾的名义，采取各种方法，从机关干部和群众组织中揪出所谓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漏网右派”、“假党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

1968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里指出，要“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根据这个批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内查外调”。对被造反派怀疑的一切干部和职工，都组织专门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国家为此投入巨大的资金和运输力量。成千上万的外调人员，为了微不足道的“疑点”，不远万里，爬山涉水，所获甚微。有不少外调人员借机会“公费旅行”，游山玩水。外调的所谓“特务”、“假党员”者，最终“查无其事”。

至于“内查”，更是花样百出。“群众路线”，变成了“群众专政”。在“一切经过群众”的口号下，非党员可以审查党员，普通机关人员可以审查党的高级干部。有的机关则搞什么“自报公议”，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在会上汇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然后群起分析、批判、质疑，“从鸡蛋里挑骨头”，闹出许多笑话。

一位在苏北战场七战七捷战斗中负伤的老干部，伸出他断掉半截的手臂，沉痛的告诉笔者说：涟水战斗中，我担任主攻的营教导员，胳膊被敌人打断。造反派审查我，竟质问说，你既然受了重伤，怎么还能活着下来?我含着眼泪回答，我是被战友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呵!而造反派则怀疑我是逃跑的，为这件事，审查我两个月……

为在全国建立新秩序，在“全国一片红”和“斗、批、改”的活动中，广泛开展了“清队”运动。1968 年 5 月 13 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给毛泽东。这个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笔者注：“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在中央警卫团(8341 部队)军宣队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江青控制的“点”，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这个《经验》上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根据这个批示，5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经验》材料介绍说，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在“毫不留情”的打击下，大搞逼供信，用所谓“攻心”战术，制造许多错案。材料介绍说，一个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女工，“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经验》转发以后，全国许多地区开展“清队”，把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当作“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局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受到立案审查的约占 75%左右。许多努力工作的好干部，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审查时，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的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连受审人员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祸及群众达一亿人。

闻名中外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是为报效祖国从香港归国的乒乓球健将，荣获过世界冠军。他们在“清队运动”中都被怀疑是“特务”，遭到游斗、毒打，相继在 1968 年 4、5、6 月自杀。世界冠军容国团在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一些党的忠诚儿女，为捍卫真理，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共和国的枪口下!

他们之中，有人民英雄张志新!

他们之中，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遇罗克!

他们之中，有多次上书毛主席，在狱中写下许多读书笔记的忻元华!

这里，简略记下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大庸县，年轻姑娘丁祖晓的被杀。

1969 年，林彪、江青集团强行推动的“三忠于”造神活动，遍布偏远的湘西农村。那时，家家升起“忠”字旗，户户挂起“忠”字匾，村村建起“忠”字碑。过去村里安放神龛的地方，现在一律变成了“语录台”。许多地方还把“三忠于”的“早请示”、“晚汇报”等五项“宗教”仪式，称为“五个第一”，每天上班前，下班前，吃饭前，睡觉前，要求早晚必做。伴随着这些“宗教”仪式，出现了大批冤案。

回乡高中知识青年丁祖晓发现，有些不识字的老实农民，因为背语录漏字掉字，说错一

句话，喊错一句口号，就要挨批挨斗，或者游乡戴高帽。对这些愚昧的做法，她想不通。于是，她向姐姐丁祖霞谈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对“忠”的看法，写信给自治州委的机关报《团结报》。得不到答复，她又把信改写成七张传单，在 1969 年 4 月 21 日“九大”闭幕前夕，在大庸县城散发了。传单像一颗炸弹，震撼了县城。

忠诚、正直的丁祖晓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要问这五个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我看这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好处，不但费工，而且是一种毫无作用的，多余的，甚至是害人的一种形式。”

“特别是现在，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做五个第一，把饭菜盛齐摆上，做了五个第一再吃，……毛主席还没有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这太不应该了。”

“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著’罗一层。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

“从现象看，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并非民心、民意。”

这封闪耀着正义光芒的信和传单，倾注着她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但是传单却变成了罪证。7 月 5 日深夜，丁祖晓被捕了。不久。她姐姐也被投入监狱。

1970 年 5 月 3 日，她在最后一场审讯时慷慨陈词：

“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

1970 年 5 月 8 日，24 岁的丁祖晓，为捍卫真理，血洒鹭湾的沙滩上!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的姑娘!

第十章 二月大搏斗

在历史的这面镜子前面，无论什么人，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是英雄的战士，还是人民的罪人?战斗的激流，时代的洪炉，会做出应有的答案。

这里记载的是动乱的年代里，老一辈革命家反抗左倾路线的一次正气凛然的斗争。

笔者访问了参加这次斗争的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

1、动乱的风暴

1967 年 2 月，首都北京的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两旁高大的建筑，以及偏远的四合小院，都搏斗在怒吼的狂风和严寒的袭击里。

情景是难忘的：沙尘迷漫着昏黄的天空，太阳像个苍白的斑点。在灰茫茫的苍穹底下，王府井大街上，沿街竖立结扎着苇席，张贴着两三米高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上的谎言、诬陷、谩骂，滔滔不尽……

马路上，乡村小道上，成千成万的青年人，三五成群，几十人一伙，像狂澜奔涛一样，在全国的各地城市、乡村里游动着，串连着，进行着徒步“长征”。

全国各地到北京进行大串连的人群，满街急匆匆地拥挤着，奔走着。

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时而喊着打倒这个，时而喊着打倒那个，发出尖厉的怪声，飞也似地往来奔驰而过。

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口，拥挤着一群群人。有几个青年人，激烈地进行着辩论。北京饭店前边的空地上，一排站着八九个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的干部，他们手里举着“红宝书”，一边低头“请罪”，一边高喊“万岁!”

局势一天一天地更加混乱了。街道上，各种各样的喧闹声、口号声，批斗会的叫嚷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各种各样的新闻、小道消息，到处传播着。从这里到那里，人们部在窃窃议论……

“一月风暴”……

“二月兵变”……

这都是为什么呢?

像许多历史事件一样，人们是直到后来才了解真相的。

1967 年春天的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四位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同志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大冤案，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即使在当时，人民也没有沉默，人们愤怒地诅咒它!坚信有一天，人民会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

给以彻底清算!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中，在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大搏斗中，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他们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卫了人民，保卫了党。他们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英勇战斗，以“二月正流”的光辉名字，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2、灿烂的一页

这场激烈、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怎样爆发的?如何进行的?它的进程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1978 年 12 月间，我曾先后访问过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谷牧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熟悉这一斗争的同志。承蒙他们的指教，使我对党的历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而这场斗争发生在 1967 年早春时节，绝非历史的偶然。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斗争绝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了!”

1978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 时，我走进谭震林同志的青砖住宅。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干将的谭震林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他一边解着上衣，一边激动地在屋内踱着脚步。回忆，像火一样地在胸中燃烧着。

“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对革命的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都打倒?对人民解放军是搞乱了好还是稳定住好?这些都是运动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一句话，这场所谓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应该依靠谁来革命?这些都是大问题啊!都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屡次争论的问题。”

谭震林同志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很早就投身了革命斗争。1928 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斗争中，他曾经长期担任井冈山特委书记，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开创与坚持了湘赣边界的斗争。火热的长期的革命战争，磨练了他倔强的性格。当他一件件回朔着浮涌在眼前的许多事情时，沉重地说：

“1966 年 8 月 18 日之后，红卫兵运动就愈来愈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偏离轨道，违犯党的路线政策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8·18”这天，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

惯于“当面念语录，背后下毒手”的林彪，面容苍白地站在播音器前，摇着红《语录》，声嘶力竭地对伫立在广场上的群众嚷着：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在红旗飞扬的人海里，在万头攒动的队列前面，林彪“打倒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

切”的喧叫声，在闷热的空气里震响着，越过高山、河流、平原，在祖国各地风也似的传开了。

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的老革命家和许多领导同志，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在险风恶浪中，老一辈革命家正气浩然地斗争着。1966 年 9 月，陈毅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厉声质问：

“有人要‘否定一切’,那么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有人说要‘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如果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打倒，那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这是有人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这时，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

3、展开了总攻击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还要再乱，乱的要深，乱的要透!”

林彪、江青一伙到处狂叫着。凡是在他们看到“乱”的不够的地方，都得重新点火，挑起大乱!

夺权!夺权!夺权!

到处是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夺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连工厂、企业的班组长也在被夺权之列。

1967 年 1 月 8 日凌晨，陈伯达打电话给正被造反派围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阎红彦愤怒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随后，他即含恨自杀。

东海舰队司令员、著名战将陶勇夫妇，也惨遭折磨迫害致死。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数十次被揪斗、审讯、拷打。面对着死的威胁，他始终坚持不解地斗争着。后来，当周恩来看到张霖之同志被活活鞭打致死的照片时，他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

很多省市党的负责人，如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等，都被造反派批斗揪走，不知下落。

全国许多著名劳动模范也都遭到冲击。一些疯狂的“战斗队”，如狼似虎地向大庆油田冲去，妄图一刀砍倒大庆红旗。他们无耻诬蔑大庆红旗是“假”的，大庆经验是“吹”的，要把铁人王进喜打成“全国头号政治大扒手”……

一天，一些人在辩论会上叫嚷“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也是假的”，铁人虎地从地上站起，怒火满腔地甩掉身上的老羊皮袄，发出气壮山河的声音：

“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铁人被关进一间密室里。一群坏家伙手持皮鞭、铁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诬蔑大庆红旗的“十大罪状”，强迫铁人签字。

“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

铁人昂然挺立着，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大声吼着：

“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几个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

坏家伙们恶狼似的扑了上去。他们扒掉铁人身上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地，双脚踩在身上，拷打得他站不起来。

同井架的工人说：“你快走吧，铁人!”“到北京去，找总理去!”

4、狂澜中的砥柱

周恩来总理得悉铁人遭迫害，立即召见铁人到北京。

1967 年 1 月 8 日这天，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了王进喜。铁人握着总理温暖的手，看着周总理慈祥的面容，心潮翻腾，他有多少话要倾诉啊!总理浓眉下闪着锐利的目光，愤慨痛斥那些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阴谋家。周恩来用高昂的声音说：

“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我们要爱护红旗。”接着，总理严肃指出：为什么有的人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红旗!

这春雷似的声音，响遍大地，给了林彪和江青一伙当头痛击。总理亲切地把王进喜同志安排到中南海住宿。

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像参天的大树，保护着许多革命的干部和民主人士。

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召开会议，议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都到了，可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被揪走了。

总理和副总理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并肩战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谈到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好端端的国家乱成这个样子，怎么不痛心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想到亿万人民的生计，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几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

“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用无数先烈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

几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对而坐地谈论着：

“能允许他们把党和国家搞垮吗?不，不能，决不能!”

“他们想搞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

他们谈起不久前的一件事：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狂妄放肆地叫嚣：“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这件事，引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愤慨。谭震林当场痛斥江青：“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呢?你是什么东西?岂有此理!”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遭受冲击了。军内外造反派狂叫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国防部和各大军区，无不遭到冲击。

1967 年 1 月 3 日，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发起了进攻，策划要在 1 月 5 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

革命军事家贺龙，早在 1966 年 8 月间就遭到林彪一伙的攻击。他们炮制了一个所谓“8·25”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贺龙，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江青还窜到清华，在群众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接着，贺龙同志全家被抄了，儿女流落离散了。

5、保卫人民的天下

面对着这些令人痛心的“无法无天”的罪行，饱经风霜的老帅们决心行动起来，决不让人民打下的天下，葬送在这伙坏人手里。

1978 年 12 月 5 日下午 4 时，笔者来到后海边一座二层黄楼里。刚动过手术的徐向前元帅，身穿黑色制服，右臂支着木拐杖，在女护士搀扶下，坐在玻璃窗前的沙发里，同笔者热情地谈到“二月逆流”问题。

他先从自己当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谈起。徐帅说：“1967 年 1 月 6 日，杨成武同志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由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长。我说，我多年有病，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后来，有一次我见到主席，当面又向他表示我确实干不了。”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徐帅满头白发，头脑清晰，声音朗朗，追忆着当时的情景。

“我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全国掀起夺权浪潮。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都受到了冲击。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

受冲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报告说，首都红卫兵在福州闹的战备工作搞不下去了。他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我怀疑主席身边有坏人!”

南京军区有八个领导干部被揪斗，有一个连队跑到军区机关闹事。许世友司令员气愤地说：“如果有人敢来揪我，我就开枪!”

面对十万火急的情况，徐向前站在电话机前，像在战争年代的火线指挥部里一样，一次一次在下达命令，对来自全军的问题，做出决定果断的回答：

“军队不准串联!”

“不准打砸抢!”

“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

“军队不准搞大民主、乱抓人!”

1 月 11 日，军委“文革”小组成立的当天，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发言。他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

为了稳住军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

6、军队不能乱

1 月 14 日，中央终于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但是，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都连续被揪斗了。

1967 年 1 月 19 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争论起来。

江青一伙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们辩论：

“党政机关都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

“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保卫国防靠什么?”

1 月 19 日晚上，北京军区文工团抄了肖华的家。肖华从后门出走，穿过几个胡同，在总政傅钟副主任家要了一辆汽车，跑到西山叶剑英住地。

1 月 20 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时，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明知故问的挑逗说：“昨夜总政主任肖华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听到江青有意火上加油，厉声说道：“他昨夜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

叶剑英拍桌子严正警告江青一伙：“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这时，肖华赶到会场。徐向前听了肖华谈他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气愤得猛力拍桌子，茶杯盖子震落地上。徐向前说：“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政客?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说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军队难道就可以叫你们几个毁掉吗?”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为防止反军恶浪蔓延，1967 年 1 月 24 日晚上，徐向前直闯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在铺满绿绒地毯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办公桌子。只有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孤零零地竖立在屋角里。怕风、怕光、怕声的林彪，在拉上窗帘的房子里，背着手，低着头，踱来踱去。

徐向前一见林彪，立刻向他开门见山地讲了军队的混乱情况。徐向前说：“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并且随即请来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共同研究。

叶剑英说：“地方到处夺权，夺到军队头上来了!这怎么行呢?”

徐向前说：“我建议马上搞个法，立个章程，军队不稳定，天下必大乱。”

聂荣臻说：“是呀，赶快制定措施吧，不然军队一垮，你国防部长不成光杆司令了吗?”

经过讨论，林彪当即向秘书口授了“九条”。军委会议还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到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小组再加讨论。徐向前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元帅，请他也到钓鱼台参加会议助威。

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全在，周恩来总理也来了。经过讨论把“九条”改为“七条”。陈伯达把通过的“七条”，装进徐向前的口袋时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件送到林彪办公室。当他回家时已是黎明四点钟了。

林彪看了“七条”，马上报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当即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有的高干子女曾参与抄家活动，影响不好，毛泽东又在原“七条”的基础上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样，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送到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

1967 年 1 月 28 日下午五时，由林彪、徐向前一起到中南海报送毛泽东。

1 月 28 日，毛泽东当场批示了“八条”：“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并且提出要加上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

毛泽东说，那种落后、野蛮的方式，共产党怎么能采用呢?必须严令禁止。

《中央军委命令》，亦称《军委八条》的中心是稳定军队，例如“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单位”，军队内部“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等等。

“八条”传达下去，对稳定军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反军事件仍然连续发生。

1979 年 2 月 9 日下午三时半，笔者在景山附近的一座庭院里，再次访问聂荣臻元帅。年已 80 高龄的聂帅，靠在躺椅上，一边服药，一边详细分析了反军浪潮的起因。聂荣臻说：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乱军的目的，他们制造了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反革命舆论，胡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歪曲人民军队的本质，并且诬蔑“解放军资产阶级化了”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一个反革命目的，想要搞跨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他又说："我们党经历了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他们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

7、老帅巧借东风

1967 年 2 月 10 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毛泽东就陈伯达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说："你是十一届中央全会选出的常委，陶铸也是这次会议选出的常委。这件事，你跟谁商量了?跟我商量了，还是跟林彪商量了，还是跟总理商量了?都没有商量!一个常委有什么权利打倒另一个常委!"毛泽东接着说："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不是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批评江青："你眼睛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

会上，毛泽东做了两个决定：第一，由王力负责，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第二，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叶群。

会后，陈伯达找到王力说，那个打倒陶铸的会，是江青组织的，事先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从被窝里被叫去讲话的。

陈伯达并且对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决定要自杀了。

王力劝他不要自杀，要请求总理帮助。后来周总理到了钓鱼台 14 楼，找陈伯达谈了几小时，陈伯达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1967 年 2 月 11 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

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因受伤被俘。第二天押解途中，我军事先在敌军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突然袭击敌人，从敌军中抢救出刘志坚。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一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当即质问他：“凭什么给定案，没有证据怎么能定案?”他还针对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

叶剑英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全国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嘲笑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聂荣臻也在会上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

2 月 14 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 16 号楼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王力约关锋一起到 8 号楼去催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都是江青搞的!陈伯达给她逼得要自杀了。”

关锋哀求康生说：“康老，可不能发火哟，要顾全大局呀!可整不得江青同志呀!”

这次批评会，江青借口有病，不参加。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集中批评陈伯达，一句也不批评江青。

毛泽东在中央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以及文革小组开会批评江青、陈伯达，直接推动并鼓励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毛泽东后来也说：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8、面对面的搏斗

2 月 16 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扩大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出现了更

激烈的争论。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谭震林问他：陈丕显来了吗?

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大区和省委书记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先后被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

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仰着脸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一听，怒火顿起。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一走进会场，再次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陈丕显要是反革命，杀了我脑袋!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推脱责任，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谈到一些干部子弟被冲击时，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谈到造反派时，谭震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 年 12 月初，农林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的，从来没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加气愤。他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愤怒地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他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回转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年代，陈毅、谭震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襟怀坦白的陈毅，接着发言。他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揪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辩解，说“文革”小组经常讲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

李先念当即驳斥谢富治：“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这次碰头会，江青又借故有病，没有参加。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出席了会议。他们一开始就处于被批的地位，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全场只有谢富治不断插话，说:“谭老板，你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谢富治：“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笔者注：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当即质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参与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他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这时，陈伯达也插话说：“我也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陈伯达，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1966 年 10 月 3 日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集体讨论审查。

碰头会的当天晚上，陈毅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的正规一些，好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们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

9、江青比武则天还凶

碰头会后，谭震林在 2 月 17 日，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他在这封信中，慷慨悲愤地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话，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候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铿锵有力的话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2 月 19 日，林彪将这封信送给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批件和谭震林的信，批了几个字：“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看了主席没有表态的批语，十分不满。他摇摇头，一气之下，把主席的批件揉成一

团，丢在痰盂里。后来，林彪秘书偷偷将主席批的谭震林信件从痰盂里捞出来晒干，用浆糊修补、对好。

后来，林彪见到毛泽东谈起运件事，毛泽东说：江青哪能比武则天呢，她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10、恶人先告状

2 月 16 日下午 6 时许，怀仁堂碰头会散会了。待其他人都已离开会场，姚文元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张春桥、王力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王力你要站稳立场!

张春桥说：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一次。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我们先碰碰情况。

王力说：可不能随口乱讲，要如实，要准确。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同乘一辆车，回到钓鱼台 16 号楼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张春桥、姚文元照着各自的记录讲，王力执笔，一条条地记下来。后来，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由王力抄清《2 月 16 日怀仁堂碰头会要点》。

张、姚、王三人带着整理的《要点》，来到钓鱼台 11 号楼江青住地。先由张春桥参考整理好的《要点》，讲了会议的情况，谈话中间，姚文元不断插话。

王力后来告诉笔者：江青听完碰头会情况，她的"病"立即好了。她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是错误路线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当着三人的面，立即拿起电话，要主席秘书报告主席，说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有重要情况向主席报告，务必请主席今晚接见他们。过一会，主席通知，当夜十点，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来。

这座宽敞明亮的大厅，是毛泽东和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经常议事的地方。自从"文革"以来，连中南海也闹起来了，毛泽东和林彪只好搬进人民大会堂来办公。

毛泽东同三个人一边握手，一边问张春桥：你没有回上海?

张春桥回答：明天回去。

接着，张春桥按照《要点》，开始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抽着烟只是笑，静静地听着汇报。张春桥讲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再也不笑了。他立时恼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张春桥这时趁机诬告了周总理，说总理对 13 期《红旗》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生气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常委审查哟!"

毛泽东听完汇报，指示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干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经济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铁路。"

这时，毛泽东已心平气和了。王力见毛泽东态度有了变化，趁机汇报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王力又说："请主席考虑，我认为重要社论，经过总理和政治局同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后来看了这篇社论，写信给王力、关锋说，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审查这篇社论。

陈毅在社论审查前，曾对王力说："这篇文章好得很。只要这样，大家都不会有意见了。"(笔者注：2 月 23 日，《红旗》第四期发表的《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社论说，经过半年多文化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

11、逼迫总理交权

张春桥等三人离开人民大会堂的当天深夜，又回到钓鱼台 11 号楼。向江青汇报了情况以及毛主席的讲话。

江青对张春桥说："你可以晚一天回上海，走前要同周总理谈一次话。"

2 月 17 日下午，张春桥奉江青之命，在钓鱼台 16 号楼会议室，同周恩来谈话，逼迫总理向中央文革小组交党政大权。

张春桥刚同周恩来谈完话，随即邀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同他吃晚饭。在饭桌上，张春桥洋洋得意地说："我已同总理谈了话，谈了怀仁堂会议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讲了要

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的问题。”

张春桥接着又说：“总理同意了，总理说，除主席决定要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外，日常的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总理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从此以后，原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改成了国务院的碰头办公会。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周恩来也不再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块办公了。

在同一时间，王力把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以及江青的谈话等，向周恩来做了报告。

12、急风暴雨的袭击

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七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提出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他们敢于向陈伯达、康生一伙面对面地斗争，以正气压倒邪气，反映了亿万人民抗拒左倾错误的呼声，是一次坚持原则的抗争。但是，在个人迷信达到顶峰的年代，老帅们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却犯了“禁忌”。

2 月 18 日深夜至 19 日拂晓，毛泽东通知参加碰头会的全体同志开会。到会的有叶群(代表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会上，毛泽东对敢于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的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严厉地加以斥责。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

这次会议，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去参加。

毛泽东对在场的叶群说：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我和林彪今天就走!

毛泽东凝视着这些在战争年代同他共过患难的战友，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说：把北京留给他们，让他们来搞，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毛泽东如此“震怒”，是因为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在怀仁堂的发言，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可以允许纠正“文革”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不允许任何人从整体上否定他所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不允许老同志批评他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小撮人。

最后，毛泽东宣布，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处理中南海怀仁堂的问题。

毛泽东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并分别同他们几个谈话。

2 月 19，由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批评。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

2 月 20 日下午，江青与王力同车到京西宾馆。江青先到林彪那里，然后又来接王力。

王力向林彪的报告，同他向周恩来的报告内容一样。叶群在旁记录。林彪听了关于 16 日怀仁堂会议情况的报告，只讲了两句话:“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陈伯达只是一个书生。”

王力走后，江青又留在林彪那里。王力从他们的诡秘的行动里，开始预感到江青和林彪正筹划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从 2 月 22 日至 3 月 18 日，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续召开过七次中央“政治生活会”。

参加这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有 2 月 16 日参加怀仁堂碰头会的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新参加会议的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肖华、杨成武、汪东兴。

这次因为许多人新到会，为帮助他们了解怀仁堂碰头会的情况，周恩来叫王力负责整理 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记录》清样由周恩来、康生审定修改，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署名整理。

政治生活批评会上，骂人最凶的是康生和谢富治。康生叫嚷说：“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你们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谢富治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揭发叶剑英在批判谭震林时曾说过：“自从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战士，在他受伤临死弥留时，自己诅咒自己所参加的战争。”

叶剑英理直气壮的回答她：“我说过这样的话。”

叶群马上指责叶剑英：“这是你们把自己比作是受伤的，把群众比作敌人!”

叶群还在会上带头揭发叶帅、徐帅背着林彪处理“青海事件”、“四川事件”的问题。

13、半个多月的批斗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连续对陈毅、徐向前、谭震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

康生敲着桌子，指着徐向前凶恶地叫嚷：

“徐向前呀，你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就不干了’。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

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叛徒、内奸、特务!……”

陈伯达说：“你们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江青说：“你们保护什么老干部，是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你们就是要招降纳叛!”

林彪、江青一伙给老同志戴大帽子，诬陷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 301 医院，他们就骂什么：“301 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们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当面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党的民主原则备受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同志，催要书面检查。秘书说：“又催来了!……”

李先念气愤地说：“你告诉他，我不写。你就说，我不写检查!”

见秘书有点犹豫。李先念大步走到电话机前，严肃地说：“你把我原话告诉他，就说，我不写检查，看他怎么办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 18 级干部。反右派斗争中，积极阴谋参与制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击大批革命干部。他因为写了关于研究李秀成的文章，得到了陈伯达、江

青之流的赏识。于是，青云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到处兴风作浪，疯狂迫害革命干部，积极组织策划对老帅的批斗。

3 月 18 日，批斗会结束这天，陈毅回到家里，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真是巧合！1926 年 3 月 18 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 4 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差点被打死，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 41 年后的今天，我因为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14、反击所谓“复辟”

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陈伯达又送一件关于天津小站发生的所谓“反革命复辟”的材料给毛泽东。2 月 28 日，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材料上批：“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陈伯达借机发挥，把毛泽东这句话发展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反动口号。从此，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活动。

3 月 6 日，江青指使戚本禹和谭厚兰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集中力量攻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

3 月 8 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的事件。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代理农业部部长江一真。

3 月 9 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3 月 10 日上午，戚本禹、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康生也赶到农业展览馆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3 月 14 日，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反对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要“炮轰、火烧”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震林、陈毅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 月 20 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还说，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二级台风”!

4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播放林彪讲话的通知，评价林彪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告，对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样，林彪讲话和中央通知，就成了林彪、江青一伙行动的纲领，通过反击“二月逆流”更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

据 1978 年 12 月 21 日《山东日报》载：1967 年山东全省在“反逆流运动”中，当时仅临沂地区就有四万多老干部被关押，遭到进入沂蒙山区的“棒子队”的毒打，其中有 569 人被打死，有 9000 多人被打伤致残。当地驻军因不支持“反逆流”，有 2000 名指战员遭到迫害。

15、“还是要搞团结嘛”

乌云可以一时弥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1967 年 4 月 30 日的夜间，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着这些曾和他一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打天下的战友。他说：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一个大闹怀仁堂。各位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的意见，是发牢骚嘛，这是党内生活许可的。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接着又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屋里，扬起一阵笑声，老帅们严峻的面容上，重又露出了笑容。同志间过去那种紧张的空气，突然缓和了。雅静、明亮、宽敞的会客室，洋溢着老战友亲切、团结的气氛。

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请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五一节。

这是一个转折!

曾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在五一节上午，同乘坐吉普车

的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来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他们来到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群众中间，和群众一起联欢。

夜晚，他们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广场上百万群众一起，观看了五彩缤纷的焰火。多彩的礼花，耀眼的亮光，交叉闪烁的探照灯光柱，将春天的夜空，装点得像光彩夺目的天宫一样。

望着这一切，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心里很不平静。眼前的人山人海，欢歌盛舞，怎能掩盖住社会上的风暴乌云?!就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武斗、打砸抢、抄家还在进行，火车停止了开动……

16、围攻中南海

社会上的风暴乌云，预示着更残酷的斗争。5 月 4 日这天，陈伯达、戚本禹亲自窜到北师大，向谭厚兰一伙煽动说：

“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

“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

“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1947 年陈伯达和康生在晋绥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推行的极左口号，重又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广了。

他们把这次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决定，当作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中的“五月妖风”来反。于是，已经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了!

七、八月，在江青、陈伯达策划下，戚本禹直接指挥国务院各口造反派、建立“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他们动员 20 万人，对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展开围困战。目的是挑起事端，嫁祸周恩来。戚本禹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说：“刘少奇已经是死老虎了，我们目的是打活老虎，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

聂元梓对北京大学的红卫兵说：“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我们要听戚本禹的!”她亲自扛着大旗，带着二百多人的队伍，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

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也都带着各自的队伍，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叶群亲自来“火线”慰问，江青则派人用记录片摄下这“历史的一页”

7 月 15 日，“批陈联络站”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周恩来多次指示要他们撤出。公检法负责人谢富治，却几次窜到那儿公然煽动说：“小将们，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

7 月 17、18 日，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同志的誓师大会。

8 月 5 日，在《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的日子里，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同志的院子里，批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同志。王光美、卓琳、曾志同志也被揪出陪斗了。

与此同时，这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要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接受大会批判”。戚本禹布置中南海内的造反派进一步批判刘、邓、陶。他说：“不要文质彬彬，一定要有气氛，”“要是开不好，拍成电影，群众看了是不会答应的。”

当天，陈毅到飞机场接待外宾。在候机室里，他痛斥那些阴谋篡夺外交大权的野心家：

“你们是两面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不能把权交给你们!”

造反派更加猖獗地揪斗陈毅同志，煽动一些人在外交部门口进行“静坐揪陈”。他们伙同在外事口的一些坏人，抛出“七月动荡，八月大乱，九月夺权”的反革命行动计划。

8 月初的一次会上，有人公然对抗周总理指示，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窜上主席台揪斗陈毅。周恩来指示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并愤然退场。

8 月 15 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公检法负责人谢富治操纵大会，一心搞臭陈毅，周恩来批评他说：“搞臭了陈毅同志谁来当外交部长?你来当外交部长?”

8 月 19 日，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谭震林的大会。会上，周恩来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谭震林副总理。会中，周恩来临时有事离开会场。乘此机会，谢富治的老婆、卫生部部长刘湘平，竟然毫不知耻地扑上台，劈面打了谭震林两个耳光。

接着，就有三个大汉一跃上台。他们将谭震林架起喷气式，一阵拳打脚踢，把谭震林打倒在地，然后在他腰背上踏上两只脚!

对这种错误做法，李先念副总理当场抗议说：“周总理事先跟你们是有协议的，可以批判，但不能武斗。你们这样搞，我就退出会场!”

对于这次外交部夺权，1972 年 6 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曾指出：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7、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

“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这是唐太宗写在《赐萧〖HT5，7SS〗王〖KG-*1/5〗〖HT5，6SS〗禹》中

的四句诗。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的暴风骤雨中，在“版荡”的动乱之世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搞突然袭击，转变会议内容，大批“二月逆流”。他们把六个老同志分割开来，每人专门成立一个小组，不断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

对批斗会，徐向前回忆说：“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往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没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疼加剧，深感体力不支。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十多天下来，我就像害了场大病似的。”

10 月 17 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上，江青一伙围攻老帅，一份小组记录记载着他们的插话和发言：

江青：不是叶剑英，而是一个集团。

谢富治：对，是一个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

康生：……表面是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徐向前的口号，同陈毅、李先念的门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康生：徐向前说，要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

姚文元：自己暴露自己。

谢富治：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他真乱军。他们不是保护老干部，是煽动干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谢富治：“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姚文元：2 月 16 日，合流总爆发。“二月逆流”就是对刘、邓、陶、叛徒、特务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的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指出，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是“二月逆流”争论的中心。上海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谭震林“2・16”政治局会上说的话，完全否定了主席的领导，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 16 条，否定了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袭来的急风暴雨，老帅们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愤然反击，时而违心的“检讨”。

聂荣臻副总理曾到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林彪、江青一伙就陷害他们是“反党集团”，监视行动。有人甚至拿出监视聂荣臻的活动记录，逼他承认。聂荣臻当场痛斥这种法西斯罪行：

“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搞这是什么?是特务!”

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每日带着病，出席会议，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躺在沙发上稍事休息。会上，江青一伙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聂荣臻是什么“杨余傅事件”黑后台。

聂荣臻去问林彪：是怎么回事?

林彪狡辩说，没有点名嘛。

聂荣臻说：“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群众代表前，当着林彪的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后台不是你，第一是我，第二是林彪……”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诬蔑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

18、《简报》的诬陷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林彪、江青一伙为继续迫害老帅，突然把闭幕了的一期《会议简报》发了下来。

《简报》莫须有地诬陷徐向前的夫人、聂荣臻的夫人是“叛徒、特务”；而且故意披露，1948 年 4 月中旬，毛泽东由晋绥边区进到晋察冀边区，暂住阜平县城南庄军区司令部时，驻地曾遭到国民党飞机扫射轰炸事件。

他们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故意制造借口，诬陷当时在山西、河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聂荣臻，妄图给他们戴上勾结敌人的帽子，置之于死地。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当时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毛泽东将要到来的消息，召集有关人员亲自布置和安排了毛泽东的安全和警卫工作，以及食宿方面的事宜。

聂荣臻将自己住的两间套房腾出来，修缮好，让毛泽东住，而自己搬到紧挨毛泽东住房的另一间房里住。他仔细察看了毛泽东住房内的桌、椅、床铺等用具。他叫一位身材高大的

同志坐在一把椅子上试了试，发现不太牢固，便把自己用的那把躺椅换到毛泽东房里来。为了防止敌机的袭击，还组织人在房后不远的山下挖好防空洞。

毛泽东还没进入晋察冀军区辖区，聂荣臻就派保卫干部带了一个警卫连远道迎护。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后，聂荣臻常常陪同毛泽东外出散步，有时半夜三更还亲自去检查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

一天清晨，一架敌机窜入驻地上空盘旋侦察，随后又来了两架。聂荣臻听到飞机声，判断敌机要来轰炸。果然，后来的两架敌机就在城南庄上空盘旋。毛泽东因整夜办公，天快亮时才睡觉，尚未起床。聂荣臻很快叫醒毛泽东，说："敌机要轰炸，快进防空洞!"

他随即跑出去查看防空洞和警戒情况。聂荣臻从防空洞出来，见毛泽东还未来，马上返回毛泽东房内，催毛泽东快走。毛泽东风趣地说："怕什么，无非是扔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这时敌机越飞越低，情况万分紧迫。聂荣臻说："不行，全党全军服从你，这会儿你得听我的。"

说完就命令警卫人员，并与赵尔陆同志一起动手，用担架把毛泽东迅速抬到防空洞里，刚进防空洞口，就听到轰轰几声巨响，黑烟冲天而起。

这次轰炸，敌机共投下五枚炸弹，其中两枚在毛泽东住房附近十几米处爆炸，一枚正在小院里爆炸了。房子门窗全都炸掉了，房内用具震得七倒八歪，桌上的暖水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在场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庆幸地说："哎呀!要不是聂总当机立断下命令，这次主席就真危险啊!"

此次敌机轰炸，后来在解放大同、保定时，从敌伪档案里查清，是司令部的一个内奸作案引起的。在罪证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的情况下，经过正式审判，把这个内奸枪毙了。

19、徐帅三次被抄家

徐向前同志先后被抄家三次。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都抢劫一空，可是造反派一根稻草也没有捞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的忘我战斗。

一个阴冷的傍晚，解放军测绘学院《红总》的三百多红卫兵，乘车向徐向前住地冲来，但却找不到准确的地址。他们就奔到被抄过几次家的张爱萍将军家里，将他强拉上车，要他带路找徐向前。张爱萍临危不乱，始终不讲徐向前的住址。车子在街上往来转了好多圈子，也没有找到地点。红卫兵无可奈何，把张爱萍赶下了车。这时，恰巧路遇高等军事学院的一辆汽车，为他们带路引到徐向前住宅。

红卫兵见卫兵不开门，攀上墙根旁的一棵大树，翻墙进入大院，打开大门，潮水似地涌入大院。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闻讯赶来制止，周恩来总理也亲自打电话，要他们迅速撤离，徐帅府才免遭灾难。

后来，徐向前对笔者说：

“我们出生入死，跟着毛主席革命，献身几十年，错误犯了不少，但是我们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呵!”“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我们为党战斗了一生的人，能允许他们把党搞垮吗?看到他们把党的事业破坏成这个样子，我们能不气愤吗?能不起来斗争吗?”

谈到江青一伙诬陷他的《简报》，徐向前气愤地说：

“他们诬蔑我们要搞政变，胡说什么政变时间就在七、八、九月。……这一切谎言，都是为了把我们打倒，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

20、诬陷李先念

战争年代，曾长期在大别山区和中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李先念同志，1946 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向北突围。林彪、江青一伙竟制造谣言说他是“大叛徒头子”，当即遭到参加领导突围的王震、王树声等同志的有力反驳。他们用大量确凿的证据，驳斥了诬陷，保护了李先念同志。王震等拿出当时突围作战的会议记录说：

“这些都是我们出生入死亲身经历的历史，怎么能允许颠倒啊!”

大别山区的人民，清楚记得，在大革命的洪流里，是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鄂东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是曹学楷、吴焕生、王树声等同志，点燃了黄(安)麻(城)起义的火炬。在火热的斗争中，一个青年木匠，放下手中的大锯，拿起了武器，投身革命战争的大海。这个青年，就是李先念同志。

赤卫队、游击队壮大成英勇的红军。李先念同志担任了红军团政委，而在他担任红军师政委的时候，才只有 20 岁。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移到大巴山，开辟了川陕苏区。长征途中，李先念作为一个主力军的政委，率部苦斗在黄河以西，弹尽粮绝，突围出祁连山区的冰天雪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又率部挺进中原，战斗在江湖河汉之间。

炮轰叶剑英

林彪、江青一伙把献身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的叶剑英同志，视为他们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千方百计要打倒。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

叶剑英当场反击说：“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站在毛主席一边，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叶剑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积极投身北伐，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他又和叶挺、贺龙同志三人，在庐山脚下九江市甘棠湖的小舟上，策划了向南昌的进军。

在广州起义的烈火里，他高举红旗，同张太雷、叶挺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建立广州公社的斗争。在开辟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里，他指挥作战，签发红军作战的命令。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他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及时把张国焘的阴谋活动报告给毛泽东，保卫了党、保卫了革命。

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周恩来同志一同参加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延安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了全军的作战。这一切，都将永远照耀史册。

对于这样一个功在祖国的老帅，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违抗党规国法，派人抄了叶剑英的家，挖开了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1967 年 4 月 2 日，戚本禹讲话当天下午，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同志的五个子女及其亲属、保姆拘捕，分别关押一年到四五年。

21、“朱德是红司令”

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文革”开始时，已是八十岁高龄，但也屡遭“文革”的炮轰。中南海内外贴出了污蔑他是“军阀”、“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的大字报。

毛泽东得知后，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

“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朱德是红司令，红司令!”

“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可是，林彪一伙根本不听。

一天下午，李富春同志的秘书，突然接到林彪死党黄永胜秘书打来的电话，念一道“勒令”:“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秘书把电话记录交给李富春。他轻蔑地看了一眼，愤怒地把条子掷在地下，对秘书说“不要理他!”

22、“大雪压青松”

一次陈毅副总理参加华东小组会议，错把《语录》上下拿颠倒了。林彪、江青一伙立即

抓住这件小事，大施反革命淫威，把陈毅批判了半天，狂叫：你还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吗?

陈毅幽默地回答：“当我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干革命的时候，在座的许多人，还不知在哪里呀!”

陈毅同志是老实人，是最讲真话的人。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请华东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江渭清、李葆华、张劲夫等来到家里聚餐。他满怀悲愤地对老战友们说：

“来吧!我们恐怕是最后一次聚首了!”

“这太悲观了吧!”有人说。

陈毅摇摇头，端起酒杯说：“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果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说毕，热泪夺眶而出……

有位同志一言不发，当场提笔疾书“劲松”二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老一辈革命家以凛然的革命气节，像傲霜斗雪的青松，抗击着林彪、江青一伙的狂风骤雨。

23、疏散的时刻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看到徐向前家中被抄的《简报》，他马上在《简报》写下批示，指出：对于所有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及其家属，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这批示到了林彪那里。林彪一边写着什么：“同意主席批示”，“不要制造新的障碍”。另一方面，又暗地指使他的一群同党，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

根据战备形势，中央决定1969年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北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例如，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北京郊区的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由此可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一事，并不属林彪的“第一号令”。同“疏散”中央负

责人混为一谈，夸大林彪“第一号令”的作用，实属误传。

在八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被疏散的日子里，他们尽管身陷囹圄，精神遭受折磨，但始终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充满高昂的斗争精神。

陈毅同志到了河北省石家庄以后，经常深入工厂蹲点，到基层调查研究，当新的谣言袭来时，他一笑置之，坦然地说，是好人不怕别人说坏话；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

这时，国内外大事，几乎全靠周恩来总理操劳处理。从夜晚到黎明，从日出到黄昏，他关心着祖国各条战线的问题。从生活必需的油米柴盐，到遨游宇宙的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的山寨，到广大城乡的亿万人民，都时刻在他关怀之内!

有一天，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小枫前来探望总理。他恳求总理为全国人民保重身体。总理听了，在黄昏的庭院里，停下脚步，闪着炯炯目光，深情地望着烈士后代，激动地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同林彪、江青一伙搏斗的暴风雨里表现的崇高品质。

24、为“二月逆流”平反

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同志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这件事搞清楚了，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已亲自为“二月逆流”翻了案、平了反。

叶剑英到医院探望病重的陈毅，把毛泽东给“二月逆流”平反的喜讯，告诉了他。叶剑英轻轻走到病床前面，伏下身子，用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共同奋战几十年的战友，生怕听不见似的，大声地颤抖地说：“陈老总，你听到了吗?‘二月逆流’平反了!”

陈毅听见呼唤，从昏迷中醒来。苍白的脸容上，泛起难以觉察的笑容，他好像有许多话要讲，但却没有力气讲出来。

“……”

陈毅微微张开口，嘴唇颤抖，断断续续吐出一些不连贯的话：

“党中央……红军……”

“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这位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英勇搏斗的共产主义战士，1972 年 1 月 6 日，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78 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郑重宣布，为因“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对林彪、江青一伙精心策划的反“二月逆流”斗争，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先后持续四年半之久。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终于认识了林彪，也认识了我们。”

第十一章 钓鱼台的风波

1968 年 3 月 27 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军民大会。在这个被称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一伙，把揭露“杨、余、傅事件”，当作文化大革命决战“第五回合”的一次胜利来庆祝。

林彪、江青一伙叫嚷的这“五个回合”是：第一回合，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第二回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回合，击退所谓“二月逆流”；第四回合，揪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回合，揭露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

为了解“杨、余、傅事件”真相，笔者多次访问当事人杨成武、傅崇碧将军，余立金将军夫人陆力行和有关人士。

1、“第五个回合”

1968 年 3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文章，说什么被推翻的敌人决不会死心，决不会睡大觉，每日每时企图复辟，“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这篇评论是新风暴的信号。

信号来自 3 月 22 日深夜的党中央的碰头会。

这天深夜，林彪走出他在人民大会堂住的新疆厅。向住在 118 号房间的毛泽东，当面汇报杨成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吴法宪等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人。

林彪把杨成武的错误，归纳为五条：

一、杨成武拉拢余立金整吴法宪，两人勾结起来，要夺吴法宪的权，把空军的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分子。

二、杨成武在批判罗瑞卿时掉了眼泪，说："可惜，可惜!"，开会时又反对开除罗瑞卿的党籍。因此，林彪说："杨成武实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

三、杨成武搞宗派主义，搞晋察冀的"华北山头主义"。他写的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实际上是要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

四、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利用北京学生两大派的矛盾，分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企图搞垮谢富治，篡夺北京市的领导权。

五、杨成武在总参整了林彪办公室秘书郭连楷的老婆，影响了林办的工作。

讲到最后，林彪向毛泽东提议：杨成武不能当代总长了。

毛泽东问：谁能当总长呢?

林彪说：调黄永胜代总长或第一副总长。

毛泽东听了汇报说：杨成武的问题，不算很大也不算小。接着又说：黄永胜是秋收暴动武汉警卫团的，不要代了，就当总长吧。

毛泽东看见吴法宪也在场，马上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我支持你!

善于逢场作戏、阿谀奉迎的吴法宪，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揉搓着眼皮，呼嗤呼嗤地哭了起来。

周恩来总理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严肃地制止说：哭什么?不要哭!

毛泽东转身走进厅内卧室里去了。碰头会当即由周恩来主持，具体讨论了对杨成武、余立金以及对傅崇碧的处理问题。

谈到余立金的问题时，江青突然插话说，要把余立金老婆陆力行也抓起来，说她姐姐在上海公安局，搞过江青的材料……

2、“你不当代总长了”

按照中央碰头会的决定，3 月 22 日，这个充满恐怖的黑夜，昔日征战沙场的三位将军——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遭到逮捕、隔离。

14 年后，1982 年 12 月 2 日夜，笔者在四届人大代表开会住处，采访了杨成武将军。他体魄高大，记忆清晰。当谈起身遭的苦难，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情不自禁地热泪滚滚。

患美尼尔氏症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久病家中。1968 年 3 月 22 日夜，叶群为了表示林彪对他的关心，这天晚上，派他儿子林立果和秘书，亲到床前表示慰问。

那时，杨成武已经服了安眠药，睡熟了。可是，林彪秘书仍然把他叫醒说：“101(林彪代号)对首长的病情很是关心，特让我们来探望，希望杨代总长好好休息。”

林彪秘书刚走不久，原来驻杨成武家附近的警卫部队，接到紧急通知撤走了。另换来的一支部队，立即包围杨成武的住宅。他们冲进住宅，把杨成武的母亲、妻子、秘书、警卫一个个喊醒，把他们像犯人样地驱赶到楼下的客厅里，门口站了几个人，禁止外人接近。

李作鹏、邱会作带着几个持手枪的战士，如临大敌，敲开杨成武的门。

邱会作假装正经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李作鹏戴着墨色眼镜，站在他背后，一言不发，盯着披睡衣的杨成武。

“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杨成武觉得情况不妙，生气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

杨成武马上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周恩来总理是怎么回事。电话线被切断了，没有一丝声音。他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被人推拥到楼梯。

看到一家被劫景象，杨成武十分震惊。他怒气冲冲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开会?少来这一套吧!你们没有党性，也该有人性嘛!邱会作，你要有点良心呀!”

(对这，后来邱会作在法庭上受审时交待说：杨成武这几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一句话也没说。每想及此，总是心惊肉跳的。)

杨成武被推进一辆黑色吉姆车里，他夹在中间，两边坐着“保驾”他的李作鹏和邱会作。

汽车穿过一条条大街，杨成武被押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

这是林彪办公的地方。林彪坐在中间的沙发里，两旁是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 30 多人。

林彪一看见杨成武进来就宣布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

林彪接着宣布：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黄永胜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刚刚说完，江青跑了过来，嚷叫着：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待，你反对林副主席的阴谋活动。

吴法宪也高喊：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是为“二月逆流”翻案!你要老实交待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的关系，交代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是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扯着福建口音，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声嘶力竭地喊：你早就想把林副主席架空、推翻，取而代之……，你为什么三次命令傅崇碧冲击钓鱼台?傅崇碧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了得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她越说劲越大，带头呼起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杨成武!”

一片口号声中，杨成武举起手来要讲话。江青摇看手说：散了!散了!

杨成武问在座的周恩来是怎么回事，周恩来说：不要着急，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批斗杨成武的会刚一结束，他就被人拥上汽车，向西郊机场奔去。在昏暗的晨光里，走上飞往武汉的伊尔 18 型飞机。

3、“三·二四”大会

1968 年 3 月 24 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在京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全体人员都到了会。

林彪拉长声音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就是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与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许世友、韩先楚以及比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即关于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两面派问题”、“大树特

树问题”。

林彪说：“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他诬陷“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晋察冀的“华北山头主义”，说杨成武反对“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大讲“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问题，大讲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实际上树他个人的权威，等等。

对这次会议，林彪一伙做了精心安排：朱德、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统统不许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都坐在台上。聂荣臻同志因为心脏病发作，没有参加会议。林彪一伙用这种安排，表示坐在主席台下的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回忆这次大会时，对杨成武说：打倒你那天，老帅们下台了，朱老总带头，徐帅、陈老总和我都在台下。台上，江青、叶群、谢富治歇斯底里地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陈老总衣服里装的是糖，对我说，坐，吃糖，不听他们的。

4、“杨成武目中无人”

196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以 73 岁的高龄，横渡万里长江。他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起来的。”

一年之后，当他再次来到汉口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已遍及全国了。运动中发生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一天，毛泽东把连续两年随同他视察的杨成武等人叫到自己的房间，谈了对“文革”的指示和意见。

毛泽东说，95％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他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诙谐地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文化大革命要在 1968 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杨成武认为，这是毛泽东最新的最高指示，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总理如实汇报了原话。

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结束“文革”的指示，迅速在副总理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作上传达。

武汉发生“7・20”事件后，毛泽东从武汉到达上海。他特别注意从各种报纸了解情况。

一天，他在沙发上翻报纸，发现了林彪在五一节题写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指着题词，幽默地问身边的人：谁封我这四个官啊?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他对在场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自己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当即向毛泽东汇报说，有人要在 1967 年建军节前夕，砸掉军事博物馆的“八一”军徽，说“八一”不能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惊奇地问：谁要砸掉?他们要哪一天作为建军节?

杨成武回答说：他们要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说：八一，是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把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那是不对的。不合历史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记，我讲：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杨成武一边记，一边抬头说：主席，不提毛主席，有人会有意见。

毛泽东说：那就再加一句，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八一这件事，1933 年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曾专门作过决议，怎么能随便改?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毛泽东又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

杨成武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

谈到老帅，毛泽东一一评价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谈到陈毅，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谈到聂荣臻，毛泽东说：聂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谈到叶剑英，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他(说到这，主席幽默地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叶剑英“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指的是 1935 年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川西北，当时担任四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看到了张国焘要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开会的会场，不顾个人安危，策马直奔党中央所在地巴西，把它交给毛泽东，使党中央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到达陕北。

谈到徐向前，毛泽东说：徐老总的问题不能揪住不放。过去的事不能再搞了，那是张国焘的事情。听说，在草地上，徐向前就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谈到贺龙，毛泽东又一次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1967 年 7 月 28 日，杨成武专程从上海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作了传达，许多同志都听到了这个传达。在八一建军节的庆祝会上，周恩来在祝词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八一起义的讲话。

“八一”过后，杨成武又赶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但没有讲毛泽东的具体讲话。

这件事，直接触怒了林彪。他对人说，杨成武从上海回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了，看不起他，有事也不向他汇报了。

5、抓“王、关、戚”

林彪、江青为制造“杨、余、傅案件”，还诬陷“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所谓“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初期，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成员。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政治舞台上，部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

1967 年武汉“7 • 20 事件”时，当地的“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搞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

7 月 25 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报刊上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这时，“空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红尖兵”的文章，提出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8 月 7 日，在武汉受伤的王力，躺在北京钓鱼台的病床上，听取外交部“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和六七个造反派代表关于外交部运动的汇报，作了许多插话。造反派把这些插话，整理成讲话稿广为传播。王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唯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

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长陈毅多次遭到造反派的围攻。外交学院钓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外交部小礼堂，叫嚷：“不揪出陈毅决不收兵!”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第二天，他俩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强迫他俩边叫边卖，故意给中国人民脸上抹黑丢丑！

8 月 28 日晚上，造反派围攻火烧英国驻华办事处，严重破坏我国对外政策和声誉，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与此同时，戚本禹指使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

八月底，周恩来叫杨成武带上王力“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嘱咐杨成武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临上飞机前，又去向毛泽东请示，问他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将记录给毛泽东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他一下飞机便直奔中南海的周总理办公室。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碰头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

过了几个月之后，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关、戚”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走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打手和骨干，是他们制造动乱的谋士和前线指挥员，他们的不少言论，反映了高层领导人的意图。毛泽东果断地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为了扭转严重的混乱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疯狂的造反派，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6、“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据杨成武告诉笔者，毛泽东视察期间，还谈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问题。

1967 年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刊登署名杨成武的一篇文章，是总参谋部政治部，根据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布置的写作任务而进行的。

总参谋部党委为讨论起草这篇论领袖权威的文章，三次开会修改，定稿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最初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旁边，写了两行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定的一篇文章，请闲暇时一阅。

毛泽东没有时间看。他用粗笔作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文章送到北京交陈伯达、姚文元修改。陈伯达把修改的文章送到林彪这里，林彪看了，指示说，还是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

文章发表的第三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谈到“大树特树”的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停停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碰头会做了传达。会上，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作自我批评……

12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

“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是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面红耳赤。他头都不敢抬，一直伏在桌面上。

散会时，陈伯达面对杨成武连连拱手，说：“杨代总长，对不起你!”

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举行通车大典。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的请示报告，其中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给毛泽东。12 月 17 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党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对教育群众破除个人迷信起了一定作用。而林彪一伙却利用这个批示，把它作为制造杨、余、傅事件的一个借口。

7、许世友的插曲

视察期间，毛泽东在上海还接见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在南京多次受到了张春桥一伙发动的冲击，“打倒许世友”的标语口号张贴南京内外，许世友被迫转移到安徽金寨的部队农场。他听说毛主席到了上海，立即让妻子亲往上海，送去他写给主席的信。

毛泽东看了信，问杨成武：许世友在哪里?

杨成武说：在大别山里!

大别山是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许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长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同当地群众结下了血肉联系。当“文革”烈火燃遍南京的时候，1927 年参加湖北黄麻暴动的许世友，又返回他战斗过的山区，隐居躲避起来，等待时局的变化。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许世友是大军区的标兵。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的，例如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不都要打倒吗?许世友不能打倒!要保他，快把他找来吧。

杨成武回答：我就去!

毛泽东摆摆手：你不要去，派张春桥去!

毛泽东又问：你知道张春桥去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没有立刻领会用意。毛泽东一语道破：因为张春桥是反许世友的呀!

张春桥乘专机到了合肥，从金寨接回许世友。

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去见毛泽东。这位粗眉愣眼，性格豪爽，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老将军，一见毛泽东，跪在地下，哇地哭了起来，热泪流过满是皱纹的面孔。他久久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毛泽东安慰许世友：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要把你打倒吗?不能把你打倒呀!

毛泽东把许世友扶起来，让他坐进沙发，鼓励他说：

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把部队好好掌握好。你要靠近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来干。

许世友破涕为笑，大声回答："主席，你放心，我有几个军。敌人来它几十万，我也能够打垮它!"

许世友高兴地走了出来。他站在客厅里，当着张春桥、姚文元的面，对杨成武说："成武，我要打个豹子送给你：打只兔子给张春桥、姚文元!你们知道吗?我是百发百中的猎手呀!"

1982 年 9 月，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笔者访问了许世友，同他旧话重提。问及是否真有这件事时，他哈哈笑着说：

"怎么没有呀?有这件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春桥一伙就煽动群众打倒我，炮轰我，把过去给地主豪绅戴的高帽子，往我头上戴，我能答应吗?林彪还支持江腾蛟夺我南京军区的领导权。我们为革命打了一辈子仗。年青时候，我当军长，背把大刀，能一把抓住马尾巴，跳到马背上，向敌人冲锋，不怕流血牺牲。我们能忍心看着人民江山葬送到他们手里吗?那时候，我腰里插着两把手枪，我真想跟这帮反革命拼了呵!"

8、将军中了"埋伏"

空军政委余立金也是 1967 年 3 月 22 日深夜，被吴法宪逮捕的。

余立金住在空军大院的首长居住区里，一排石头围成的小院里，立着一座二层楼房。往年春暖花开季节，花坛里盛开各种花木，可是，自从"文革"以来，满院却是一派凋落景象。

这天晚上，余立金睡得很晚，刚刚入梦，就被秘书喊醒了。他揉着眼睛问："有什么急事?"

秘书说：刚才吴司令员的秘书来电话，说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急事和你商量。

余立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是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若是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走下楼梯，秘书要他带上警卫员，他说："这么近，就在隔壁，不用叫了，还是让警卫员睡觉吧!"

在寒冷的暗夜里，余立金从后门进了吴法宪的小院。突然，有四条大汉从黑暗里窜了出来。

“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惊骇地回答。

四个大汉，应声扑了过来。扭住余立金的胳膊，“咔”的一声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被扭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家的客厅，见他正坐在沙发上。余立金顿着脚骂道:“你们这是搞宫廷政变!凭什么铐我?”

“铐你?铐你是好的!”吴法宪从沙发里跳了起来，张牙舞爪地说：“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政委!你们要干什么?”余立金高声吼着：“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吴法宪狞笑着说：“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起，你要老实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余立金被扭进汽车，关进一间门窗全部钉着木板的牢房。板缝里漏进一丝阳光。牢门的小洞里，不时传来看守人员的斥骂声。他作为 1955 年曾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红军战士，胸中燃烧着怒火，感到无限屈辱。他百思不解，不知道自己怎么掉进了可怕的旋涡!

吴法宪多次派人来，要余立金交待他的历史，交待他在皖南事变时“被捕叛变”，参加“军统、中统组织”的罪行。

余立金一次一次的回答：“我历史清楚，为党为人民战斗了一生！”

从此，余立金在长达六年四个月的监狱生活里，经受了残酷的迫害。

历史的真相是：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经党组织调查鉴定，结论是，“组织部队，勇敢作战，最后突围。”

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同志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作为新四军的女战士，她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余立金被诬陷后，她也受到株连，坐了六年又四个月牢。她向笔者介绍说：“历史的真相，终有弄清的一天。余立金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要夺空军的权，在他们看来，余立金不是他们的人，所以就千方百计打倒他。”

余立金过去是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任空军政委期间，曾听毛泽东讲过:“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对贺龙要保护。”他对隔离审查贺龙想不通。

余立金也不同意“光辉榜样”的提法。他认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后二条完全是对立的”，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念念不忘战备”。吴法宪立即把这些向林彪汇报，认为他“反对林副主席”。

“封锁林副主席”也是余立金的罪状之一。他们在材料上写着：“1965 年余立金到北京工作后，从来不向林副主席请示汇报工作。在吴法宪同志外出期间，空军有些重大事情应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余立金也不请示报告。”

9、“卫戍区司令的车，哪里也可以去!”

1983 年 3 月的一天清晨，笔者同北京军区政委傅崇碧并肩散步在杨村军营外边的田野里。谈到“文革”中他的经历，将军感情激动地说：“是呀，今后可不能再演这种历史悲剧啦!”

“文化大革命”初期，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责任。当时，北京市委被称为“独立王国”，“文革”开始便被砸烂了。党政军、工农兵学商各机关，也全都瘫痪了。北京卫戍区及其他部队，像顶梁柱那样，支撑着塌陷的大厦。

红卫兵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潮水似地涌进北京。招待数以百万计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需要大量的煤、电、粮、菜……

但是，煤矿停产了，铁路中断了，粮食运不来。为解决数十万红卫兵的吃饭问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卫戍区只好派军队到门头沟挖煤；派部队到东北把粮食弄回来；当飞机从沈阳向北京抢运副食品时，机翼上竟挨了武斗的子弹。

粮食十分困难。可是雪白的馒头被丢进了水缸，几百万斤白面打成浆糊，被大扫帚甩在墙上贴大字报了。战士劝说要注意节约，红卫兵却喊着“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有的还殴打“支左”人员。

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把他们遇到的困难写个报告给毛主席。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给周恩来说：很好，交文革小组讨论解决。

周恩来接到批示，还未来得及看，江青就蛮横地一把抢过来说：“有文革小组，你不要管……”

“这是批给我的嘛!”周总理说。

一天下午，汇报会开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全体人员都来参加了会议。毛泽东鼓励北京的“支左”部队说：

“北京的支左不错。你们没有武斗，也没有支一派压那一派，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说，另伸出个小拇指：“缺点嘛，是这个。”

“北京支左有很大成绩”。周恩来说：“功劳也有傅崇碧一份!”

傅崇碧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还要努力。”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鼓励，给傅崇碧增添了勇气。他看到江青也在场，当着毛主席的面，汇报江青批评他的所谓 3 月 8 日“冲击钓鱼台”的问题。

“这件事，我有缺点，没有请示江青同志，有两辆车进了钓鱼台。”

毛泽东听出傅崇碧话中有音，立刻问道：钓鱼台为什么不能去?傅崇碧，你是卫戍区司令。你的车到我这里，有人挡过没有?

“没有!”

“你到周总理那里，有人挡过没有?”

“没有!”

“对嘛!”毛泽东站起来说：“你卫戍区司令的车，哪里也可以去!”

“你这人很坦率。”毛泽东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江青说：“江青是个炮筒，爱放炮，你可以放她一炮嘛!”

江青气鼓鼓地坐在那里，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她对我很关心，她的话很灵。”傅崇碧为缓和空气，又补充说：“她讲了话有人听，在困难时候，江青同志一句活就能为我们解围。”

毛泽东笑着说：“什么?她讲话灵吗?她入股了(笔者注：指江青当文革小组副组长)，你还没有入股!”

10、埋伏的导火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决定搞掉杨成武的时候，同时也决定搞掉傅崇碧，撤销他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是因为傅崇碧同他们之间，已经埋伏下一根根导火线。

首先，表现在对干部问题上打与保的矛盾。林彪、江青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傅崇碧执行周恩来指示，把一大批老干部保护起来。

1967 年春，有 30 多个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部长一级的老干部，被毛泽东、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北大、清华等学校的红卫兵，从中央文革得到这消息，为了抓人，一下冲进中南海北门。8341 部队向北京卫戍区紧急求援，傅崇碧立刻增援两个连，用人墙把红卫兵堵住了。

这天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叫到办公室。周恩来用目光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轻声地说：

“你要想办法，把这批老干部转移出去，保护起来。”

“请总理放心，我坚决照办!”

傅崇碧向周总理汇报了他的想法。就在这天夜里，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一大批老干部安全转移到花园村和南苑。对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的抢救，更是惊心动魄。

宋任穷被关在京西宾馆 12 层楼上，一小撮坏人日夜对他进行围攻、拷打，施加酷刑，一心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傅崇碧像当年在战场那样，亲自带着十二个战士，穿过走廊，来到紧闭的门口。他们大声呼唤，屋里一声不答，用铁杆撬也撬不开。傅崇碧仔细观察了房周围的形势，下命令:“走，上楼顶去!”

战士们带着绳索，爬到几十丈高的楼顶上。接着，将绳索缠在两个战士的身上，悬空从楼顶下放到十二层楼外面的窗口，向“碉堡”发起进攻……

窗口被打开了，战士们冲了进去，奄奄一息的宋任穷同志得救了。

省委第一书记们被抢走的消息，中央文革很快就知道了。傅崇碧接到通知，要他到钓鱼台五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开会去。一见面，江青就气势汹汹地追问:“傅崇碧，你把这批人藏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坐在沙发上，装着没听见，边喝茶、边抽烟。

一阵紧张的沉寂。康生咆哮了:“傅崇碧，你听见没有?你把这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弄到哪里去了?”

江青撅着嘴说:“听说你还让走资派家属送东西。你把他们敬如上宾!”

傅崇碧辩解说:“旧社会还允许探监嘛!”

“啊!你敢把文化大革命比作旧社会?”江青说:“这些叛徒、走资派，死几个有什么了不起!”

康生跳起来，用拳头擂着桌子:“傅崇碧，你不要装聋卖傻，快说，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抽烟，装着没有听见。

周恩来总理坦然地坐在桌中间，用严肃地目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傅崇碧。他，能不能顶住压力，经受考验呢?后来，当康生再次追问傅崇碧，是谁指使他这样干的时候，他只简单地回答了四个字:“上面知道。”

上面是谁，他没有说。

第三天下午四点，毛泽东把傅崇碧找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毛泽东点燃香烟，侧身靠在沙发上，一开口就问：“最近北京情况怎么样?”

傅崇碧说：“主席，很乱!又贴了打倒朱总司令的大标语，还要砸烂狗头……”

毛泽东听了很诧异：“朱毛!朱毛!朱是总司令，我是党代表，怎么能打倒砸烂呢?”

毛泽东见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纸，就问：“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傅崇碧当即交给主席：是造反派印刷的彩色“百丑图”！

毛泽东把“百丑图”摊开在膝盖上，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突然站起来，把“百丑图”扔在桌上，往来在地毯上踱步，厉声地说：“不能搞这个!不能印这个!这完全是在丑化我们的党!”

接着，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文革小组追查他保护一批省委书记的事。并说，保护老干部，是周恩来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仔细听着，连连点头：“这件事办得好!不能把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

傅崇碧说：“他们批评我，保护走资派……”

毛泽东赞同地说：恩来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

毛泽东留傅崇碧吃饭。席间，傅崇碧进一步向毛泽东报告，现在战斗升级了，花样又多了，搞起喷气式了。

“什么叫喷气式?”主席放下筷子。

傅崇碧离开座位，在饭桌前当场作“喷气式”表演。他撅起屁股，头朝上，两臂向后高高扬起……

主席问道：你们过去是怎样斗地主的?

傅崇碧说：搞过游街，戴过高帽子……没有搞过喷气式!

毛泽东连连摇头，颇为不满地说：过去斗地主都不这样搞，对干部能这样吗?这样搞，不好!

第四天，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继续在钓鱼台文革小组追问傅崇碧保护省委第一书记的事。这一次，周恩来也出席了。

康生问：“傅崇碧，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江青说："傅崇碧，你还在装聋卖傻吗?说，你为什么不说呀!"

"上次，我不是讲过了吗?是上面!"

"上面是谁?"江青、康生一齐开口。

"你问主席去吧!"傅崇碧理直气壮地顶撞她。

这回答，震惊了全场的人。场内鸦雀无声，充满紧张的沉寂。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招呼傅崇碧坐进他的"红旗"轿车。周恩来双臂往怀里一抱，向后一靠，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了。

周恩来亲切地拍着傅崇碧的肩臂，说："你回答得好呵!"

11、"老娘不是好惹的"

今日江青，昔日蓝苹。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洋洋得意地让大家传阅一张她三十年代的照片："你们看，我当年的照片。"

傅崇碧收到上海送来的一包用牛皮纸密封包装的材料，他原封未动地交给了江青。江青看了一眼说："你这样交给我，很好!"

过了三天，江青把谢富治、傅崇碧叫到钓鱼台，同时也找来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她当着大家面，骄横地说："今天我请公安部长、卫戍区司令来，还有你们几位小将作证。现在有人要整老娘我的材料，我不怕!老娘可不是好惹的，谁敢惹我，我就干谁!"

过了几天，中国电影协会又送来两大捆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材料。这些用旧红帘布包裹的落满灰尘的材料，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金敬迈。包裹上的灰尘说明，材料谁也没打开过。

傅崇碧将材料从金敬迈手中接过来，又原封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你们都在这里，这包裹的东西谁都没有看。现在，我亲自写封条，把它封起来!"

周恩来当场写了一张长封条，又亲自把封条贴上，即使这样，江青仍不放心，她怀疑金敬迈偷看了材料。当即把他关押起来。

后来，江青通知杨成武、吴法宪、谢富治，由三人监督，把有关她个人丑史的材料，在夜里送进故宫大院，浇上汽油，放火焚烧了。

尽管如此，心怀鬼胎的江青，仍怕傅崇碧透露她的劣迹，于是便同林彪、叶群合谋，对他下毒手了。

傅崇碧被宣布撤职的第三天，江青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新任命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

当时由于傅崇碧被撤职的命令还没有在干部战士中传达，卫戍区传达室的同志说，我们这里只有傅司令，没有温司令，把信退了回去。

江青闻言大怒，为表示她对军队有发言权，要“管一管”军队，显示一下权威，她特地穿上新军装，外披风衣，把头和军帽一起裹在宽大的围巾里，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耸人听闻地说：“傅崇碧不经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击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呢?”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着每个到会的军人。

随后，江青为证明“冲击”钓鱼台不是偶然的事件，颠倒黑白地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以及我们写了一封信，结果出了怪事，傅崇碧派了一个叫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他们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

江青叫嚷：“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都在华北，你华北是坏人当了道……”

1970 年 12 月 31 日华北会议上，江青把冲击钓鱼台的情节编造得更为离奇。她说：

“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事情，至今还没有查清。”

“傅崇碧冲击钓鱼台的时候，他的秘书用皮包打我，要砸断我的脊梁骨，我的腰一直在痛!”

“他秘书的皮包里，装有手枪；他的车子后边，最低限度还藏着一挺机关枪……这是想干什么呢?”

事实是怎样呢?傅崇碧后来对笔者说：

1968 年 3 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鲁迅先生的手稿丢失了。

江青得信后，在 3 月 5 日夜里，要傅崇碧立即查明鲁迅手稿的去向。

经周总理批准，几位同志审问了戚本禹：并且当面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报告。但是江青不相信报告的事实，要傅崇碧继续派人查找。

3 月 6 日，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政委等同志，连夜对手稿进行了调查，他们很快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来转移到文化部了，而且是江青自己于 1967 年 6、7 月间，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一位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收藏鲁迅手稿的四个樟木箱子的。

这位工作人员是成都部队的一位教导员，当时已返回部队，为了查证鲁迅手稿的事，3月7日，派出专机把他从成都接回北京。

3月8日，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四同志，一同到招待所，询问这位工作人员是否从文化部取走了鲁迅手稿。这位工作人员说："是江青派我和戚本禹同志到文化部取走了鲁迅手稿的。"并且说，他将手稿交给了中央文革的另一位工作人员，那位工作人员已把手稿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同志了。

傅崇碧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她女儿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肖力回答。

傅崇碧在电话上说:"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12、白虎堂上

打完电话，傅崇碧等四同志，乘着两部小汽车向钓鱼台驶去。

汽车在钓鱼台东门前停下，先由传达室代为联系。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当即答复:"可以进来。"傅崇碧等乘车缓缓进入宽大的园林别墅。

傅崇碧等来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门口，遇到姚文元，打过招呼，他们便同他一起走进一间宽大的会议室里。

大家还未坐定，江青突然推门进来，她见屋中站着几个军人，顿时神色大变，凶神恶煞地吼叫起来：

"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吗?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来人解释说："是经办公室允许的，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进一步向江青解释："我们来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江青尖声尖气地嚷着:"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允许就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站在一旁的姚文元，忙给江青帮腔："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

正在这时，随着傅崇碧一起来的秘书，因为连日奔忙，疲劳过度，扑通一声晕倒了。他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把江青吓了一跳。

江青惊慌地躲闪着，连声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傅崇碧连忙解释：“他疲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傅崇碧再次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楚，特地来向你汇报。”

江青放缓了口气。“手稿在哪里?”

傅崇碧说：“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江青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可能吗?不会!”

来人当即从皮包里找出写有收管手稿人签名的条子说：“这是收鲁迅手稿的条子。”

江青接过条子一看，收条上清清楚楚写着中央文革保密员卜信荣的名字。她转身对姚文元说：“你把卜信荣叫来!”

卜信荣原是一位空军的干部。他来到以后，傅崇碧当场问他：“鲁迅的手稿放在你那里吗?”

卜信荣回答：“在，就在楼上保密室里，一共有四个箱子，保管得好好的。”

江青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神经病似地咆哮起来，伸手指着保密员的鼻子：“你是个大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快抓起来!”

有人上去扭住卜信荣的胳膊，保密员挣扎地喊着：“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冤枉啊!”

江青下命令：“叫他他把钥匙交出来，用手帕把他嘴塞起来!”

保密员被推到门外以后，江青转过身对屋里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不大会儿，装有鲁迅手稿的四个大樟木箱子，抬到江青跟前了。她围着箱子转圈，叫嚷说：“来，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铁皮撬开，看一看到底是不是!”

樟木箱子打开了，飘出一股浓郁的香气。果然，箱子里一个个小抽屉里，放的全是珍贵的鲁迅书信手稿。江青俯下身子在箱子里翻阅起来，看到第三个抽屉时，突然，她脸色一变，把箱盖子关上了。

“我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锁起来!”

江青变得和气起来，她笑哈哈地对傅崇碧说：“你们辛苦了，就在这里吃饭吧!”

饭后，江青对傅崇碧说：“鲁迅手稿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找回来，你们要去把戚本禹提审一下。”

13、夜审“戚大帅”

当天深夜，傅崇碧等提审戚本禹。

傅问：“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回答：“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

傅崇碧又问：“你拿的什么?”

戚本禹答：“我借的是毛主席批阅报刊、文件的清样，从没有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随即打电话问汪东兴。回答说：“他没借过手稿，借的是清样。”

弄清了事实，他们赶快向江青如实做了汇报。

但是，江青并不满足。她决心掀起更大的风波。她先找了周恩来，又找了陈伯达，到处控告傅崇碧：“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吗?”

周恩来说：“傅崇碧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击中央文革干什么?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1967 年 3 月 9 日晚上，江青又把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大发脾气：“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你知道吗?是你下的命令吗?”

杨成武回答：“不，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江青说：“傅崇碧没有得到许可，冲进钓鱼台。你们军队这么干，非撤职不可!”

接着她又叫杨成武去批评傅崇碧：“你们是老熟人，老战友，对这种无纪律的行为，应该批评!”

杨成武辩解说：“我不清楚，傅崇碧干嘛要冲击钓鱼台?傅崇碧进钓鱼台，他完全有这个资格，他可以进也可以出，是卫戍区的司令员嘛!要批评，要讲，要谢富治去讲。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市委书记，不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

江青一听，大跳起来："太无纪律了，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姚文元跟着说："你不要包庇傅崇碧，你们都是军队的人!"

杨成武辩解说："我负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卫戍区的干部!"

杨成武站起来要走。周恩来拦住他，说："你还是和谢富治同志一起去一趟，把卫戍区的干部找来谈一谈，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

过了几天，江青又让当时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和傅崇碧到她那里去谈问题。

两人一同走进江青会客室里，江青一见面就打圆场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我对你的批评是出于一片好心，是对你的关心，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嘛，我们都是老同志嘛!"

傅崇碧捏着一把汗吃了江青那顿饭。他清楚知道江青是个厉害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江青与他举杯相碰的时候，一场新的风暴、新的陷阱，正在等待着他!

14、凌晨的"调动"

1968 年 3 月 23 日凌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楼的第六层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人和报社的负责人，正在讨论一篇号召全市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社论。

电话铃响了。是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他对傅崇碧说："傅司令员，请通知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一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我们。"

傅崇碧随即来到大会堂。周恩来一看他，就关切地说："崇碧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不要激动。"

当傅崇碧跟着周恩来走进会场时，只见一圈沙发里全坐着中央文革的人，气氛严肃而紧张。

林彪走了进来。他板着冷冰冰的面孔，对傅崇碧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主要负责北京卫戍区，接替你的工作。"

对这个突然的调动，傅崇碧十分震惊。不等他做出反应，林彪站起来，对在场的全体人员说："走，我们去接见团以上干部。"

周恩来侧过身对傅崇碧说："你可以和沈阳来的陈锡联同志谈谈。"

会议厅里只留下陈锡联伴着傅崇碧。他长叹一声，仰望着天花板，猛力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陈锡联和傅崇碧尽管过去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可现在两人却相对无言，仿佛中间隔着一座无形的大山。

两个小时过去了，凌晨四时，周恩来和谢富治走进来，吩咐秘书准备吃饭。傅崇碧很不理解，就问总理："这调动工作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不是跟你谈过了嘛!"

傅崇碧满肚子火气："那算什么谈话，宣布了命令，别的什么都不说。"

周恩来出去接完电话，转回来叫傅崇碧多吃点饭："吃饱了饭，才能有革命本钱。"

饭刚吃完，周恩来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走?"

傅崇碧愤然地说："这像调动工作吗?为什么要这样?我想不通!"

周恩来安慰地问他："你要不要回家拿点东西?"

傅崇碧气愤地说："不回去了!"

"那好，干脆利索，需要的东西由陈锡联解决。"周恩来接着又说："你不回去，那就给家里写个条子吧!"

"不写!"傅崇碧发火了。

"崇碧同志，叫你写，你就写吧!"有同志在一旁劝说。

傅崇碧想了一下，马上伏在桌上，草草地写了三句话给家属黎虹："我调沈阳工作，到那里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写信。"

周恩来把傅崇碧送出大厅，紧紧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嘱说："革命工作有的是。现在，你身体不好，先把身体搞好，你要经住考验。"

黎明前，傅崇碧被三四个军人拥上汽车。他一看，秘书不在，警卫员也不在，车子也换了。傅崇碧火急地说："这不是我的车!"

陈锡联走过来说："走吧，这是送你的车!"

车子向西郊机场急驶。两个大个子军人坐左右两边，把傅崇碧夹在中间。他望着熟悉的郊区原野，心里完全明白过来：这哪是凋动工作。这完全是一场欺骗!

在机场候机室里，服务员端来咖啡，他却说：“我要抽烟!”

红色电话机响了。中央文革打电活来问：“第一架飞机起飞没有?”

“刚刚起飞了!”一位负责机场的团长说。

这是指刚刚起飞的押送杨成武飞往武汉的飞机。

“第二架呢?”

“飞机正在发动，人刚刚到。”

两分钟后，那位团长走过来，立正敬礼：“报告首长，飞机发动了，请登机。”

傅崇碧迎着寒风走向飞机。陈锡联脱下披在身上的大衣，给他穿大衣。傅崇碧接过大衣，怀着沉痛的心情，走上飞机，告别了他曾经日夜警卫的首都北京，飞往沈阳。

15、在深墙冷院里

傅崇碧一下飞机，就被关在沈阳的一座独立小楼里，院子内外警卫森严，如临大敌。

当时的沈阳军区副政委，向他宣布：“为了安全，你不要下楼，吃饭会送来。”

傅崇碧从此与世隔绝了。他听着呼啸的寒风，望着没有发绿的白杨。随着一阵脚步声，进来几个人。

来人问：“你老实交待，你的后台是谁?”

傅崇碧说：“什么后台?我没有后台!”

来人问：“你和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是什么关系?”

傅崇碧说：“什么关系，革命关系!他们是党和军队的领导人!”

来人问：“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贺龙送到苏联去?”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将军，面对这些荒谬可笑的问题，指着身上的斑斑伤疤说：“我热爱毛主席、我保卫毛主席……我是为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的!”

以后，傅崇碧的住处多次在夜晚转移。等到转得糊里糊涂以后，审问人员拿出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片上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三位老帅和傅崇碧同志四个人的合影。这是一次在叶帅家里，他的一个孩子拍的。

专案人员对他说：“只要你对他们反戈一击，马上就可以工作!”

“你说什么?”深深受了侮辱的傅崇碧，猛地像触电似地站立起来，怒视对方。

专案人员说：“只要反戈一击，你就可以出去!”

傅崇碧一下跳起来，愤怒地吼叫：“你这是混蛋话!为什么要对他们反戈一击?他们都是开国元勋，他们都拥护毛主席!”

傅崇碧同几位专案人员吵了起来。他说：“你们没资格淡这些!”

傅崇碧想要走开。专案人员却命令两个战士，抓住双臂不让走。傅崇碧怒吼：“要杀就杀!”他拍着胸膛说：“你们朝这里开枪!”

没有多久，傅崇碧又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说到这里，这位 1932 年在四川省通江参加红军的将军，感慨万分地对笔者说：

“我身上七个窟窿，坐了七年监狱，这就是一个老红军的经历!”

多么令人不解啊!昨天的功臣变成了囚犯，渺小无闻的爬虫，却跃居了高官。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转眼间变成了“叛徒”、“走资派”……而他自己也就在难以捉摸的政治旋涡里，陷入了深渊，莫名其妙地突然从负责岗位上跌进了铁墙冷院里。直到 1974 年 11 月 14 日，他被解除隔离，回到北京。

16、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杨成武押到武汉以后，先被看押在东湖宾馆地下室，不久又被转移到山坡机场的一间库房里。在此以后，他又被转移到河南洛阳、开封和山西临汾。在开封，他夫妇两人关押在曾是关押刘少奇的地方。在那里，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杨成武长达六年多的囚禁生活里，他 70 多岁的老母亲被折磨死了，大女儿也被整死了，一家前后死了三口人。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已经升起。

1971 年“9·13 事件”后，党和国家和各方面工作都有了新的转机。

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杨成武回到了北京。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到医院看望他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汪东兴又向杨成武传达了林彪事件的情况。

杨成武激动地说："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他并且提议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12月21日，毛泽东在办公室里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他向大家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谈到贺龙同志，他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我保你，我是保他的。"

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

谈到"杨余傅事件"，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作自我批评，我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

在毛泽东接见之后，周恩来叫住杨成武，在小会议室里对他说："成武同志，这几年你们受了冤枉，不要埋怨。挺起身子来干吧!"周恩来还亲切地对杨成武说："在'杨余傅'的事情上，我说过过头话……"

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并先后恢复了工作。

1974年9月30日夜晚，"杨余傅"三人在人民大会堂庆祝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上相遇了。他们面对灯光辉煌的大厅，面对成百成千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有多少话要说啊!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他过去吧!"

杨成武苦笑地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1979年3月，党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公开平反，指出对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1979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把钓鱼台风波引起的历史冤案，完全澄清了。

钓鱼台的风波，是一幕神经质的滑稽剧。野心家们利用一点小事，蓄意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实现乱中夺权。所谓“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际上是“乱了自己，利了敌人。”

第十二章 被摧残的长城

1、受迫害的将军们

1966 年 10 月 5 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军委、总政为稳定军队曾经做出的许多规定，完全按照“16 条”的规定，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于是，军校师生纷纷冲破所谓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走出校门，外出串联，到社会上参与造反夺权活动。各大军区、总部机关和军队负责干部，连连遭受冲击和批斗。11 月，涌进北京的十万军队院校师生，有少数人开始了对国防部首脑机关的围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将领受到诬陷、诽谤和残酷迫害。1968 年 7 月 21 日，康生按照江青的要求，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

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庞大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193 人，有 88 人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

在这个名单中，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民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 61 人，除六人已经去世外，有 37 人被点到。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彭德怀、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王树声、许光达、肖劲光、罗瑞卿、徐海东、粟裕、谭政；上将王震、乌兰夫、邓华、叶飞、吕正操、刘震、苏振华、李志民、杨勇、杨成武、肖华、肖克、宋时轮、宋任穷、张爱萍、周桓、洪学智、钟期光；中将万毅、王尚荣、王恩茂、张经武、廖汉生。

被诬陷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有李达、徐立清、唐天际、贺诚、傅连〖HT5，7SS〗日〖KG-*1/5〗〖HT5，6SS〗章。

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诬陷迫害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还有：王铮、肖望东、阎红彦、傅秋涛、刘少文、梁必业、刘志坚、李聚奎、饶正锡、李耀、彭嘉庆、汤平、赵尔陆、肖向荣、王平、蔡顺礼、刘道生、杜义德、陶勇、方正平、徐深吉、成钧、张廷发、聂凤智、吴富善、吴克华、欧阳毅、程世才、顿星云、崔田民、傅崇碧、庄田、晏福生、陈

再道、钟汉华、杨秀山、刘培善、刘转连、黄新廷、郭林祥、甘渭汉、袁升平、秦基伟等。

在一次又一次的“横扫一切”、“大批大罢”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极“左”行动中，人民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在一个时期内几乎被险恶风浪冲垮了，许多指挥员被诬陷、迫害了。

据 1980 年 11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起诉书》列举的第 32 条罪行，在他们制造的大批冤案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有八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 人被迫害致死。

八年抗日战争，我军在战场上牺牲的将军，有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和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军在前线牺牲的也只有炮兵司令朱瑞将军。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自相残杀的内战里，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元帅有贺龙、陈毅及高级将领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HT5，7SS〗日〖KG-*1/5〗〖HT5，6SS〗章

将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将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将军等许多优秀的军队干部，都在法西斯的残酷摧残下献出了生命。

2、射向贺龙的毒箭

1966 年 8 月 25 日，总参出现“炮轰”总参领导的大字报。带头在大字报上签名的是一位部长，原是“二方面军”的，是贺龙的老部下，而总参的领导又是林彪所信任的。林彪一伙由此推论认为，这张大字报是贺龙支持的，是贺龙想夺总参权的一个信号。

于是，策划了一系列陷害贺龙的活动。

1966 年 9 月，林彪主持召开军委常委会。他说他是奉毛主席指示，就贺龙问题向大家打一下“招呼”。林彪打“招呼”说，有“证据”证明，贺龙有野心。他列举了一些大字报的材料说，贺龙想在军内伸手夺权。

对林彪的“招呼”，参加会议的人都感到很惊讶。贺龙未参加会议，已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了。

贺龙发现自己处境反常，打电话给林彪，想找他谈谈。林彪鉴于毛主席对贺龙的方针是“一批二保”，就答应贺龙来当面谈谈。不料这件很平常的事，却把叶群吓坏了。

叶群马上找来林彪的警卫秘书，要他马上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叶群说：“首长召开军委常委会，就贺龙问题打了招呼，能有不透风的墙吗?贺龙想见首长，准是为这事来的。他一定恨死了首长，见面后动了火，谁能保证他不先动手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首长的安全有了一差二错，怎么向主席交待呢?”

警卫秘书本不相信，经叶群这么一说，他就按叶群的指挥布下埋伏了。

贺龙平静地走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同林彪面谈以后，又从容地走去。在这当儿，叶群却如临大敌。她要警卫秘书带几个警卫埋伏在大厅的幕后，说："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把手枪拿在手里，把子弹推上膛。谁也不准咳嗽，谁也不能露一点动静。我在幕布的夹缝观察动静，一发现反常，我就一挥手，你们就赶快冲出去!"

叶群紧张得脸都变白了。直到贺龙大步走出，她才松了一口气。

警卫秘书对秘书们发牢骚说："纯粹是吃饱了肚子撑的，没事找事!"

贺龙的外甥廖汉生是原"二方面军"的老红军，任原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1967年2月8日下午三时，突然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家，连同他老伴扭送卫戍区司令部关押起来。

与此同时，北京军区贴出了由解放军报一位副总编辑和总政文化部长联名写的揭发廖汉生的大字报。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位都不是北京军区的干部，并且对廖汉生一向都很陌生，他们俩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大字报呢?

原来这两位头发已经花白的军人，是在叶群专门指使下写的。叶群把两人召见在林彪的台球室里，要秘书将一大包揭发贺龙的材料交给他俩。叶群说："这一包材料，就是炮打贺龙的重磅炸弹。首长信任你们，把重担交给你们，回去后，好好看看，归纳一下，明天把烧廖汉生的火点起来。"

两人果然欣然遵命，连夜赶写出大字报，把北京军区的火点燃了。

3、煽起一场风波

1967年3月，全国解放军几乎全部卷入"三支两军"工作，为交流"支左"的情况与经验，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在汇报会上，听到不少同志建议，希望军委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

当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顺便提了军队干部的建议。毛泽东当场批准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周恩来亲自给林办打电话，要秘书转报给林彪，林彪也表示同意。

叶群借此又煽起一场风波。

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秘书说，她正在钓鱼台11楼和8楼，同江青、康生商量一件事情。她听说，总理向主席建议要开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然后，总理才把这件事报告首长。这样做，就把首长架空了。叶群说："首长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防部长，军内要召开这样大的会议，为什么不先经首长同意后再找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先报主席，后报首长，那还行吗?所以康老说，此例不可开。我也同意康老的看法。"

叶群要秘书马上报告林彪。叶群回到毛家湾，立即又找到林彪。两人商量后，叶群随即找到康生，两人一同到毛泽东那里告总理一状。

毛泽东没有深究此事，只是说：总理是应当先向林彪同志通通气。

周恩来听到信息，特意写信给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和林彪的批评。周恩来说明当时的客观原因，开会的事是在向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出来的，当时林彪已休息，不便打扰，但作为他是不可原谅的。周恩来在信中保证“今后决不重犯”。

林彪听秘书念了周恩来的检讨信，当即口授了一封复信。大意是：“看到你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应当向你的谦虚精神学习……”

林彪还告诉秘书：“叫叶群再看一看!”

叶群看了林彪口授的信稿，立时火冒三丈：“开玩笑!写什么信?最多打个电话应付了事，为什么给人家留下文字根据呢?”

“千年文字会说话。”在叶群的执意坚持下，林彪同意将信作废，改由叶群给周恩来打个电话，表示一下安慰。

秘书们告诉笔者，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夫人专政”的深刻影响。作为国防部长、副统帅林彪，能指挥千军万马，但在家里他却受老婆的指挥。“9・13”林彪可耻的叛逃，叶群起了重要作用。

4、所谓“第一个战斗号令”

1969 年 9 月 11 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为缓和边境局势，中苏两国政府商定，要在北京开始举行两国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的谈判。

9 月 22 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1969 年 10 月，党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形势，怀疑苏联政府可能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加强全国战备工作，“以防患于未然”。毛主席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号召全国“准备打仗”。

林彪提出“战备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检查一切”。

10 月 1 日国庆节前夕，林彪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到毛家湾来。林彪说：“今天谈一下战备问题，这个

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明天是国庆节，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也是星期日，人们在欢庆节日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苏

联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几百公里，飞机用几十分钟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

林彪当即做出具体布置，要北京附近机场的飞机，除了作战值班外，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机场上，要设立障碍，防止敌空军空降……林彪说：“关键是十月一、二、三日。一日又是关键的关键，只要这关键的几天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当天夜里，北京空军的飞机全部开始转场飞行，轰隆隆的飞机声，震响着机场的夜空。好像战争明天就要打响了一样，林彪和他身边的人都没有睡觉。

这时，林彪突然头脑一热，要警卫参谋向周总理转达了一个可笑而又十分危险的命令。他吩咐说：“你马上给总理去个电话，就说为了防备敌人飞机轰炸，造成水库决堤，我建议连夜把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的水全部放掉。”

周恩来在电话上当即表示反对。联想到 1938 年蒋介石在花园口制造黄河决堤造成的人间惨剧，周恩来果断地说：“千万不能这样做，如果把这些水库的水一夜间放掉，下游的几十个县都要受淹，人民的生命财产将无法保证。”

正是周恩来的冷静与勇敢，才制止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国庆节三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林彪提出要坐飞机从空中视察五台山、雁门关、张家口一带的地形。飞行的这天，有三架“子爵号”飞机，载着林家全家人马，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视察了未来的“战区”。

秘书张云生告诉笔者，10 月 16 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一到苏州，在 18 日就向他口述了五条关于防止苏联突然袭击的紧急战备命令：要全军各部队立即疏散；各种设备和重要目标都要隐蔽和伪装；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兵工厂要抓紧武器、弹药生产；二炮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

秘书立即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命令。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在向下传达时，借题发挥，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号令”，下达全军。

从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百万大军在夜幕掩护下，离开营地，紧急疏散向山野，进入战备工事里，风餐露宿在旷野里。这时，疏散到武汉的毛主席，看了叶群用电话记录形式向汪东兴转报的“命令”，只说了一句：“烧掉!”

我军一级战备的举动，震动了世界。沿中苏、中蒙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休假，频繁调动部队，有些部队似乎在向我边界推进。这时，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相应地进入了全面戒备，调动了舰队。台湾和金、澎的国民党部队，也进入了戒备。一时间，我国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似乎马上就要爆发了。

一个月后，形势和缓了，天也变冷了。疏散在野外的部队，吃、住和训练都遇到了新的困难。各部队首长纷纷来电反映遇到的艰苦情况。秘书根据各军区的反映，及时报告了林彪。

“部队可以回营房了，可以停止疏散了。”林彪要秘书打电话给黄永胜，“让他们研究一下”。

秘书建议说：“部队是按首长的命令疏散的，如果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回营的决定。”

林彪同意结束部队的疏散，开回营房过冬。

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叶群的阻挡。她说：“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放回来一旦战争爆发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叶群的一句话，又使百万大军多受了几个月的冤枉苦，坑苦了广大官兵!

事实证明，“一号战斗号令”是一场虚惊!

这场虚惊的引起，在于毛泽东过分严峻地分析国际形势。他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争论演变成国家争端，夸大了战争到来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九大政治报告里，写进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核战争的内容。战备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无法计量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浪费在全国“深挖洞”的战备工事里了。

笔者在北京军区同志陪同下，曾参观了通县东部的“堆山”工程。这座可以容纳一个炮兵营的火炮堡垒，是林彪导演的战备工程的缩影。

5、血染“5·13”

1967 年上半年，上海、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的夺权，实际上变成了两大派之间的相互争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国务院的各部委的千万个大小单位，两派群众组织都在相互争权、夺权。由于席位分配不均，直接涉及各派的利益，争端就更加尖锐起来。

夺权中，是不是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又是两派争夺的焦点。什么你“保”我“革”，我“保”你“革”，相互争论不休。不同观点的争论，认识上的分歧，加深了两派的对立。两派的群众组织之间，常常由嘴头的争论，发展到拳头动武，以至大规模的武斗流血，

连林彪也惊奇地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军队参加“支左”，由于分辨不清谁是“左派”，常常变成“支派”，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混乱。一些造反派肆意冲击军队，又致使军队和激进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相继发生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 年 1 月 26 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石河子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进入汽二团，因争夺枪支，双方发生枪战。农八师的部队亦与造反派发生冲突。这次双方前后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接着，四川成都发生了“二月镇反事件”：2 月 23 日，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

湖北、内蒙、广东、河南、湖南等地，也都相继有部队“支左”支持了所谓“保守组织”，犯了“路线错误”。

这里，特别值得一叙的，是发生在北京的“5·13 事件”。

1967 年 5 月 23 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 周年纪念日。

如何纪念这个《讲话》?4 月 20 日晚，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代表。鉴于当时军队内部文艺群众组织也发生了对立和分裂，周恩来提出“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要联合演出”，并且说，只有联合演出我才去看，不联合演出，中央领导就不去看。

总政文化部向军内的各文艺团体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战友”文工团按照指示组织了五一节文艺演出，周总理观看后，表扬他们联合演出好。但是事过不久，他们就分裂为“老三军”和“新三军”两派。

5 月 13 日上午，总政主任肖华打电话给军委文革小组，通知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请他们劝说要求演出的文艺团体，不要演出或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当夜，立即向有关单位传达了这个指示。

空军文工团有位女演员，常到中南海参加舞会，“5·13”这天，这位演员在同毛泽东跳舞时，汇报说文艺单位要联合演出。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且指示秘书打电话给叶群，支持他们演出。叶群叫来这位演员，问明情况后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

这位演员说：“我们想与他们搞联合演出。”

叶群说：“干什么要找那些反对你们的人呢?人少，可以到海政、总政的左派去串联。”

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得知肖华不让演出的指示，立即报告林彪。林彪一听发火了。他让叶群打电话告李作鹏、吴法宪。叶群说：“林彪讲，肖华算老几?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让宣传毛泽东思想，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呀!我看谁敢动?谁动，我打断他的脊梁骨!”

李作鹏、吴法宪向老“三军”的全体演出人员，传达了林彪的讲话。大家雀跃起来，说，有林副主席支持，怕什么呀!

当晚八点开始，一直演到 12 点，都很顺利。叶群不断在电话上讯问，吴法宪说，很好，没有什么问题，请放心!

深夜 12 点半，随着一阵马达声，新“三军”的几十辆汽车，开到了展览馆，冲进剧场，打碎玻璃，双方在舞台上搏斗撕打起来，一些演员受伤。

一位海军同志告诉笔者，李作鹏接到吴法宪告急电话，立即召集海军直属单位的“红联总”，动员大家到现场支援。他说，海军要和空军联合起来，反对肖华!并立即动员数千海军

人员，赶到展览馆现场撵走了新“三军”派，抓了一些人。

陈伯达和肖华听到双方发生武斗的消息，立即赶到现场。他们看到被砸烂的乐器、道具和受伤的演员，十分生气。肖华当即把两派的人召集到一起，痛心地说：“前几天，总理建议你们联合演出，你们不听，那你们就不要演了么。我提醒过你们，可你们置若罔闻，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现在可好，流血了，打起来了。让地方学生插手，给解放军丢透脸了……”

肖华的讲话，立即被李作鹏、吴法宪支持的造反派抓住，当晚就轰闹起来。

海直“红联总”连夜在大街上，到处张贴：“火烧肖华”、“重炮猛轰肖华”的大标语。与此同时，空军、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北京军区、通讯兵等军兵种的群众组织，纷纷上街贴反对肖华的标语：“打倒 5·13 事件的黑后台肖华!”“肖华是 5·13 事件的罪魁祸首!”“肖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从此，北京地区的海陆空三军，明显地划分出反“肖”的“老三军”派，同保“肖”的“新三军”派。许多军事领导机关卷进派性斗争的旋涡。

14 日下午，叶群为扩大“老三军”的影响，带着李作鹏、吴法宪和中央文革的关锋等人，到海军、二炮医院慰问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她假惺惺地挤出几点眼泪，拉着关锋的手，一边给武斗伤员戴毛主席像章，一边说：“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木家!”他们还将慰问照片印出大量海报，吹嘘：“叶群同志和三军造反派一起战斗在第一线。”

海军政委李作鹏支持一派演出，有预谋地压制另一派。他在接见造反派时说：“三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 5·13 流血事件，而开始划清了谁革谁保的界限。凡是支持三军演出的是革命造反派，否则就是保皇派。5·13 事件不但解决了三军群众站队问题，同时也解决了领导干部的‘亮相’问题。”

事后，支持单独演出的这一派，就成为“林副主席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被赞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支持下，牢牢地掌握了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海军、空军的领导权。

过了三年，1970 年 5 月 13 日，叶群邀请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带着老婆孩子，同游万里长城，互赠了礼品。为纪念“5·13”三周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还联名给叶群写去致敬信，肉麻地吹捧叶群、吹捧“5·13”:

“叶群同志：

今天是‘5·13’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三年前的今天爆发的政治流血事件，是一件大坏事，但也是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揭开了砸烂以肖华为代表的总政阎王殿斗争的序幕，加速了三军的革命大联合，促进了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的直接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指战员、革命群众并肩战斗……”

6、“砸烂总政阎王殿”

1982 年 11 月 31 日 7 点 30 分，前来参加五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兰州军委政委肖华同志，在京丰宾馆 11 楼接见笔者。

这位 68 岁的老将军，满脸喜色，声音宏亮，言词锋利，文思敏捷，是著名《长征组诗》的作者。当他谈起“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怎样合伙“砸烂总政阎王殿”时，他时而愤怒地斥责，时而仰天哈哈大笑，时而满眼含着泪水，低下头来陷入巨大的悲痛……

肖华说：自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军队院校就纷纷外出串联，参加造反夺权，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这还像解放军吗?我找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商量，要把来京串联的十万军事院校学生集中起来，开个会进行教育，把院校稳定下来。其他几位老帅也都同意开会，我并且报告了林彪。

1966 年 11 月 13 日这天，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

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不正常现象和错误做法提出了坦率的批评，苦口婆心地劝告同学们要冷静思考，不要盲目，不要冲动，不要失去理智。

陈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年轻的师生们不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乱搞，不要闹，不要把军队搞乱。同时提醒大家，路线斗争中“可能犯大错误”。陈毅坚决反对冲中南海，冲国防部，不要图报复，要团结同志，要讲道理，要掌握界限。

陈毅尖锐地指出：先要给那些头脑发热的同志“泼冷水”。他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

徐向前讲话时，再次提出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战斗状态。他说，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影响军队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他提醒同学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动：“究竟对革命有利呀，还是有害?”他要求军队院校要做出好样子，不要损害人民解放军的形象。

叶剑英讲话指出，不允许军队院校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军队的优良传统。他说：“冲我们最高统帅部，冲我们国防部，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作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比这更错误啊……严格讲起来，这就是反革命。”他说，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即使毕业也不能担任军官。

叶剑英讲话时，有人递条子给肖华，提出挑衅性的问题：你们今天的讲话，是否经过林副主席的批准?

叶剑英大义凛然地回答：当然是经林副主席批准的。他叫写条子的站起来，那个人不敢

站。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一次尖锐的公开的批评。会议也给狂热的军校学生以压力，帮助他们重新思考。有些觉醒早的同学退出了“造反”的行列。

林彪、江青对工人体育场的大会，对几位老帅的讲话极为不满。江青说，这次会议，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同中央文革小组闹对立，是在另外组织一个司令部，“是在唱对台戏”?!

肖华回忆说，玉泉山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面对许多地方冲击军队事件，我站起来说：“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搞垮了，谁来保卫祖国……”

会场上许多人也都愤愤不平地喧嚷起来。这时，叶剑英双手向下按了按，说：

“各位请熄心头火!我知道大伙心里难过、憋气，但我们是党指挥的军队，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不可轻举妄动……”

1967 年 1 月 19 日下午，肖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陈伯达、江青带着中央文革的一大伙人来到会场。

江青大发雷霆说：“肖华，你们公开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是对左派群众泼冷水，不经林副主席批准，违反组织原则。”

陈伯达怒气冲冲，大骂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玩阴谋，要花样”，为贺龙涂脂

抹粉，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推到第一线。他要肖华当天晚上到万人大会上去检讨。

叶剑英把“打倒肖华”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要保肖华。今天晚上，不能开万人大会批肖华。

周恩来在凌晨召开造反派头头会议，传达毛主席保肖华的指示，不要冲击军队。他并下命令说：抄走肖华的文件，一份也不能少，必须全部追回。

1967 年 3 月 3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总政机关干部的万人大会。周总理深情地说：肖华从小参加革命，是我和毛主席看着他在红军里长大的。

叶剑英说，肖华南征北战几十年，久经考验。绝不能打倒肖华，不能把总政搞乱。

7 月 25 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援“7·20”事件的武汉造反派。林彪在天安门上接见造反派头头。林彪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坚决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林彪讲话在总政机关造反派中做了传达。形势突然大变。

从八一建军节这天起，全军造反派开始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轮番批斗。海、陆、空造反派轮流对他进行“实战演习”、“喷气式”、“地毯轰炸”，搞逼供信、大批判、游街，连续 120 多次。

“连续的批斗，搞得我死去活来。直到 1968 年把我关起来。”肖华沉痛地说：“造反派把我关在总政院内的一间小屋里，窗口、门缝全都用纸糊起来。每月只有 12 元的伙食。家属五年没见过。我的老伴也是个红小鬼，是个老红军，也被株连关了两年。”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总政治部被砸烂了。1968 年 10 月，建立了总政军管小组，对总政实行军管。军管期间，他们诬陷总政保卫部是“保卫蒋介石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宣传部是“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文化部是“文艺黑线专了政”；“叛徒特务成堆”，是“一筐烂梨”……总政机关 900 多人中有 600 多人参加学习班，“弄清思想，交待问题”。

黄永胜在 1968 年 12 月 5 日军管小组会上诬蔑说：“总政是水浅王八多”，“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用了很多坏人，干了很多坏事”，对他们“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根据这个方针，总政的几位领导人都被戴上“阎王”的帽子。他们宣布肖华是“大阎王”，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袁子钦是二、三、四、五、六号“阎王”；宣布给正副部长戴上“牛头马面判官”的帽子。给一般干部戴上“小鬼”的帽子。总政机关的 47 名正副部长以上的干部被反复批斗，被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长期关押、审查。袁子钦被迫害致死。

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的 767 名干部受到审查，有 17 人被迫害致死。总政 95％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机关干部被赶出总政，分散处理到全国各地。

7、“揪军内一小撮”

1967 年 1 月 8 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强调：部队文化大革命很重要，要搞好，搞彻底；部队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但阻力很大；机关、院校要同地方一样搞，要坚决支持部队左派，在军队内部也要搞大民主。林彪说：“机关要彻底搞。主要一条是革命，把革命摆在第一位，战备和其他工作要照顾一下。”他说：“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一般的开会批评。”

林彪在这次会上，宣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让他管军报。

1 月 10 日后，关锋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在钓鱼台六号楼，召集当时的中央宣传小组组长王力，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开会，传达林彪的指示，研究军报宣传已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有个改进才行。

会上研究几条改进军队宣传的意见，给全军文革和林彪写个报告。关锋接着说：“解放军报要指导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军内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要统统揪出来。”

关锋当即让胡痴记录，几个人议一条，由胡痴写一条。“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

胡痴写材料证明，这几句话，完全是关锋讲的。

几个人当场凑了五条。最后念了一遍，又做了一些修改，当即由关锋、王力、唐平铸、胡痴四个人共同签名，送全军文革报林彪副主席。

1967 年 1 月 10 日下午三时，他们几个人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把《关于解放军报的宣传方针》打印出来，分送在场的领导人。

江青看了一遍，对关锋和胡痴说：“这是有关军队的事，赶快送林副主席市审批!”

他们还在报告上特别写明：“林总，江青同志瞩你速批。”

1 月 11 日上午，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在电话上通加：林彪 11 日批：“完全同意”。

“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以派”的反动口号，就这样出笼了。

从此，打倒革命老干部的烈火，烧进“钢铁长城”，把人民解放军搞乱了。

1967 年 1 月 14 日，《解放军报》社论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社论提出：“这种阻力(笔者注：指阻碍“文化大革命”开展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过去，他们曾经施展过种种卑鄙伎俩，进行捣乱。现在，他们还在要出各种花招，进行新的反扑。”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毒全国。

1967 年“7・20”事件的第二天，首都各界群众和造反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打倒谁!”“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

8 月 1 日，《红旗》杂志刊登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说：“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毛泽东看了这篇社论，连夜和江青通了电话。毛泽东说：“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的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乱了军队，使军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毛泽东要江青注意这个问题，要纠偏。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们再搞小集团，要给他们打预防针。

毛泽东当即在《红旗》杂志上作了批示：“还我长城。”严厉批评乱军的阴谋。

8、“向《解放军报》夺权”

为夺取《解放军报》的领导权，1967 年 8 月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中央军委看守小组组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他到钓鱼台 11 号楼江青那里去接受任务。

吴法宪按时到达，正遇江青和叶群在研究一份打印的稿子。江青把稿件修改完后，对吴法宪说："这是我女儿肖力写的一张大字报稿子，肖力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她领导的一个突击队组织，要夺解放军报的权，打倒赵易亚。赵易亚是在国民党干过事的小职员，曾在国民党浙江省某县当过报纸编辑，而且又是肖华调来的人。你们军委看守小组要帮助肖力夺权。"

江青还具体指示吴法宪要帮肖力办三件事：

一、帮助肖力抄写大字报并帮助在解放军报社张贴；

二、立即从北京军区、海军、空军、二炮调三十名办报的干部，到解放军报帮助出版报纸，并接受肖力的领导和指挥：

三、看守小组要支持肖力夺权，并宣布以肖力为首的突击队领导解放军报。

吴法宪表示一定坚决照办。他肉麻地吹捧江青："你是中央文革的政委啊，我绝对听你的指挥!"

江青得意地说："好啊，你就叫我政委好了，你要听我的话啊!"

回到空军司令部以后，吴法宪立即要秘书替肖力抄大字报，于黄昏时分派人到解放军报社，张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

吴法宪随即又来到京西宾馆军委看守小组，对后勤部长邱会作等人传达江青指示，连夜向各军兵种抽调骨干，于当晚一点前到达军报报到，筹备第二天报纸。

吴法宪于当晚 12 点赶到解放军报社开会，向突击队长肖力介绍调去的各军兵种的干部。同时，又在深夜召开全报社军人和职工大会，向他们宣布肖力是新任命的报社领导。人人都要听从这位年方二十几岁的女青年的领导。

散会以后，军报的大院里立刻翻腾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拥护肖力和打倒赵易亚的大字报，贴满大楼和院落。仅仅只有五个人的突击队，一夜之间夺了中央军委机关报的领导权。

第二天，陈伯达立即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到解放军报社，表示对夺权的祝贺，对肖力的支持。

林彪也立即写信，支持肖力夺权。说什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过了一个星期，江青突然找到吴法宪，要他交出肖力大字报的底稿。江青怒气冲冲地骂："肖力的大字报底稿哪去了?你把肖力的底稿贪污了。想抓肖力的辫子吗?量你也不敢有这个

狗胆!”

吴法宪满头冷汗，连声说：“我找!我找!”

吴法宪回去，要两个秘书找了一夜没找到。后来，终于在军委看守小组的秘书那里，找到了大字报的底稿，一场风波才停息了。

9、向军队指挥权伸手

江青担任军队文革小组顾问以后，越发胆大妄为，不再满足只当“顾问”了。妄图直接伸手军队的指挥。

1967 年 9 月底的一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以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身份，首先提出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安排问题。并通过了江青提名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邱会作、李作鹏为成员的军委办事组名单。

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中央军委名存实亡，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

据吴法宪交待：黄永胜上任两个月后，江青对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开始不满。有一天，江青来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她指着自己的鼻子，十分骄横地说：“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党中央，封锁我的消息，太无组织纪律了!”

这次江青发脾气，是因为军委办事组要调动一个营的部队，写报告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每个成员，请他们划圈批准。

对此，毛泽东亲笔批示说：调动部队的报告，不要写那么一长串名字，今后只写报告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就行了。要保守秘密，不要给“中央文革”的每个成员都写报告。

从此，军委办事组就不再给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送报告了。

江青看不到报告，就对军委办事组大发脾气。

江青大骂后，当场宣布给军委办事组的人三条处罚：

一、要周恩来、康生、姚文元二人找黄永胜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给予批评警告；

二、停止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叶群、温玉成继续参加；

三、原定黄永胜率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现在江青宣布：不准黄永胜参加了。

周恩来看到江青干涉国家外交事务，于是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气愤地说：“不要理她，黄永胜继续去阿尔巴尼亚。”并且说，要开会批评江青。

黄永胜从阿尔巴尼亚归来以后，周恩来为了协调“中央文革”小组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关系，他亲自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钓鱼台 11 号楼看望江青。

江青一看黄永胜等人来了，不等周恩来说话，又大骂开了：“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党中央，你们穿着军衣，戴着五星军帽和红领章，不觉得可耻。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忘了本，你们当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我给你们争来的!”

周恩来示意黄永胜等人忍耐，不要讲话。

江青继续讲了一阵，接着宣布：恢复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资格，同时要他们继续反省，清理思想。

两天过后，周恩来通知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按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江青。那时，已是深夜三点钟了。

江青在会上说，她有错误，对待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的三条规定不妥当，是她病中发高烧脱口而出的，要黄永胜等人原谅，不要计较等。

汪东兴当场批评江青，他特别提出：中央常委不要怂恿江青。对江青不对的，应该多作批评。

吴法宪轻描淡写地说，江青爱听一面之词，有片面性。吴法宪还故意献媚说，他要学习江青的自我批评的精神。

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对江青的所谓“批评会”，不到一小时就散会了。

江青虽然受了批评，但仍继续耀武扬威地四处活动。她两次到空军机场，让部队为她搞军事表演。

一次早上七点，江青由叶群、吴法宪陪同，乘专机到达空军基地，全体地空人员列队欢迎。她站在主席台上，手拿照相机，让部队在炎热的太阳下，集合、站队、跑战备、起飞。雄伟的四机编队，在蓝天下表演了空中开花、俯冲等特技。

她又借口休养，来到青岛海军基地。吴法宪、李作鹏及其随行人员，如同众星捧月地围住江青，既殷勤，又恭顺。吴法宪跟在身旁，弯着腰轻轻地用扇子为她扇风，摇扇的手几乎触到了她。

辽阔的胶州湾海面上，风平浪静。特地从旅顺口来的北海舰队的四只舰艇，按照江青拍照的要求，乘风破浪，在海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江青完全满意了，这才停止了海上演习。

第十三章 无法无天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冷酷、残暴是江青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文革中，曾同江青共事多年的陈伯达，对江青的性格也十分了解。1979年10月，他在交待中评论江青说：

“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展示献媚，趁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奸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讲：“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我不胜荣幸之至。人家把我比做武则天，我政治上比她进步，我的才能不如武则天、吕太后，但我抓阶级斗争比她们强。我是个过河小卒。我这个小卒可以吃帅呢!”

江青多次自鸣得意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上海秘密抄家

江青把她30年代在上海政治上、生活上的肮脏经历，看成是自己的脓疮。因此，她对当时同她有过交往，了解她那一段历史的人，总想“一网打尽”。

1966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紧急召见了电影导演郑君里，警告他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放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

郑君里回家经过一番清理，于1966年7月17日写信给江青：“……清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还有几张你在延安和北京时送给我们的照片，我们仍保存着，……至于张春桥提到的几封信件，实在没有保存下来。”

江青要寻找的一封信，是江青托郑君里转给她前夫唐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

叶群为帮江青寻找这几封信的下落，在1966年10月初的一天，突然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立即转告南京空军政委兼空四军第一政委江腾蛟，来北京接受任务。

过了两天，江腾蛟乘夜航机到北京，住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当天晚上七点多种，吴法宪和江腾蛟俩人一同来到钓鱼台，碰到叶群正从江青住的11号楼下来。叶群和江腾蛟早在“四清”期间就打得火热，一见面，叶群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件事要你办。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

叶群再三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要害怕，这是为了保卫江青!”

江腾蛟表示："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向空四军文化处长张彪、空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世英等五人，传达了叶群的指示。

他们经过精心准备，仔细侦查了郑君里等人的住址，研究了行动方案。决定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欺骗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共四十多人，假扮红卫兵，分成五个小组，于 10 月 9 日凌晨一时，分乘五辆汽车出发。当天夜里分别搜查了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赵丹等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对这件事，1980 年 12 月特别法庭在审判中传唤证人到庭作证。头一个出庭的是江腾蛟。他对所做的事供认不讳。

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在法庭上作证：

就在张春桥找君里谈话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家里闯进来一批身份不明的人。这伙人对我们全家每个人进行搜身，从头发搜到鞋子。带头的人对我们训话说："把你们全家所有首长的文字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没有文字的东西。"他们不相信，就进行了查抄。把我们家所有的书籍都翻遍了。连君里几十年来积累的文艺创作方面的手稿、资料，几十年的心血，统统给他们搜刮一空啊。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江青、叶群、吴法宪组织的这次"秘密抄家"，事先并没有同上海有关方面打招呼。抄家后的第二天，被抄者向自己的单位纷纷反映昨晚的怪事。情况反映到上海市委。1966 年上海市委印的一期《文化大革命动态》，记述了这一夜发生的事情：

"10 月 9 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抄文件文物，不抄其它，行动秘密。郑君里被抄去重要内部材料。九日凌晨一时许，约有十多名挂'红卫兵'袖章的人，年龄都在 25 岁至 30 岁左右，他们进入武康大楼后，就锁住了大门，管住了电梯司机，控制了电话，其余人就上楼，进入郑君里家里。这些人动作和讲话声音都很轻，直截了当地告诉郑要搜文件和机密文件。他们搜查得十分仔细，不仅房间各个角落都搜遍，而且搜了郑的全身衣服和鞋子。搜的动作也很熟练。他们临走时不准郑把被抄的情况讲出去，否则就要你的脑袋了……"

上海抄到的材料，很快送到北京，由他们亲自监督，在林彪家后院的熊熊大火中烧毁了。

抄来的材料烧毁了，江青该放心了吧？不，在江青看来，他们人还在，有嘴巴。于是继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迫害。

1967 年 11 月 26 日，张春桥为讨好江青，亲笔批示把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顾而已等 18 名三十年代在上海搞过文艺工作的人，全都拘留、隔离审查。后来，这些人都给戴上"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种种罪名，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身患肝癌的郑君

里惨死在病床上；顾而已也被迫害致死。

2、抓人的全权代表

1968 年 1 月，江青又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有人在上海街头散布她的历史材料，要求碰头会讨论处理。

碰头会当即讨论决定，首先，把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黄赤坡、梁国斌、王鉴等人拘押到北京。因为他们都曾接触过所谓“通天”材料。

碰头会还决定派吴法宪去执行逮捕搜集散发江青材料的任务。理由之一是，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来去方便”。

吴法宪对执行这一任务，既高兴，又有疑虑。他装出为难的样子，伸出两个巴掌：“我不了解情况，我说话，上海的人也不会听的。”

陈伯达马上为他壮胆：“给你写一个授权的全权证书，代表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权处理这件事。”

江青表示同意后，陈伯达当场亲笔写了一张授权的全权证书。所有参加碰头会的成员都签了名。

第二天晚上，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某省代表。吴法宪在东大厅同江青走在一起。吴法宪说：“我明天去上海。”

江青一边走，一边手里拿着一本事先准备好的小说，指着作者孙峻青的名字说：“此人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你到上海要找到此人，同他当面谈，要他到北京来。我要找他谈话，但又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人知道。”

吴法宪说：“我不认识此人，不一定能找到，我在上海又不熟。”

江青说：“你通过上海空军的人去查询嘛。”

吴法宪说：“好，我一定设法找到此人。”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乘专机到了上海。他先去见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把中央文革小组授权证明书给他看了。

吴法宪说，我情况不熟，很难完成任务。要求张春桥全力协助，并在市革委会领导之下办好此事。

张春桥满口答允，并要负责专案的王某协助吴法宪工作。

他们很快在两天之内，拘押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黄赤坡等十多人，并把上海市公

安局保存的昔日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旧报刊剪报等“通天”材料，在两个晚上，由专人分乘两架飞机，负责送达北京西郊机场，转交中央文革。

与此同时，他们还分别逮捕了公安部以及浙江、江苏、山东等地的公安干部二十多人。他们的罪名都是接触过“通天”材料，知道江青的一些情况。

住在上海空军招待所的吴法宪，对他能在两天内就打完一场“保卫江青”的“歼灭战”，十分满意。每天都向北京汇报进展情况，但是，他要找的孙峻青在哪里呢?

3、孙峻青被抓

第三天晚上八时，一个身穿灰棉袄的老头，被人抓到空军招待所，走进吴法宪的屋里。

1968 年 2 月 27 日下午六时左右，靠边站的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家孙峻青回家时，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突然被一个戴口罩的人挡住。来人指着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的小卧车，要他上车。

据孙峻青写的揭发材料说：当时孙峻青十分惊疑，问他是什么人?来人说，姓张。

孙峻青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张说：“你知道。”

孙峻青更惊奇了：“你到底找我干什么?”

张说：“你自己清楚嘛!”

这位来人叫张彪，拐着腿，是空四军文化处长。他立即把穿一身灰棉袄的孙峻青弄上车，带到空军招待所，由吴法宪、江腾蛟、张彪三人和孙峻青谈话。

吴法宪第一句话就问：“你向中央写过信吗?”

孙峻青说：“没有。”

吴法宪不信。他反复问孙到底写过信没有。

孙一直坚持说：“没有写过。”

吴法宪以为孙峻青有顾虑，假装关心地说：“你想想，你我素不相识，我来找你干什么?我是受委托专找你的。你到底向中央写过材料没有?”

孙峻青坚定地说：“没有。”

吴法宪犹豫起来。他晃了晃脑壳，看着江腾蛟，对张彪说：“奇怪!不对头哇，是不是搞

错人了?”

吴法宪又问孙峻青：“上海还有第二个孙峻青吗?”

孙峻青说：“我不知道，但是上海作家协会只有我叫这个名字。”

吴法宪立刻板起脸说：“中央首长要你到北京去一下。”

孙峻青说：“去北京?要通过上海组织，否则，我不去。”

3 月 2 日，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厅主任找孙峻青谈话，通知：“中央有个专案，要你去一下，马上动身。”

当天夜里，孙峻青被送上飞机。据说是因跟“文艺黑线人物关系密切”，在北京关押了五年多。

4、杀人灭口

吴法宪交待说：1968 年 2 月的一个晚上，江青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我 30 年代在上海工作时，有一个名叫秦桂珍，又名阿桂的人照顾我的生活。她知道我三十年代的情况和活动，为防止被扩散出去，要弄来北京。”

碰头会对江青的要求，没人提出异议，并且一致同意由吴法宪去办。吴法宪把协助他办事的空军干部张晓山介绍给江青。

临行前，江青再次对吴法宪、张晓山交代说：“找到秦桂珍，要秘密把她弄来。她家里有我和毛主席的照片，要全拿回来，你们可以对她说，江青想你，请你到北京见见江青。”

空军干部张晓山带人飞到上海。他们通过上海市革委会，在市区寻找了三四天，终于在一个街道居委会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孤苦的老太婆秦桂珍。她穿件洗得挺干净的退了色的蓝布褂子，脸上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闪着一双和善的眼睛。

张晓山开门见山地问：“你认识江青吗?”

秦桂珍答：“认识，二三十年前，我当过佣人，照顾她生活。”

张晓山告她：“首长很想念你，请你到北京会一会她。”

秦桂珍一听，高兴得很，满脸笑容地说：“我天天想她呢!”

秦桂珍当即回家收拾衣物和一些照片，手里摇着红皮《毛主席语录》，走上夜晚十时起飞的专机。飞机上只有秦桂珍和两个接她的军人。她一到北京，马上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住进铺红地毯的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

第二天，陈伯达、叶群、吴法宪相继来到招待所，专程看望秦桂珍表示慰问。

吴法宪向江青汇报了找秦桂珍的情况，请江青安排时间接见她。

江青一听，脸色马上变了。泼妇骂街似地嚷起来："什么?要我见她!我找她来是怕她泄露我 30 年代的情况。现在，你要写个报告，要把秦桂珍监押在北京。我不再见她了。"

秦桂珍在招待所住了五天，第六天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

12 年后，1980 年 11 月 21 日，当笔者和秦桂珍见面的时候，这位 60 多岁的老太太，作为江青罪行的历史见证人，被特别法庭人员请来北京，住在京西宾馆。

她谈的被捕经过，同吴法宪的交待完全相同。当她谈到被捕后受到法西斯酷刑和非人的虐待时，手捧着保存的血衣，失声痛哭起来了。

秦桂珍是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人。母亲生下她那年，家乡闹水灾，母亲逃到上海当奶妈。她跟着妈妈，靠稀饭米汤喂大。后来，她寄居在婆婆家，直到十多岁还没穿过鞋袜。

13 岁那年，婆婆送她到上海一位姓许的人家当佣人。不久，蓝苹和唐纳结婚，在许家二楼租了一间房子。阿桂见蓝苹常常没有吃饭钱，偷偷地给蓝苹送菜送饭送蛋，主动帮助蓝苹洗衣服、擦地板，从没要过一分钱。

蓝苹常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蓝苹唐纳婚后常常吵嘴打架。一天半夜，住在三楼的阿桂，听到蓝苹呼喊："阿桂呀，救命，救命!"

阿桂急忙跑下楼，只见两人正在扭打。唐纳骑在蓝苹的身上，对阿桂说："你不要拉，我不会打死她!"

后来，蓝苹离开上海的时候，她把演《大雷雨》、《王老五》的剧照，送给阿桂留作纪念，当作对阿桂恩情的报答。

阿桂也买了一本相册送给蓝苹。她紧紧地抱住阿桂说："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1946 年，阿桂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信，内装一张蓝苹抱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一念，才知昔日的蓝苹，改名成了江青。她随着来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的毛泽东，带着女儿李讷到了重庆。

1950 年，秦桂珍带着东家的孩子到北京看病，住在北京大学的亲戚家。谈起往事，她请人代笔写了"毛泽东转江青收"的信。

过了一个多月，她被一辆吉普车接进中南海，见到了离别多年的蓝苹。

江青问她有什么要求?

秦桂珍说，我没有文化，可是有力气，我要参加工作。

1951年，秦桂珍被介绍到北海幼儿园当保育员。以后又转到上海机关幼儿园，直到1966年退休，在上海里弄参加街道工作。

1968年3月2日傍晚，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住宿的秦桂珍，突然被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位女干部叫住了。她拿出介绍信，很客气地对她说："请你跟我去一趟市革委会，有点事情。"

秦桂珍坐进一辆漂亮的小卧车，到了市革委会的办公室，见到了空军的张晓山。几句问话过后，当晚两个人乘一架专机到了北京。

秦桂珍随即跌进了火坑。秦桂珍热泪横流地说："我一被捕就受到酷刑拷打，打得几次死去活来。他们逼我承认是特务，是反革命，跟香港有什么关系。我死不承认是特务，他们又打，我说，你们打死我吧!我拿着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是江青对我下毒手啊!毒蛇心肠的江青，全不念我过去对她的恩情，为杀人灭口，连个老太太也不放过!"

秦桂珍不是政治要犯，却被送进秦城监狱，关了七年零两个半月。

秦桂珍坚强而善良，她坚信一个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她终于等到黑夜过去，迎来了光明和希望。

198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乘波音班机飞来北京，请她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开始公审前的一天，一位法官来到秦桂珍的客房里，对她说："关于对你的残酷迫害，我们提审了吴法宪，他承认了，做了交代。可是江青矢口否认，态度非常恶劣!"

秦桂珍火冒三丈，愤怒地说："这怪妖精……"

法官接着说："江青想赖你这笔血债。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不承认。我们想请你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照片。秦桂珍立刻认出，这就是当年她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珍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的照片。

秦桂珍登上法官的汽车，向城外奔去。一个个岗哨，一堵堵高墙。这熟悉的地方，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是秦城监狱，过去你住过。"法官深情地说："现在江青就住在这里。"

秦桂珍激动地说：“我在这住了七年多，1976 年 5 月离开，差一点死在这里。”

秦桂珍走进犯人放风的高墙圈里。只见一个女人裹着一件军大衣，戴着一副紫色镜架眼镜，闭着眼睛，靠墙角坐着晒太阳。

秦桂珍悄悄走近跟前，仔细一看，正是那个蓝苹，那个“怪妖精”！

秦桂珍猛喊一声：“蓝小姐，我来了!你还认得吗?”

这熟悉的声音，响雷一般把江青惊醒。她突然站立起来，瞪大眼珠，脸色苍白，吃惊地望着眼前的秦桂珍，向她伸手走来，高喊：“阿桂!阿桂!”

秦桂珍严正地说：“我过去待你那样好，可你把我害得好苦。你也有今天的报应!”

秦桂珍头一扭，上车走了。

江青还在拖长声音喊：“阿桂!阿桂!……”

几天过后，法官来到宾馆，笑着对秦桂珍说：“你见了江青以后，她的态度有变化，承认了她对你的迫害……”

5、复仇的女妖

在江青看来，凡是知道熟悉她的丑事的，都是她的仇人，其中之一是孙维世。

早在 1937 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孙维世，是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任锐两位烈士的遗孤，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著名演员金山的妻子。

孙维世 14 岁曾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工作过，当时蓝苹也在该剧团工作。抗战爆发后，孙维世在周恩来、邓颖超帮助下来到延安。这时江青也到了延安。她俩一同参加任白戈的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扮演资本家大小姐的孙维世，远比扮演资本家太太的江青演得出色。由此她对孙维世也产生了嫉恨。

解放后，1949 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回国后，江青要孙维世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孙维世没有答理她的无理要求，由此更加深了江青对孙的仇恨。

1964 年，江青大出风头，搞“现代京剧革命”。有一天，她碰到孙维世，故意挑衅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有没有问题呵!这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但是，孙维世依然不理睬她那一套。

江青特别害怕孙维世说出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因此，她就诬陷正在大庆油田体验

生活的孙维世是“特务”，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1968 年 2 月 26 日，康生批准将孙维世等三人一道逮捕。孙维世同志在关押期间，遭受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于 1968 年 10 月 9 日冤死狱中。

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同蓝苹争演过《赛金花》的王莹，曾是被誉为“中华女杰”的电影明星，15 岁参加中国共产党，她的丈夫谢和庚是党的著名地下工作者，曾任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54 年夫妻二人同时在美国被捕，被囚于哀离岛，同年，王莹和丈夫谢和庚从美国归来，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后来，谢和庚被划为“右派分子”，王莹和丈夫一块到北大荒劳动。一年后回到北京，住在香山狼见沟，过着隐居的生活。

红色风暴中王莹遭到抄家。1967 年 2 月 1 日，王莹同丈夫谢和庚先后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江青为掩饰几十年前在上海的丑行，把王莹诬陷为“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美国特务”，定为“死囚”，轮番对她进行审讯、毒打，下肢瘫痪。她喊着：“放我出去!我不是叛徒特务!”1974 年 3 月 3 日，她冤死狱中。

6、砸烂公检法

江青、谢富治多次煽动造反派要砸烂公检法国家机关，夺取全国政法战线的领导权。

1966 年 12 月，江青在北京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诬蔑公检法“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官僚机构”，要由“军队接管”。要把国家机关人员作为旧人员，把他们“扫地出门”或“监督留用”。她颠倒黑白说：“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揭开，害苦人了……主席，林副主席和我走到哪里，他们都盯梢，安装窃听器……”

1968 年 2 月，江青叫嚷公安机关“十七年干尽了坏事”，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公检法“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坏”。她声嘶力竭地喊：“打倒反动的公检法!”“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谢富治是“文化大革命”中负责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他紧随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旨意，向全国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

1967 年 8 月 7 日，谢富治向公安部全体人员讲话：

“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

“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现在的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讲话后，他指使机关造反派把他的话刊登小报，流毒全国，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公安部，谢富治一伙人制造了“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团”和“窃听器”、“里通苏修，通敌叛国”、“包庇刘少奇”等冤案。将公安部 225 名干部、职工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把 47 位副部长、局长、处长逮捕入狱，把副部长徐子荣迫害致死。

谢富治等在 1968 年 1 月逮捕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的报告中写道：“最近我们发现，凌云伙同徐子荣布置反革命分子王鉴，对我们伟大领袖最好的学生江青同志进行秘密侦察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布置王鉴在上海、北京秘密搜集江青同志的材料，调查江青同志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检查江青同志的信件，并对江青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真是罪该万死。”

谢富治为此逮捕了公安部及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和办案人员 30 多人。

公安部“18 号”案，原是一起匿名信案的保密代号。但是江青却硬说这个代号是立她的专案，大发脾气，扬言要“算账”。

1968 年 4 月 22 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姚文元，急急忙忙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专案人员。会上，康生说：“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要用脑子思考问题，脑子里要有敌情观念，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陈伯达说：“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18 号’案是整江青同志的。”

江青说：“所谓‘18 号’案，是整我的，怎么还用 18 号?你们是在公开地合法地在为我立案。要立就立吧，我不怕!”

为审讯这个案子，他们在北京制造了“以冯基平(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邢相生(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案，有 72 位公安干部被捕入狱，1600 人受到迫害。

在上海，他们制造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集团”等冤案。在这些冤案中，有 2890 名干警受迫害，78 名干警被迫害致死，96 人致残。

在浙江，大批公检法干部受到迫害。1968 年 4 月，江青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说：“浙江省公安厅……我走每一步，他们都有监视，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还坏，法西斯!”她要浙江造反派“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公检法”!

对“砸烂公检法”，毛泽东 1968 年 7 月 8 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这样说：“第一个提出砸烂公检法的是谢富治。他领导的公安部三千多人，现在剩下 80 人。北京公安局有两万多人(包括民警)，弄出 900 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占 5%，因此，他们提出要砸烂，我说，好!”

被砸烂的公安部，一下被轰走几千多人，作为精简对象，分配到 104 个农场监督劳动。

他们还大办所谓“干部子女学习班”，对局、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 65 名子女，加上“企图外逃投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

被砸烂的北京市公安局，一下子轰走 900 人，送到良乡劳改农场。对待这些干部如同对待犯人一样，在他们周围架起铁丝网，架起机关枪……

在砸烂公检法的同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康生等，疯狂推行什么“群众专政”、“群众审判”、“民办劳改”，任意抓人、关人、打人、杀人，私设公堂和监狱，搞法西斯的刑讯逼供，在全国煽动“打砸抢”之风。

7、“红都女皇”

在外事活动中，江青也是“无法无天”。

“九大”以后，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的江青，总是伺机表现自己，争取能出风头、在国际舞台上扬名的机会。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兴起访华热，许多美国朋友都想来中国看一看。其中一位 34 岁的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维特克，希望专门了解有关现代中国妇女的革命史料。

7 月 19 日，维特克参加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来到中国，受到热情接待。

在烈日炎炎、挥汗如雨的日子里，她游览了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特别使她难忘的是会见了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接着她又提出想要访问江青，这个在当时最有权势最有地位的女人!

周恩来看了要求江青接见的呈件以后，在呈文上批道：“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把接见外宾看作是她在国际上露脸的好机会。外交部闻讯以后，立刻做好江青会见维特克女士的准备。

8 月 17 日下午三时，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她上身穿件尼龙短衫，下身穿西式纱裙，足蹬白色凉鞋，手挎白色提包，手摇一把檀木扇。她嫌檀香木还不够香气袭人，又在扇柄上拴了一串茉莉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今天又特地搽了许多头油，越发显得闪光了。

江青双手握着维特克的手，赞美地说：“你真年轻、真漂亮。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会说我骄傲啦。……你看，我是为了你才留下了的，专机等着我哩，要到南方去休养。但为了你，我留下了。”

维特克受宠若惊，专心听她滔滔地讲。谈到采访计划，她说她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江青兴奋地说：“很好呀!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说过，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外国人。我提供你材料，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以前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诺德加·斯诺，他在三十年代，写过毛主席，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晚间，江青在江苏厅举办的宴会上，滔滔不绝地向维特克献殷勤。她说：“今晚的菜谱是我亲自定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会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治疗，喏，这个炸童子鸡，不能是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半。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从河里抓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都取掉了。哈哈，嘻嘻，你还年轻，胆固醇对你没有威胁性。”

维特克吃得很有滋味。不时停下筷子刀叉，夸耀江青：“江青夫人，你真是了不起，你对中国什么都懂。这几个小时你教会我很多东西。”

江青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她自我陶醉地像演员表演那样，一会说到样板戏，一会说到数十年前的事情。自己打扮成在青年时代对“王明路线早有察觉和抵制”的文艺战士，和鲁迅一样受到了围剿和迫害。

周恩来听了汇报，指示要她只谈文艺问题，不要谈其他方面的问题。接待人员向她转达总理指示后，她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

江青在第一次谈了六个小时之后，又于 8 月 18 日乘专机来到广州，住在豪华的山间别墅里。她特地又把维特克从上海接来广州，继续没完没了的扯淡：“我是不是马列主义者呢?是的，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我政治、经济、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还特别谈到陕北战争。她佯装成军事家，胡乱指划着陕北战争示意图。

8 月 25 日，她谈到西北战场情况时，自吹自擂地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你知道，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那时我时时要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消灭。然后我们过黄河……”

江青指着战争时期的几张图表，对维特克说:“这些图表部是为你准备的，你可以带走。”

江青立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括图》、《平津战役概括图》、《淮海战役概括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要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

陪同人员提醒她，并且劝阻她把话题移开，可是江青仿佛根本没有听见，继续信口开河，东拉西扯。一会谈到战争，一会谈到政治，一会谈到艺术，一会又谈起狗呀、猫呀，显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是行家。

“我还养猴子哩，猴子呀，最富有人情味儿。动物界中，除了人就数猴子最有灵性，你

知道，猴子还懂得吃醋哪，就是嫉妒。这是动物最高级的情感。”

江青又谈到狗：“我还养狗，狗也是很忠实于主人的，我喜欢大猎狗，哈巴狗没有意思。我拿牛肉喂它，别人给食它都不吃的，这是最好的狗。只能我喂它，多么警觉呀!”

江青说到她在上海的艺术表演：“我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其实我不想当电影明星，一举成名。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江青连自己也觉得说的太离谱，又连忙说：“最主要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旗手。我想你一定读过鲁迅的著作吧!了不起呀，喏，我送给你的书中就有一套《鲁迅全集》。鲁迅对我是很赏识的，不仅对我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这个人，鲁迅说我是个真正革命的女性……”

江青为了在维特克面前显示“女皇”的身份，不仅每天要宴请一次客人，而且每谈一次话，就要换一个客厅。她还同客人津津有味地谈到《红楼梦》、《武训传》等等。

江青一连六天，同维特克谈个不停，持续时间达 60 个钟头。谈话结束的时候，江青向维特克赠送了珍贵礼品，其中一部精装《二十四史》，是极珍贵的珍品。

江青不仅广泛谈了许多不应当谈的问题，而且还提供了照片、作战地图、总部番号，其中有很多涉及国家机密。

毛泽东知道以后，非常生气，指示要收回江青谈话全部记录，并且严厉批评江青。毛泽东说：“我是军委主席，对战争只能了解大的部署，下面具体事我也不了解，她还能了解?”接着说：“江青是我的老婆，我要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批评她。”

维特克回国以后，依照记录写了题名《红都女皇》的书，大肆吹捧江青，并且歪曲描写革命历史，在国外造成极坏影响。有关方面为挽回影响，不得不花大量外汇，购买了该书的版权。

第十四章 丑恶的旗手

追求“女皇”权位的野心，狂热而又残酷的性格，虚荣、奢侈、腐朽、无耻，使江青常常失去自控，干出一些令人作呕的蠢事。

1、“地动山摇”

以“文化大革命”闯将和“文艺旗手”自称的江青，到处公开露面，招摇过市，标新立异，显耀自己。一次，她趾高气扬地接见造反派时说：“我每次出去，坐专列，乘专机。这叫‘巡抚出巡，地动山摇’，这不是中了糖衣炮弹了吗?”

事实正是如此。江青每次乘专机外出，总是兴师动众，前呼后拥。除了带警卫人员外，还要带上厨师，厨具、吃的菜，用的调料，连喝的水也都随机带上，各种箱子、提包，把飞机货舱装得满满的。

飞机要起飞了。江青叫汽车一直开到客舱梯口，然后由身边工作人员扶下汽车，架上飞机。她像林彪一样，走进密封的三叉戟机舱里，既怕光，又怕风，披着包得严严实实的披风，一会儿喊这儿有风，一会儿喊那儿有风，逼得乘务员四出堵风。她坐在躺椅上，崭新的毛巾被和毯子，把她身子周围裹得严严实实的。

一次，她冬天要到广州，为了试验机舱内的温度，竟然连续五次做“堵风”的试验飞行。她派人坐在客舱里，然后点燃香烟，测看冒的青烟是否直线上升，如青烟飘歪了，那就是“有风”，要继续试验“堵风”。每次从北京到广州试飞一次，就得花两三万元。

飞机平稳飞行中，有时机外气流强烈波动，飞机稍有颠簸，江青就把扑克一甩，训斥机组人员是干什么吃的?逼得驾驶员握紧驾驶杆，不断改变飞行高度。

专机的内部设备本来就够讲究了，可是江青总嫌不好。她坐飞机的马桶，怕硬，怕凉，只得做个马桶垫子。开始是用布料做，她嫌粗嫌硬，连做几个都不满意，直到用海绵和金丝绒做马桶垫子，她才算如了意。

在广州，她住在一座宽阔、豪华的别墅里。她要求她的房间，既要明亮，又不能射进阳光，要用一种特殊的绒布把四周围起来。北京、广州没有，派人特地到上海购来十卷，上下左右都罩上这种高级半透明金丝绒。

她住的房间门口，挂两层门帘，每道门帘有三层，走进房内，如同走进五光十色的王宫。

江青闲得发慌，常在院内走动。她走在满是鲜花奇草的小径上，看到一株金银花，兴致勃勃地在这株金银花根上，拔了几根草。她当即叫工作人员，在这株金银花周围，起水泥架子，挂上牌子，写上“江青亲自种植于某年某日”，为自己树碑立传!

江青一连四次，到广州矿泉别墅游泳。每次来，周围过路汽车都不准鸣笛，也不准附近农村鸡叫狗咬。她称赞这里矿泉水好，可是总批评浴泉的沙子不好。于是，派出专机到海南岛运回柔细的海沙铺地，这才心满意足。

江青每到一处都摆“女皇”谱，挥霍国家财产。1972 年 5 月，她参观石湾美术陶瓷厂。从广州到石湾，只不过 20 多公里的路程，坐小汽车半个小时便可以到达。可是江青却说：“坐小汽车我受不了!”

于是下令工作人员从五千里外的北京，调来空跑了几千里的内燃机专列。她从广州坐专列火车到佛山，再坐进防弹小汽车到石湾陶瓷厂。专列又空跑回北京。

1971 年 1 月，她到广州玩，吴法宪竟然动用五架飞机为她服务。一天，她突然心血来潮，要穿一件夹大衣。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北京，派一架飞机专程从北京飞往广州送衣服。这种飞机，从北京到广州，每次往返飞行的汽油费等，就得好几万元。夹大衣送去了，但挂在柜里，一次未穿。

从 1974 年 6 月至 1976 年 8 月，江青先后在天津停留共计 38 天，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她吃饭十分挑剔。夏天吃西瓜怕凉，要热的；冬天吃河虾要会蹦的；吃鸡蛋要刚下的。她住的地方，要保持固定的温度，一度也不能差。卧室里设有双层玻璃，还要再加五层窗帘。为了保持室内新鲜空气，除用紫外线消毒，还要往室内输送氧气。

8 月的庐山，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可是江青一会怕冷，一会怕热，出门头要顶高冠，身要披外氅，用大头巾把脸掩遮得只剩一双眼睛。有一天晚上，更深夜静，人已入睡，可是江青还吵着说有声音，干扰她不能入睡。一查，原是山溪的淙淙声。

2、如此吸血鬼

江青是个滥用特权，侵吞挥霍人民财产的吸血鬼。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经常同康生、叶群等人窜到北京文物管理局，将大量贵重文物和历史书籍窃为己有。

1974 年 4 月 1 日，江青亲自到文物处拿走三方图章。

据查，仅被江青拿走的印章、字画、古墨、古砚、金表等，就达 743 件。其中有一只 18K 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带着四条金链，是中外稀有的文物。有七块鸡血石印章，每一块价值几千元以上，而江青只象征性地交了 17 元钱。一支象牙杆狼毫笔，价值几百元，她只付二分钱。

江青一人霸占八辆汽车。为了学开汽车，专门要了一辆红旗教练车，没几天就给撞坏了。

她还到处霸占住房，仅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杭州、青岛、北戴河等地就霸占了 27 处。

一年四季，她要根据气候变化，选择不同居住地点：春天到上海，夏天到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每到一地，她都要占用游泳池，池水保持 30 度的温度。

1972 年夏天，江青到北戴河，硬要占用朱德委员长住地的浴场。她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整天吃饱没事干，有什么资格占用五浴场!”硬是把朱德委员长挤走了。

江青为了寻欢作乐，每天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玩狗、耍猴、骑马、照相、打扑克和看电影上。她养的猴和狗要经常体检，每天用香皂洗澡，洗过还要吹风、洒香水。她打扑克，走到哪打到哪，在家打，外出还要带着专人陪她打。夏天，为了在室外打扑克，用 120 米纱布专门做了两顶大蚊帐，白天黑夜钻到里面打。

3、活像个妖精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说："江青活像吃人的妖精!"摧残为她服务的人。

江青经常用封建帝王、皇后的思想，待身边的服务员、护士、司机、厨师、警卫员和秘书。

她傲慢地对工作人员说："党派你们来，是用你们的体力劳动换取我的脑力劳动"，"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中央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亏"。

她把护士、服务员等，当作她的娘姨、丫环和奴隶。一次，她公开辱骂一个护士："你这个奴才，旧社会还不是个小丫头!"

她像王公贵族使唤奴隶那样，对待身边的同志。她要求工作人员同她讲话时，站着不能高于她的头。她站着，你就得弯着腰；她坐着，你就得跪着一条腿，低下你的头。

她要护士每天早、中、晚三次向她请安。起床，要人轻轻托起，穿好里外衣服，并要向她报告当天的气候情况。护士给她穿鞋袜时，她连腿都不抬，让护士跪在地上给她穿。她每天要换十几次衣服，每件衣服都得洗净熨平，不能打一点摺。

她吃饭特别挑剔。吃菠菜要厨师做成菜泥；吃芹菜要抽掉筋；吃玉米粒、高粱米要剥掉皮。

她散步时，要人扛着椅子跟随；打扑克，要人钻到桌子底下给她捶腿换鞋；她吃药，要护士先尝；打针，要在护士身上先试……

她还经常坐在马桶上睡觉。睡多长时间，护士就得在一旁陪多长时间，而且不能发出一点声响，连咳嗽一声都不行。

她任意侮辱工作人员，高兴时，拿着开心；不高兴时，拿着撒气。有一天，她把吃剩的饭留着晚上喂狗。护士用碟子把饭盖好，放在楼前屋檐下。后来，小狗把饭偷吃了。江青怀疑是护士喂了狗。她怕别人喂狗后狗对她感情减弱，立刻大发雷霆，罚护士跪在她的饭桌前。她用筷子交替夹菜，一边喂护士，一边喂狗，一边大骂："你不是喜欢狗吗?你就和狗一块滚吧!"硬是把护士和狗连夜送到农场。

1976 年，秘书回家处理父亲丧事回来，江青见面第一句话却问："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能给你证明，挖出来看看，是不是你父亲!"

不等秘书说话，她就扯着嗓子高叫："你给我滚!"

她不止一次威胁工作人员说："即使我的话是错误的，你们也不能解释，不然是没有好下场的。"

工作人员稍不遂她的意，她开口则骂，动手便打。她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吵大闹，多次用剪刀、裁纸刀捅人，当众用茶杯砸护士。

党内每次出现一次所谓“路线斗争”，江青都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寻找“坏人”。今天说这个是“特务”，明天又说那个是“密探”，动不动就令工作人员反省检查，下放劳动，甚至捏造罪名，投入监狱，撤换人员。从 1966 年到 1976 年，她就更换了三十多个身边工作人员。

原在总后工作的周淑英同志，1968 年调来当护士。周淑英日夜辛苦工作，任劳任怨，几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林彪叛逃后，江青为了掩盖她与林彪的相互勾结，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竟诬蔑周淑英是林彪、邱会作派到她身边的“特务”、“密探”，给她吃了五年安眠的“毒药”，将周逮捕入狱，审讯逼供一年多。

新来接替的护士是从广州军区调来的，她又立即与黄永胜连在一起，当即撕下护士的领章、帽徽，对她进行审问。吓得小姑娘浑身颤抖。

1972 年春天，江青在一次会上大讲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致江青的信的“重大意义”后，说：“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我的，也是写给全党的……同志们，阶级斗争复杂得很，尖锐得很哪!阶级斗争非常无情啊!阶级敌人的手伸到我身边来了，他们对毛主席的老婆下毒手了!”

1973 年 6 月，她看一部外国影片时，让秘书杨银录和警卫周金铭通知张春桥、姚文元也去看。当时两处回电话都说已看过。江青看过后，又亲自去问张、姚。他俩为讨好江青，故意撒谎说没看过。于是江青大动肝火，诬蔑杨、周挑拨她和张、姚的关系，下令将杨、周两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赶出了钓鱼台。

4、家庭里的“母老虎”

到延安前就已结过四次婚的江青，由于长得比较出众，又会唱戏，得到了毛泽东的喜欢，于是就草率结婚了。

转战陕北期间，她确也翻山越岭，伴同毛泽东行军打仗，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

但是江青“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的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她的根深蒂固的恶劣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在解放以后，越加暴露和发展了。

毛泽东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勤三个儿子。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生了女儿李敏。江青生了女儿李讷。

像一些恶毒、狭隘、冷酷的女人一样，江青把杨开慧的孩子看作眼中钉、肉中刺。

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毛岸英，曾在延安当面斥责江青：“你对爸爸一点爱情也没有，只会找爸爸吵闹。你要是不爱爸爸，你就走!”

毛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后，江青喜形于色。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说过：岸英的死，对江青来说，就像失去一条狗都不如。

毛泽东把刘松林当作女儿看待，写信劝她改嫁："下决心结婚吧。"

1962 年，刘松林同空军军官刘茂林结婚，到了江苏盐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夫妻两人被以"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罪名，一同被捕入狱，在上海关押五个多月。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亲自批示说："娃娃们无罪"，夫妻俩才从江青的魔爪中解脱出来。

毛岸英死后，江青逼疯了毛岸青。1951 年秋天，毛岸青同他的机关负责人发生一次口角，江青马上利用这件十分平常的事，大做文章，制造事端、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在患病高烧四十度的情况下，日夜逼他写"自我检讨"，毛岸青心慌气闷，脸色苍白，呆立不动。"江妈妈"还斥责他："你倒会装蒜，为什么不出声?"毛岸青突然一阵昏迷，倒在江青脚下。从此，精神开始失常。

后来，当毛岸青同刘邵华成婚的时候，江青又多方阻止。"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诬陷本是革命老干部的刘邵华母亲是"政治骗子"，又指使北京大学开万人大会斗争刘邵华。后来，毛岸青夫妇冲破江青的刁难和拦阻，虽然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总躲不过江青的骄横。

一天，毛泽东留毛岸青、刘邵华吃饭。饭后，毛泽东同儿子，儿媳聊天，讲故事。江青在隔壁马上喧闹起来，又打碗，又摔盆。

毛岸青问主席："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毛泽东苦笑地摇摇头："还不是因为你们和我吃了一顿饭吗!"

曾在苏联治病的贺子珍，1947 年带着女儿娇娇，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她先在哈尔滨，以后转到天津，1948 年 8 月，毛泽东曾派人带着娇娇前往天津，看望贺子珍。全国解放后，贺子珍曾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安排她担任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住在她哥哥贺学敏家里。陈毅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后，1958 年 7 月，贺子珍从上海迁到南昌居住，得到江西省长方志纯和妻子朱丹华的多方照料，而朱丹华改嫁前原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烈士之妻。

1959 年 7 月 8 日，庐山会议期间，经过陶铸夫人曾志同志的精心安排，在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和方志纯夫人朱丹华陪同下，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伴侣贺子珍上了庐山，在"美庐"同毛泽东会见了一个多小时。

对这次阔别了 22 年的会面，据曾志同志回忆说，当她向毛泽东谈及她曾下山见到贺子珍时，毛泽东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得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

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曾志说：“应该见见。”

毛泽东同意见面之后，又嘱咐曾志说：“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

曾志说：“放心!她不会知道。”

哪知这件极为机密的事，还是很快传到在杭州的江青耳中。她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连夜打电话给毛泽东，急急忙忙的赶到庐山。原准备第二天还要会见毛泽东的贺子珍，也随即下了庐山，至死再未与毛泽东会面!

5、女儿的亲事

李敏是毛泽东同贺子珍结婚十年中生育的第六个孩子。苏德战争中她同妈妈在苏联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归国后，母亲定居上海，李敏随父亲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同贺子珍之间的情谊，通过李敏往来沟通一些信息。

江青为此十分恼恨。一次，李敏画了一张切成三角形的大西瓜，作为学校作业寄给妈妈。深受感动的贺子珍，寄来一首西瓜诗。江青得知以后，对李敏大发脾气：“我已经将这件事报告了中央，要组织处分你妈妈”，还接二连三派人监视李敏的行动。

“文革”开始后，李敏从北京跑到南昌看妈妈，江青下命令要吴法宪去抓。汪东兴劝吴法宪说：“不能这样干，对她就说没有找到。”

1940 年，江青 26 岁时生李讷。由于江青原名是李云鹤，所以女儿没有姓毛而姓李。江青对此很高兴。

毛泽东很欣赏古人名言：“君子敏于事而讷于言”，故给小女儿起名李讷。战争年代，李讷在毛泽东严格要求下，同战士们吃一样饭。在陕北行军打仗时，战士们吃什么，她也吃什么，从没有什么“特殊化”。

1959 年，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在学校学习时，李讷也同其他学生一样骑自行车，挨过饿，吃过“大跃进”浮夸风带来的苦果。

1963 年，李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北大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把李讷拉进动乱的旋涡。她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带头造反、夺权，批斗老干部。年方 26 岁的肖力，夺权当上《解放军报》总编辑。1974 年至 1975 年，先后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江青在政治上坑害了李讷。

1970 年，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毛泽东对谢静宜说：“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的去了，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

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李讷离开干校到了江西一个农村插队。有一段时间，李讷得病发烧，有人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毛主席说：“不，人在那里，就在那里治病。”又说：“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李讷对于个人的婚姻，不愿让母亲干预，却愿听听父亲的意见。毛泽东让人转告李讷：

她的婚姻父母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

1．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

2．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

3．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了。

李讷按照个人的意愿，在她 30 岁时同一青年战士相恋，并经毛泽东同意结婚，生一男孩。不幸的婚姻，一年之后就离婚了。

毛泽东的警卫长李银桥很关心李讷。1985 年，经李银桥介绍，李讷同 12 岁参军的副师级警卫干部王景清结了婚。

他们同儿子一起，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6、向三口棺材鞠躬

1971 年 8 月 28 日，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一连几天不曾安睡的江青，突然心血来潮，于凌晨三时带着一帮人马，来到定陵博物馆。

据现场人员回忆说，她一下车就对馆长说：“天气太闷，睡不着啊，到你们这个世外桃源休息一会儿。”

经过一阵忙碌，江青的床、蚊帐和随车带来的绿布厕所很快安置好了。第二天上午，江青以高傲的神态，步入定陵展厅，把出土文物浏览了一遍。当她看到万历皇帝使用的药罐时，摇晃着头，厌恶地说：“什么破烂货也往这陵墓里放，这个死皇帝也真是不值钱。”

江青看到皇后戴的凤冠，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她弯下腰，右手扶着眼镜框，脸贴到玻璃上，仔细地观察着。接着，抬起头，对众人说：“这个，还不错。能拿出来戴一下吗?”

“能，能……”馆长让讲解员把凤冠拿了出来。

这个醉心想当女皇的女人，手捧着凤冠，激动地看了又看，轻轻地戴在头上。

“好看吗?”江青问陪同人员。

“好看，太好看了!”人们同声恭维着。

“太沉了，戴一天准得把人压死。看来这皇后也不是容易当的。”江青把风冠摘下来，交给工作人员。

江青随后在服务员搀扶下，慢慢走下地宫，走进地宫后殿。在三口朱红色棺椁前，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转身朝外走了。

江青出于什么心态，向三口朱红色的棺木行礼呢?是祈祷“死魂灵”保佑她的女皇宝座，还是默告自己的心愿呢?在场人员面面相觑，大为不解。

第十五章 武汉的怒涛

1967年的夏天，我国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更是热上加热。

太阳像火一样悬在天空，炙烤着长江两岸的大地，万里滔滔的江面上，浮动着白蒙蒙的热气。拥挤繁闹的市区街巷里，如同闷在没有盖子的蒸笼里，连柏油马路也热得冒了油。成千成万的人群，在流汗、在喘息……

然而比酷热更难熬的，是连绵不尽的不安和恐怖。

造反派、红卫兵扛着标语、红旗，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押着从各机关、学校、工厂抓来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穿着戏衣，插上稻草，在街上游行示威。汽车上的高音喇叭，响着刺耳的尖叫声，呼啸而去。到了夜晚，武斗的枪声，时断时续地掠过武汉上空

1、分裂成两大派

武汉地区像全国各地一样，人民群众内部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观点，逐步分裂成两大派群众组织。这些不同观点和派别的群众组织，就绝大多数群众来说，无论当时属于哪一派组织，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泽东主席和他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是“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受害者。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是拥护武汉军区，还是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1982年11月31日晚，笔者在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驻地，访问了原武汉军区

司令员、上将陈再道同志。一谈到震惊中外的武汉“7·20 事件”，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他立刻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争论的焦点。

“这两派都是群众组织。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在北京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的支持下，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大喊大叫要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他们殴打、围攻执行‘支左’任务的指战员，接二连三地搞打、砸、抢，多次制造武斗事件，把矛头直指武汉军区领导，要揪‘武老谭’(笔者注：即武汉的谭震林，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甚至绑架代表军区工作的钟汉华政委，一次又一次地给军区施加压力。这一派的人数虽不多，但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得到林彪、江青的支持，是所谓响当当的‘左’派，搞得武汉到处停工停产，一片混乱!”

陈再道，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中等身材，肩宽腰圆，满头白发，粗犷豪爽，声音洪亮，说话幽默，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那一派怎么样?”笔者问道。

“同造反派对立的一面，是‘百万雄师’。这是 5 月 16 日由武汉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的‘百万雄师联络站’。”

“百万雄师”成立后，虽有缺点错误，但拥护武汉军区，保护许多干部，在很短时间内发展到 100 万人左右。

“他们是什么观点?”

“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湖北省委。他们还认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以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对干部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律都打倒。”

“武汉军区的观点呢?”

“说心里话，武汉军区机关、部队的指战员也是这个观点。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是倾向‘百万雄师’的。但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们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他们。由于军区的同情和支持，‘百万雄师’发展很快，到‘7·20 事件’发生前，这派组织已经 120 多万人了。另一派呢?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乱闯、乱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得人心慌慌，不得人心，结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武汉地区的“百万雄师”成员有 122 万人，其中工人占 48％，贫下中农占 18％，学生占 19％，其余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武汉地区的党团员中有 85％加入了“百万雄师”。

陈再道说，武汉地区两大派的观点和做法，影响到湖北全省。从省级机关到各地、县、公社以至每个村庄都分成对立的两派。这样给军队“支左”提出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武汉军区党委经过深入调查，认为那些搞打、砸、抢的组织不能支持，特别是不能支持“工人总部”这样的组织。

陈再道是湖北麻城人，1909 年生，1926 年参加黄麻暴动的农民自卫军。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历任红四方面军的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东进支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解放后，任河南省军区和武汉部队司令员。

他同笔者谈话的时候，虽然已是 73 岁的老人了，但体魄强壮，精力旺盛，头脑清晰，问他身体为什么会这么好?他说："这也是小时候练武功的成果啊!"

小时候，他在家放牛，给地主种田。因不堪忍受压迫，投奔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同许世友、钱钧一起习武练武，练就了一身武功，能像壁虎似的攀屋登梁。

2、事出有因

武汉两大派的对立，有其深刻的根源，是"革"与"保"基本矛盾的表现。

陈再道回忆说，1967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5 日，进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原本六天的会开了三天。这次会议，围绕军队"支左"大方向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陈再道在会上说："什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

在北京开会期间，武汉军区连续打来电话，说武汉形势紧张起来了。

二月初，武汉的造反派同南下的造反派联合占领了汉口的《长江日报》红旗大楼，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篇"2·8 声明"，火药味极浓，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托"，"丢掉幻想，投入战斗"，"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等等。

2 月 9 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支援"下接管的，在群众中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2·8 声明"之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点火，到处抓人，对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接连进行批斗、游街，实行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把武汉闹得人心惶惶。2 月 11 日这天，他们竟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了。

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武汉军民的极大不满。有些群众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2·8 声明"表态。军区党委经过反复研究，于 2 月 18 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2·8 声明"的错误观点，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8 声明"。至于军队内有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在"2·8 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

陈再道对笔者说："我和钟汉华政委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总理找我们谈话，指示我们回去要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要各行业的大联合；三是抓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满怀忧虑的周恩来总理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就没有饭吃了!'周总理的指示，对稳定形势非常重要。"

3 月 17 日，武汉军区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制止武斗，稳定形势，抓了搞打砸抢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朱鸿霞、胡厚民等 400 多人。接着，又在 3 月 21 日，发表了武汉军区的《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样，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制止了打砸抢抄的活动，保护了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

在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上，陈再道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且高声宣告：“鄂豫两省是共产党的天下，今后哪个乌龟王八再敢夺共产党的权，我就用枪杆子和他辩论!”

3、插进了黑手

陈再道回忆说：“林彪早在军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就向心腹吴法宪交代，要把军内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在林彪看来，我就是要‘揪出来烧掉’的一个。”

4 月 16 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直接把火种抛向武汉。

5 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多次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武汉空军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在武汉军区后面跑。

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整武汉军区是他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坏人的挑动支持下，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得更厉害了，形势更混乱了，武斗也升级了。

陈再道回忆说：“那时，武汉的造反派，集中力量向我猛烈开火，街道里，马路上，到处贴着标语、漫画、大字报。”

陈再道说到这里，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说起来真是笑话。有一张大漫画，把我竟画成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陈再道，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武汉的两派人员，涌到了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王府井和中南海周围，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申诉各自受到的迫害。笔者也亲自听过他们的申诉，看过他们武斗时血淋淋的照片。他们把武汉问题的大标语写上北京的大街……

武汉的形势，引起党中央的关切。

4、毛主席到武汉

1967 年 6 月 26 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一封电报，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电报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武汉军区按照电报精神，在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选出各组织的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汇报的人员名单，准备好到北京汇报，解决武汉问题了。

“就在这时，大约 7 月 10 日左右，周恩来总理给我打来电话。”陈再道回忆说，周总理告诉我：“你们不要派代表来北京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就地解决问题。”

1967 年 7 月 14 日早晨，周恩来乘飞机到达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同机到达的有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海空军作战部长等人。

14 日中午，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四个红卫兵，由四川重庆市到达武汉。他们原来是奉中央之命，到云南解决军队支左问题的，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由云南转到重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车到达武汉，随毛泽东同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

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迎毛泽东。晚上，当谢、王在夜幕中去看大字报的时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很快被群众认出来了。本来是绝密行动，一下走漏了消息。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991 年 3 月，笔者再次访问王力，谈起“7·20 事件”时，动过手术的王力，在阳光明亮的书房里，以浓重的淮安乡音告诉笔者说：“我们奉主席指示，解决西南问题。7 月 13 日晚，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赶到武汉，说是紧急任务。谢富治当即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

“在总理做出决定之后，我因主席交待赴西南的任务未完成，所以才打电话给关锋，询问如何改变计划?到武汉是什么紧急任务?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为什么毛主席点名要谢富治去武汉?除了他是公安部长，还因为在战争年代，他曾指挥过当时驻武汉的部队，熟悉那里的军队干部。”

谢富治同陈再道是老乡，是红军老战友，又都是上将。谢富治一见面就亲切地对陈再道说：“我是受康生和江青之托，来转变武汉军区支左方向的，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陈再道一听就火了：“对不起，我没法帮你们的忙!”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谢富治追了出来，拉住陈再道说：“咱们可是朋友，我可是为你好啊!”

陈再道说：“我根本不相信你们!”

谢富治说：“那你相信谁?你连中央文革都不相信了吗?你知道陶勇的下场吧!”

陈再道知道，谢富治说这话，是在对他下警告。

美丽辽阔的东湖，银波荡漾，太阳一出来，照耀得满湖波光粼粼。湖堤岸边，绿树成荫，精巧雅致的别墅小楼，掩映在翠林间。中央领导一来，小楼窗口的灯光，星星点点，从深夜闪到天明。

14 日晚上，在安排好毛泽东、周恩来住处和警卫工作之后，住在东湖宾馆二所的陈再道、钟汉华应召来到百花一号别墅，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他俩，要做好汇报武汉情况的准备，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要你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我们对要做检讨，思想上不通，不知道支‘左’错误在哪里。”“总理看见我们情绪不好，脸色很沉重，又对我们进一步解释说，在离开北京前，毛主席曾对他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听总理这么说，心里虽然踏实一些，可是脑子里一直乱哄哄，武汉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翻过来，复过去，来回在脑子里翻腾，演电影，闹得一夜没合眼睛。”

15 日和 16 日，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和谢富治、王力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议论解决武汉问题和办法。

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解决武汉问题。谈到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保守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

毛泽东在会上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领导同志的工作。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认为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所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后，打击“百万雄师”，支持它的对立面“工人总部”。“百万雄师”对把他们打成“保守组织”很不满，因而引发“7·20 事件”。

从 7 月 15 日开始，直到 7 月 18 日，周恩来每天下午亲自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及驻武汉部队的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听取武汉地区情况的汇报。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听这个汇报。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杨成武、李作鹏、郑维山等也断断续续、时进时出地听了汇报。

7 月 18 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

作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责任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周恩来建议陈再道、钟汉华要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接着，周恩来关切地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要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望着在座的军区同志继续说，军队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他说，支左部队要做好两派的工作，搞好大批判、大联合，搞好对“百万雄师”的团结工作。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他并且主动承担责任，说军区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最后周恩来还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他说，支左犯错误是难免的，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更加了解周恩来总理的高尚和伟大。据说，这个讲话提纲是总理亲自拟定的，并且是送主席亲自审定的。可是，当时，我们没有了解总理的难处。总理那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精神，是我要永远学习的，永志不忘的。”

7 月 18 日晚上，周恩来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他带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毛主席住地梅岭一号别墅。毛泽东在客室里等候的时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坐在毛泽东的对面。

谢富治、王力一到东湖宾馆，就径直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并且公开接受和佩带该派的袖章。

造反派总部立即把这个新闻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全校各派群众立即沸腾起来，在校内和街道到处张贴欢迎中央文革大员的标语。

王力回忆说：“我们的身份被群众公开了。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听了以后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周恩来当即亲自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到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

武汉三镇轰动了。各派群众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称誉谢富治、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王力回忆说，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为保卫毛泽东安全，曾指示武汉军区收缴各派群众组织的武器，

但是这一正确决策，却没有能够贯彻。

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武汉军区下命令收缴武器以后，在 7 月 18 日的讲话里，批评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从此以后，周恩来等在多次讲话中，只讲"不要武斗"，再也不提收缴枪支了。

不收缴枪支，怎么能制止真枪实弹的武斗呢?

错误的决策，招宋更大的动乱。一边高喊制止武斗，一边又把真枪实弹分发给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支一派，压一派，其结果必然是矛盾激化，火上浇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

5、"雄师"怒吼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连日的谈话精神，谢富治、王力连续到造反派据点进行工作，发表了很有倾向性的讲话。他们在大捧造反派的同时，又大压"百万雄师"的一派，致使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极度愤慨。

7 月 17 日夜间，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一去，就让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装进了他的口袋。十天之后，这张名单上的十三人，全被逮捕了。他们之中的八个人，一直关到 1972 年。

当时，王力指责"百万雄师"说："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才这样。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让回去，我们'百万雄师'表示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去……"

王力听了很不耐烦，说："你们提这个问题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你们怎么管得了别人呢!"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回答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团也平等对待!"

第二天，"百万雄师"负责人向全市的所属组织传达了王力讲话。群众一听传达，坚决反对王力的讲话。

火上加油的事又接踵而来。

7 月 18 日，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

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由刘丰陪同，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

谢富治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这派群众组织。他说：“你们造反派的风格要高，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放心。你们在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做了许多努力，做了很大贡献!”

王力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说：“武汉问题一定可以就地解决，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三钢’、‘三新’就是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是要相信你们，依靠你们。”

王力接着又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这些天你们受压，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还说，“工总”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 月 19 日，造反派立即将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用高音喇叭向全市广播。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像一颗炸弹，在武汉军民两大派中爆炸，终于引发了“7·20 事件”!

7 月 19 日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的大街小巷。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

“王力窃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群众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下午，武汉军区党委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王力出面向干部做工作。

谢富治在会上说：“那些造反派大方向没有错，执行了中央文革的路线。他们提出的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对的。武汉军区党委和部队同志，必须来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

原来不准备讲话的王力，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用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讲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王力滔滔不绝地一气讲到夜里 11 点。王力把“百万雄师”说得一无是处，而对“工人总部”则倍加赞扬。他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全场。许多人早就听烦了，可是还得耐着性子听下去。那些在会场以外的群众和战士，却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怒气冲天，集会、讲演、喊口号，把久久埋在心底的愤怒喷发出来。

军区干部会刚散不久，省直机关干部、独立师、29 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他们头带安全帽，手执长矛，开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浩浩荡荡涌进军区大院。愤怒的群众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什么要把“百万雄师”划

为右派、保皇派，打成“保守组织”?有什么理由把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武汉军区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

军区机关干部和家属、小孩，为声援他们的斗争，打着灯，纷纷送茶送水，支持“百万雄师”。

军区领导同志为保卫王力安全，悄悄将他从军区大院后门转移到东湖宾馆，并且说服群众离开军区大院。

但是，涌在武汉街上的人群，深夜也不肯散去。他们冒着酷暑的蒸烤，浑身淋着汗水，成群结队地围聚在一起，激情地争辩着、讨论着。

20 日凌晨四时左右，手执长矛，头戴安全帽的两千多“百万雄师”，乘着 27 辆卡车和八辆消防车，又来到军区大院。他们声称如再不解决问题，明天就可能罢工。

陈再道回忆说：“上午 7 时，‘百万雄师’又有二百多代表来到东湖宾馆，要求谢富治、王力出来解答问题。他们挤在百花二号门口，要找王力。”

一早来到这里的陈再道，同谢富治一道，劝大家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去谈。“百万雄师”的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成一圈，同谢富治、陈再道“谈判”。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代表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到双方气氛较好，也从屋子里走出来，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

“正在这时，又冲进几百人来。”陈再道回忆说：“他们大多是独立师和 29 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找不到王力，就冲进来，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他们认不得王力，就错把我当成王力，一上来就是拳打脚踢、枪托撞击，将我打了一顿。王力趁着混乱跑回屋里。谢富治是从湖北出去的老红军，又是国务院副总理，群众连指头都没动他一下。”

群众心里有气。他们随即又冲进屋里，将王力架出来，塞进汽车，拉到军区大院。

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

毛泽东住的梅岭，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

陈再道笑着说：“如果我真是要想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7·20 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

王力被群众揪到军区大院四号楼的阳台上，院子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摇摆着红旗，像汹涌的波涛，喧嚷着，吼喊着。屋顶上，阳台上，树干电杆也爬攀着人。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响震着四周楼房。

“毛主席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打倒王力，王力滚蛋!”

“揪出谢富治!”

群众和战士代表蜂拥阳台，愤怒质问王力、批判王力：为什么要把“百万雄师”打成右派?为什么要支一派，打一派，把一派打入地，把一派捧上天……

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

到场的军区领导钟汉华等同志，一边苦口说服群众，一边手挽手奋力保护王力。

一时失去理智的战士，还是鲁莽地冲了过去，一阵拳打脚踢，将王力打得浑身青肿，左腿脚骨粉碎性骨折。

中午时分，王力在军区政委钟汉华等同志护卫下，悄悄走出军区大院，转移到小洪山北侧的军区某师师部六号楼。以后，又被人转移到小洪山的玉米地里，躲藏了一天。

20 日下午，武汉“百万雄师”七万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打着红旗、标语，喊着口号，乘着数百辆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像浪涛一般，涌上大街，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7 月 20 日到 23 日，在连续举行的示威游行中，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着“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汽车上架着机枪，并肩同群众一起游行。黄石市和武汉近郊的工人、农民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四川、辽宁、陕西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发来了声援电。

武汉大街上出现了许多醒目的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王力说，当时毛主席对“7・20 事件”，先是很恼火，加上林彪、江青的煽动，说了一些气话。后来冷静下来，才做出接近实际的论断。毛泽东说：他们是想以王力做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这就是说，“7 • 20 事件”，一不是反革命叛乱，二不是“兵谏”，三不是毛泽东住到“贼窝”里去了。

武汉“7 •20 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爆发的一次对极左路线的群众性的抵制和抗争。如果说“二月逆流”是中央政治局内部高层领导人对极左路线的批评，那么到了七月的武汉事件，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已演变成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了。

6、林彪“大做文章”

武汉军民本想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方针处理武汉问题。然而林彪、江青却利用这一事件，在所谓“兵变”上“大做文章”。

7 月 19 日，北京得悉武汉的消息。这天黄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打电话给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受临时紧急任务。

邱会作准时来到浙江厅。只见林彪、江青、叶群三人坐在沙发上，气氛严肃而紧张。

林彪板着苍白的脸孔，一声不吭。看到邱会作进屋，林彪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江青憋着一肚子火。一见邱会作到来，她便开口说：“你来得正好，毛主席在武汉，现在那里形势很紧张。派你去给主席送封信，还要带几个医务人员。”

江青停一停，又嘱托说：“你乘专机去，到了武汉以后，能乘汽车更好，若不能乘车，你就步行进武汉。”

江青当即把准备好的一个大白色信封，交给邱会作。邱会作离开大会堂，直奔西郊机场，于 20 日凌晨飞达武汉王家墩机场。

邱会作到机场不久，毛泽东由杨成武、汪东兴等陪同，乘专列也到了机场。

邱会作在火车上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江青的信，淡淡地说：“待会儿，给他们回几个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上了飞机。邱会作赶到机场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当着杨成武的面，对邱会作说：“不写信了，也没有什么话交待，你回北京吧!”

21 日凌晨二时，飞往上海的毛泽东的专机起飞了。

听到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深为武汉事态担忧的周恩来，决定第二次返回武汉。他要亲自了解情况，处理武汉问题。

周恩来的专机，于 7 月 20 日下午 3 点 50 分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周恩来。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而降落到距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催武汉军区领导同志，赶快把王力找回来。

22 日凌晨三点多钟，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从小洪山的玉米地里接走王力，由武汉空军驻地转移到山坡机场。

这天，按照精心安排，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比周恩来的专机先起飞，于 22 日下午飞离武汉。

为使周恩来的专机能提前到达北京，参加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的仪式，谢富治、王力的专机特地在远郊上空，多绕了几圈，晚了半小时，等待周恩来的专机先降落。

下午 4 时 50 分，谢富治、王力的专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向王力致敬”的口号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迎上前去，同谢富治、王力热烈握手、拥抱。

7、“惩一儆百”

7 月 22 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由谢富治汇报“7·20 事件”情况。

会议讨论决定：把“7·20 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诬蔑武汉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并决定：

一、发一个中央告武汉人民书；

二、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到北京处理；

三、在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散会以后，林彪在夜里又给戚本禹打电话，指示处理武汉事件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

林彪指示戚本禹，起草向武汉、郑州地区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并且指示：“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毛主席。”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 事件”。

7 月 24 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林彪讲话说：“凶手一定要捉起来，要公审，此风

不可长，惩一儆百。”又说：“要把武汉放在被动的地位，不要让他们过早争取主动，让他挨一顿骂。”

会议提出了出席7月25日首都百万人大会的名单。在会上，江青和康生坚决主张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坚决不让叶剑英、徐向前出席大会。

会议结束后，中央文革小组把研究要点书面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并且提出他本人要出席欢迎大会。他还要康生给上海打电话请示毛泽东。

25日下午三点，林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由秘书、警卫搀扶着，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现在他们给我们出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造反组织头头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林彪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找到王力，问：“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表示赞同，连连点头。

蒯大富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又问：“武汉事件的后台是肖华?”

王力说：“不是”。

蒯大富又问：“是不是叶剑英、徐向前?”

这时，王力“表示默认”。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大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大字标题中明确提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表示，“最热烈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

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决地声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天报载：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聂荣臻、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同谢富治、王力登上天安门城楼。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各大城市，都相继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中央报刊相继发表新闻、文章、社论 76 篇之外，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北京支持你们》的记录片，在全国放映。从此，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序幕。林彪、江青“大做文章”，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围攻和迫害。

8、丑恶的“表演”

7 月 23 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 15 人到北京去“开会”。

这架专机，于 7 月 24 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陈再道等随即到了京西宾馆，住在第九层楼上。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京文艺口的几百名造反派，喊着要“找陈再道辩论”，冲进了京西宾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看到情况紧急，根据周恩来保护陈再道的指示，立即派人把他们藏进电梯，在八层和九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担心陈再道等人被造反派抓走，要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

傅崇碧说，造反派不听我的，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即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周恩来十分严厉地说：“我管不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撤走了。

但是，“三军造反派”的队伍却按照江青、叶群的布置，迅速包围了京西宾馆。叶群指示造反派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示威游行，连续搞几天。”还要他们到处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

京西宾馆四周人山人海。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连夜部署，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造反派数万人，分乘几百辆卡车，日夜轮流围攻京西宾馆，支援揪斗陈再道。

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还亲自带领各军兵种负责人，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7 月 26 日下午，中央召开扩大碰头会。

参加碰头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武汉军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个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像接受审讯一样站着。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煽动说：“7·20 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吩咐，气势汹汹地咆哮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吴法宪还信口开河地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据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听见吴法宪越说越不像话，一连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但是，吴法宪仍然滔滔不绝，竟然当场恶毒攻击徐向前元帅。他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徐向前对武汉问题要负责任，应当追究这个责任。

徐向前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他写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忿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当场申辩说：“如果说我在武汉搞兵变，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到会场，当场野蛮地扒掉五位老军人的领章帽徽，接着就拳打脚踢，搞喷气式，将陈再道打倒在地……

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又组织一伙服务人员对陈再道进行武斗。

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连续持续到夜晚。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

“我是放牛娃出身，快 60 岁的人了，念我革命 40 年……”

哪知，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老脸，凶神恶煞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 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这时，吴法宪突然从主席台旁边窜出来，扑上去，劈面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接连在会上发言，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其他军区的负责人也都发言表态，说明自己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是个体魄魁梧的彪形大汉。到北京后，多次被吊打拷问，昏过去，又醒过来。当审问员问他，陈再道给你下达什么命令?交待过什么搞“兵变”的任务时，这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忍着酷刑，总是回答一句话：“我死也不能乱说，……陈司令没有交待别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好好保卫毛主席!”

9、一幕浩劫

从 7 月 26 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共达十几篇之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高潮，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几天后，笔者曾获准到“对外作战部”访问。设在清华大学三层楼的“作战部”，充满神秘气氛，但只有几个人进出。看来还没有进入“临战”状态。

7 月 27 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研究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这封由陈伯达起草的信，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信中强调指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信中还诬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军区领导班子，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小型座谈会”上谈到武汉问题时，猖狂地诬蔑说：“武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以陈再道为首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搞的一个反革命叛乱。”

《红旗》杂志在第 12 期社论中说：“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新高潮”、“大风暴”就是新灾难、大浩劫!

请看：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且撤离武汉进行改编。

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被全副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被打成“百匪”、“反革命组织”，不少解放军的家属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家属被打成了“叛军家属”、“匪徒家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游斗，有的被长期关押，大批无辜者被打伤、打死。

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7·20 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群众多达 18．4 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死 600 多人，打伤、打残 6．6 万多人。如果加上两派武斗中伤亡的人数，伤亡人数就更骇人听闻了。

1978 年 7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7·20 事件”平反、昭雪。

同年 11 月 28 日，湖北省在武汉市召开“7·20 事件”平反昭雪大会，全省参加和收听的多达一千多万人。会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宣读了中央文件。他说：“7·20 事件”是湖北省人民，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叛逆事件。这是林彪、“四人帮”为篡夺党的领导权，而制订的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反革命阴谋!

第十六章 巨人的最后岁月

196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他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他看来，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7 月 2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刊登这一新闻时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风大浪，摧残了无数英灵，分裂了党，分裂了群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1、不屈的“囚徒”

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冲击旋涡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党内外杰出人士，都遭到迫害而牺牲。多少元戎名将，多少文豪人杰，在激流中沉浮，在牢狱里化成青烟……

1980 年 11 月 17 日下午，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里，访问了彭德怀元帅的夫人、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和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她俩忍住悲痛，详细讲述了彭大将军之生死。这里记下是她俩的回忆和笔者的访问。

1966 年 12 月 28 日午夜过后，一辆深灰色的囚车，从北京站向五棵松附近的一所军营疾驶而去。

车停了，从车上下来一个穿青呢大衣、内穿黑土布棉袄的老人。战士们把他架进小屋，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睡觉，我好几夜没睡了。"

他脱了大衣，拉开被子，倒头便睡。

他是谁?

大衣口袋里掉下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战士翻开一看，书皮内写着"彭德怀"三个字。

两天前，这位身经百战，曾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八路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三军统帅，在四川成都永兴巷七号住宅，突然被来自北京负有特殊使命的红卫兵包围了。接着他被押上火车，揪回北京。

彭德怀 1959 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后，在北京西郊清王朝皇族的挂甲屯吴家花园住了六年。

1965 年 9 月 23 日，在任命他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时候，毛泽东请彭德怀来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

毛泽东一见彭德怀便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

谈到派彭总去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就在 9 月 11 日上午，中央曾派彭真等人同彭德怀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彭德怀毫无精神准备，沉默了片刻后说："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还表示自己对工业生产没有经验，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

9 月 24 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毛泽东看信后，决定于 9 月 25 日亲自同彭德怀谈话，并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参加。

在谈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批判后讲的三条保证(即不会做反革命、不会自杀、愿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

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接着，毛泽东向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淡。

彭德怀被毛泽东说服了。“我听你的，主席，去西南。”

11 月 30 日，在彭德怀到达成都的当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上海《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矛头是对着自己的，他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

“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被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1966 年上半年，他走了 20 多个县市、15 个工矿企业，走遍金沙江两岸的川、滇、黔交界的广大地区……

正在这个时候阴谋家的黑手又伸向彭老总了。

1966 年 4 月 12 日，关锋、戚本禹根据江青、康生的授意，写了一份材料，对中央任命彭德怀到三线任副总指挥“思想上有保留，我们反对这样的处理”。

6 月 16 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表示“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12 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随后，戚本禹也打电话给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对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12 月 22 日晚，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红卫兵，从成都永兴巷抓走了彭德怀。早到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地派”红卫兵，闻讯后又于 23 日从“天派”手里夺走了彭德怀。

三线办公室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了这一情况。总理办公室当即传达了周恩来的三条指示：

一. 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准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北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到达北京后，1966 年 12 月 28 日安排到北京卫戍区某部监护。

1967 年元旦，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 月 22 日晚在成都住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 日转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 27 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 年 1 月 1 日”

这封充满希望、期待的信，是彭德怀写给毛东的最后一封信。

但是，一天天、一月月，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2、大批判的风暴

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杀气腾腾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卫兵要彭德怀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彭德怀回答说：“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在红卫兵的再三催促下，彭德怀给姚文元射去“回马枪”，对所谓“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诬陷，表示极大愤慨。

红卫兵进一步逼他承认所谓高岗、饶漱石的“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说：“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什么俱乐部!”

红卫兵说：“非写不可!”

彭德怀气愤地把桌子“嘭”地一拍，瞪着眼珠，大声吼道：“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遭受疾病折磨的彭老总，因为囚房里没有阳光，窗户用旧报纸从底直糊到顶，屋内潮湿，没有衣服可换，双腿、臀部和背腰都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两个多月未换的内衣裤，沾满了脓血，袜子也破了，棉裤露出棉花。

二月底的一个晚上，他给侄女彭梅魁写了封信，要换洗衣服。信上说："……在成都被抓的时候，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黑制服、袜子、布鞋，还要一点钱。"

天暖了，他还是穿着破旧棉袄裤。他向哨兵要来针线，眯着眼睛，一针一线缝补。

3 月 19 日，一个参谋送来彭梅魁给他带来的衣物和水果，也带来了安慰和希望。彭梅魁告诉笔者，当她知道彭老总的下落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

5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长篇讲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他公开点名彭德怀、彭真、陆定一、周扬等是反革命。

彭德怀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将报纸扔到一边，气得倒在床上高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雄伟、粗犷的歌声，震惊了军营，撼动了牢房。

3、残酷的批斗

1967 年 7 月的一天，中央文革的"代表"前来审讯彭德怀。这代表就是造反派"地派"头头王大宾。他们对彭德怀一阵拳脚相加之后，要他限期交代如下问题：

一．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关系；

二．在朝鲜战场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三．毛岸英究竟是怎么死的……

7 月 11 日，北京市 50 多所高等院校师生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动员开展大批判、大揭发。江青几次对红卫兵说："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啊!"

12 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造反派头头会议，戚本禹对韩爱晶等人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对他客气。"

18 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彭德怀是个军阀，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要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

19 日酷热的中午，彭德怀刚吃完有人塞给他的一个玉米饼，就被拉进吉普车，押到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几十个红卫兵。

红卫兵厉声地要彭德怀交代问题!

“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彭德怀昂着头态度温和地说：“我几十年来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有人责问：“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彭德怀脸上露出轻蔑的冷笑。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其它地方组织一两次。”

这时，有个北航党委的干部钻了出来，歪曲事实地说百团大战暴露我军力量，把日寇引到根据地来……

彭德怀立即打断这个干部的话，讲了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战斗怎样英勇，连红卫兵都听着迷了。韩爱晶为扭转会场局面，又喊叫起来，要彭德怀交待在庐山会议上反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义正词严地说：“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严肃地说：“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在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其实，这个发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过“万言书”。彭德怀反驳说：“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问题。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是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倒我。”彭德怀略有沉思，说：“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

彭德怀说出了他百思不解，长期埋在心底的话。红卫兵人群里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喊：“打倒彭德怀!”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尖声喊道：“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彭德怀气势昂然：“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扑上来，一拳打在彭德怀的下巴上，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群红卫兵跟着围了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一连七次，把这个年近 70 的老人，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个穿皮鞋的坏家伙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彭德怀被人拉起来时，他头上淌着血，站不住。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起来。

这次批斗会上，彭德怀受了重伤。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厂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内伤，彭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

批斗彭德怀的第二天，有关人员曾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

韩答：“中央文革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

“周总理不是向你们作过‘不许武斗，不许游斗，不许逼供信’的指示吗?”

答：“总理的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为掀起“批彭”高潮，7 月 26 日下午，北航、地质学院联合召开七万人大会。接着，各兵种总部、国防科委、在京军事院校、人民日报、邮电学院等十单位，相继召开批斗大会，彭德怀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受尽人间折磨侮辱。张闻天和黄克诚、谭政、张爱萍、王尚荣、李志民等著名将领一次次陪斗。

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也遭到北师大造反派的“喷气式”批斗。浦安修因拒绝揭发彭德怀，扁担打在她的肩背上，头被揪着往墙上撞得咚咚响。当时印发的红卫兵小报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为彭贼涂脂抹粉”，警告她“再不交待，砸烂你的狗头!”

4、罪恶的审讯

大批斗的风暴刚过，又开始了更为残酷的秘密“审讯”。

这种罪恶的审讯，从 1967 年 6 月 21 日到 1971 年末，据不完全统计，相继进行 150 多次，直到彭德怀一再昏迷，精神完全崩溃。

审讯的重点，有什么“假党员”，“里通外国”，甚至奉命出国访问、接待外宾，都成了问题。

1955 年 5 月，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径莫斯科。赫鲁晓夫曾与彭德怀谈话，谈及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仅由少数高级人员参加。回国后，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审讯人员用“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再三进行逼供。彭德怀在连续三天七次的审讯中，因患感冒，咳嗽不止。彭德怀忍着病痛，拒不屈服逼供。他大声说：“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

审讯人员骂他：“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

彭德怀忍无可忍，跳起来拍桌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1968 年 1 月 19 日起，专案组用车轮战突击审讯，每天从晚上七时，一直审讯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反复穷追死逼，直到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26 日这天，从下午六时审问到第二天凌晨三时，连续对彭德怀审讯九个小时。这天的《哨兵日记》，如此记载着从审讯处回到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伏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态。”

1959 年，彭德怀出国参加阿尔巴尼亚霍查举办的宴会，在小会客室曾与赫鲁晓夫进行了礼仪性的会见。为逼供这个问题，专案组在长达 11 个小时的连续审讯里，对他进行车轮式的轮番“轰炸”。审讯人员轮流休息、吃饭，却不让彭德怀吃喝，逼他承认同赫鲁晓夫“密谈”，“同苏修勾结”。彭德怀宁死不屈，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破口大骂，捶着桌子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

专案人员恫吓他：“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彭德怀冷嘲地说：“好啊!看你们有什么好下场!”

后来，彭德怀被迫写了“检查”，并把它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又加上一段注解：“为此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与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要弄清真相，事实求是，做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

“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彭德怀已陷入极度矛盾的痛苦中。这是多痛心的悲剧呵!

1968 年 3 月，黄永胜接管彭德怀专案组以后，审讯更是一次比一次残酷。彭德怀看了“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名单，“扳着手指头数”，当知道一个个熟悉的老同志不见时，他“流泪四次”。

彭德怀经常失眠。9 月 11 日后，他连续四夜失眠，彻夜不睡。他在牢房里踱来渡去，常常自声自语，嘴唇不住地颤抖。有时他坐在床上，静静地出神，有时他挥舞双手唱歌发笑，有时突然火山爆发，高喊吼叫，把牢房都震得嗡嗡响……

1973 年 4 月，彭德怀直肠癌恶化。一天他忽然跳下床，仰天长叹，对前来探望他的侄女彭梅魁说：“今天让我见毛主席，明天我上手术台。我留着这条命，就是要尽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彭德怀喘息着，反复地说：“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

一份责任!”

这时，彭德怀还不知道，“彭德怀专案组”早在1970年9月17日就写过一份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无耻的谎言，歪曲不了彭大将军革命战斗的一生；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摧残，改变不了他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彭德怀忍着剧烈的疼痛，大骂江青一伙“国民党特务”。

他对伏在他身边痛哭的彭梅魁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到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我们这个党呀，坏事就坏在那些国民党特务手里，在我们党里兴风作浪!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指‘四人帮’)害死的!”

彭德怀告诉彭梅魁说：“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同志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76岁。

1978年12月24日，党中央给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彭德怀元帅流芳千古!

第十七章 历史悲剧的重演

贺龙，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贺龙，一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巨人；

贺龙，一面红二方面军的旗帜；

贺龙，这位永远令人怀念的元帅，竟然死在混进自己营垒内部的奸贼手里!

抗日战争年代，笔者曾随贺龙统帅的军队驰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目击过他那英雄的风采，并且在他家里聆听过他长时间的谈话。他那魁梧的身躯，阔而圆的额头，闪光的眼睛，浓黑的胡须，洒脱的风度，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1、漫天的谎言

1966 年，在大风大浪卷起的旋涡里，身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遭到了风浪的猛烈袭击。

笔者曾多次访问贺龙夫人薛明。在那多树的庭院里，在那竖立贺龙塑像的宅庭里，薛明大姐时而擦拭眼泪，时而无声地哭泣，时而愤愤地举起拳头，对笔者诉说着贺龙元帅和她的遭遇。

1966 年 9 月 14 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里。薛明像往常一样给他送去几份文件。但是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却是慢慢地吸烟，脸上也不见往日的笑容。他突然对薛明说："告我的黑状。"接着嘴角上现出冷笑："可就是没告准!"

林彪把贺龙当作眼中钉。8 月 7 日，林彪刚从大连回来，就连日接见他的亲信，煽动诬陷贺龙。

8 月中旬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召见吴法宪汇报空军第十一次党委全会的情况。他劈头就说："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又说："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并且要他"对贺龙插手的问题写个书面报告"。

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马上写了报告。诬陷空军有一条贺龙为首的"黑线"在那里"指挥"。

与此同时，林彪召见海军政委李作鹏，诬蔑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些人反对我。"李作鹏同吴法宪一样，也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反对"四好运动"。

林彪还利用炮制的总参"8·25"反革命事件，借口一张大字报，诬陷贺龙策划"要夺总参谋部的权"。

这些诬陷信被林彪转给毛泽东主席。

9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贺龙，并把诬告信给贺龙。等贺龙看完了，毛泽东笑着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贺龙很坦然，请示毛泽东说："是不是找他们谈谈?"

毛泽东摇摇头说："有什么好谈的?"他还很有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9 月 19 日，毛泽东告诉贺龙："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12 月 28 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和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坐在毛泽东的身边。

胸怀坦荡、心地光明的贺龙，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和毛泽东亲切谈话的时候，一股恶浪正向他扑来。

一天，贺龙按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向林彪征求意见。几句寒暄之后，林彪假惺惺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什么意见。"接着他把话锋一转："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军委扩大会就要召开了，要注意支持谁，反对谁。"林彪皮笑肉不笑，冷森森地威胁说。弦外之音是让贺龙跟林彪走。

贺龙听出林彪话外有音，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地说："军委碰头会我要参加的。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

叶群为了陷害贺龙，指使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长宋治国于 1966 年 9 月 7 日、17 日、19 日，10 月 7 日，连续四次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这些纯系捏造的谎言，十分荒唐可笑。特抄引几例立此存照：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 120 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等等。

经事后查证，"揭发材料"列举的内容，有的纯属造谣，有的则是叶群口授。叶群为了借刀杀人，又不留痕迹，还精心安排了一场写"假证明信"的丑剧。当宋治国将写好的诬告信交给叶群时，叶群特地叫来林彪办公室的三位秘书，当着他们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你写的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叶群说："那我们就照转不误了。"

演完这场双簧，叶群怕露马脚，又叫"林办"的三位秘书在人民大会堂西厅，联名写了一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这些诬陷材料，"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主动，并非他人授意"。

诬告贺龙的黑材料，林彪一一批转毛泽东。据林办的一位秘书回忆，仅 1966 年 9 月下旬这段时间，叶群让他保存的有关诬陷贺龙的黑材料就有一二十份，每件均有毛泽东、林彪的划圈。

在林彪一伙接二连三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动摇了。他点头同意，对贺龙问题可以“在小范围内打招呼”。贺龙的名字，从军委会议的名单上抹去了。

9 月 8 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打招呼”，诬陷贺龙“同彭、罗、陆、杨相勾结，要夺权。”

10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

诬陷也越来越升级了林彪诽谤贺龙是“土匪”、“军阀”，江青诽谤贺龙是“坏人”，陈伯达说“贺、罗、彭是一帮的”。康生诽谤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吴法宪则诬陷贺龙“阴谋投敌”，“逃往苏联”……

“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12 月 30 日，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在接见造反派头头的会上煽动揪贺龙。她还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唆使下，贺龙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抄去，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

“打倒贺龙”的口号，刷上街头。很多在革命战争时期同贺龙一起战斗的战友都被揪斗了，到处都在“抓贺龙的人”。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政委苏振华、空军副司令员成均、北京军委政委廖汉生等高级将领，都被卷到旋涡里了。

2、“一滩滩的血……”

面对突如其来的揪斗，贺龙极为愤慨。他对薛明说：“这是搞什么名堂哟!我得去，应该去见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去。他却笑着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建议请示周总理后再说，贺龙同意了，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陪同贺龙来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周恩来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受感动!

周恩来本想留贺龙一家在中南海多住些日子。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中南海也闹腾起来了。“打倒贺龙”的口号声，不断从红墙外传来。

1967 年 1 月 18 日，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主席和你谈过了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又说：

“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1 月 19 日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到北京西山。在山腰间这所严格保密的平房院落里，除了警卫战士外，再没有别人了。

烈火一般性格的贺龙，一会在院子里踱步，一会倚在窗前沉思。当贺龙从报纸上看到“一月风暴”的黑风刮遍全国，许多跟随毛主席征战的老干部都被打倒时，他心情沉重而焦虑地说：“他们要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了!”

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四川夺权的消息，点了几位老同志的名，更加激起他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他手里拿着报纸，愤然不平地对薛明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清出党外了!”

贺老总心情一天比一天沉痛。有天，他把一叠纸推到薛明面前，对她说：“写!”他决心上书中央，详细申述 1931 年至 1935 年洪湖地区错误肃反的血的教训。

在这段时间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理人夏曦，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把许多革命同志当作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跟随贺龙在湘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从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营长、连排干部，都被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杀掉了。有的连队前后十多个连长被杀了，洪湖的区县干部几乎被杀完了。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军长段德昌等也遭到了夏曦的枪杀。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王尚荣、黄新廷、杨秀山等，都已被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

据杨秀山同志回忆：夏曦在四次肃反、一次清党中，最后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实行“重新登记”时，党员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四个人。

夏曦怀疑一切，甚至连贺龙也怀疑起来，企图加害于他，要他写申明书。

夏曦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

贺龙气愤地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

夏曦说：“没有。”

贺龙说：“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行军至竹林关，夏曦竟然把贺龙警卫员的枪给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问他：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

说着，贺龙把身上的一支勃朗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我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说：“胡子，不要生气嘛!”

贺龙说：“生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

当时，红三军中连以上干部有 90％以上，地方党政干部有 80％以上，都被打成所谓国民党的“改组派”。

贺龙痛心地说：“这时候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空前削弱。其实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曦、关向应和我么!”

贺龙同薛明谈起这些惨痛的教训，心情十分激动：“多少好同志啊，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

如今，看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被迫害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要不得呀!一定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薛明说，贺老总经过一个多月的回忆，在她的帮助下，终于写出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报告》。这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报告，通过贺龙亲身的经历，总结了历史悲剧的教训，提醒人们警惕和避免重演血腥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这个历史的悲剧正以“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泛滥成灾了!

3、“冤枉、冤枉、我冤枉!”

1967 年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 月 9 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他诬陷说：“搞名堂的彭德怀、贺龙，一是地痞，一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他同罗(瑞卿)邓(小平)彭(德怀)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

这一年夏天，林彪的黑手逐渐控制了贺龙在西山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薛明说，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老总和她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贺龙只好戴上老花镜去挑拣。没烟吸了，买来旱烟叶，用手搓碎了，再用纸条卷起来抽。没有了旱烟，就把抽剩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起抽……

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五天断绝了水的供应，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迫使两位老人每逢下雨，就用水盆、水杯接雨水使用。一天，贺龙为端一盆雨水，上台阶摔倒，扭伤了腰，18 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连喝的水都没有，更说不上梳洗了。由于长期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薛明的耳朵边上竟结了一层网。

为了给贺龙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成立了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组长的贺龙专案审查组，开始了对贺龙更加疯狂的迫害。

1968 年 5 月 16 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民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在京的全体人员，他诽谤说：“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他要专案组在审案时要“由此及彼，由贺龙历史上搞叛变投敌，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也由此及彼，联想到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

康生凭着这种主观的推测、臆断，要专案组在 9 月 18 日写信给贺龙，要他“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问他：“1933 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完信，气愤地把信往桌上一摔，高声怒吼起来：“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这件事发生在 1933 年。这个时期，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在“内部肃反”和敌人围剿下，不仅丧失了根据地，红军也由 25000 人锐减到不足 3000 人。红军处境十分困难。这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重兵围攻，一面又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来联络，然后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带着二十多名随从，坐着轿子来到红四军。

贺龙遵照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为了摸清敌人破坏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在湘西龙岩县茨岩塘休息三天。在这期间，贺龙同熊贡卿进行了接触。他通过机智的谈话，得知敌人已派了四个人，到四方面军进行收买瓦解工作。探知情报的工作完成了，于是，他在翌日凌晨，下令警卫班逮捕了睡梦中的熊贡卿。

行至茨萍到桑植的一个山崖口，待部队集中起来后，贺龙迎着凛冽的山风，站在岩石上向部队讲话。他激情而又洪亮地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决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贺龙随即下令枪毙熊贡卿。他大义凛然的讲话，果断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红军，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这件事，湘鄂西中央分局于 1934 年 3 月 17 日，向中央写了报告。笔者 1979 年 10 月在中央档案馆成立 20 周年的纪念陈列室里，看到了当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这

份当年 4 月 18 日才收到的致中央的报告里，其中对蒋介石派熊贡卿游说，被贺龙首先发觉，最后举行群众审判处决一事，有明确记载。

在报告后面签名的是湘鄂西分局负责人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同志。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贺龙专案组在审查这个问题时，曾于 1969 年 1 月 22 日将湘鄂西分局的报告，从中央档案馆做了复制取走。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将查到的这个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甚至将敌伪报刊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蔑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等。

对这件冤案，1982 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伪造的‘通敌叛变’的材料，完全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1933 年 12 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妄图收编我军。熊先派梁素佛来试探，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敌人的阴谋，当即将情况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可诱使熊贡卿来我军驻地。在熊贡卿供述情况后，贺龙同志当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湘鄂西分局中央于 1934 年 3 月 17 日，曾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林彪一伙本已查到了这份重要报告，不但隐匿不报，反而对有关人员大搞逼供信，捏造伪证，制造冤案。”

几十年前早已被贺龙处决的敌人，现在又被林彪一伙拿来当作陷害贺龙的炮弹。薛明同志谈及此事，伤心地掉下泪来。她说：

“贺龙在战场上，面对着敌人的子弹、炮弹，他从来连眼都不眨一眨。可是，现在林彪一伙却盗用党的庄严名义，向热血满腔、赤心向党的贺老总，射来了一支支毒箭，这能不叫老总伤心吗?当时老总气愤不过，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二个字。一页纸上写满了‘冤枉’、‘冤枉’!老总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就喊冤枉!”

整整一天，贺龙都被怒火烧灼着。他像一头雄狮，高昂着头，很少说话，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挥着拳头。到了晚上，他忽然说话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却谈起过去在湘鄂西的英勇卓绝的斗争。贺龙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什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摇了摇头，声音更加低沉了，“可是，现在搞成这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这一夜，薛明说：“贺老总一夜没有睡觉，他躺在床上反来复去，有时悄悄下地，走一阵，又上床去。第二天，当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一大片枕巾都被他哭湿了!”

这个历史上早已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坏人利用了。

江青拿到一份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的所谓揭发材料，要胁周恩来说：“这下可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即派人到武汉、南昌、长沙等地调查，但“均不能证实贺龙有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江青一伙却继续利用“不成问题”的材料，栽赃诬陷贺龙。

薛明说，连续几天，贺龙不断重复着几句话：“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

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

贺龙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又指着康生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坏事!"

4、"杀人不见血"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贺龙，在生活上对他折磨摧残得更厉害了。

贺龙和薛明两人合用一条毛巾，中间破了大洞，只剩下四个边了。贺龙的两套衣服全破了；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一双线袜补了一层又一层。

贺龙患糖尿病，最需要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可是看管人员只让贺龙吃清水煮白菜，饭也不给吃饱，薛明只好到院里，找些野菜给老总充饥。在残酷摧残下，他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后来，林彪一伙经过"六道政审"，为他派来一个凶险恶毒的护士。她采取各种办法，把贺龙夫妇从家中带去的37种药品3000多片，全部搜刮走了。这时，尽管贺龙已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但是他不想死。他对薛明说："他们硬是要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他还风趣地说："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贺龙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神却在向他逼近。

由于贺龙失去最基本的药物保证，到1969年5月，身体已明显衰弱。仅五月上旬就摔倒七次。6月3日到7日，贺龙出现了头痛、呕吐、上腹痛等糖尿病酸中毒征象。

八日晚上，进行化验，他们不是查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病人自己是不是服毒了，直接危害糖尿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输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6月9日天刚亮，医生要贺龙去住医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医生坚持要他住院，并说："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医生，见他们没有表态，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1969年6月9日上午8时55分，贺龙被送进301医院，病情明显比8日恶化。在抢救中，继续拖延和进行错误治疗：贺龙同志入院一个半小时才给胰岛素，10时20分已知血糖

远远高于正常人的指标，仍错误地给葡萄糖液。病人脱水很严重，急需尽快给予足够液体，但在六个小时的抢救中，仅输入液量 1100 毫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致使病情迅速恶化，下午 3 点 9 分逝世。

这时，距薛明离开他仅六小时零九分钟。

两个孩子搀扶着薛明，走到贺龙的遗体旁边。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床单盖着那颀长的身躯。

他那高高的额角，浓黑的双眉，没有修剪的唇上的胡髭……

1975 年 6 月 9 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在为贺龙平反冤案之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

48 年前，在为贺龙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恩来曾经说过："贺龙是一个好同志!"

现在，周恩来又深情地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第十八章 地狱里的火焰

1、铁骨铮铮的好汉

1990 年，95 岁的老人杨献珍，坐在病房的椅子上，像一座白玉雕成的塑像。他长脸庞，眉毛粗长，眼睛微闭，一头雪白的头发下，是几道深深的皱纹。多少英勇的斗争，多少死亡的考验，在他脸上烙印着时代的光彩。他是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好汉!

我曾多次访问杨老。他曾是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95 岁诞辰时，他用"要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话，概括自己战斗的一生。

杨献珍同志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里，两次被捕入狱。1931 年他奉组织之命到北平营救同志时，不幸又被投入草岚子监狱。五年间，一直戴着沉重的脚镣，无数次的拷打，把手腕都打断了，他也没有一句口供。敌人把他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 12 位一起判了死刑。后来，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走，杨献珍等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才幸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所谓"61 人叛徒集团"，又受到林彪、江青、康生的诬陷。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都与杨献珍毫不相干。他在狱中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

自问自答：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这样一想，心地也就坦然了。他在八年监禁、三年半流放中，尽管受尽侮辱折磨，而精神却很旺盛。杨献珍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没有作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我心底平静，扪心无愧。这就是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杨老告诉笔者：1931 年 6 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共河北顺直省委、省军委、共青团委三个单位以及北平、天津巡视的人员，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刘锡五、赵林等 300 多人被捕，关进伪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八月被移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这次大逮捕、大破坏里，党组织遭到惨重的损失。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监狱并不可怕，只不过是斗争场所的转移。他们既要同敌人斗，又要与叛徒斗。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草岚子监狱的优秀共产党员，建立了狱中党支部。

党支部干事会有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子久、胡锡奎、李楚离、张友清、张玺、赵铸、董天知、刘锡五、赵林、马辉之、王德等十多个骨干组成，他们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教育狱中的同志在敌人法庭上英勇不屈，保持革命气节。

作为领导监狱斗争核心的支委会，针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多方冲垮反革命的“审查”。按照敌人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审查”，“反省”了就释放，经过三次“审查”仍不悔改者枪毙!

被捕的政治犯，都戴有一副大铁镣，禁止阅读任何书报，每天只放风半小时。谁要触犯规定，就加重大镣，遭受拷打。

党支部在狱中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和气节教育，提出鼓舞斗志的响亮口号：“红旗出狱”!“粉碎敌人‘审查’，就是击退敌人一次进攻，就像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到苏区的一次围剿一样。”狱中每个党员都向组织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决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活，要活得像个共产党员；死，也要像个共产党员!”在三次“审查”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经受了考验。狱中斗争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敌人“审查”失败以后，就改用简化反省手续，只要在敌人事先准备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以释放。这样一来，敌我短兵相接，斗争更加尖锐。

共产党员郝清玉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敌人拿着“反共启事”对他说：“你只要按个手印，你马上出去。如果你不按手印，就把你送到天桥(刑场)去!”郝清玉斩钉截铁地说：“让我叛党，办不到!别说到天桥，就是到地桥，我也绝不按手印!”

赵志长同志病危时，敌人劝他按个手印出去，他却义正辞严地回答：“共产党员永远不会．在法西斯面前低头，让你们的反共启事见鬼去吧!”

曾在狱中改名王通的陈伯达，在敌人的胁迫下写了反省书，说什么“本人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我愿意反省……”，不几天就出狱了。支部干事会认为，陈伯达的行为是叛变，应开除出党。但他到延安后，却当了毛泽东的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竟是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组长。

1934 年 12 月 19 日，60 名同志庄严宣布绝食。同志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回牢房，把屋内所有食物、食具都扔了出去。头两天，敌人端上好饭好菜，鸡蛋挂面，进行利诱，遭到同志们的唾骂。再过两天，带病参加绝食的同志病情加重了。敌人抬来担架，威胁说："死一个送一个，死几个人我们不在乎!"

绝食的同志拒不回答，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忍受着疾病和饥饿的折磨。到了第七天，敌人震惊了，派来官方代表要求谈判，请求复食。党支部派薄一波同志去谈判，迫使敌人基本上同意绝食斗争的条件，改善了狱中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狱中的同志加强了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殷鉴、杨献珍等同志把从狱外弄进来的俄、德、法等外文马列主义图书，一页一页地翻译出来在狱中传阅。党的秘密文件也经过地下交通送到监狱中来。

1935 年春，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特务，伪装成被捕的共产党员，带着镣铐进入监狱，摸到了狱中党组织的一部分情况，决定将殷鉴、刘锡五、胡锡奎、张玺、董天知、韩钧、张友清、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张振声等 12 位共产党员判处死刑。这些同志都加上重铐，不准放风，等待执行。只是由于日本侵略者逼近华北，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退，这 12 位同志才幸免于难。

2、特殊条件下的斗争

杨献珍说，这 12 位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党组织营救出来了。经过是这样：

1935 年 11 月后，北方局由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及彭真、林枫、柯庆施、李大章等同志组成。鉴于日寇入侵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1936 年 3 月，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工作的建议，避免像在东北监狱中的党员干部那样，在日寇占领时被大批屠杀。

北方局同意这一建议，并请示中央。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回忆，"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中央批准的北方局的决定，是通过草岚子监狱"保外就医"的孔祥祯同志，第一次写信告知监狱支部殷鉴同志的。信中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即登报启事)，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

接到这封信后，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支委殷鉴、刘澜涛，立即碰头研究，认为这封来信形迹可疑。北方局不会不知道，我们多年来坚持的就是不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家一致同意拒不执行，"不付讨论"。

过了两个月，北方局又给狱中党支部来了第二封信。信的大意是：北方局报告了中央，经过中央讨论批准，要你们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即刘少奇)同志让写的。信去后，未见你们动静。胡服同志和北方局让再给你

们转去这封信。信中明确指示：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抗日高潮即将到来。全国人民已将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党身上，各方面、各地区都要求我党派人去指导工作。但目前我党干部不敷分配，白区工作的干部尤为缺乏，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不适应，影响工作的开展。所以你们必须争取早日出狱，担负分配的实际工作。

第二，你们在狱中所进行的各种斗争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你们不应该只局限在监狱的狭小范围内进行斗争，而应当出来在抗日运动的大天地中做工作，去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成立人民武装，准备同日寇进行广泛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党当前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第三，你们中的许多同志进行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斗争已有五年了，坚决拒绝了敌人的出狱条件。你们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对党的忠诚，在长期的监狱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中央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你们的。因此，中央才指示你们履行这种“出狱手续”，也只有你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才有资格这样做。现在我们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你们，你们只有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才能出狱为党工作。这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执行，那你们就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第四，中央向你们保证，对这次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为党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律不得视为自首叛变分子。中央对这件事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为了证实这些信确实是中央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北方局第二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的抄件。

支委会还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认为这个指示与毛泽东的文章精神是一致的，最后判明这是中央的指示。根据“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党的纪律原则，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就这样，薄一波等 52 个同志执行中央指示，分批履行了敌人的“出狱手续”出狱。(所谓“61 人案”，其余 9 人，情况各有不同，不属于这个范围。)

薄一波等同志英勇不屈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这些被营救的同志，殷鉴、邱少山二同志因在狱中惨遭摧残，出狱不久就去世了。其他同志分路出发到江苏、山东、陕西等地，在抗日战场上同民族敌人开始了战斗。

由薄一波同志带队进入山西的同志，打进阎锡山的军政机构，建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且利用牺盟会形式，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纵队”以及暂编一师。这些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军，配合八路军 120 师、129 师，不断抗击日寇进攻，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正式参加了八路军的战斗行列。

分配到其它地区的同志，也都英勇开展对敌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自己后半生的历

史。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出狱的共产党人，只剩下 36 人还活着。这些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中央和省市各部门的领导职务，继续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3、又一次考验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里，早有正确结论的所谓“61 人叛徒案”，在康生的鼓噪下，又被翻腾出来了。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这天，几百名红卫兵代表走上天安门城楼。康生问站在身边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是哪里人?

红卫兵说：“南开大学。”红卫兵见“中央首长”主动热情跟他谈话，便问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是什么。

康生说：要深入发展下去。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的历史。这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性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问：“到哪里去查呀?”

康生指点说：“图书馆、档案馆。”并当场在一张纸上写道：“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历史资料，望给予支持!”下边落款“康生，8 月 18 日。”

在康生的指使下，南开大学和其他大学的红卫兵，蜂拥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在堆满灰尘的旧报纸堆里，寻找变节自首声明。

早在 1943 年，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薄一波，曾经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他本人和其他同志出狱的经过。当时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对此，参加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康生也十分清楚。他还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营救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做得对，做得好。

1943 年 12 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康生汇报反特斗争问题。康生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朱德、彭德怀、彭真、高岗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4 年，康生在中央党校一部作报告时说：“我党中央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阎锡山乘机把他们找去，为他所用。薄一波同志正是利用敌人的这一错觉，开展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文革”一开始，康生却出尔反尔。1966 年 9 月 16 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 1936

年 8、9 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在康生授意下，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成“抓叛徒战斗队”到了西安，一连数日团团围住中央西北局办公大楼，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是“大叛徒”。

为澄清这一历史问题，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致西北局的信。信中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批复中又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康生公然抗拒中央的电报指示，积极支持鼓励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揪“61 人叛徒集团”。他对中央组织部的群众说：“南开‘8·18’、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个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康生并且批准南开红卫兵以“中央特许”的“中央专案组”名义，到一些重要城市查阅机密档案；对要审查的对象，任意抄家、抓人。

1967 年 1 月 10 日，中央文革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的一些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1967 年 3 月 16 日，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并在这份材料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认为“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这个批示，从根本上推翻了过去历史上的正确结论，把是非颠倒了。而 1937 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却始终坚持说“出狱”是经他批准的。康生要人传话对他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出路!”

张闻天拒绝他们的要求，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回来后他告诉夫人刘英：“我可能被逮捕。”1969 年 5 月 16 日，夫妇两个人被隔离监护，一次一次的受审，连续被囚禁 523 天之久，1976 年 7 月 1 日张闻天身亡。

在“抓叛徒”的妖风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同志，1967 年元旦清晨，在广州疗养地被红卫兵揪走。他被扣上各种帽子，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每天轮番受到狂暴的批斗和专案组的严刑逼供。有时几天几夜不许睡觉，每顿饭只给一个小窝窝头。他颤抖的手，拿不稳筷子，饭粒送不进嘴里，掉在地上，又一粒粒拣起来吃。他面对拷打、伤痛和疾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无休止的磨难，决心顽强地活下去，为受冤的同志申冤。他在多次给中央写的材料中都明确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的忠诚。”经历了 10 年监禁，直至 1975 年 2 月 9 日，他才得到了自由。

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经受的批斗次数，可能创造了“文革”中的最高纪录。仅从1966 年 11 月中旬，到 1968 年 1 月的 14 个月中，他就被批斗 1000 多次，平均每天批斗三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十万人。在游斗他的大卡车上，他双手被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一块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终年不息地轮番批斗在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他的夫人受到株连，遭受拷打，被迫害致死。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长达 21 年之久的安子文，1925 年 6 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 1925 年到 1936 年，他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任务。这 12 年当中，他曾四次被捕，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和监狱斗争中，锻炼成为有胆有识的成熟的革命家。

1936 年秋出狱以后，安子文同志参加了北平市委的领导工作。为巩固和发展“一二 •九”运动成果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以后，安子文参加了晋冀豫、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8 年 1 月 2 日，安子文同志再次被捕入狱，长期监禁达十年之久。他在残酷迫害之下，忠贞不屈。康生派人拿着“给你立头功”、“给你当中央委员”的诱饵，妄图逼迫安子文写假证明。安子文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宁肯自己坐牢、受拷打，始终不做欺骗党的事，表现了对党对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

在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的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被轮番批斗。造反派强迫他站在桌子上，连续三昼夜不准下来，也不给水喝。游斗时，有时把铁丝拴在他的脖子上，前面的人使劲拉拽，后面的人脚踢拳打。在七年的监狱生活里，受尽折磨凌辱。一次得病，体温高达 42 度，得不到治疗。他病危时，想见儿子一面，竟也遭到拒绝。他在临终前的遗言中写道：“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你不要想我了。想我的时候，唱唱《五月的鲜花》吧!”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顽强的抗战不息!”

4、深冤大白

在草岚子监狱里，被诬为“叛徒”的受害人，为坚持真理和恢复历史的真面目，一直顽强地斗争着，申诉着。

1977 年 11 月 11 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一次向中央写信说：

“为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孔祥祯在信中再次申述 1936 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写信以及后来如何出狱，都作了详尽的叙述。

1978 年，党中央号召拨乱反正，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专门组织调查组，对“61 人案”进行了历时四个多月的调查。铁证如山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四人帮”制造这一冤案的阴谋。

1978 年 10 月 12 日，在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讲话中说，薄一波等 61 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1978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关于“61 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使长达 12 年的重大冤案、错案，彻底得到了平反昭雪!

阴云遮不住阳光。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事实。“61 人冤案”的平反昭雪，再一次证明，凡是阴谋必将破产!

第十九章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笼罩大地的腥风血雨里，有许多勇于捍卫真理和正义的战士，挺身而出，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同横行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英勇地搏斗着。他们之中，有将军也有士兵，有青年也有老人。

历史的丰碑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1、第一张反林彪的大字报

很难相信，写第一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的，竟是一个身体十分瘦弱的女子。

住在北京大佛寺 5 号院的舒赛，是湖北江陵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曾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和建设工程部工作。她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乱打乱杀现象，十分愤慨。

1966年8月2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又看到一条消息，崇文区有八个红卫兵和一个少先队员被害，真使我悲愤震怒!为什么要在红色的首都搞这种自发的运动?为什么以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路线、方法来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胜利的17年，竟然出现这种怪现象：有经验的走开，没经验的勇闯。真正岂有此理!……借电话打给北京日报社，因为九个孩子的不幸遭遇，使我难过得再也忍不住痛泪横抛地述说了我的意见。”

在社会上开始揪斗刘少奇的时候，她对当地的民警说：“刘少奇同志是有功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光辉的著作，对党贡献很大。我认为这样对待刘少奇同志是不对的。”

她对林彪抛出的许多政治口号，对林彪的讲话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批判之后，在日记中写道：

“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林彪，是个阴恶险毒的政治阴谋分子……他骗取信任，利用党给予的权力，树立个人势力。”“他拼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文字和语言上的混乱，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以至组织上的混乱，妄图趁乱中混水摸鱼，各个击破的整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骨干，再进一步打倒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和篡军的阴谋。”

历史的发展，证实舒赛的分析是正确的，是有真知远见的。舒赛在日记中热情地向人们呼吁：

“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红卫兵们，必须冷静地认清林彪的嘴脸，勇敢地、坚决地站出来揭发、清算林彪的罪行；不要迷信其军功、地位，不要被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所蒙蔽。历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如今为何独独突出林彪一人?!巍巍林彪乎，即令是出类拔萃的大将军，比起多少共产党人鲜血凝成的伟大革命事业来说，岂不是沧海之一粟？”

九月中旬，她开始写大字报，十月初将大字报的初稿送往中组部。接待人员告诉她：“现在是个人管自己，自己对革命负责。”

十月中旬，她在王府井一带贴出五张大字报。由于不醒目，很快被别人的大字报覆盖。后来，她就改用红纸，蘸金粉书写了《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大字报。她在12月2、3两日，骑上自行车，顶着刺骨寒风，将18份大字报分别贴在北京城的繁华地点。在去西郊大学区张贴之前，她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狂热的红卫兵而遭不测，她在家中留下遗言：“我可能不回来。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尸骨和母亲的骨灰葬在一起。”

这是全国第一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公安部门四出追查。光明磊落的舒赛，于12月3日下午就贴大字报事，向大佛寺派出所作了声明，并且说道：“如果我再坐牢的话，你们就知道为什么。”

当权的林彪集团，认定她后面一定有“黑手”，立即派人对她跟踪了四天四夜，一无所获，乃于12月7日傍晚将她拘捕。她在拘留证上写道：“拒绝签字!因为林彪本人说过大民

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红报就拘留我?”她被带走时，高呼：“打倒林彪!”

这天，从零时开始，对舒赛进行日夜轮番审讯。她针锋相对，应答如流。她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拒绝认罪。每次审讯完毕，她都拒绝在记录本上按手印，因此，她被视为“态度极端恶劣”，受到种种虐待。舒赛不断进行抗议。

12 月 26 日晚，她质问审讯人员：“你们如果还有人类的天性，应当相信我说的是真理。我需要的东西应当拿来，即使你们把我迫害死，也不应当从生活上为难我。”“王若飞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写了《狱中日记》，你们如果是按共产党的政策办，就应当让我写日记，不让写，不过暴露你们害怕真理而已。”

在狱中她经常遭到辱骂、体罚以至拷打。舒赛再次抗议：“你们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她向审讯人员郑重宣告：“林彪大权在手，我今天这样反对他，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1969 年 10 月，她和数百名政治犯一起，被押往临汾山西省第三监狱。她受到种种折磨。1971 年 5 月，舒赛的生命濒临衰竭。她愤然剪下一绺长发和指甲，收藏在一堆破烂的个人物品中，准备作为遗物留给亲属，作为自己受迫害的物证。1971 年 5 月 24 日凌晨，舒赛含恨而死。

舒赛去世不到四个月，林彪 9 月 13 日在温都尔汗粉身碎骨了。而舒赛的冤案，直到 1987 年才彻底得到了昭雪。

2、真理的卫士

1980 年 4 月 9 日黎明，笔者在沈阳友谊宾馆六号楼，阅读了张志新的 30 多万字的全部档案。烈士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连日访问了张志新案的一些知情人。我还抄录了 70 多页密密麻麻稿纸的档案、记录等。

一天，由张志新的丈夫陪伴，查看了张志新生前的宿舍。我们又乘车奔到沈阳郊外，来到杀害张志新烈士的地方……

在一片丘陵地里，我们登上长满荒草的小山包。几株稀疏的马尾松，在寒风中凄凉的号叫。

1975 年 4 月 4 日上午 10 时 12 分，英雄被“四人帮”的刽子手割断了喉管，无声地倒在这里，鲜血浸染赤红沙砾的土地……

张志新，1930 年 12 月 5 日出生在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0 年她考入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随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被选送军事院校学习，后来又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5 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 年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沈阳城。她作为共产党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可是，日子一久，眼前许多冷酷血腥的事实，把她的激情打消了。

省委机关同社会上分裂成几派的群众组织，从早到晚，在大字报和高音喇叭里对骂，相互指责对方“保皇”、“反革命”。大街上，小巷里，甚至一个家庭，都在进行着不同观点的辩论、争吵。辩论由“动嘴”上升到“动手”，开始了从石块、棍棒发展到步枪、机枪、土坦克的武斗。

6 月 1 日这天，某大学发生了上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武斗，多少无辜的青年在血泊中倒下。南湖的树林里出现了许多无名的新坟。

武斗的枪声，在城内时起时伏。张志新同爱人带着两个女儿到天津姨妈家躲一个时期。谁知到了天津，天津照样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武斗。她又从天津到了北京，去看望哥哥妹妹，北京到处也在武斗。

她走上北京街头，看到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的领导同志都在被揪斗游街，连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将军、学者，也都戴上高帽，被押上卡车，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背朝天、臂翘上、头朝下、弯着腰，被人按着头，坐“喷气式”……

难道武斗就是革命?谁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张志新满怀对党对国家的忧虑，半月后从北京回到沈阳。

张志新回到省委宣传部。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从北京回来变了，变得沉默了。她总是一个人长时间地思索着、苦恼着。她对眼前的许多事情，看不惯，想不通，不理解，更不想去“紧跟”！

一天，省委机关礼堂又一次召开批斗大会。在一阵阵的口号声中，省委书记周桓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几个彪形大汉，将这位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按着头，搞喷气式，痛得这位共产主义的老战士汗水直流。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张志新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悲伤地在会场上啜泣了。

张志新找同志们谈心，诉说着自己想不通的疑问。她还没有来得及在群众中公开讲出自己的观点，就同原东北局、辽宁省委、省人委的几万名干部，下放到干校了。

干校在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日夜紧张进行着“清队”，老干部遭到“人人过关”的审查。原省委宣传部不足 40 人的连队，有一多半被立案审查，还抓出了一个所谓小“三家村”。和张志新睡同一铺炕的五个人中，有四个被清理审查、专政。几天之后，睡在炕头的一位副部长，经不起日夜的政治压力，精神崩溃，吊死在荒凉的野地里了。

张志新眼泪滚滚流淌着。想得很多，很多……

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1958 年那种‘左’倾政治路线错误的继续扩大和

发展……”，她在笔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我看来，所以形成了这种错误路线，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些年来，毛主席不谦虚了，在胜利、成绩面前骄傲了。……以个人崇拜、少数人的意志，排斥、削弱、代替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的原则，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点……”

黑夜降临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她默默地翻阅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脑海里却剧烈地翻滚着，思考着。她在批斗会上不畏强暴，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对江青我就是怀疑，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江青审查了没有?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可以揭么!”

她激愤地说：“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信任!”

张志新被立案审查了。

她独自坐在房东的炕上，反复地问着自己：难道是我错了么?难道我真的离开了党吗?不，我没有错。我要捍卫真理。她决心做一个高举真理火炬的共产党员。她写道：“我没有离开真理，也没有离开党。我决不是一个人，我同党在一起，同七亿人民在一起!哪怕暂时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参加整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应当无所畏惧的，我襟怀坦白，因为不是为了谋求什么私利，不是维护利益相关的某一宗派和阶层，……我要敢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使人多么痛苦!”

张志新的英雄气概，使“四人帮”害怕了。辽宁省“四人帮”的死党下了逮捕令。

1969 年 9 月 24 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戴上手铐，昂首挺胸地朝吉普车走去。

张志新被捕后，看守所、法院对她进行了多次审讯。每次她都理妆整容，从容地步进审判厅。她在审判庭上，每次都郑重声明：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们不可以用对待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

下面是提审的部分记录：

“你为什么这样嚣张地攻击林副主席?”

“这是我的看法，这不是反革命行为。”

“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审判员强词夺理地说：

“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培养我参军，上大学，我怎么会反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的前途!”

“离开党，谈不上个人前途!我没有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审判员的气势，被张志新的高声质问压下去了。审判员只好草草收场：“回去吧，写一份认罪书交上来。”

1969 年 11 月 6 日，张志新奋笔疾书，写下了《谁之罪》这首悲壮的诗篇。

“在漫长的岁月里，

在尖锐的斗争中，

为真理而斗争，誓死捍卫党。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的人?!

今天来问罪，

我是无罪的人!”

她在囚室踱着步子，听着脚下镣声锵锵，她为《谁之罪》谱了曲。先是轻声哼唱，继而引吭高歌……

这一夜，张志新通宵不眠。十天之后，她交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认罪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想要革命么?你就应该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张志新最初被判 15 年徒刑，后来又被省里主管政法的一位“大人物”，改判成无期徒刑!

张志新把送来的判决书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她理理短发，就坐下来读《毛选》，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写下如下的话：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我自己斗争很激烈，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不投降，有后果；投降，自己又做不到。以前我想过自己的事，算自己的账，两个家庭加起来 21 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1975 年 4 月 3、4 日，张志新再次以审判者的气概出现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她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我的观点起之有因，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

“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毛远新，穷凶极恶地下令：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

张志新从 1969 年 9 月 24 日被捕，到 1975 年 4 月 4 日被割断喉管，英勇就义，她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 2100 个日夜的斗争。

1979 年 3 月 31 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大会，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党争光的优秀党员，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她学习!

3、无罪的囚徒

1970 年 6 月 29 日，安徽和县监狱的一间牢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张“刑事判决书”递到一个青年犯人手中。这位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两腿脚因长期戴镣铐而浮肿青紫了。

“刑事判决书”写着：“被告石仁祥，于 1968 年 10 月、先后书写油印反革命信件多份，报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武汉军区、济南军区等单位，恶毒攻击、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特别嚣张地撕毁林副统帅的画像，在林副统帅画像上打 X，勾划林副统帅的名字，书写大量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在关押期间，拒不认罪，而且在我审讯人员面前公开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被告石仁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了誓死保卫林副统帅，特依法判处石仁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个英勇捍卫真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就这样被处决了。

1942 年，石仁祥出生于安徽和县卜集乡石巷村的一个穷苦农家。他从和县师范毕业后，曾任过小学教师、区的宣传干事。1964 年 12 月报名参军，任新兵班长、工程兵实验员，1966 年调往西藏拉萨某部队任文书。他酷爱读书，勤于思考，经常和战友们谈论国家大事，编排

墙报和文艺节目。

“文化大革命”妖风席卷到高原上。当他从报刊、广播中得知许多老革命家、著名专家学者都被投入“牛棚”冤狱时，他怎么也想不通眼前的混乱现象。他阅读马列著作，联系当前的实际，逐字逐句解剖了林彪 1966 年 5 月 18 日的讲话。他在日记上写道：

“这个讲话举了一些中外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随意解释，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掩盖下的反革命的‘白皮书’。”

石仁祥敏锐地感觉到“毛主席身边有虎狼”，“有人想趁机捣鬼，搞乱全国，发动反革命政变。”他多次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赤子之心，向部队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和忧虑。回答他的却是：“不要胡思乱想!”“不准胡说八道!”

1967 年 7、8、9 三个月，全国到处是武斗的枪炮声，中华大地流着无辜人们的鲜血。石仁祥想上北京反映情况，他一再请假都得不到批准。他满怀悲愤地在日记上写道：“浮云一时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经过一段曲折、艰难经历，他到了北京，到了中央文革接待室。但是由于没有证件，他被赶出了接待室大门，只好卖掉手表，怀着忧伤的心情，登上了驶往故乡的列车。

石仁祥见到离别三年的姐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连写了两天三夜，刻印好《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他特别选择毛泽东诞辰的这天，将这篇声讨林彪的檄文分别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南京军区和他所在的部队。

石仁祥在信中列举了林彪 28 条罪状，指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对人民危害太大。”“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揭露林彪指使爪牙“非法绑架、威逼、拷打一些革命首长，打击一大片，借人之手暗打，伸出魔爪明抓。”他在信的末尾，无畏地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革命战士石仁祥”。

石仁祥还留下 20 多万字的评论、杂文、日记等手稿，其中有《打狗篇》、《国贼——走狗又一存照》、《对林彪要全国全党全军共讨之》、《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等等。他写道：

“林彪是万恶祸根!”“言不由衷的赞扬，皮笑肉不笑的捧场，和当年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他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让他阴谋得逞，那么国家就要变颜色，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那时的中国不知何等悲惨!”

这些匕首、利剑般的语言，是在林彪红得发紫、举国山呼“永远健康”的时刻写下的。石仁祥的明亮的眼睛，看透了林彪的豺狼本性。他明知写这些文章，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因之，他也同时写下准备随时献身的誓言：

“我个人的生死可以不考虑，整个的、长远的原则决不放弃。”“在虎狼面前决不示弱。成功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打倒林彪的战斗，我始终如一，坚决战斗到底!”“我个人在林彪豢养的刽子手面前，宁可牺牲，绝不屈节。”

石仁祥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1969 年 1 月 8 日下午，他被捕了。他被扣上沉重的脚镣，投入牢狱。

在狱中，他用手指和筷子蘸着水，在墙上、地上写“打倒林彪”的口号。

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他把审讯室当作揭露林彪的战场。审讯记录上写道：

问：林彪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你为什么要恶毒地攻击呢?

答：那要通过实践才能证实，林彪是真革命的还是什么。有些人开始不是革命的吗?后来不是变了吗?

问：你是在恶毒攻击林副主席，你继续放毒!

答：我是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是出于忠于毛主席，这是我的看法。

问：你这是什么思想?

答：我这是正确思想，我这是从实践中来的。

问：你这是什么正确思想!你这是反动思想!你从什么实践中来?

答：我是从各方面观察的，是我意识形态的反映，是我的看法。我是为了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要向部队首长反映问题。我如果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个人利益，我就不这样做了。

问：你是属于那个阶级的意识?

答：就我自己讲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问：你承认你是不是反革命?

答：你如果以无产阶级立场，我就是革命的。

问：你愿不愿意认罪?

答：没有任何法律条文需要我认罪。

问：你想到了后果没有?

答：我个人后果都没有考虑过，只不过把客观问题揭露出来了。

问：你所作所为是不是反对林副主席的?

答：反对林某是客观存在的，我所反映的是事实。

问：你写的东西，攻击林副主席，你认为是不是反动的。

答：我认为我写的东西不是反动的，是进步的。

1969 年 11 月 26 日，审讯人员要他写“交待”。他奋笔疾书：“林彪长期效劳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戴着共产党人‘乌纱’摇晃着脑袋，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形左实……”写到这里，审讯人员说他“继续放毒”，责令停写。

1970 年 7 月 12 日，石仁祥被公判处决时，他的喉管早被割断，乡亲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洪亮的声音。

石仁祥壮烈牺牲的第二年，林彪仓惶出逃，机毁人亡。

1978 年 11 月 24 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为反林彪的英雄战士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中共和县县委在濒临长江的一座山顶上，兴建了石仁祥烈士墓。

4、铁骨苍松

在十年动乱中，许多老干部再次经受考验。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残酷的折磨下顽强不屈，直至停止呼吸。更多的人是在久经磨难后，战斗不息，幸存下来，迎来了新生活的曙光。

笔者第一次见到赵健民同志，是 1950 年在重庆修建成渝铁路的工地上。后来，他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和航空工业部长。这位候补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旋涡里，经过了难忘的历程。

1968 年 1 月 21 日，赵健民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迎头相撞。康生气势汹汹地质问：“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回答：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1936 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混到我们党里来，想趁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笔者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特务组织)，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当场，康生指使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了赵健民。

赵健民被监护审查，一年过去了，没有人过问。在监护所里，既没有笔也没有纸，为了申述意见，1969 年 1 月 20 日，他用石灰在地下写了短诗“一年有感”。其中曰：“我无任何罪，冤狱到一年。……坚信太阳下，不会永含冤。”

赵健民告诉笔者：1932 年、1933 年的山东共产党组织尚处在幼年时代。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山东省委领导机关在 1933 年曾两次遭到大破坏。曾任济南市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长的赵健民同志，经过曲折漫长的斗争，终于同北方局建立起联系。他 1936 年被捕后，在敌人狱中英勇不屈，保卫党组织。康生诬陷他自首叛变，纯属居心险恶的“想象”。

在监禁期间，赵健民几次写血书申辩意见。1970 年 9 月 15 日，他在壁诗中写道：“审讯不准我申辩，只问片面严上严，紧箍血骨肉，道道血沟不堪言……”

在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下，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令冤案使云南省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记载，有“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八年的牢狱中赵健民受尽折磨。冤狱平反后，他通过书写一生斗争经历，教育革命后代。

5、舒同的傲骨

1984 年 9 月，我在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栋小楼里，访问了当代著名“马背书法家”舒同。他精神健旺，目光敏锐，步履稳健，看上去好像 60 多岁的年纪，要不是夫人王云飞介绍，怎么也想不到他已是 79 岁高龄了。我请他写字，他当即挥毫舞墨，为我书写了毛泽东的诗词《娄山关》。他一气呵成，字字苍劲有力，刚中有柔，潇洒自如，具有巨大的艺术吸引力。

舒同六岁读私塾书时即开始练字。因无钱购买纸墨和毛笔，便上山砍来毛竹，劈成细丝，用黄土泥浆作墨汁在廉价的纸上，正反两面反复练小字，在地上练大字。到上小学十三四岁的时，他写的字在家乡东乡县就颇有名气了。

曾在抚州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舒同，1925 年参加革命工作，1926 年加入共产党。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漳州战役时，他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握住舒同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写的字。

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延安以后，担任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队长的舒同，为延安南门外新建的市场，书写了刚健有力的大字：“延安新市场”。

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形势，也为新市场题写了一副对联：坚持团结坚持抗日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1943 年，舒同奉中央之命，赴山东传达整风精神。临行前，他分别到杨家岭同毛泽东、刘少奇辞行。到达山东后，他在战争中多次向毛泽东发电汇报华东战局。

1954 年，舒同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0 年，“大跃进”的后果开始在全国显露出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在山东干部大会上宣布撤销舒同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任章丘县委书记。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握住舒同的手说：“你只是认识问题，改了就好。”舒同感动地流下了眼泪。1963 年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1966 年，风暴乍起，舒同是陕西省委最早被打倒的书记之一。当时，他曾有预感说：“打倒后再平反”。

舒同被关押六年，唯有一本毛主席语录陪伴着他。1972 年出狱时，来接他的只有原来的司机。他对司机说：“你说毛主席语录哪一页，我背给你听。”司机随口说了一页，他果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在狱中他受尽折磨，毒打是家常便饭，专案组还扬言要枪毙他。舒同在高压面前，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丝毫不向迫害他的人屈服。他蔑视迫害他的人，他用辛辣尖锐的笔锋，愤怒地痛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舒同夫人拿来一份用毛笔写的材料。这是舒同 1971 年 12 月 31 日写的《献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致专案组的陷害者们》。这实在是一份难得的正气歌，表现了一个无所畏惧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为了保存这份资料，笔者将原文抄录如下：

献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

(阅后请转呈中央)专案组的陷害者们：

你们可以完全不要事实根据地，并且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地，把一个经过 46 年长期考验，仅仅在某一个时候犯有一般性严重错误(见我的历史清算)，本质上完全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干部，打成各色各样的反革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黑帮!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刘澜涛的狗崽仔!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二月逆流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三反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全家人反革命窝窝的总后台!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北京一个地下反革命组织的阴谋暴乱者和为首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私藏枪支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号令的现行罪犯!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在华中的黑干将!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而今，你们又把他打成大叛徒!

从城市打到乡村，从机关打到基层，从陕西打到山东，又从山东打回陕西，(在陕西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没有听说)，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对敌斗争形式，都是同你们蛊惑人心的宣传分不开的，大量的传单、图表、小册子满天飞。到处是提供陷害的炮弹，有许多场合还是由你们亲自出马，当众扯谎造谣。

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还要高明。秦桧只知讲“莫须有”三字，而你们则更上一层楼，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凭空虚构、捏造陷害，而且陷害的时间是这样的长，五年有余，陷害的程度是这样的深，彻头彻尾!

你们的智慧比起旧时的商贩来并不逊色，善于掌握市场的物价，乘机牟利，什么样的罪名能把心目中的对方整死，你们立即见机而作，不择手段，先定框框，后找材料，找不到材料也要瞎说一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做的。今年九月六日仍抛出一个见不得人的阴沟里的黑货——伪造假证件。

你们的权力有无限大，顺之则生(解放或给出路)，逆之则亡(不解放或不给出路)。不是先落实材料来决定问题的性质，而是根据所谓的态度问题来决定对于人的处理。倘若顺从你们的陷害便认为态度好，即便是敌我矛盾也可以破坏新党章的规定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倘若不顺从你们的陷害，就被认为态度不好(或叫态度很差)，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不顾党的政策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五年多来，你们一直就是把我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使尽了各种对敌斗争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切手段：无奇不有的斗争形式、机关管制、群众专政(专政名单中我是第一名)、军事管制、游街示众(除了三次大游街之外还有一段时间每天小游街六次)、搜查住宅、翻箱倒柜(多次)、隔离封锁、跟踪跟哨、强迫劳动、打骂体罚（军管前两年还是这样)，乃至种种折磨侮辱!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不顺从专案组的陷害，就认为是同专案组对立。而“对立就没有好下场”，那么，除了上述下场之外，剩下的就只有无期徒刑或终身劳役，最坏的下场莫过于极刑。无怪乎你们有人大声向我恐吓：“要把你锁起门来送饭吃”、“要送你去法院”、“要枪毙你”，如此，你们就可以称心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即可以迫使小人们三跪九叩首，哀求饶命，乖乖地承认自己是叛徒，岂不妙哉!可是，你们到底凭什么事实，根据哪一条法令有权利这样胡作非为呢?

你们真不愧为自由王国的人们，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毛主席的信件，可以自由扣压，毛主席的指示可以自由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可以自由篡改，《人民日报》纪念中共五十周年文章中某一段历史结论可以唱反调，铁的历史事实，可以自由歪曲，活生生的人证物证，可以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客观上本不存在的东西，可以无中生有，什么事实求是，什么唯物辩证论和历史唯物论，什么“九大精神”，什么“九大”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号召，什么毛泽东思想，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你们从来没有放在心里(绝口不谈、背道而驰)，党纪国法，一概踩在脚下，其唯一目的，就在于实现一个最伟大的理想——没有真凭实据也要千方百计把你打成叛徒，方显英雄本色(捏造就是英雄事迹)，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被审查人能不五体投地!

你们的确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造谣能手，陷害专家!”

舒同 71．12．於军管委

1976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来到北京中央组织部“上访”的舒同，被勒令回陕西接受批判。他随身带的行李也被扔出门外。71 岁的老人舒同，靠在中组部门口仰天长啸：老干部、老革命还不如战犯，还不如反革命……

舒同再次上书毛泽东。毛泽东最后一次欣赏舒同的书法，就是舒同的申诉长卷。毛泽东躺在沙发上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缺点错误，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

但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并没有人照办。

1992 年，88 岁高龄的舒同住进北京 301 医院。尽管他的记忆力渐渐衰退，但他在散步时仍不时吟诵：“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第二十章 “要打出一个党来”

1、“全国一片红”

1968 年 9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社论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并没有掩盖“左”倾错误带来伪灾难。在“全面夺权”、“打倒一切”的方针下，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大批高级领导干部被打倒了。

据 198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的控告，在 193 名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就有 88 人。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制造冤案，破坏民族团结，有 34．6 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 人被迫害致死。

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的 84000 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2955 人被迫害致死。

这些血淋淋的冤案，全被蒙上“全国一片红”的彩带!

1967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成员谈召开“九大”和整党问题。

毛泽东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农民、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党里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

“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思想反映。他在这次讲话中说：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的解决。

为准备召开“九大”，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是一次极不正常的违反党规党法的会议。因为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70％以上都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了。第八届 97 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 40 人。开会时，临时从中央候补委员中补了 10 人为中央委员，勉强过了半数。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员竟达 74 人，占会议成员总数 133 人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主持会议时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徐向前元帅告笔者说，会议一开始就充满政治恐怖的高压紧张气氛。对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一个组里，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开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徐向前只冷静地回答一句话：“总要事实求是嘛!”

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二走资派翻案。”

被当作“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同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会议还对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进行了批判。

谢富治诬蔑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吴法宪公然当着朱德的面诬蔑说：“你当了一辈子的总司令，实际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

林彪在 10 月 20 日的会议上说：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他在叙述历史上三次文化大革命之后说：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会议通过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把持下写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根据他们制造的伪证，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在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里，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即达 2．6 万件，受灾祸的达 2．8 万多人。至于由冤案在不同范围内遭受批判斗争的人，更是难以计数了!

2、错误的“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江青等人把他们的帮派体系的人大量塞进“九大”，其中个别甚至连党员都不是的也参加了“九大”。

对这次有1512名代表出席的大会，当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为了解林彪在“九大”前后的情况，笔者在1980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对林彪的四位秘书连续进行了七天采访。几位同志是应“两案”特别法庭的通知，从四川、河北、辽宁、山东等地来京，为法庭提供证言的。他们在“文革”前后，都长期在林彪办公室工作，对林彪、叶群的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了如指掌。

秘书们告笔者，林彪“九大”报告，来源有三个版本。最早是林彪要秘书们为他“拉条子”，起草讲话稿。后来，改由陈伯达执笔起草报告，只写了三个章节，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他鼓吹唯生产力论，否定了。

毛泽东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成立“九大”报告起草小组，他们写出报告初稿，尽管陈伯达有不同意见，最终还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批准了。

秘书们说，这篇长达九万字的《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拿到手后，他连一遍也没有看过，一字也没有改过，就上台念稿了。

毛主席宣布开幕。

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他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指导，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实施和过程，大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他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大会通过了党章，砍掉了党员的权利。它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极其夸张地评价了林彪，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九大”选出的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里，原来任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只有53人，不到九届总数的五分之一。原来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多数都被“吐故”了。许多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和领导人都被排斥了。

林彪一伙还暗中操纵投票，只让老帅们得票刚过半数而勉强当选。

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林彪秘书告笔者，4 月 27 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开会，最后审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这天晚上，叶群担心她的名字被林彪划掉，特地向她儿子林立果请求帮助，阻止周总理来毛家湾向林彪当面征求意见。她说："老虎，明天就要进行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了，这是妈妈的关键时刻，如果妈妈当不上政治局委员，就前功尽弃了。你爸爸虽说是接班人，但他身体不好，最近还怀疑得了癌症，能活多久?妈妈年轻，将来你不靠妈妈靠谁呢?老虎，你如果能帮妈妈一把，使妈妈顺利度过难关，将来妈妈当上政治局委员，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叶群如愿以偿了。周总理没有来，林彪在周总理送来的名单上，划了一个大圆圈，批准江青、叶群在内的政治局委员名单。

林彪、江青一伙的许多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从而使他们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后来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骨干分子，都是"九大"进入中央高层决策机构的。林彪、江青、叶群、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 12 名政治局委员后来都成了反革命罪犯，在 21 名政治局委员中占了一半多。

3、林彪成为"接班人"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

林彪为什么能成为副统帅、接班人和唯一的副主席呢?

林彪在黄埔参军，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从 1928 年 5 月上井冈山起，一直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器重。红军长征中指挥红一方面军；抗日战争初期，指挥八路军 115 师取得在平型关歼灭日军的重大胜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尽管他也犯过错误，但他因有光荣的历史和战功，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

建国以后，林彪一直在养病，没有做多少工作。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林彪开始主持军委工作，并担任国防部长。

随着林彪在军内、党内职务的提高，职权的扩大，他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这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人物，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情况下，他为了爬上去，就把自己装扮成对毛择东最崇敬、最虔诚的忠实信徒，伪装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一贯紧跟"的"亲密战友"、"最好学生"、"光辉典范"。

林彪狂热地号召"活学活用"、"立杆见影"，颂扬领袖的"天才"，"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大搞个人崇拜，鼓吹造神运动，神化毛泽东。

林彪极为夸张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一万句。"号召对毛泽东要"无

限忠诚，无限信任，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他阿谀奉承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号召全党全军，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号召大家发扬民主，“开出气会”。

林彪却与众不同。他私下对人说，“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却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如都按照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就会变得小一些。”实际上，林彪这是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开脱责任。

林彪在军队工作中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它”、“抓活思想”、“四好连队”，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比较过去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善于讨好毛泽东的林彪，强调要“一本万利”。他说：“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建议，主要学习毛泽东向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就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林彪还是中央七人常委和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只有 59 岁。这是林彪当接班人的最有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说：“当时常委中只好是他当接班人，这是很自然的。”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周恩来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

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背景下，林彪被选为“接班人”，这是历史的错误。正如邓小平在后来的一次讲话里说的：“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毛泽东在“全国一片红”的时刻，提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结果同他的愿望相反，打出的不是坚强的党，打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这两个集团，狼狈为奸，既勾结，又斗争。

“文革”初期，林彪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竭力吹捧江青。双方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

在林彪看来，江青是个既得罪不得，又令人讨厌的人。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开初对江青一伙也是毕恭毕敬都把江青当“娘娘”看待。

江青随着职位的高升，越来越骄横，渐渐地不把林彪一伙放在眼里，矛盾日益加深。

党的九大后，江青指使张春桥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批判“文艺复兴运动”，矛头直指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江青甚至公开指责黄永胜等人：“蒋介石搞一个党国，你们现在是搞一个军国!”

4、“军国”的由来

林彪自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个人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千方百计谋取更大的权力。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就相继批斗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罗荣桓等人。

林彪一上台，就在重要部门安插他那个山头的人。他在任命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之后，1962 年又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作鹏任海军常务副司令。1965 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刚逝世，林彪先发制人，让吴法宪担任空军司令员。接着又在 1965 年的上海会议上，对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动了突然袭击，积极参与陷害罗瑞卿，1968 年“杨余傅事件”后，又任命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

这几员“大将”在历史上都曾长期同林彪一起工作，是同林彪往来甚为密切的同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林彪庇护下，他们都很快一个个过了关。

为保邱会作，叶群拿着林彪、陈伯达的手令亲自出马，半夜三更，化装潜入总后大院，将邱会作从关押的地方救出来。邱会作对林彪感恩万分，称林彪、叶群是他“再生父母”，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他在《零点得救》的日记中说：“二十五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林总挺身而出派夫人接一个人，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不能不使我感动得流下热泪。”

1969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后，在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原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继续担任副主席。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的执行机构为军委办事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分别任正副组长，办事组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林彪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山头，排斥几位老帅、副主席于中央军委之外，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的一切工作由军委办事组包办。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

林彪在同黄、吴、李、邱谈话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你；们身上。你们要很好团结起来。”

“四大金刚”果然“团结起来”，干尽了坏事。

第二十一章 庐山风云

1970 年 8 月，一辆辆小轿车，冒着酷热，驰过九江，沿着曲折婉蜒的山路，穿过绿荫婆娑的树丛，迎着冉冉升起的白云，登上海拔 1500 公尺的庐山之巅。

避暑圣地庐山，留有古迹二百多处。然而这次登上庐山的人们，却无心去探寻这些历史的古迹。萦回在他们头脑里的是，不知这次九届二中全会究竟要讨论什么问题。在这个屡次掀起政治风云的地方，就是林彪在 1959 年 7、8 月的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而当上国防部长的。

历史总是这样：阴谋家的奸诈虽然可以深藏于一时，但终有一天会露出它的原形；罪恶的勾当可以掩盖一时，最后总会被人识破它的真相。

庐山的这场斗争也是这样。

1、分歧的起点

1970 年 8 月 19 日，江青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她乘坐飞机，一块到九江，上庐山。积怨甚多的江青，几年来一直害怕有人利用她乘坐飞机的机会，把她害死。所以，她每次乘飞机外出，都要吴法宪为她作为人质保险。江青上飞机时对吴法宪说：

“飞机若是出事故，你也跑不脱，连你也摔死!”

吴法宪一边扶江青上扶梯，一边安慰她说：“你放心，我们不会同归于尽!”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目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夺各自宗派的权力。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狂热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们有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时为分赃火拼，在争夺国家领导权上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场争夺权利的斗争，在庐山不仅进一步表面化了，而且达到了高潮。

1970 年 3 月 8 日晚，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及在四届人大前夕先召开九届二中全会的指示。

汪东兴说：对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毛主席主张不设。毛泽东说：我主张不设为好，我是不愿当这个国家主席!

政治局听了传达以后，并没有就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展开讨论。当天晚上，政治局散会以后，叶群回家，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指示。

3 月 9 日下午，叶群打电话给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彪听了高兴得很。林彪说，他赞成设国家主席，还是要毛主席当我们的国家主席。过了两二天，叶群又当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讲，林彪亲自两次给主席那里打电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还是建议设国家主席好。党、人民、军队都希望毛主席当我们的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不设国家主席，人民也会提出来，要毛主席当我们的国家主席。

1970 年 3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甲的一些原则问题，

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批阅了这个请示。

3 月 17 日至 20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中央政治局通过宪法修改起草小组成立，康生为组长，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纪登奎、李作鹏、吴法宪等人。

宪法修改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会议室里进行的。会上，康生、张春桥提出宪法写多少条条，只搞三十至五十条。人大常委会只设主任委员，不设委员长，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还要把“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进宪法，把罢工也写进宪法。康生要大家考虑怎么写法，写什么，不写什么?会上，其他人忙着看资料，都没有发言。

会后，吴法宪立即打电话，向在北戴河的叶群报告了会议情况。叶群随即转报林彪。

林彪很生气地说：“不要听康生的!你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设委员长!宪法条文也不能少。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坚持毛主席是全军当然的统帅!”

林彪情绪显得很激动。叶群看到林彪犯病的样子，连声劝说：

“莫急嘛，莫急嘛，这么点事，看你气成啥样了!”

林彪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叶群的话，继续打机枪似地尖声吼叫着：“我们是个大党大国。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设国家主席能行吗?设国家主席名正言顺嘛!”林彪拉着长声说：“世界各国宪法都是有元首的，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元首?毛主席是我们当然的国家主席，为什么我国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呢?”

叶群把林彪的原话，转告给参加宪法起草小组的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再三嘱咐说：“林彪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你们可不能松口呵!”

林彪在叶群打完电话之后，仍然不放心。4 月 11 日这天深夜，尽管已经是夜十一点三十分了，林彪仍把秘书叫进卧室，口述着他向政治局正式提出的建议：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作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向毛泽东报告了林彪的建议。毛泽东当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在四月下旬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他引用三国

时的历史故事，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们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对林彪虽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林彪并不死心，他仍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

5 月中旬，林彪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2、吴胖子立了一功

林彪为什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呢?

1970 年 5 月上旬，黄永胜陪外宾到杭州会见毛泽东归来。吴法宪到飞机场接黄永胜，两个同坐在一辆车上。

黄永胜对吴法宪说：“现在有人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你们在修改宪法时，一定要坚持宪法草案上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并且说这是林彪亲自告他的。

六月的一天，林彪要叶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他最近看了世界各国的宪法资料，无论大小国家，无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国家，都设有国家元首、主席或总统。我们国家开国以来也设有国家主席，现在突然取消不好。世界人民会怀疑。我国党和军队，全国人民的心愿、感情也通不过。

林彪叫叶群转告吴法宪，在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时，要用这些意见说服康生、张春桥等人，坚持在宪法上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要陈伯达支持你们。

有一天，叶群再次对吴法宪说，要坚持写上国家主席这一条。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林彪身体差，林彪和毛主席相比，相差很远，拖不过毛主席。如果在最近几年不让副主席接班，那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吴法宪心里明白了：林彪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假，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如果宪法上写了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愿当，那不就是林彪当国家主席了吗？

1970 年 8 月 13 日下午，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里举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都来了。

康生、张春桥因为预先摸到了“气候”，知道毛泽东在审查九大报告时，曾亲自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中的三个副词。因此，讨论宪法时竟意外地提出，在序言部分把三个副词删去。

张春桥满有把握地说：“我估计，写上了，毛主席也会把它删掉!”“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说，这么说，赫鲁晓夫也发展了马列主义。”

吴法宪一听，高声嚷叫起来。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讲过这个话。毛主席什么时候讲过这话?对什么人讲的?在什么情况下讲的?我也不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提法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写的，是中央讨论通过的，并不是那个个人的。你们是中央同志，这样捅出去，往下传，让下面该怎么办哪?究竟以后还喊不喊，叫不叫，说不说这类话呵!现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吴法宪把听黄永胜讲的话，拿来移花接木，用来对付他们的竞争对手了。张春桥一言不发，一口口地喷着烟。

康生听吴法宪一说，又连声附和说：好，写上，写上!

吴法宪觉得自己捞到了稻草，他迫不及待地走到另一房间，把争论的情况用机要电话告诉了叶群和黄永胜。叶群立即转告林彪，并且马上把林彪的话，又在电话里告诉吴法宪。

叶群一字一板地鼓励吴法宪：首长说，胖子这回立了一功。胖子的意见很对，放了一炮，有功。今天，你抓住了张春桥了，抓得好哇!首长又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他是从那条阴沟里爬出来的。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会，持续到深夜一点钟。散会的时候，吴法宪在怀仁堂南门口，一直等到陈伯达出来。陈伯达问吴法宪：我出去接电话的时候，听到你们大声吵，吵什么哟?

吴法宪把争论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招呼吴法宪说：“你到我家去吧!”

3、陈伯达走钢绳

吴法宪跟着陈伯达到了他家。在一间满挂字画的幽静的客厅里，吴法宪向陈伯达详细述说了争论的内容和经过。

陈伯达说：“我支持你!你马上把这件事报告林彪去。”

吴法宪说：“我已经报告过了。”

陈伯达说：“还要马上报告总理。”接着又说：“康生没有什么了不起，张春桥是个小人物。”他贴近吴法宪的耳朵，低声说：“我希望林彪将来当总理。”

吴法宪一听，连忙解释道：“林彪不能当总理，他不是搞总理的人。林彪自己曾经说过，中国没有周总理不行。周总理这个职务，林彪是干不了的。他不是当总理的角色。”

吴法宪回到家，天已是大亮了。他一觉醒来，就给黄永胜打电话汇报同张春桥的争论。黄永胜一听，当即鼓励吴法宪说：“胖子，你干的好。我马上把李作鹏从青岛叫回来，支持你。你一个人太孤立了。”

8 月 15 日晚间，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讨论时，张春桥、姚文元一言不发。会上没有争论宪法草案，一条一条顺利通过了。

后来，周恩来问张春桥："你怎么不讲话呵?"

张春桥一笑："吴法宪那么厉害，下午把我训了一顿，我再讲，不又吵起来了。所以我干脆不讲。"

4、林彪突然袭击

8 月 20 日，林彪、叶群、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上了庐山。空军的"太上皇"林立果乔装"军委秘书"，随同林彪也上了山。他们为及时通报信息，专门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此外，还带了两架云雀直升飞机，在庐山随时待命。

21 日下午，陈伯达到林彪住处谈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到林彪、叶群住处，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将近黄昏的时候，叶群提议冒雨去逛仙人洞。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在洞前"合影留念"。这天，黄永胜因为留在北京看家，暂时未上庐山。

22 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参加。会议气氛和气而平静。毛泽东在开场讲话中一再重复说：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继续贯彻他在"九大"讲话时精神。

周恩来在会上谈了关于会议三项议程的安排问题。

林彪又一次提出关于要在宪法上写出国家主席的条文，当场遭到毛泽东的否定。林彪尽管很不高兴，也没有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的问题。

23 日上午，陈伯达又到了林彪住处密谈。

1970 年 8 月 23 日下午 3 时，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 155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0 人。

周恩来在会上讲了会议的安排，宣布了三项议程是：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由康生讲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经过。

临到开会，林彪在庐山礼堂休息厅的走廊上，遇到毛主席，突然提出他要讲话。

林彪讲话中，首先称赞了宪法草案怎么好，肯定了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最高统帅"地位，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个宪法简短明了，只有三十条。林彪讲了四五个好处。他说："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

接着，林彪抛开原定的讲话提纲，一下子把话题转到"天才论"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人提出来，不要在宪法中写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去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

副词，我是不赞成的。说到这里，他故意提高了嗓门。

林彪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又说：“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毛主席自己的勤奋努力，他的学习、革命实践，那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天才在内。天才论我始终坚持，我始终坚信这一条。”林彪又说：“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继续讲下去，说，有人不同意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他说：“同志们，中央的同志，不要把这话往下捅，不要捅到群众里面去，将来不好解释。”

林彪意外的突然讲话，打乱了会议的议程。散会时还有一些同志走过来同林彪握手，表示对他讲话的称赞和高兴。

5、金鱼的故事

在散会回住处的林荫路上，叶群兴致冲冲，一边走，一边对同行的陈伯达等人说，林彪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人物的不点名的点名，讲得很好，讲得很得体，讲得很策略。叶群还对秘书说，首长是在临开会前，同主席谈话的。她在走廊上散步，防止 11 楼(指江青)闯进去。

陈伯达对林彪忽然抢先讲话，感到很突然。感到“态度完全反常”，讲起来东拉西扯，“语无伦次”。

“散会以后，我本来应该直接到毛主席处，提出对林彪发言的疑问之处。”对此，1980年 8 月 11 日，陈伯达交待说：“但我没有这样做，却匆匆赶去问林彪本人，问他的发言，是否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了假话，诓骗了我。我愚蠢至极，竟深信不疑。”

事实正是这样。23 日傍晚，在林彪突然讲话之后，陈伯达一个人沿着石板路，来到林彪、叶群的住处。

陈伯达坐进竹椅后，单刀直入地问林彪：你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

林彪说：开会之前，同毛主席谈过。

陈伯达摸了底，从林彪那里出来，特地绕过几座楼房，来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住地。几个人情投意合，又说又笑。当话题转向江青的时候，陈伯达津津有味地讲起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陈伯达说：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写过一篇叙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故事说，有个贪心的老太婆，最初，先要渔夫向金鱼要一个木盆，金鱼给她木盆；接着，她又向金鱼提出，要当一个有钱有势的贵妇人，金鱼给她当了贵妇人。那知老太婆仍不满足，又向金鱼提出，

要当一个自由自在的女皇。后来，老太婆果然当了女皇。可是，她当了女皇之后，又要想当海上的女霸王……金鱼见她野心永远满足不了，尾巴一摆，游进了大海。结果，摆在老太婆眼前的还是那个破旧的木盆。

故事讲完，陈伯达似笑不笑地说："你们看，江青像不像那个老太婆?江青就是那个想当海霸王的老太婆!"

三位听得入神，连声称赞陈伯达："说的对，江青就是那个想当海霸王的老太婆!"

这时，邱会作向陈伯达提出，请他给找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关"天才"的语录，以便配合学习讨论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讲话。

陈伯达劲头十足地说："马、恩、列、斯都有天才论的说法。"

6、"秘密武器"

陈伯达兴奋地跨着大步，走回住地。

陈伯达一进屋，立刻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搬来几本精装马列著作，分头为他查抄马、恩、列有关"天才"问题的论述。他激动得似乎忘了一切，每找到一条有关天才的语录，马上亲自笔录，然后又亲自打电话，一字一句地转告给邱会作。

邱会作也把身边的人员动员起来，紧张地抄录抄写着，并且立即用电话向李作鹏、吴法宪传达。

邱会作给吴法宪打电话："胖子，这七条'天才论'语录，可是有力的武器呀!"

"天才论"语录，变成"秘密武器"，一夜之间，在庐山与会人员中流传开来。其中有恩格斯的一条，列宁的五条、毛泽东的一条。

例如：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列宁称赞："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列宁在《预言》一文中，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

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8 月 23 日晚上，政治局开扩大会议。中央、国务院和省市负责同志参加了，共约三四十人。

会上，吴法宪首先建议，要会议讨论林彪的讲话。当时，有几个人附合，康生表情不高兴。张春桥也不高兴。他们心中有底，知道林彪是对着他们来的。

讨论的时候，大家纷纷表态说，林彪讲得很好，抓住了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核心问题。

吴法宪坐在叶群旁边。伏在叶群耳朵上说："今晚你们来迟了，讨论林彪讲话是我提议的。"

散了会，叶群马上向林彪汇报了讨论情况。她随即拿起电话，兴致勃勃地对吴法宪说："林彪听了很高兴。他说，你胖子又立了一功!"

8 月 24 日上午七时，叶群一大早就来到吴法宪的房子里，同等候在这里的吴法宪、李作鹏谈话。

叶群说："林彪要我转告四条意见：一、讨论时无论如何不要点名字，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二、不要联系康生；三、坚持"天才论"；四、要坚持在宪法草案上写进设国家主席。"

叶群要他们几个人，采取适当的方式，把这四条告诉本单位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叶群还指定吴法宪在会上争取先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叶群再三嘱托说："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要有感情，用我们的热烈，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接着，她又说："林彪的讲话是大是大非问题，要表态，要宣读语录。"

果然，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统一布置，同时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的小组会上，一齐发动了"攻势"，支持林彪的讲话。

7、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8 月 24 日下午，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他吹捧林彪，说林彪怎么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怎么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怎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可是现在偏偏有人说，不要再提"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了"。

"谁!是谁讲的!是谁不叫这么提了!"小组会上顿时嚷成一片。

"你们不要问名字!"吴法宪故意卖弄玄虚："你们不要查了，不能讲名字，我不能说!"

华北组开会，陈伯达一马当先，直指张春桥。他嘶哑着嗓子说："现在竟然有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是经过很多斗争的。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他的闽南口音太重，许多人听不懂，他又怪声怪气地说：吴法宪说过，有人拿毛主席的

伟大谦虚的话，来贬低毛泽东思想，讲的很好。

会场马上哄起来了。“谁要贬低毛泽东思想，谁要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汪东兴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建意宪法恢复“国家主席”的章节。

吴法宪在西南组为表示自己对主席的“感情”，故意挤出几滴眼泪，手握拳头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他两手握拳说：“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泽东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

在中南组会议上，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和叶群同在中南组的李作鹏，紧跟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按照事前的串联，在西北组也发了言：“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会议的温度越来越高。当天晚上，邱会作在庐山给在北京的黄永胜打电话说：“现在可热闹了，都动起来了。”

黄永胜回话说：“我知道了，吴法宪来过电话。”

叶群深夜也打电话向黄永胜报告庐山的情况：现在有几个人跳出来，让他们好好表演!

黄永胜在北京坐不住了。他立即打电话给庐山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给他起草“天才论”的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

25 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出笼了。简报刊载，华北组一致通过决议，坚持设国家主席。

林彪让秘书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念了一遍，接着又叫再念一遍。简报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听后大笑：“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个个更加来劲了。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中南组准备仿效华北组，希望吴法宪所在的西南组，也能仿效华北组的办法，通过决议拥护设立国家主席。

吴法宪在会上一讲，大家举手表决，一致鼓掌，通过决议，要求设国家主席。他并且把记录人员找来，说：“我们组简报温度不够，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

李作鹏手里提着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对前来看他的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组局面不行!”

分组讨论的热烈气氛，感染了林彪。8 月 24 日深夜，他得意地对叶群说：

总起来说，这次分组讨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几个人的发言都不错。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一些。

林彪还夸奖叶群说：你在分组会上的发言不错!水平有很大提高，看来你近来学习了不少东西。，坐在一边的儿子林立果，故作冷静地说：不过也要看到，有的人还留着一手，如果风向一变，就会溜之大吉。

林彪点点头，表示称赞：“嗯，你说下去!”

林立果谈到 24 日晚上，李作鹏写给叶群的一封信。原信写道：“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的问题，似可以发，请您过目。致(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林立果说：“李作鹏给主任的条子，我看不光是为我们着想，也是为他自己留退路。”

林彪笑着夸奖说：老虎近来也长进了。你能注意这些很好，不过你还要懂得，这不奇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有不为自己考虑的!所以，重要的是要学会利用人的这种天性!

叶群连忙附和说：“可不是吗?有奶便是娘，谁都一样。有权就有一切。万一我们丢了权，垮了台，照样树倒猢狲散!”

叶群的预言，第二天就证实了。

8、“翻车了，倒大霉了”

8 月 25 日中午，叶群突然打电话告吴法宪：

“吴司令，有个情况告诉你，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这天中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毛泽东住处。这处傍山峦建的新居，背后靠

着壁立的山峰，从脚到顶，全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连绵起伏的峰峦，披挂着缕缕白云，波浪似地滚动在山峰之间。院前，公路外边是新修的水库。无数的溪流，穿过峡谷，汇聚在这里，白茫茫的水面，在炎日下闪闪发光。

毛泽东仔细看着江青送来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不等毛泽东开口，江青连忙插嘴说：他们这样搞，要哄起来了，要揪人了，华北组要揪张春桥、姚文元!

毛泽东说：不要揪人，不然就会分裂!

张春桥、姚文元又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有关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通知暂停召开小组会。同时，决定召开常委会议，并吸收各大区的组长参加会议。

8 月 25 日下午，毛主席在住地召开党中央常委会议。

林彪接到通知，马上坐车走了。叶群立刻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在常委会上，毛主席谈到了华北组的简报，谈到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有人说我一句顶一万句，谁说的?能相信吗?实际上我的话不算数。比如，不设国家主席和天才问题，我的话半句也不顶用。如果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两次，该顶两万句，那就没有这回事了嘛!说明还是不顶事。陈伯达才一句顶一万句呢!"

"大树特树，究竟树谁呢?名曰树我，实际上树何人?我那几本书被他们吹得神乎其神。他们还把我放在街头，零上几十度，热得要死，零下几十度，冻得要死。他们在家里睡觉，叫我在街上站着，好不残忍!"

对毛泽东的批评，陈伯达听不进去。他仍然执迷不悟地说："我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听到陈伯达的话，毛泽东越发生气了。"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说着，毛泽东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也劝你，不要当这个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且责令陈伯达检讨。

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地，他那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他马上把叶群叫进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叶群神色紧张地跑出来，对秘书说："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

叶群又急忙指使办公厅人员，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她在分组会上的发言记录。

吴法宪到西南组开会。看到组长张国华不在，就问副组长谭甫仁，组长到哪里去了?谭甫仁告诉他，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不久，组长开会回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

情况，说要立即收回六号简报。

吴法宪吓得目瞪口呆，身上直冒冷汗。十年后，他在自己的供词中写道：“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错误了。”

形势的突然变化，仿佛向林彪一伙投下了炸弹。为掩盖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和阴谋，他们慌忙销毁材料。

吴法宪给邱会作打电话，问他的发言简报发了没有?

邱会作说：“还没有发。”

吴法宪说：“情况有变，不要发了。”

听到风声的邱会作，早就将他的发言简报压下来了。当他要求记录人员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他的发言记录时，遭到了拒绝。

8 月 25 日晚上，在北京的黄永胜，一听到风声，急得像热锅蚂蚁，一连多次打电话到庐山。吴法宪因为自己也很紧张，没有接黄的电话。直到 26 日凌晨，吴法宪才把毛泽东的指示告诉黄永胜。黄永胜要他告诉工作人员，赶快把他自己准备的发言稿烧了，把“天才”语录也烧了。

黄永胜问吴法宪，形势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快?吴法宪说：江青带张春桥、姚文元到主席那里告状求救啦!

林立果气急败坏地对林彪秘书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9、舍车马，保将帅

陈伯达在 25 日下午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当众受到毛主席批评。他胆战心惊地回到住处，心里更加惊慌了。他几乎一夜没有闭眼。

26 日一早，陈伯达去求见毛主席了。他渴望毛泽东在他危机的时刻，能够解救他，宽恕他。

毛泽东同他握手时，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不看我了。”

毛主席严肃地批评陈伯达：“你怎么参加了‘军事俱乐部’?你为什么许久不找我谈话?你官做大了，架子大了，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叫别人去写……”

陈伯达表示要作自我检讨，并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告别时，毛主席同他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陈伯达离开毛主席住处，径直向江青住地走来。这时，他发现张春桥、姚文元早在那里了。

江青一见他，故意用嘲笑的口吻说："稀客!稀客!"她两眼盯着陈伯达那满是羞惭的脸孔，气势汹汹地骂起来："你们名义上是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推翻林副主席!我卑视你!我卑视你!"

接着，她疯子似的扑向陈伯达，要撕陈伯达军服的领章、帽徽。逼着陈伯达当场写下认罪书，要他承认他是"罪上加罪"。

张春桥接过话头："你为什么不找毛主席?你借口秘书不好联系，有什么不好联系的?"

姚文元也跟着责骂陈伯达，说过去为一件什么事，陈伯达让他坐等了好久。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轮番把他骂了一遍。陈伯达低着头，嘴唇直发抖，说不出话来。

28 日下午，陈伯达又悄悄找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分懊丧地对他们说："毛主席严厉批评我参加了你们的军事俱乐部。从现在起，我们之间不要来往了，我给你们的语录，今后不要用了。'天才论'不要再讲了，把天才语录也都烧了吧!"陈伯达又说："我到江青、康生那里都挨了骂。康生说，你把林彪绑在你们的战车上，把吴法宪的话，当作语录用。"

26 日、27 日，周恩来总理、康生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29 日，西南、华北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吴法宪的错误。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写检讨。

吴法宪去找林彪，一进门就问："总理要我作检讨，怎么办?"

林彪说："你不要作检讨，你没有错，做什么检讨!""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文斗斗不过人家。"

8 月 30 日下午，周恩来把吴法宪送的"语录"当即送给毛泽东。8 月 31 日，毛泽东在这份陈伯达搞的"天才"论语录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文中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写道："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

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天才问题，有没有天才的问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不是天才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天才问题却成了政治问题。毛泽东抓住有关天才的“语录”，当作投向对方的石头，把林彪、陈伯达压了下去。

9 月 1 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体中央委员人手一册。

林彪意识到陈伯达的政治生命就要完了。他决定把陈伯达推出去。

当日下午，林彪把刚从北京来到庐山的黄永胜以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召在一起开会。他批评吴法宪：“你没有核实情况，就报告我，引起我生气，就在会上讲了话。”

林彪说的“没有核实情况”这件事，指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九大”报告和党章的原稿时，亲自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中的三个副词。

林彪还说：陈伯达不好，要同他划清界限。

林彪话刚落音，陈伯达走进了开小会的会客室。几个人争相发言，批判陈伯达。有些事本来是吴法宪等人主动串连陈伯达的，但会上只说陈伯达的华北组发言影响了我们。这个会，只开了一个多小时，借机保林彪一伙，而把陈伯达甩出去。

李作鹏说：“林彪这样做，是很高明的一着。”

9 月 1 日晚上，林彪主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

讨论开始，吴法宪发言时，本来计划先检讨自己，但叶群、黄永胜不断给他递条子，要他先揭发陈伯达。这一下，打断了吴法宪的思路。

他对陈伯达和他们之间的串联活动，一字也未涉及。他害怕一触及，就会把林彪一伙人之间的全部阴谋暴露于天下。

纸包不住火

纸包不住火。林彪一伙同江青、张春桥之间，争夺“接班人”的“狗咬狗”的斗争，继续进行着。

林彪一伙导演的夺权丑剧，在庐山进行了两天半，就因暂时失利而退却了。

林彪气恼地对给他读文件的秘书说：“军队的老干部是炮筒子，说话走火，本来是好事，给他们弄糟了”。

叶群装病躺在床上。她原是国民党少将叶琦的小姐，原名叶宜敬。1937 年，在国民党电台当过几天播音员，后来，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1938 年卷入抗日的洪流，跑到延安革命圣地，在女子大学里学习。1942 年，同林彪结婚。“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丈夫成了副统帅，她青云直上，兼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当了政治局委员，成为军队的一位“皇后”。如今，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当她准备登上“第一夫人”的皇位时，突然发生地震了，幻想破灭了。

第二十二章 庐山风云续曲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从发迹走向没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从高峰跌入了深渊。

1、开始了审查

1970 年 9 月 7 日天刚微亮，林彪、叶群乘车下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尾随其后，到九江机场送行。

送林彪飞北戴河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当即登上另一架飞机回北京。

9 月 11 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灯火辉煌。周恩来神态安详地听着吴法宪的交代和检讨，偶尔插进一些问话。吴法宪谈到他和陈伯达的一次谈话，周恩来问他：“在庐山为什么不揭发呢?”

吴法宪没有想到总理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他，脸色吓得雪白，声音颤抖地说：“这是我有意隐瞒错误。”

周恩来接着追问李作鹏、邱会作。他俩都说：什么也不知道。

周恩来最后问到黄永胜：“你知道吴法宪和陈伯达的谈话吗?”

黄永胜假惺惺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几个人在庐山犯错误我有责任，办事组长没有当好。”

12 日晚，周恩来、康生继续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批评。周恩来说：“毛主席批评你们有宗派主义。黄永胜是一个头，你们几个人，在军委办事组，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想你们之间的活动，会前有什么准备，必须向党中央、毛主席讲清楚。”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按次序轮流表态：没有什么不正当的活动，山上山下没有联系，会前会中没有联系。

叶群听说吴法宪正在写检讨，一连多次打电话安慰："胖子，您不要着急呀!首长(指林彪)沉着得很，每天照样睡大觉，若无其事，你还着什么急呀!"接着又说："毛主席在庐山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人还要看两年。过两年就交班给林彪。你的靠山大得很，不用你操心!"

惊弓之鸟

1970年10月，国庆节刚过，林彪从毛家湾打电话到中南海，要求看望毛泽东。

从中南海回来，林彪特地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当面指点他说："我去见了主席，看样子，你要当面去向主席检讨。一方面，你争取主动，把错误的来龙去脉，当面向主席讲清楚，帮助主席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你又不要涉及别人，不涉及黄、李、邱、叶群。你还要搞好团结，尊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林彪特别嘱咐吴法宪："不要因你一个人犯错误而牵连别人。不注意，一个人垮台，会倒一大片哩!"

吴法宪写了"检讨"。10月14日，毛泽东在"检讨"上批示："作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他所指的"个别同志"，就是林彪。

10月12日，叶群也写了"检讨"。

10月15日，毛泽东看后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接着又写了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当叶群写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毛泽东驳斥了叶群所说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批评叶群："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1月13日，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黄永胜：你黄永胜是总参谋长，是个头儿。你一天到晚不抓大事，只抓小事，不参不谋，路线问题、团结问题，你就抓不住。什么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长!

2、“批陈整风”运动

1970 年 11 月 1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人，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指出，“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党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所谓“批陈整风”，即结合批判陈伯达，教育全党干部，整顿思想作风，提高思想认识。

为提高广大干部对“批陈整风”的认识，毛泽东在 11 月 6 日批阅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

根据这个精神，《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对唯心论的思想进行批判。当时，批判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党内外都知道是指陈伯达。这个“小小老百姓”，实为“大大野心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毛泽东为从理论上武装干部，一再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971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在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里写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公开批评林彪，最尖锐的一次，是 1970 年 12 月 18 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个人崇拜”; 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 Teacher，就是教员。”

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

谈到个人崇拜，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3、挖墙脚、掺沙子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采取种种措施削弱和限制林彪集团的力量。后来，他把这些办法，概括为："甩石头"(即写批示发下去)，"掺沙子"(派干部到林彪控制的机构)，"挖墙角"(即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

1970年12月10日，北京军区38军党委写了《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央。报告指控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到处阴阳怪气地讲话，支一派，压一派，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12月16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根据这个批示，1970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到会有北京军区机关和河北、山西、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共340多人。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大家在会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会议文件既有正确的揭发批判，也有违反事实的不实之词。

会议在对陈伯达的揭发里，也株连了一些同志。例如，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并被撤销了职务。后来，事实证明此事属于错案，并予以改正。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讲话。他宣布了党中央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这次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目的在进一步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影响。

1971年1月26日，对陈伯达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了。联系陈伯达的历史，中央向全党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这个材料，有的是事实，有些不符合事实，有些是陈伯达自己在历史上交待过的问题。陈伯达的真正罪行，是后来在人民法庭判决书上列举的材料。

1971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对计划会议的指示里写道："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1971年2月20日，军委办事组针对毛泽东的批评，就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如下："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1971年3月30日，毛泽东又对刘子厚在3月19日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的检查上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会议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 3

月 19 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4、“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

1971 年 3 月 24 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里加了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 1931 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陈伯达是怎样一个反动人物?

陈伯达，1904 年生，福建省惠安县岭头村人。他曾祖父是清朝举人，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私塾先生。陈伯达自己说，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穷秀才之家”。陈伯达在三兄妹之中，是唯一的读书人，排行第二。陈伯达本名叫陈声训，伯达是 1934 年采用的笔名，一直沿用了下来。

陈伯达 1925 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1927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到莫斯科留学。1931 年 4 月 8 日在天津被捕，同年 9 月转入北京草岚子监狱。1932 年 2 月写了悔过书，向敌人办了手续。出狱后于 1934 年恢复党的关系。1935 年，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林枫为秘书长时，陈伯达为北方局宣传部长。在党内同李葆华、柯庆施等领导了北京“一二•九”运动。

1937 年初，陈伯达一度被任命为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参与主持北平市委的工作。

1937 年 7 月，陈伯达携带妻子到了延安，在党中央机关作研究工作，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等职。曾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著作，是党内著名的“秀才”之一。1945 年“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以后，中央部分机关转移到黄河以东。他和康生在山西省晋西北一带进行土地改革的试验，提出许多左的错误口号，“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做法扩大到不少地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

1956 年 9 月，陈伯达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8 年，陈伯达主张人民公社要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一年，陈伯达担任新创刊的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政治局委员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一块，奉毛泽东之命到“两年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去考察。因为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经济”，主张“取消货币”，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1967 年初，政治局常委陶铸被打倒，陈伯达成了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响当当的“理论家”。

5、“死都死在一起”

“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读了毛泽东的 1971 年 3 月 15 日批语，当着女儿的面，冷笑地说：“读马列的书，是为了整军队老干部，整大老粗。”接着又说：“现在不让说天才，实际上就是有天才。我自己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脑袋生的好。这是爹妈生的，也没办法。人与人不一样，就在这上边。”

1971 年 4 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派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参加被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进行“掺沙子。”

1971 年 4 月 15 日至 29 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 99 人参加。

住在苏州别墅里的叶群，4 月 13 日打电话给吴法宪，向他交底：“林彪让我转告你，他说，他是愿意同黄、吴、李、邱死都死在一起的。林彪还说，你吴法宪在会上把林彪捅出来，我相信你还不敢，但搞得不好，口不紧，把我(叶群)捅出来，是完全可能的。”

叶群接着又说：“你要知道，我和林彪是分不开的。我在庐山就告诉你，大锅有饭，小锅好办，你要记住这句话!”

叶群再三叮咛，要黄、李、邱三人帮助吴法宪“把关”。

吴法宪表示：“请你们放心!”

“四员大将”立即开会，最后共同议论了几条对策：一、四个人都不要到京西宾馆，都不去见省(市)各军的人，避免说去搞活动；二、在批陈会上，不早到，不晚退，多听少说，带着一双耳朵，一包香烟，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抽烟，喝茶，做记录；三、把人家提出来的问题，记下来，不要有问必答。想好以后，写稿子，照着念，以免说漏嘴；四、会上情况，要随时相互通气。

汇报会开始以后，会上，有两个同志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串连的情况。林彪、叶群一听说，在苏州再也呆不住了。

4 月 19 日，两人特地从苏州飞回北京，目的是“回来坐镇北京，必要时再说话”。

林彪心里很清楚，“批陈整风”中的“批陈”，实质上就是批林彪。所以，他做贼心虚，特别害怕。

4 月 29 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也在会上做了检讨。李作鹏惊恐地说：“这一下全捆在一起了。越检讨，捆得越紧，越被动。”

一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到自己的住地开会。

毛泽东对吴法宪说：你吴法宪，从前多次要找我谈话，我不愿意，今天一块谈。你们三个人的检讨写得很好。你要再写个检讨，要叶群也再写个检讨。

谈到错误，毛泽东批评说：你们主要没有调查研究，三个副词是我抠了的。

康生接过去，又重复了一句：主席讲了嘛，你们主要是没有调查研究。

6、“五一”节晚上

在北戴河，林彪看到了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当他看到：“什么四个伟大，讨嫌!”的时候，十分恼火。他猛地把文件摔在地上，猛力按下电铃，喊警卫参谋：“回北京去，明天就回北京去!”

吴法宪很快派来了专机，接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

“五一”节晚，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林彪不愿意出席。叶群再三苦苦恳求他一定要出席。最后林彪答应去五分钟就归来!

林彪、叶群登上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城楼。林彪根本无心观看焰火。他只同毛泽东打了个招呼，匆匆应付几句话，摄影记者还未来得及给“最亲密的战友”照相，就急急忙忙走下天安门了。

叶群为了掩饰这种很反常的情况，一回到家里，马上就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打电话，通报情况。

叶群说：“林彪同主席谈得很好，毛主席批评你们几个，对林彪帮忙不怎么高明。”

叶群又补充说：“谈话时，我就站在主席身边，我连忙解释说，是帮了倒忙!”她再次安慰“四大金刚”：“别的没有什么事，你们放心好了!”

叶群对黄永胜一伙说：“大家要团结在一起，林彪是绝对信任我们的，不论到什么时候，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们死都死在一起!”

邱会作当场向叶群表态：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忘恩负义的，林彪保了我们，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要是江青把我们打下去，送到农场劳动，我们也会给林彪养几只老母鸡!

7、到北戴河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带着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于1971年8月15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关于解抉“四大金刚”问题的指示。

这天晚上，专机到达北戴河，大家很疲劳，马上就休息了。

周恩来住在山前那座毛泽东的别墅里。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同住在绿林丛中的一座别墅大楼内，一人一间房子。黄永胜则住在另一座小楼上。

8 月 16 日上午，周恩来及其一行，乘车沿着北戴河海滨公路，爬上弯弯曲曲的山间柏油路，穿过密密层层的松林，走进莲花峰山腰的林彪别墅 96 号楼。

这是一座工字形的灰色两层楼房。楼的东西两头，是林彪、叶群各自的卧室、办公室和室内车库。楼的中间是宽敞的走廊和服务人员住室。

林彪住在楼东头的卧室里。这位怕水、怕风、怕光的"怪人"，像在北京毛家湾一样，把卧室装修得像一座密封的墓穴。窗帘严严实实地遮罩着窗口，室外虽有灿烂的阳光，室内却阴暗得难辨五指。为了测量外面是否会刮进风来，窗户专门挂着两米长的纸条子，发现纸条摆动，赶快把风口封住。他还在床头的屏风上，贴满大大小小的字纸，上面写着吃什么出汗，吃什么不通大便。温度计旁边，挂着穿几件衣服是多少体温的说明。为防止着凉，他不接触凉的东西，连电灯开关都被裹上纱布。林彪常常是坐在沙发里，半睁半闭着眼睛，陷进无穷无尽的沉思……

工作人员向林彪连续报告了三次：总理来了!

在叶群的陪同下，林彪身上穿着几层厚厚的衣服，头上包着一块大围巾，来到了会客室。

几句寒暄之后，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汇报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纪登奎汇报了关于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概况；黄永胜汇报军事情况：李德生汇报关于政治情况等问题。

最后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十一"前后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正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林彪听汇报后，接着，他对战备工作讲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他对于毛泽东关于批评"四大金刚"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调查研究"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谈到庐山的那场斗争，林彪对黄永胜、吴法宪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批判陈伯达，这一下把你们几个都带出来了。陈伯达一拖，把你们几个都拖出来了。"

8、南方巡视

1971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从武汉到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沿途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就庐山会议及其形势作了指示。

毛泽东在谈到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时，曾这样说过："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

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1972 年 3 月 18 日，中央办公厅印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中，关于庐山会议及林彪、陈伯达问题，有如下记述：

“1970 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笔者注：指林彪、陈伯达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 8 月 23、24 到 25 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 1918 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谈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笔者注：毛泽东曾把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及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的斗争称为党内“九次路线斗争”)。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

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 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 700 字的文件(笔者注：即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以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毛泽东的谈话，为深入“批陈整风”运动指出了方向。而他在谈话中指明的“陈伯达后边还有人”，林彪“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林还是要保”，“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等等，在林彪一伙中引起极大的惊慌和震动。

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千方百计地探听到毛泽东讲话的内容。9 月 6 日凌晨，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把毛泽东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密告给李作鹏以后，李作鹏又立即转报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又密报叶群。林彪十分恐慌，开始了谋害毛泽东的罪恶活动。

9、押“第四号人物”上最高法庭

陈伯达从庐山回到北京，郁闷地回了家。

陈伯达曾多次在电话里求见毛泽东、康生，但是都被拒绝了。只有给周恩来打电话时，周恩来亲自接了。

1971 年，“9·13”林彪叛逃后，公安部门立即将陈伯达连夜从家中押往秦城监狱。走到监狱门口时，陈伯达不愿进去，就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阜平，即河北省阜平县。1948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从晋绥边区兴县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告密，国民党空军派轰炸机袭击。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忙于办公，怎么也不走。

陈伯达听到飞机轰响，就朝毛泽东住地跑。高喊：“飞机来啦!飞机来啦!”跑进屋里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位同志也赶来，将毛泽东扶进防空洞。

就在毛泽东刚离开的当儿，一颗炸弹落下，正命中毛泽东的院子，把房子炸塌了。

23 年后，陈伯达为救自己，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这句话。

陈伯达的喊话，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在监狱里受到优待，如他自己所说，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

1978 年，陈伯达因病住进北京某公安医院单间病室。

1980 年 11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开始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陈伯达的审判。笔者参加法庭采访，目击了这次审判。

76 岁的“文革”“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穿着中式棉袄，外罩一件旧卡其军服，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被两个法警拥扶着走上法庭。他面对出庭人员的目光，默默地低下头。

法庭审判了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批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罪行。

陈伯达一手制造的“冀东冤案”，更是触目惊心。

1967 年 12 月 25 日，陈伯达到达河北唐山，解决唐山问题。当天晚上，他听了唐山造反派三个小时的汇报，第二天就在唐山地区各县、市的代表团及驻军代表大会上大放厥词，胡说八道。他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他还点了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女市长白芸等人的名，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

审判员宣读了陈伯达当时在唐山的讲话，问：“现在我问你，1967 年 12 月 26 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陈伯达答：“我刚才说过了，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这些话无非是瞎说而已。但是经过我说的，我负责任，我没有推托这件事的责任。”

法庭当即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录音播放后，陈伯达说：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审判是认真的，我这么一个糊涂蛋，到了这么一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也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及时的各方面的询问，就这么乱说一通……

陈伯达又说：“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多人呢。2000 多人的命呀 18 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用心，完全没有表示……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笔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当然是大罪了，罪是很大的。”

法庭接着宣读邢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 1980 年 8 月 1 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 年 12 月 26 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 20 年，方飞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 1604 人，涉及到中央 29 个部门和 24 个省市，被定为和列名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 737 人……唐山地、市两级遭迫害的干部群众达 8．4 万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 2955 人，致残的 763 人。”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 1980 年 9 月 29 日的证言，他陈述了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

接着，法庭又审问了陈伯达迫害陆定一、制造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发生在 1967 年 10 月 8 日这天的后半夜，即 10 月 9 日凌晨。天津市的一位煤球工人，来到北京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 80 多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于同年 11 月 20 日即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

陈伯达接见专案人员时，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专案人员随即按他们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甚至坐“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于 1968 年 12 月追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审陈伯达的另一主要罪行，是关于 1966 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问题。

在开庭之前，陈伯达得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出他炮制《横扫》社论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时，就惊慌地说：“坏了，坏了，算这个账，把我杀头算了，枪毙我也不反对，可能也太便宜了。”

陈伯达在第三天法庭发言时，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 18 年。”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从 1970 年 10 月 18 日软禁之日算起。1981 年 8 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政府为便于照料他的生活，批准他的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从石家庄来北京，同陈伯达住在一座新楼的一套房间里，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

1988 年 10 月 17 日，陈伯达刑满释放。

1989 年 9 月 20 日中午，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时年 85 岁。

第二十三章 林家王室的覆灭

1、周恩来："'9·13'事件不是偶然的"

京西宾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举行高级干部会议的地方。1973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空军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也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是林彪叛逃以后，空军党委首次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通过两个月"揭、批、查"，基本弄清楚了同反革命联合舰队有关联的人与事。笔者奉命采访会议，这对笔者了解林彪叛逃前后的情况，极为有益。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等参加了会议。

1973 年 5 月 15 日，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同志汇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会议总结。当穿着浅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周恩来的讲话，从夜里十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 16 日凌晨三点。他以超人的精力，智慧的哲理，深刻的分析，高昂清亮的声音，详细阐述着"9·13"事件的经过和教训，并且一再强调，在处理清查有关的人与事时，一定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笔者坐在主席台下的东侧，仔细地纪录了周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说："空军这次会议是一次搞好内部的会议。林彪抓空军搞了许多阴谋活动，主席一直注意着各种势态的发展，感觉到林彪的思想不对头。"

接着，周恩来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到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反党阴谋暴露，列举事实说明"主席还是在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周恩来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对主席更加仇恨了，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

这时，他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用炯炯目光，从右到左注视着全场，接着，他连续讲到毛泽东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和叶群、林立果等人的批评，以及批陈整风会期间，"挖墙脚、掺沙子"的紧急措施，并且谈到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搞"571"的罪恶活动。周恩来特别提到江腾蛟，说他是"空军的阴谋家，是摇羽毛扇的人物，是个小丑，是个像三国蒋干那样的人物"。

周恩来回忆到 1971 年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观礼时的情况："五一节晚上，林彪上去只呆了五分钟。过去每次去天安门，他都是紧跟，拿着语录，紧跟毛主席后面，从东到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这次他不跟了，对主席恨极了!"

"这天，他本来是不愿意来的，叶群哭着在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你要是不去，咱们一家人都得死了!''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重嘛。'林彪答应只来五分钟。"

周恩来说："林彪对毛主席是仇恨的，他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只要有土壤，他就酝酿一次阴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林彪的叛逃是逐渐演变的、发展的。'9·13'事件不是偶然的。"

周恩来又回忆到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1 点钟，接到吴法宪报告时的情景："吴法宪打电话问我，256 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了，要不要拦截?打不打?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全国人民的'副统帅'，我怎么下这个命令?"

周恩来右手放在胸前，高高地举起左手，用犀利的目光扫过会场，问在场的空军高级指挥员们："如果我下命令，你们打不打?除非毛主席直接给你们下命令，对你们说。当时也说不清楚呵!有些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责怪下级，叫下级负责不行!教训当然是有的，责备空军党委。空军党委八个常委，有四个是死党……有事情，空军党委比我们早知道，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两个一切'，林立果当作战部部长、空军办公室副主任等都不向中央报告，也不向总政治部备案。我就不知道这个名字，只知道他叫小老虎……"

谈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严肃地说："空军党委不仅犯了政治路线错误，而且也犯了组织路线错误，违背了党性。党委的职责，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不问一个为什么，就会上当。"

周恩来要求新成立的空军党委在清查林彪的人与事时，要实事求是，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周恩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林彪叛逃只带走两样东西，一件是讲用报告，一件是空军大院的第一号出入证。他的文件全部没有带走，什么都可以清查……"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空军的活动，系统地进行了清查。

笔者在林彪住的毛家湾还看到一些物证，说明他怎样在"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里，堕落成阴谋杀害伟大领袖的罪人!

这要从"老虎出洞"写起。

2、"老虎"出洞

林彪一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林彪同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小琳在动乱初起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一派红卫兵组织。叶群假借林彪名义，写了一封信，在社会上广为散布，宣布开除小琳的"家"籍。同林彪、叶群生活在一起的，只有女儿豆豆(林立衡)和儿子老虎(林立果)。

在林彪看来，这两个孩子，是他的一对"眼珠子"。当叶群向他建议，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孩子们自己去"闯闯""锻炼锻炼"的时候，林彪想了想说："放到空军，我放心。"

林彪竭力把儿子林立果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林立果 1945 年生人，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1967 年 3 月参军时 22 岁。

就是这个浓眉大眼，看来有点呆头呆脑的年轻人，后来变成了谋杀毛主席的反革命“联合舰队”“司令”了。

“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入伍不到四个月，就由吴法宪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他入党以前，已经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了。

林立果以秘书为名，参与了军机大事。他不仅可以看到党内、军内的高级机密文件，而且参加“拉条子”，为林彪起草 1967 年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

林立果在林彪的授意下，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这篇由周宇驰、刘沛丰代为起草，经过陈伯达、关锋修改的文章，用通栏大标题，发表在 1967 年 7 月 22 日《解放军报》一版。《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立即转载，进一步为大张旗鼓地夺权吹响进军号。

林彪为了给儿子晋升做安排，1969 年 2 月 16 日，直接写信给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党委处长刘沛丰，要他们“帮助”：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吴法宪得到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刻理解这封信的用意。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应召来到林彪家里。林彪问。吴法宪：“林立果在你们空军不错吧?”

“很好，很受大家拥护。”吴法宪说：“他把你的指示，运用到空军，能经常传达你的意旨、指示，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彪说：“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想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林彪接着说：“我自己到空军部队的时间有限。因此我全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

林彪说：我的意见嘛，这样就能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这样就能向你们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法宪连忙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我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切指示，我完全拥护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仍兼空办副主任。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彪说：“为培养她，这样也可以，边做边学嘛!”接着又说：“你要放心，我的儿子、

女儿都在空军，他们都是为了扶植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林豆豆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空军的大字报……”

吴法宪亲笔供词说，他回到空军，立即向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王飞传达了林彪的“指示”。10 多天以后，1969 年 10 月 17 日，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治委员王辉球的名义，发布了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

第二天，18 日下午，林立果随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一同来到吴法宪办公室，由吴法宪亲自向林立果传达了任职命令，祝贺他的荣升。

吴法宪说：“你的命令下来了。我们欢迎你今后更好地为空军建设出力。你今后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

王飞、周宇驰当即向林立果表示：“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听林副部长指挥!”

这天下午四点钟：叶群特地给吴法宪打来电话，非常高兴地说：“听说老虎升官了呀!”

吴法宪说：“是呀，是你这个做母亲的教育有方。”

叶群说：“还是靠空军的培养。看来，我的儿子比他姐姐强。”

吴法宪立刻回答说：“林豆豆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要任命林立衡当空军报副总编辑。”

叶群表示欣慰，说：“我的儿子、女儿都交给空军了，是你们的干部，今后就由你们安排了。”

吴法宪说：“有什么事，我会向林副主席和你请示的。”

据吴法宪交待说，1970 年 5 月，一天下午，空军政委王辉球来到吴法宪家里，吴法宪再次对他说：“林立果在空军的确起作用。他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但不要在会上说。”接着又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只是挂名的，实际空军司令是林彪。林彪天天在关心空军的建设……”

对此，王辉球也交待说，有一天，吴法宪把他接到西山，对他说：“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将来空军领导靠他来接班了，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

吴法宪就这样把林立果捧为空军的“太上皇”。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个毫无作战经验的“毛孩子”了。

1970 年 7 月 31 日，“超天才”林立果出场了。他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讲了由王飞、周宇驰等人代写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

林立果整整讲了一天。废话、空话、假话连篇。他把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说成是万能的，法力无边的，甚至胡说什么对精神病患者和疯子，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病人就会“热泪盈眶”，霍然痊愈。他还大放厥词，说“革命”由东向西转了一圈，“再转一圈到东方转到中国强盛了”。如果敌人向我们挑战，用“精神原子弹”武装的我军战士，立刻会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林立果话音刚落，吴法宪妻子陈绥圻立刻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向立果同志致敬!”

吴法宪肉麻地吹捧说：“立果同志是我们空军的骄傲，他是一颗政治明星。谁说世界上没有天才、帅才?立果就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的红太阳，第三代接班人……”

过了两天，林立果回到家里，问林彪：“你听了我在空军干部会讲用报告的录音了吗?”

“听了。”林彪说：“不仅仅思想语言像我的，连声音也像我的。”

坐在林彪对面的吴法宪说：“将门出虎子嘛!立果的报告，轰动了整个空军，也轰动了全军，我已经批了，印 70 万份，发给全军学习!”

吴法宪进一步向林彪讨好说：“我们空军党代会做了一个决议，对立果同志的态度就是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和态度问题，我们空军的口号是要时时想到林副部长，事事请教林副部长，处处保卫林副部长，要老老实实服从他的调动，服服帖帖听从他的指挥……”

林彪把自己的儿子看作是天才的化身。一天，林立果带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看林彪，王维国再次吹捧林立果是“天才”、“帅才”。林彪听了哈哈大笑。对林立果说：“认识一个天才不容易。我过去说你有天才，你不承认，现在王维国也说你是天才，看来王维国也了不起!”

3、“联合舰队”

“五一”节晚上，林彪在天安门上匆匆只呆了五分钟，就回家了。

叶群见林彪不高兴，就说你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还是要想开点!老虎那里的一帮人，是经过考验的，是过得硬的，将来用得着的地方多得很，你就早点见一见吧!

林彪答应趁纪念“五一”节的机会，同林立果结交的一班人见一见。林立果高兴地说：“只要首长和大家见见面，最多暗示一下，其他的事，有我!”

1970 年 5 月 2 日晚上，一辆空军大轿车，在暮色苍茫中开进了毛家湾。从车上走下来的，有男有女，成对成双，有的还带着小孩。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走在人群的前面。

林彪从屋里走出来，在电影放映室第一排的沙发上坐下来。王飞和周宇驰分别坐在林彪两边，亲切交谈。

林彪问周宇驰：你领导老虎，还是老虎领导你?

周宇驰心里明白，两人都是办公室副主任，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林彪这里所讲的领导，隐藏着另一种更深的含义。周宇驰心领神会地说：“当然是立果同志领导我们了!”

林彪同大家一起看完电影。随后，叶群给大家送了纪念品，每人一个塑料图片、一枚毛主席像章。接着，她又给每人一块糖，连蒙带骗地说：“这是‘五一’节晚上，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桌子上的糖。我特地拿了回来，想了想，还是送给在场的同志好，不是给大家吃的，留作纪念，这是最大的幸福。”

周宇驰在接见的第二天晚上，特地召集参加的人，开了一次“表忠会”。

周宇驰说:“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运核心……”

周宇驰所说的这个“战斗集体”，是指林立果担任作战部副部长以前，1970 年 5 月经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它的任务是给空军出点子，提建议。

参加“调研小组”的人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玲、空军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绪、空军某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这年秋天，在调研小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法西斯别动队——“小联合舰队”。

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以后，把这个反革命组织称为“联合舰队”，并自称是“舰队”的司令官，而周宇驰则是“舰队”的“总管”。林立果还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谐音，给自己取了一个代号叫“康曼德”。

林立果对他们的同伙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大伙要有‘江田岛精神’。”每到外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就说这是“联合舰队”出航，进入一等战备。他自称是“旗舰”，称骨干分子是“主力舰”，许秀绪等人则称自己是“快艇”，“小驳船”。

联合舰队的成员都有代号。“铜玲”、“阿飞”、“捶子”、“金钟”等，就是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的代号。

根据查获的“联合舰队”材料，1971 年 2 月 8 日下午，“联合舰队”举行一次收集情报的会议。记录上这样写着周宇驰关于收集情报的部署：

1．情报的重要性。

2．重要情况与非重要情报，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

3．死情况与活情况，活情况重要。

4．等情况与主动收集情况，应主动选择新情况。

5．每个人每个时期都应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个问题。

“联合舰队”还分别在上海、广州建立有“分舰队”，下属还设有小组。

1970 年 3 月，林立果到上海，在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协助下，建立了“上海小组”。

“入组须知”写道：

“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因此，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光荣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和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过程中，应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在“须知”规定“必须做到”的五项任务中，第五项就是“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1971 年 2 月 8 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对上海小组当面指示说：“我们现在做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副部长的工作……我们做机密工作的若干同志，包括我在内，就是要在副部长的领导下……”

王维国还派人去广州向林立果领受反革命任务。一份传达记录中写着：“一、战略方针，全局在胸。是应付大风大浪的准备阶段。二、打基础，做基层……聚集力量，立于不败之地。三、一定意义上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不利于我的情况，休养生息，让步退却。因此，是保存力量，隐蔽力量，不要打硬拼仗，不要搞堡垒战术……”

根据这个反革命策略，“联合舰队”总是以十分隐蔽的形式，在公开掩护下进行着罪恶的活动。

广州民航局宣传队也变成了“联合舰队”的分队。林立果和他的亲信，先后 40 次利用排练节目，提出要把“战斗小分队”“建设成捍卫林副主席和副部长的坚强战斗堡垒”。他们把培养“对副部长的感情”作为吸收党、团员的标准。他们还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

1971 年 5 月 22 日誓词的全文是：“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希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9 月 17 日，在“9・13”事件后的第四天，战斗小分队外出演出时还在誓言里表达着忠心：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海枯石烂不变心，天崩地裂志不移。风声紧，雨意浓，路线斗争的激流，就像开冻的冰河一样互相撞击着。放心吧，战友们，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决不做贪生怕死的懦夫，而要做挺拔在暴风雨中的青松，决不做卑鄙可耻的叛徒，而要做路线斗争中过硬的刀尖子。放心吧，不管情况怎样变化，小分队战士接受考验，永远不变!”

这首词句华丽的“誓词”，典型地代表了那荒诞的年代，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日子，一些被欺骗得失去理智的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演出的一幕幕悲剧!

4、“571 工程”

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始了批陈整风。毛泽东对林彪一伙人猛敲猛打，接二连三地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进行了严厉批评。

黄永胜再也沉不住气了。一连三次打电话到苏州，向林彪、叶群告急。

叶群故作镇静，安慰黄永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要紧张，要稳住神，没有什么可怕的，提起千斤，放下八两。有林总在，就有一切。”

黄永胜胆大起来。他在军委办事组的办公会议上，有恃无恐地说：“我们的错误就那些，在全国检讨也不怕。”

李作鹏拍着胸脯说：“不怕!还有完没有?”

他们口头上说不怕，内心里更加恐慌了。叶群在苏州别墅，催着林彪赶快拿主意。

林彪打断叶群的话说：“临阵不乱，方能为将。”

林立果说：“咱们文的搞不过他们，就搞武的，我们舰队的力量已经很大了!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

林彪同意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他说：“政治斗争最终要靠枪杆子的来解决，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能束手待毙。”

林立果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林彪、叶群商量后，决定派林立果去杭州，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秘密串连，进一步把根据地建设好。林彪当即向林立果面授机宜，要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

林彪说：“现在，你要多和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认识了，熟悉了，他们就能听你的指挥。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971 年 2 月 21 日，林立果在于新野陪同下，驱车直奔杭州，陈励耘到几十里外的瓶窑

迎接，然后送到花家山的别墅住宿。

3 月 18 日下午 1 时，林立果离开杭州，陈励耘前来送行。林立果对陈励耘交待说：以后有事，可以由于新野常到杭州来联系。

据李伟信交待，林立果当天来到上海，由李伟信负责接待。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情况，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你暂不要回北京了，留在这里主要处理这件事。"

接着，林立果又交待于新野通知周宇驰，要他赶快来上海，也参加这项工作。他说："刚才我已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笔者注：叶群的代号)谈了一下，她同意我们的方案，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周宇驰 3 月 20 日赶到上海。3 月 21 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开始讨论制订《"571 工程"纪要》。当时，负责接待的李伟信坐在门口，一边接电话，一边听他们密谈。

据李伟信交待，在讨论"接班"问题时，周宇驰说："如果等和平过渡的接班，得五六年，可能时间还会更要短些。"

林立果说："可能不止五六年，B—52 的身体(笔者注：林彪一伙蔑视毛泽东的代称)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就说五六年，这中间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很难说，首长的地位不一定能保得住。"

周宇驰说："就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接班，一下还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

林立果摇摇头："B—52 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再说，他可以让你靠边站，名存实亡!"

李伟信供述，林立果在密谈时认为，林彪随时都可能被人赶下台，因此，应先下手为强，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着手"提前接班"!

对提前接班，他们提了两种办法：一是把他们所说的"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搞"和平过渡"；二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主席。

周宇驰气汹汹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可以把毛泽东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毛主席以后嫁祸于人，抓几个替死鬼就掩饰过了，古今中外搞政变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处理，首长可以出来说话。"

林立果经过密谋，认为必要时可以利用他们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如果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这伙反革命分子最后决定，先做两件事：第一，制订武装叛乱计划，林立果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订为代号《"571 工程"纪要》，林立果说："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

框，由于新野起草。”第二、组建十支反革命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教导队，一百人左右，要精干、保密。”确定这支反革命武装由“上海小组”来抓。

于新野 1971 年 3 月 23 日至 24 日起草的《“571 工程”纪要》，在“9·13”林彪叛逃后，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缴获了。

这几页印着横格的活页纸上，用潦草的笔迹，写着以下的主要内容：《“571 工程”纪要》的主要内容共分九个部分：即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

《纪要》主要原文如下：

◆可能性

9·2 后，政局不稳，统治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571 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注：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认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好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动机和手段

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先和 B—52)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指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政策和策略

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

5、“三国四方会议”

1971 年 3 月 31 日深夜，一架军用飞机在上海市郊军用机场降落了。一个身材矮小、伪装重病的人，脸上戴着大口罩，被人扶下飞机，抬上担架，被汽车送进上海岳阳路的一个招待所里。这个人就是被周恩来斥之为“蒋干式”人物的江腾蛟。

江腾蛟是个奸谋多诈的人。1964 年，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搞“四清”运动时，当时他在上海空军当政委。他经常看望吴法宪，利用送礼勾搭上叶群。“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把儿子、女儿送到上海、杭州，托江腾蛟照顾。

叶群对江腾蛟说：“林彪同志就这两个孩子，像他的眼珠子一样，把他们托给你，有你照顾，我们就放心了。”

江腾蛟含着眼泪说：“请放心，有我江腾蛟在，就有他两人在。”

从这时起，江腾蛟就加入林彪的“舰队”了，很快由上海空军政委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接着，林彪、吴法宪又要提拔江腾蛟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后，批示“此人不能重用”。

1969 年 10 月，林彪背着党中央，把当时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江腾蛟，委派为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林彪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这个人要用，不但要用，而且还要重用。像江腾蛟这样的好干部要是不用的话，就再没有可用的了。"

江腾蛟说："首长和副部长救了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死，也要跟着林副主席干。"

3 月 31 日夜九时，来自浙江杭州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平，同来自北京的江腾蛟都到齐了。

主持会议的林立果，摆着"司令官"的架势说：现在的情况是，军队受压，军委办事组受压，他妈的，我们也是到处受压，周副司令在南京受压，南京军区还要抓江政委、陈政委的"5・16"，看样子，他们不抓出点名堂来不放心。

林立果又说："现在从表面上看很平静，实际上是平静中潜伏着险情。人家的力量组织得很快，这是决战前的寂静，我们可不能像关云长那样，大意失荆州呵!"

林立果还说："当前的斗争，是接班人之争。斗争的重点在上海。双方都在准备力量。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要临危不惧，不能等着挨打卜要做最坏的准备，要防止对方搞突然袭击，打我们的闷棍，这是对方惯用的手法，有好多人都坏在这上头了。"

接着，林立果宣布："今天，我们开的是'三国四方会议'，上海以王政委为头，杭州以陈政委为头，南京以周副司令为头，还有江政委，他是你们的老政委，由他负责拉总，有什么事情可以请示他。"

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参谋，我们都听林副部长的指挥。"

林立果马上说："你们几个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首长说过，现在谁也不能拆台，大家是同舟共济，命运把大家拴在一起了。"

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纷纷表态。

4 月 1 日凌晨四点多，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收场了。他们来到楼下的餐厅里，在一阵阵碰杯声中，相互祝贺胜利。会后，"联合舰队"更加疯狂地进行着各种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加紧修建秘密据点；

他们加紧"教导队"的武装训练，配备了车辆和武器；

他们在北京、北戴河进行穿梭飞行；周宇驰进行直升飞机训练之后，8 月 8 日，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进行加强训练。

就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主席开始巡视南方了。

6、"庐山这件事没完……"

1971 年 8 月 15 日，一列深绿色的专车，驰过绿波荡荡的原野，从北向南奔驰……

毛泽东乘坐专列，冒着炎夏酷热，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开始了对南方的巡视。从 8 月 16 日至 9 月 12 日，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召见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分别就庐山会议后的形势，同“各路诸侯”进行了多次谈话。

8 月 16 日，毛泽东到达武汉，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同行的汪东兴谈话。华国锋专程从北京到达武汉后，先向毛主席汇报了几句工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摆了摆手，用手拍着自己的额头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斗争。”

8 月 27 日晚，毛泽东主席到达长沙，连着接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治委员刘兴元、广西军区党政军负责人韦国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会见时，华国锋、汪东兴在座。

毛泽东详细谈到党的历史，谈到十次路线斗争，他说：我有三个希望，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 50 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毛泽东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他接着说：“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8 月 26 日，正当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谈话时候，林彪的“联合舰队”也进行了一次形势分析。于新野的记录这样记载：

“会议：1971.8.26

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东西。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从这个记录里，可以看到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策略，“由明争转入暗斗”，用更加隐蔽的阴谋活动，达到抢班夺权的目的。尽管他们一再强调“战争的突然性很强”，要在“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出立刻发动武装政变的准备。

但是，几天以后，形势突然变化了。

7、南昌的警钟

8 月 31 日晚，毛泽东的专列从长沙抵达南昌。

据汪东兴回忆，在毛泽东到达南昌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毛泽东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泽来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程世清原是林彪指挥下的一位将军，同林彪相识很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成了全军的副统帅、全党的副主席。程世清也就成了林彪家中的常客，他曾以《在林副主席家中做客》为题，写过一篇长文，吹捧林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给林彪、也给自己脸上贴金。

对这些，毛泽东当然是清楚的。

庐山会议上，程世清加入林彪一伙人的大合唱。这次他能陪同毛泽东来到南昌，在他看来，这是表现“忠于毛主席”的良机。所以，毛泽东在别墅下榻以后，程世清主动提出请示，希望毛泽东单独会见他一次。

毛泽东答应了。

9 月 1 日下午，程世清走进宽大、明亮而又凉爽的客厅。毛泽东稳坐在沙发上，见程世清进来，挥手示意叫他坐下，一开口就冷冷地说：“你有什么问题说吧!”

程世清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沉默了一阵，他说：“在庐山会议期间，8 月 24 日晚 12 时以后，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一趟，谈谈华东组情况。我向吴法宪谈了小组发言情况，后来，吴法宪又把我带到叶群那里……”

程世清鼓起勇气，又向毛泽东报告：“联合舰队”的死党周宇驰，曾两次来到南昌……

据 1979 年 10 月 11 日程世清亲笔写的材料，当时他是这样向毛主席报告的：“这次周宇驰来南昌，很神秘，很鬼祟。过去在江西给他们装修了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这次，他们要很快用飞机把水陆两用汽车运走。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要逃跑呢?”

程世清说：“周这次来，我有点警惕，我叫秘书一起在场，谈的是一般问题。他说：‘这

次是路过南昌，准备用飞机把汽车运走，顺便送你一架收音机，没有别的事，来看看你。’我说我已有这样的收音机了，拒不收，他便留下了。”

程世清还向毛泽东汇报说：“有一次，我老婆陪豆豆到井冈山。豆豆同我老婆讲，程政委口直心快，以后少同我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

这次，毛泽东同程世清谈了一个多小时。

9 月 2 日，毛泽东又同韩先楚、许世友、汪东兴和程世清四个人谈话。谈完后，毛泽东特地把程世清留下，继续昨天的谈话。

毛泽东问程世清：“林豆豆能找到她吗?”

程世清说：“如果主席要找她，我能找到，她可能要谈一些问题。”接着又说：“‘四大将军’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拿住了，要从林豆豆那里了解情况，先把‘四大将军’的问题搞清，叶群的问题就能弄清……”

程世清说：“林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里搞的四好五好，闹的矛盾很多，互相不团结，事故很多……”

毛泽东要程世清搞一个调查报告，并说谈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都不能讲!

对这次毛泽东同程世清的谈话，据后来有关部门从各方面调查，得到证实。程世清的交待基本上是可信的。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听了来自林彪亲信内部的情报之后，自然会引起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但毛泽东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觉察到林彪一伙的阴谋呢?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指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毛主席后来也没有向我们讲过。”

8、林彪的密令

七月，林彪同时群一道回到避暑胜地北戴河。

林彪、叶群虽说回到安静、冷清的别墅，可是，心里却七上八下，惊魂不定。他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三个方面的消息：毛泽东南巡到了什么地方?“老虎”率领的“小舰队”准备得怎样?“大舰队”是否能够如期开动?……

9 月 5 日这天，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刚听完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的“吹风”，连饭也顾不上吃，在深夜一点半，把他偷偷记在香烟壳上的传达“要点”，向北京的于新野做

了汇报。

原定要到广西桂林去的周宇驰，突然改变计划，带着于新野整理的长达 15 页的电话记录，亲自驾驶“云雀”直升飞机，于 9 月 6 日从北京直接飞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林立果报告。

汇报完后，周宇驰立即向广州的顾同舟打电话进行嘉奖:“林副部长看了于新野的记录，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记录稿，派人送到北京。”

顾同舟立即连夜加班，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长达 50 页的材料，派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乘飞机到北京，交给“联合舰队”，同时附了一封给周宇驰的信。信中说：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在 9 月 6 日凌晨六时许，专程从北京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的李作鹏，正在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东湖宾馆秘密交谈。

当天，李作鹏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回到北京，马上把刘丰密报的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通知给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立即抓起保密电话，报告给叶群。

毛泽东南巡谈的每一句话，都像千斤重锤，敲打在林彪的心上。这位被人称为“副统帅”、曾指挥千军万马的“接班人”，更加心慌意乱了。

晚上，正当林彪和叶群密谈，黄永胜又来了告急电话。工作人员告诉他叶群不在，黄永胜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连打了三次电话，第三次他说:“有重要的事要立即报告。”这次通话竟长达 58 分钟。

从 9 月 6 日晚到 9 月 7 日清晨，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四个人，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做出“破釜沉舟”的决策，决心同毛泽东背水一战!

9 月 7 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9 月 8 日，林彪下达了密令：“按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9、策划谋杀毛泽东

9 月 8 日晚上 9 时，林立果带着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带着叶群给黄永胜亲启的密封袋，和刘沛丰、陈伦和秘密回到北京。

林立果离开北戴河前，叶群打电话对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

林立果在西郊机场一下飞机，一走进候机室，就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的情况很复杂，首长确定离开北戴河，要赶快准备飞机，首长对你很信任。”

说着，他就拿出林彪写的手令，说：“事关重大，要特别保密。”

周宇驰也是第一次看到林彪的手令。他既像是自己表态，又像是鼓励胡萍，红涨着脸说：“我们要忠于首长，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

接着，林立果向胡萍传达了第一个命令。他要胡萍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安排“对首长感情深的”。

随后，林立果、周宇驰跳上汽车，奔向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接着，王飞也来到这个秘密据点北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林立果对王飞说：“现在情况很紧张，有人早就想整首长，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把首长看作目中钉，竭力陷害首长。”

王飞立刻表态：我们坚决保卫林副主席!

林立果瞪眼说：“要坚决把反对首长、陷害首长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把他们都搞掉。”“南边的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你负责。估计在南方问题不大，北京这边在钓鱼台，也好搞，就看你们了。”

王飞支支吾吾地说：“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但怎么搞好，还要考虑考虑，钓鱼台……”

林立果恶狠狠地说：“你不是有警卫营吗，开上大卡车往里一冲，就进去了!”

王飞为难地说：“动用警卫营可不那么容易，用什么理由说服他们往里冲呢?要是吴司令下令就好办了。”他想把事情推给吴法宪。

林立果沉着脸说：“到时候要他下命令，他也非下不可。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成败全靠你了。”

王飞临走时，周宇驰拿出一个大信封袋，交给王飞，大信袋上写着：“带交黄总长亲收。”

王飞走后，林立果、周宇驰随即也离开空军学院，来到西郊机场。江腾蛟正在这里等候。林立果一见江腾蛟，快步迎上前去说：“情况严重呀!”随即拿出林彪的手令送给江腾蛟看：“老政委，怎么样?”

江腾蛟立即说：“为了捍卫林副主席，坚决地干!”

在此前，9 月 7 日下午，周宇驰到江腾蛟家送毛泽东谈话密报时，就对他说：“一组(指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要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就可以动手了……”

江腾蛟沉思片刻说：“在上海，那只有叫王维国去干了。”周宇驰手一挥说：“不行，王维国太粗。”

江腾蛟马上自报奋勇："那就只有我去了!"

周宇驰高兴地说："江政委能亲自出马，首长就放心了。"并且鼓励他："兵贵神速，要去就快点去!"

因为事前已经说好由江腾蛟负责南线，所以林立果一见面就下达命令："上海先动手，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项神圣使命，你那里是第一线，你就是第一线总指挥，你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首先满足你，你看怎样?"

江腾蛟说："那就看你们有什么办法吧!"

林立果说："我们商量了三个办法：第一，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打火车。第二，调几门高射炮打火车，把'教导队'带着，说有坏人要害主席，以抢救主席名义往上冲。万一前两条办法都没有成功，最后要王维国趁主席接见时动手。"

江腾蛟讲了不少困难，表示缺乏信心。

林立果连续六次召开会议策划谋杀毛泽东。江腾蛟、周宇驰还主动献计，用日本人在东北搞掉张作霖的办法，先把看守苏州硕放铁路桥的人干掉，换上看桥人的衣服，在毛泽东火车经过时，用炸药把铁路桥炸掉，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江腾蛟还画了油库和毛泽东乘坐专列停车点的位置图。

林立果勉励大伙说："首长讲，这次要论功行赏，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你们完成了任务回来时，我组织十万人欢迎!"

周宇驰说："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

分手时，林立果送给江腾蛟一株灵芝草，并叮咛江多保重身体。

9 月 10 日，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图，以及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建地区机场资料，为他们以后叛国外逃做准备。

同一天，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刘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由林立果、周宇驰交给王飞，要王飞伺机给黄永胜。林彪在信中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9 月 10 日晚上，曾在林彪办公室当过主任的某师政委关光烈，从洛阳来到北京秘密据点。

林立果对关光烈说："今天请你来，研究两件事：第一件，把你们的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江腾蛟指挥；第二件，从你们师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打钓鱼台。特别是到上海的喷火连，要快，要争取时间，你看怎么样?"

关光烈连忙解释说：“调动部队要经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至于调喷火连到上海，关光烈说：“别说一个连，就是一个排也不行。”

为攻打钓鱼台，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趁天不黑，几个人一同钻进于新野开的汽车，走进同钓鱼台相连的玉渊潭公园，侦察钓鱼台的地形。

四个人装出散步的样子，鬼鬼祟祟地转了一圈。林立果拉着关光烈爬上小丘，对他说：那就是警卫部队的房子，要多加注意。

江腾蛟走到他俩身旁，林立果发疯似地说：“有个轻型原子弹就好了!”

9 月 11 日下午，林立果一伙在西郊机场的平房里，进一步密谋策划杀害毛主席的具体措施。林立果说：“首长的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搞北京。”他问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

江腾蛟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呵!”

9 月 11 日晚上八时，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曾是抗美援朝空军英雄的鲁珉，从昆明出差归来，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

林立果一见鲁珉，立刻表示欢迎，并给鲁珉看林彪手令，接着说：“只要把 B—52 干掉，林副主席一接班，天下就是咱们的了，到那时，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有功之臣。”

林立果对鲁珉说：“江政委是歼七、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把 B—52 搞掉，如果搞不成，就看你了。你在硕放搞，有的是炸药，硕放有一座桥，你在那里埋上炸药，B—52 火车一到，就是第二个张作霖事件。”

鲁珉犹豫地说：“我没有在陆军干过，从来没有弄过炸药……”

林立果说：“你到上海去，就是他(指江腾蛟)点的将，我们决定派你到上海，先和王维国研究一下。”林立果又说：“如果再不行，由陈励耘派改装的依尔—10 飞机炸火车!”

鲁珉说：“打火车还是轰炸机好，那东西厉害!”

江腾蛟见鲁珉信心不足，马上打气说：“你不要把这个当一件坏事，我们这是正义的行动，是为了真理，是为了千百万的老百姓!”

林立果说：“到那时，你们就是国家的栋梁，有功之臣了，北京军区我非交给江政委，我才放心!”

江腾蛟马上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好!”

但是，情况突然变了……

就在 11 日这天深夜，在上海的王维国给林立果、周宇驰打来电话，密报毛泽东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离开上海回北京了。

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部署。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和幻梦彻底破灭了。

林立果流着泪，哭丧似地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沉默，死一般的沉默。

周宇驰歇斯底里大叫起来："现在难过也没有用，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说完，像跑了气的皮球，躺倒在沙发上。

10、冲出死亡圈

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以后，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简单谈了两次话。

陈励耘是杭州地区负责警备工作的，担负着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工作，而负责上海警备工作的则是王维国。这正如林彪一伙叫嚣的那样，毛泽东"到了我们的根据地"，"在我们的手心里"。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动声色亲自采取了措施。

9 月 8 日，就在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秘密回到北京的这一天午夜时分，大家刚吃完夜餐，毛泽东突然叫汪东兴，让他立即把停在机场附近的专车，转移到去宁波方面的绍兴。距杭州一个多钟头的路程。

9 月 10 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下令："立即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毛泽东乘坐专列匆匆离开杭州。

毛泽东晚上 6 点到达上海，专列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

11 日上午，许世友来到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和许世友、王洪文、汪东兴谈了两个小时，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谈到中午，毛泽东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许世友、王洪文刚下车，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我们走!谁都不通知。

列车离开上海不久，许世友得知毛泽东已经动身，立即乘飞机回南京，在专列到达之前，赶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下车，只有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列车只在南京停留 15 分钟，又飞驶北上了。

11 日晚上 10 时，毛泽东的专列，安全地通过林彪一伙预谋炸桥的硕放铁桥。

毛泽东要汪东兴在济南车站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到丰台火车站谈话。

12 日 13 点 10 分，专列在丰台火车站停车。毛泽东尽管经过长途南巡旅行，显得有点疲劳，但神情很好。毛泽东望着围坐在他身边的李德生等人，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

毛泽东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一直讲到下午三点多。毛泽东严肃地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毛泽东这句话，等于点名林彪了。据李德生回忆，在这次谈话最后，毛泽东要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从 38 军调一个师来南口。

离开丰台，李德生立即部署 38 军一个师到南口的调动。

毛泽东专列最后驶进北京站时，已是 12 日的黄昏了。

11、妄图南逃

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像一声炸雷，震醒了林彪一伙反革命的迷梦。

住在北戴河的叶群，发疯似地跑进林彪的房间，惊慌地说：不好了，老虎那里全落空了，人家早已过了上海，我们受骗了……

林彪脸色苍白地僵坐在沙发里，眼直瞪着叶群高声吼叫：

"慌什么?快，快，按照第二个方案办。"

所谓第二方案，即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 月 12 日下午四点半，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来到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的客厅。周宇驰用下达命令的口气，向他说："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 13 日离开北戴河。"接着具体布置说："三叉戟飞机 256 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

"准备一架伊尔—18，13 日七时起飞，我们俩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的 256 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伊尔—18 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往广州。"

"再准备一架三叉戟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 日 8 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飞指挥。"

“再用一架安—12 飞机，拉上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

“另外，派一架安—24 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首长到小飞机场时使用。”“其他的大飞机也准备一下，以备首长用。用时电话告诉。要绝对保密。”

胡萍立即按交待的任务，进行安排。五点多他打电话通知空军某师师长潘景寅，要他亲自驾驶 256 号飞机，晚上 7 时送林立果去山海关，并做好飞行准备。

随即，他又打电话通知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三叉戟 252 号，今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

胡萍故意把 256 号说成是 252 号，是为了掩入耳目，说是训练飞行。他说：“你亲自掌握，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

随后，他又通知了山海关机场。下午六点，王飞、江腾蛟、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汇集到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周宇驰宣布：“首长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都到广州。去了以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宣布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他们如果要动武，我们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周宇驰接着又宣布了南逃的具体方案。他说：“机上的警卫工作，由江政委负责，江政委就是警卫营长，指挥人看住他们。”他要王飞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飞机。”

临散会时，于新野招呼大家说：“还要带些冲锋枪。”

9 月 12 日晚上十时，准备南逃的人员，按照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的通知，来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的会议室里。王飞主持召开这次秘密会议，对南逃上飞机的分工、警卫、枪支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布置。

会议期间，王飞叫装备处长到警卫营仓库取来五九式手枪 30 支、子弹 2000 发、冲锋枪两支、子弹 2000 发，分发给每个人。

鲁珉在西郊机场得悉要杀害毛泽东的阴谋后，回到家里把情况告诉妻子，妻子劝他说：这事干不得，搞不好要满门抄斩。俩人商量了一夜，想出了脱身的办法，妻子把鲁珉的眼睛弄肿，住进了医院。今天，他接到通知又从医院出来，参加了秘密会议。

林立果乘 256 号三叉戟专机，于 12 日傍晚从北京起飞，八时在山海关机场降落。下飞机前，他向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副主席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林副主席感谢大家。”很快，林立果同刘沛丰乘车向北戴河奔去。

晚上八时，林彪住处的走廊里，正放映香港的电影《甜甜蜜蜜》，它是为庆祝林立衡结婚而专门放映的。对于林立衡的婚姻，叶群多次横加干涉，强迫女儿按照她的意愿选择对象，以至女儿以服安眠药自杀来抗拒。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外科医生张清林，确立了恋爱关系。

9 月 12 日，是林立衡、张清林到达北戴河的第六天。林立衡不同意马上结婚，但叶群还是强制她：“你们今天就算订婚了。以后你们怎么样，我们都不管啦!”

警卫秘书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拍了合照，又强迫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也拍了照。叶群在送了纪念礼品之后，声泪俱下地抱着女婿说：“豆豆精神不正常，你可要好好爱护她……”

叶群强拉硬扯的安排，引起林立衡的许多怀疑。为什么迫不急待地一定要在今天举行婚礼呢?明天真的要去“大连”吗?为什么林彪、叶群关在房间里，长时间地密谈?林立衡安排内勤公务员去偷听林彪、叶群的谈话。晚上九点左右，林立果回来了。

林立衡又找到林彪的警卫秘书说：“老虎和主任想把首长搞走，他们可能要逃跑。你先跟首长说，不让他上飞机嘛!”

这时，内勤公务员跑来告诉林立衡偷听到的两句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情况十分紧急，林立衡决定马上向警卫部队报告。

林立衡跑出住处，沿着山坡小路，钻进黑暗的森林里，走到 58 号楼前，林立衡向警卫大队长姜作寿报告了情况。

姜大队长打电话请来了 8341 部队的张宏副团长，林立衡又向他汇报了情况，并且提出几条防林彪外逃的措施。

警卫部队负责人请示北京，迟迟得不到回答。

这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的周恩来总理，大约是在 9 月 12 日晚 10 点 30 分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报告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周恩来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

汪东兴回答：“可靠!”

周恩来联想到林立衡同自己家庭的矛盾，对她的话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周恩来指示：“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不要鲁莽行动。”

急促的电话铃声又响了。汪东兴又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据林立衡报告，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这架飞机是今晚八点多钟送林立果来到山海关的。”

周恩来立即找到吴法宪，问他是否知道此事。

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要马上去查一下再报告。

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场，周恩来马上又打电话问李作鹏。李作鹏来报告：“我问了山海关机场，今天傍晚去了一架三叉戟飞机，现在还停在那里。”

紧接着，吴法宪来了电话：“我问了胡萍，确实有一架到山海关去了。是改装后训练试飞去的。”

胡萍说的是谎言。周恩来当即指示吴法宪：“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

深夜 11 点多，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开初说不知道，接着又改口说：有、有，是他儿子坐着来的，说他父亲明天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警觉地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吱吱吾吾地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再飞。”

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说：“别飞了，不安全。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听说周恩来要来，心慌了，马上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停在山海关机场的 256 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下达的命令才能飞行。”

但是，李作鹏却篡改了周恩来的指示，说什么“四个首长其中一个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笔者参加 1980 年 12 月特别法庭采访，听到李作鹏诡辩并掩盖他的罪行。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都没有下达任何阻止飞机起飞措施的指示，竟答“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拖延时间。审判时，在四个机场工作人员的对证下，李作鹏才无言答对，承认篡改了总理的命令。

林彪得知周恩来查问飞机，惊慌得浑身发抖，他说：“现在什么都完了，只有靠空军，靠那架飞机了。”

9 月 13 日 0 点 32 分，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林彪已乘飞机逃跑了!

据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后来回忆：

“……大约 11 点 40 分到 50 分左右，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一起到林彪的密厅里。刘沛丰手里提着三四个皮包。叶群一到，就马上出来叫喊着调汽车，在走廊里到处乱窜，像个疯子一般。”

“刘沛丰提着三四个提包，首先上车，接着叶群、林彪最后上车。……没几分钟，听到下面响起了枪声……”

据林彪警卫秘书回忆：“我也跟着上了车，汽车便开动了。开出不久，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到。’

汽车开到 58 楼时，姜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 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汽车冲到 58 楼以后不久，我突然喊了声：‘停车!，车停下了。我立即下车。当时车里几个人没有吭气。我为了保命，向后车门后面退了几步。

车里向我开枪，我即向汽车的前车门开枪。……”

据姜作寿回忆：“我们追到距汽车三五米处，汽车又开动了。随后，肖中队长乘一辆吉普车，带六七个队员，我乘一辆卡车，带六中队 30 多人，向机场追去。到机场时，飞机起飞了。飞机发动起飞时，林彪一伙看到没有登机的梯子，就慌慌张张攀着驾驶舱的梯子向上爬。刘沛丰第十个上去，叶群披头散发，跟了上去。林彪光着脑袋，几乎顶着叶群的鞋底，紧跟爬了上去……”

1971 年 9 月 13 日 0 点 32 分，林彪一伙乘坐 256 号飞机，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来得及上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0 点 46 分，256 号飞机改航向先向南，又转向西北，向外蒙古西部，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飞去。

周恩来得到飞机起飞的报告，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并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

李德生马上到空军司令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得中随同吴法宪到西郊机场；纪登奎到北京空军司令部掌握指挥。

9 月 13 日凌晨 1 时 56 分到 2 时 20 分之间，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国下达“禁航令”“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国雷达监视天空。

12、凌晨静悄悄

快步进入空军作战指挥所的李德生将军，马上找来原空军参谋长梁璞，两人一起紧张地

注视着整幅墙壁般大的雷达屏幕。从屏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架飞机标志的一个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正在这时，周恩来向空军司令部调度室打来电话问道：“用无线电向 256 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能听到。”

周恩来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说：“那就请你向 256 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

从屏幕上看，飞机耍了个花招：它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向北飞去。

李德生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上移动的亮点。据李德生回忆，当时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航不一般，情况异常。”

李德生问梁璞：“有什么特点?”

梁璞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通过红机子，不断将他看到的情况，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及时向周恩来报告。眼看飞机要飞出国境了，怎么办?李德生马上请示总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他并且说，还有人提议把飞机打下来。

周恩来在电话上告诉李德生，他已请示毛主席，主席指示说：“不要打!”

林彪逃跑的专机，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1 时 50 分，从荧光屏上消失，飞逃出了国境线，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

此时，周恩来总理已经 50 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同汪东兴、张耀祠来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办公室，向毛泽东汇报了经过。

毛泽东凝神片刻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9 月 13 日凌晨三点钟，周总理代表中央通知中央负责人到福建厅，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叶剑英、江青、姚文元、张春桥来了，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也来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整夜未合一眼的周恩来，浓眉紧锁。神色严肃地走进会场。他的第一句话，是对江青说的："今晚发生的事情，你们几个不会感到很突然吧?!"

江青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回话。周恩来愤然地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全场呆住了，会场一阵紧张，鸦雀无声。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林彪乘机逃跑的经过，他特别提到林立衡直接找他汇报的情况。周恩来最后说："可以断定，林彪是投靠苏修去了。"

叶剑英听到这里，连忙插话说："我们要在政治上先发制人，军事上后发制人。政治先发制人会主动，军事上后发制人也会主动。"

周恩来问："林彪冒然投苏修之前，有什么迹象?"

叶剑英说："任何迹象也没有!"

周恩来提醒说："苏修会乘我们之危机呀，这是要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总理、叶帅经过商议，为防止突然袭击，当即向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野战部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周恩来宣布一些人住进人民大会堂后说："全国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这时，令人奇怪的是，张春桥显得特别高兴，他意味深长地对坐在一起的李作鹏、邱会作说："你们愁眉不展作什么?这是你们甩了一个包袱，你们解放了!"

接着，江青、张春桥、李作鹏三个人就玩起扑克牌来了。

13、荒原野火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的茫茫荒原上，坠落爆炸了。

出事以后，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会谈交涉，中国驻蒙古特命全权大使同蒙方官员和专家，于 15 日下午乘飞机从乌兰巴托向东南方向飞行 300 公里到达温都尔汗。他们接着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行进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飞机失事地点，

眼前一片凄迷、荒凉的原野，一洼许多丘陵、土包、沙土和没膝深茅草构成的盆地。南

半部是一大片烧光烧焦的草地。这块烧焦的土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和九具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尸体。

烧焦的土地上，机壳化为灰烬。200 米处躺着一大块带舷窗的机身；300 米处，横着一扇标有“旅者止步”字样的机门；400 米处，三个联装的座位呈三角形位置卧在那里；530 米处，黑幽幽立着庞大机头架，甩在东西两侧。200 米一处未燃烧的草丛里，奇迹般地躺着一个毫无损伤的轮胎。

在机身东侧几十米的地方，有两大段机翼，一截上有“中国”二字，另一截上有“民航”二字。“民航”的“航”字旁有一个约 40 厘米的大洞。

在飞机爆炸的土地上，还散落着林彪一伙携带的六支五九式手枪，一只冲锋机枪，还有叶群的一双高跟鞋。

九具尸体经事后验证：

2 号尸体：衣服全部烧光，面部表情痛苦、凶恶，似在烈火中挣扎。这是林立果。

5 号尸体：头骨外露，眼、鼻、舌和衣服烧光烧焦，胫骨炸裂，尸体收缩而肿胀。这是林彪。

8 号尸体：衣服烧光，左嘴角烧伤，头发只额前略焦，脚底烧伤起泡。这是叶群。

在这些尸体旁边，还有刘沛丰、驾驶员潘景寅及司机、机械师的尸体。

蒙方分析说，飞机是在紧急着地而失事的，当时并无任何外来影响，天气也不错。机上人员做了紧急降落的准备，但飞机着陆时失去平衡，右翼触地引起爆炸。至于右翼根部那个大洞，是在飞机破碎过程中，内部炸破冲击形成的。因为洞孔边缘外翻，形状不规则，且翼面顶面没有穿洞。这就排除了所谓防空导弹打的怀疑。

林彪一伙摔死引起的风波，经过中蒙双方的协商，很快平静了。

14、空中搏斗

9 月 13 日凌晨 1 点 40 多分，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三人，带着飞行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携带几个装着三万多美元和许多机密文件的手提包，开着车冲出空军学院大门，发疯似地向沙河机场奔去，一直开到大队部门前。

两点半左右，陈士印摸黑走上楼，喊醒正在熟睡的八中队中队长、驾驶技术最好的飞行员陈修文，说有紧急任务。

陈修文迅速穿好衣服，走出宿舍；早在车上等候的周宇驰，拿出林彪的“手令”，在陈修文眼前晃了一下，鬼鬼祟祟地说：“有紧急任务，要绝对保密!”

3 点 15 分，3685 号直升机。飞向灰蒙蒙的夜空。周宇驰告诉陈修文，航向 320 度，陈修文按照周宇驰指定的航向，向西北方向飞去。

3 点 25 分，北空负责人接到通知："沙河起飞一架直升机，要雷达监视，夜航部队做好准备，听令起飞。……"

3 点 40 分，北空负责人又接到李德生的通知："总理指示，你们要把这架飞机拦截回来。这是总理叫我传达的命令。"

正在飞行的陈修文，耳机里突然传来地面机场的呼叫：周宇驰说："不要回答!"

3685 号直升飞机一直保持沉默。

飞机临近张家口上空，周宇驰却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北京—乌兰巴托—伊克库次克航线图，命令陈修文："飞乌兰巴托"。

陈修文按了机外送话接纽，提高声音说："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

张家口机场调度室的值班员，清晰地听到了陈修文的呼唤，并且作了记录。

周宇驰听到要下去加油，立刻凶狠地咆哮："你要落地，我就打死你!"

陈修文毅然掉转机头：返航!

周宇驰发现飞机转弯，凶恶地问："飞机怎么转向了?"

陈修文回答："有飞机拦截，作机动飞行。"

奉命起飞的歼击机，在直升飞机上方呼啸而过。

5 点 12 分，直升机开始降落了。距地面百十米时，副驾驶员陈士印按照周宇驰的命令，猛一蹬舵，强行操纵直升机向山区飞去。此时，耳机里又传来地面机场的呼叫。返航的陈修文又看到了伟大首都的灯光。周宇驰惊恐地狂叫："怎么又回来了?……你骗了我们，我要枪毙你!"

勇敢机智的共产党员陈修文，驾驶着直升机在怀柔县沙峪公社的上空盘旋，找到了一块河滩地，开始徐徐下降。距地面二三十米时，陈修文切断了油路。直升飞机在空中紧急停止了。

赤手空拳的陈修文，突然转过身来，向林彪死党周宇驰猛扑过去……

周宇驰惊恐地扣动手枪扳机，连发数枪。

英雄的战士陈修文倒在座椅上，鲜血染红了驾驶舱……

13 日早晨 6 点 47 分，失去动力和操纵的直升飞机，摇晃着坠落在沙峪公社井峪大队的河滩上。

李伟信、于新野跳出机舱。于新野向驾驶舱里打了一枪，打在周宇驰的手腕上。三个人相互搀扶着，向北山上逃去。

朝阳照亮大地，三个叛徒坐在玉米地里。当看见搜山的民兵围过来时，三个人各自举起手枪，连开三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李伟信却没有倒下，他抬高了枪口，放了空枪。

周围的民兵，听到枪声，从四面八方跑来，包围了现场。

9 月 16 日，按“南逃广州”计划，逃往广州的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都在火车站被捕了。

15、“四大金刚”落网

林彪的叛逃引起全世界的震惊，许多国家的首脑注视着北京连续发生的出人意外的情况。

周恩来原定接见的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临时突然接到通知，推迟五天；

原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罗马尼亚高级军事代表团，被婉言谢辞；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发出密令，取消陆海空三军休假官兵休假，要求军事人员火速返回战斗岗位；

原定 9 月 20 日迎接国庆盛大的群众游行的演习，突然宣布取消了。

这一切都使人猜测，使人不安……

北京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

9 月 23 日，已是“9 • 13”事件的第十天。中央一直在等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交待。可是他们一直“按兵不动”。他们不但没有一句话的交待揭发，而且不断频繁活动，毁灭罪证。

吴法宪告诉他老婆，把墙上林彪的像烧了，把林立果讲话材料烧了。

黄永胜在自己卧室里，锁起门来焚烧材料，烧坏了一个瓷缸和一个大花盆。

听到这些，毛泽东决定，马上对黄、吴、李、邱进行隔离审查。

9 月 24 日五点钟，吴法宪接到周总理电话通知，说八点钟在人民大会堂开军委办事组会议。

吴法宪马上打电话问黄永胜："开什么会呀?"

黄永胜说："我也不知道。"

吴法宪把一些文件交给他老婆说："今天可能回不来，可能把我关起来。"

清晨七点，邱会作到机场送李先念访问越南。周恩来也到机场送行。站在一旁的邱会作，清楚听到李先念对周恩来说："我就是担心总理的安全。"

邱会作正思索这句话，周恩来突然看了一下表，对他说："等一会福建厅有会，你知道了吗?"

邱会作说："知道了，我现在就去。"

周恩来说着上车先走了。

邱会作忐忑不安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北门，中央警卫团的同志走过来，把他拉到旁边一间小屋里，搜查上身，对他说："今天要检查一下。"

警卫团的同志领他走进福建厅。他发现福建厅的座位布局变了：西边并排放着四个沙发，对面沙发里坐着周恩来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得中。北边沙发里坐着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等。一边的角落站着一些中央警卫团的同志。

周恩来说："出事十天了，你们几个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为了什么?"

周恩来接着说："今天早晨三点钟，主席最后下决心，你们几个暂时离开工作，给你们找了几个住的地方，你们去写材料。军委办事组的工作，由叶帅暂时负责。"

周恩来还以质问的口气点了黄永胜："你同叶群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黄永胜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说。

周恩来讲了一个多小时。待黄永胜押走以后，周总理谈到空军的问题，对吴法宪说："这几年，空军叫你搞成什么样子了?"

吴法宪押走以后，总理又谈到海军，对李作鹏说："你们这个海军，从上到下搞站队，搞得乱糟糟的……"

邱会作最后一个离开福建厅。

9 月 29 日，中央发出通知：责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

第二十四章 三箭齐发

1、“批林批孔”的发起

1973 年 5 月 20 日至 31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指示》，并决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为提前召开十大进行准备。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召开的十大，再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但是广大人民和干部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厌倦了，怀疑了。毛泽东鉴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由此产生了可能要出“复辟倒退”的忧虑。因此，毛泽东提出要把批林同批孔结合起来。

7 月 4 日，毛泽东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专门有一段话谈到批孔问题。他说：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这次谈话，是“批林批孔”的动员令。他“借题发挥”，以历史题材作现实文章，把“批林整风”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反对变革的儒家、推崇主张变革的法家联系起来。通过“批林批孔”，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防止出现“复辟倒退”，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批评了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经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并且说：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此种顽症，历来都有，现在仍有，不是一个人有，各地都有。

毛泽东此处说的“大欺骗、大主宰”，是指外交部曾在一个内部材料中提到苏美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

毛泽东听完翻译唐闻生读完简报以后?认为简报对一些国际形势的分析有错误，同他谈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一致，因此很不满意。

“外交无小事”，外交方面的所有重大事情都是请示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毛泽东为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1973 年 8 月 5 日，他同江青谈话时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他念了一首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砍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9 月 23 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谈起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代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听到毛泽东的讲话，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借题发挥，大做文章。

江青一伙利用他们控制的报刊和大批判写作组，发了大量批判孔子，批判儒家的文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笔名“梁效”的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笔名“罗思鼎”，中央党校笔名“唐晓文”等，都以“批宰相”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几个大批判写作组，在一个时期内，成了“四人帮”制造舆论的中心，变为他们呼风唤雨的传声筒。

江青看了“罗思鼎”炮制、经姚文元修改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争论的社会基础》一文后，连声叫好：“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

江青在接见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时说：“为什么要批孔?就是因为林彪是最大的儒家。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才能深入。”

江青指桑骂槐，明目张胆地把锋芒指向周恩来。她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党内就有，党内外都有，林彪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没有正确地分析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

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再次宣称：“还要多次进行像无产阶级大革命这样的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路线，江青一伙的力量在政治局内有了增强。上海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以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为由，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像坐电梯一样，被提升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同江青一伙密切合作的野心家康生，也被提升为副主席。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入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追随江青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取得了更大的权力。

2、江青的炮队

“9·13 事件”后，在清查毛家湾的林彪住处时，查到林彪引用孔子、孟子的几条言论材料。

例如，1969 年 10 月 9 日，林彪写给叶群的一张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写了四条“克己复礼”的条幅。

“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度的思想核心。林彪多次书写“克己复礼”，暴露了他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1974 年 1 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将林彪书写的有关题词、笔记，汇编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江青、王洪文看了这个材料，1 月 12 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他俩还建议，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毛泽东随即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主观意图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受到不少人的抵制和不理解。这同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批孔和肯定法家的进步作用，对广大干部群众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助于转变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达到“防修、反修”的目的。

江青得悉毛泽东批准转发全国之后，立即于 1 月 13 日深夜，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开展“批林批孔”。她通知谢静宜的丈夫空军干部苏延勋，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原 8341 部队宣传科长迟群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三人，来到钓鱼台 11 号楼江青住地。

江青对三个人说："毛主席在 1973 年与我曾谈过批孔的问题，我向政治局传达后，周总理没有主持讨论。""我要替毛主席抓大事，抓典型，协助主席抓好批林批孔工作，共产党不批孔，岂不是怪事?批孔，军队进行的最差劲，不检讨我是不答应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批孔呀?"

江青越说声音越高："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你们就是我的炮队。现在我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我给你们找地方去开座谈会，去放炮!"

在此以前，她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于是，她立即把这份材料当作炮弹，越过中央军委、南京军区，亲自给连队写信，派迟群、谢静宜到防化连送信。她并且把写给空军司令员的信以及材料，叫苏延勋亲自送去。

第二天，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分别到了南京防化连和空军某师。据谢静宜交待，大年三十这天，"我们乘飞机到了防化连。连队立刻集合起来，先由迟群念了江青给防化连的信，讲了部分批林批孔材料。传达了江青的原话。防化连同志立即表决心，喊口号，感谢江青对他们的关怀。"

1 月 18 日，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 1974 年的第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材料"前言说："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表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1 月 22 日，是春节除夕。回到北京的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马上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江青欢喜若狂，见面第一句就说："我的炮队回来了，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你们真是马到成功!"

江青请三人吃饭。在餐桌上，江青边吃边说，举起酒杯："西沙打胜仗，我们也是在打仗，打的是一场政治思想仗。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在另一会议上，江青还无耻地自我吹嘘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

江青"指挥战斗"的炮队中，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位将相外，还有几个火力很强的"炮群"。这就是以"大批判组"命名的几个写作组。仅 1976 年 10 月，梁效大批判组撰写公开发表的就有 18 篇，其中许多是江青、姚文元直接点名授意的"重点"文章，为"四人帮"夺权服务。

3、两个大会

为了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燃遍全国，进一步在军队中鼓吹开展"批林批孔"，在军队

中无正式职务的江青，竟然居高临下，于 1 月 24 日，向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信上说：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

张春桥阅后，马上将信批转给叶剑英，“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1 月 24 日至 25 日，正值春节假日，江青等人未经批准，在北京连续召开两个万人大会，一是工人体育馆的在京部队单位大会；一是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召开这两个大会，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更没有讨论过。周恩来听说要开会，通知国务院各单位去参加。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处于被指责的地位。在“1·25”大会上，迟群叫嚷说：“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

谢静宜也声嘶力竭地叫嚷：“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呵，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大会上，82 岁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三番五次的被侮辱点名，几次被迫颤颤抖抖地站起来。

会后，张春桥还到郭沫若家，当面要他承认抗日战争中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当即给予驳斥和拒绝。2 月 10 日，江青也到郭沫若家，当面逼郭沫若作检查，并以批判意大利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为名，攻击周恩来。

大会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从翻译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里，得到江青一伙要向全国发大会录音带的消息，十分生气，严肃批评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毛泽东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口某些干部子女当兵问题，点名批评叶剑英。别有用心地同性质根本不同的“孔孟之道”、“林彪路线”联系起来，妄图再打倒一批老干部。

1974 年 1 月 30 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表明自己对“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看法。

2 月 15 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指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后来，毛泽东又把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称之为“三箭齐发”。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说，中央认为：“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伙对抗毛泽东的批评，继续利用“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王洪文、张春桥在军队各大单位“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指责军队领导机关“批林批孔”不深入，不得力。

王洪文说：“总参几位领导右得很”。“总参党委不抓大事”，“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对总参，“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张春桥说：“总后已经瘫痪了，我看瘫痪得越彻底越好，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2 月 10 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一家美国公司送给我方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是崇洋媚外”。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回去，并提出“抗议”。后来经周恩来指示查明，美方送玻璃蜗牛并无恶意。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妄图利用“蜗牛事件”，强加给中央领导人“洋奴”、“爬行”等罪名的政治阴谋。

在批林批孔的洪涛巨浪里，笔者认为值得特别记录下来的是老一辈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大义凛然，不屈从压力的事。

1974 年受到江青点名批判的梁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批林批孔开始，他秉笔直书，针对当时风行的观点，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鲜明地指出：“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他说：“孔子在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为承前启后关键性人物，孔子的功罪或价值如何，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表现出成功失败而定之……‘五四’运动中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而以‘赛恩斯’和‘德漠克拉西’(笔者注：科学与民主)标榜，大体上是对的。但不能抄袭别人的文章，仍须走自己路。”

他在政协批林批孔学习会上，坚持不批孔的看法。

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刘少奇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也是公开的。”他又说：“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

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

政协学习会整整批了他半年，最后要他表态，他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听了他的话，全场一片哑然。

4、放火烧荒

江青为搞乱军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别有用心地提出“放火烧荒”的口号。

1974 年 2 月 25 日江青写信给张春桥。她写道：“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总参问题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

张春桥接到信，当天批示：“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

但是，怎样才能在解放军里把火放起来呢?

江青决定先在文艺单位下手。3 月 5 日晚上 10 时半至六日凌晨四点半，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八个文艺单位，扩散火种。江青趾高气扬地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江青说：“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他们不许普及样板戏，有坏作品批评不得，对我们的话根本不听……”

她把脸转向坐在身边的兼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春桥同志，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回来。我看军队工作还是让亚丁管起来，不然方向就偏了。”

她对陈亚丁和另外两个人说：“今天把你找来，把他们两位找来，准备他们骂娘。他们骂，我也可以骂，动员起群众同他们斗争。说这个那个是林(彪)的黑手，其实是他们自己!”

“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

江青还嘱托说：“亚丁的问题，请春桥同志到军委备个案。”

3 月 17 日，陈亚丁秉承江青的意志，召集驻京文艺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鼓动他们回去放火，陈亚丁说：“江青同志指示叫我‘点火’，‘夺权’，‘管全军文化工作’……我不敢组织，不敢找部长们，因为阵线还不清，找错了门不好办，再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今天请同志们来就为一个目的：点火!”

陈亚丁再次强调说：“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没过多久，总政点起火来了。

7月15日下午，江青急急忙忙把迟群、谢静宜召到钓鱼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说：“总政批林批孔已经起来了，听说大字报贴满了大院。我派你们俩去看大字报，回来向我汇报。”

江青说：“总政是个阎王殿，问题很多，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去了别叫人给打死了。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已告诉汪东兴，去总政这段时间内，给你们每人派一名警卫员。这样就好了，打死两个还能跑出两个，打死三个还能跑出一个报信的。”

迟群说：“他们门口卡的很严，地方的车子不好进去。”

江青立刻为他壮胆说：“怕什么?我告诉汪东兴同志给你们换上车牌子，都换上8341部队的牌子。第一次去时，我会通知他们，让人在门口接你们。”

迟群、谢静宜俩人悄悄到总政大院转了一圈，他俩感到问题太复杂，回来向江青报告说：“算了，别去了!”

对此，1980年8月14日，谢静宜交待说：“‘四人帮’为夺权，到处制造混乱，总政即是一例。”

江青为了放火烧荒，把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当作“试点”。1974年6月，江青提出要研究儒法军事斗争史，要六连马上拿出“经验”，并连续六次送去“女儿经”等材料要六连研究批判。

1975年初，江青派到六连的联络员组织几个战士，按照他们自己定的内容，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批评信”。江青说她要把这封信“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揭开《解放军报》的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并且组织一个“试点”单位的少数人，专程到北京给《解放军报》贴大字报，说“军报内部路线不明，可能有坏人”，“在关键时刻和中央唱对台戏”。

1975年3月11日，江青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强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把《解放军报》变相停刊178天。

北京南郊紧靠京广线的窦店村，是北京军区某部八连的驻地。1974年1月底，江青下令把正在烧砖的十多个战士请到人民大会堂，要他们汇报部队基层批林批孔的情况。

八连一直忙生产，从来还没有接触过批林批孔问题。指导员只好根据自己平时看报和听到的情况汇报了一下。

江青听了不大满意，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不料八连从此竟成了江青批林批孔的“点”。

这个“点”由“江办”直接指挥，连续派来教授、记者和报导组，在四个多月里竟在《解放军报》发了八连七个头版头条新闻。此外，还写了多篇的大批判文章和批判专版。这些全是常驻八连的写作班子，借用八连指战员名义炮制出笼的。

5、阴云笼罩着周恩来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得到的权势，借用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据 1980 年 5 月 31 日王洪文交待，1974 年元旦过后，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毛主席提了几次批林批孔，总理不布置。”江青当场诬蔑总理说：“总理，你也有孔老二思想。”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日理万机。他既要对内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又要花很大力量处理对外事务工作。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审时度势，大力促进国际形势的新变化，1972 年 2 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缓和；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外，并同许多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推动了世界和平的发展。

对这些震撼世界的外交成就，江青虽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宏伟业绩，但她总是伺机挑唆，对周恩来进行迫害。

1973 年 11 月 10 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问北京。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就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令人迷惑的现象是中国报界正在开展的‘批孔运动’，各种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运动是指向周恩来的。”在基辛格看来，“阴影笼罩着周恩来”，“这个人坐在火山口上”。

11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翻译王海容、唐闻生从机场送走基辛格以后，两人径直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这时，有人间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昨天晚上周恩来来过没有?打过电话没有?当她得知周恩来事先没有向毛泽东报告会谈的具体内容时，她就边走边说，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对会谈中的一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美国会谈中有错误，是“温和派”。指示政治局应该批评总理。

江青四出活动，分别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成立了所谓“帮助总理小组”。

江青恶毒地把这次“帮助”，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时，年高 76 岁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五年。他忍着病痛的折磨，仍日夜不息地坚持工作。为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顾全大局，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经历着多么大的痛苦!

这时，“四人帮”控制的报刊，采取影射的写法，指桑骂槐，万炮齐发。

1974 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

的文章中，假借描写孔子“71 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影射攻击周恩来。

《北京日报》刊登《从〈乡党〉看孔老二》一文，描写孔子“端起胳膊”，“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对江青来说，是想通过“批周”，将周恩来一棍子打倒，实现她夺权当“女皇”的美梦。

但在毛泽东看来，“批周”这只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赞同“批林批孔”，但不赞成公开“批周”。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这株大树不能倒。如果“批周”，周批倒了，谁来帮助他支撑国家的大局呢?

1973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以后，他同担任翻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谈起对周恩来的批评会议，说：“这次会开的很好。缺点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指江青)。一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也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对他批评不得。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在这次会上，外交部长乔冠华也对周恩来进行了不公正的批评。对此，他感到内疚。后来，乔冠华利用一次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病重的周恩来表示认错，请他原谅。周恩来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

江青集团反对周恩来由来已久。1983 年，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会上讲话时曾这样分析说：

“江青集团反周恩来总理的第一个高潮，是 1966 年 8 月至 1967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为此发了脾气，说，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才把反周的气焰压下去了。但暗地里仍有一股反周暗流。林彪自我爆炸，这股暗流又起来了。1973 年至 1974 年批林批孔，又是一个反周高潮，这是第二个反周恩来高潮，第三次，是 1976 年总理病重以后直到逝世……”

这次是第二个反周高潮，配合社会上发动的“反复辟回潮”、“反潮流”，又一次掀起动荡，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一度恢复和发展。

6、“反复辟回潮”

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发动“批林批孔”的同时，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联系实际，在一些教育单位树立典型，进行“反复辟回潮”。

1974 年 1 月，迟群一伙打着所谓“反复辟回潮”的旗号，在清华大学用三个月时间，

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给 400 多个被批判的教职工扣上“反对教育革命”、“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帽子。

针对国务院关于提高教学质量、高等院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试的规定，在辽宁的毛远新竟诬蔑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他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进行批判和反击。

1973 年 6 月 30 日，辽宁兴城考区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在答物理试卷时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信乞求上大学:“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报纸发表时把这话删掉了。)7 月 19 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示，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

接着，《人民日报》又于 8 月 10 日予以转载。一时间，全国报刊大肆宣传这位“白卷英雄”的“反潮流精神”，对教育工作和招生考试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

《红旗》杂志、《教育革命通讯》也都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不仅进了大学，入了党，还当上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了“闹而优则士”的典型。全国刮起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张铁生到处发表讲演。他在山西太原等地公然叫嚣，要“回击回潮风，今天呀，我们要做一把钢刀，直刺教育部”。1973 年 12 月 12 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且配合了近千字的按语：

“这个 12 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人民日报》于 28 日全文转载了来信，并配发了一则新闻。几天时间内，一个小学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

江青一伙利用这个小学生对老师的看法和意见，煽动师生对立，批判教师，破坏学校秩序，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1974 年 1 月，江青一伙制造了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该校一个女生因外语成绩不好受到批评，投河自杀。当地对此事已经做了认真处理。可是江青却借此大做文章说：“我向你们控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我派人去调查了，硬活活地逼死了!”王洪文说，“这是搞法西斯专政”，“这样的教师我主张判重刑”。接着在全国大抓“马振扶事件”式人物，仅在河南就制造 150 起迫害学校教师的冤案。

他们还在文艺界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进行批判。硬说《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招魂”，是“反共黑线回潮”；把歌颂教育工作者的《园丁之歌》，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再一次对文艺工作者进行迫害。

在“反复辟回潮”的浪潮里。1974 年 12 月下旬，国务院科教组、农业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这次会议，大力鼓吹坚持农村办学、分散办学，“三上三下”，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经验。会议提出：农业大学必须搬到农村去办，实行“社来社去”；“学大寨”应是农业大学学生的必修课、基本课；工业大学要把“学大庆”作为基本课；“要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远新提出：朝农的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下，一些地区又出现了混乱。名目繁多的上访团、联络站一类组织，重新又括跃起来，争山头、闹派性、打内战，到处揪斗老干部。一些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重新被打倒，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陷入瘫痪。

许多工厂企业的生产陷入混乱。例如，全国 270 个铁路局，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只有七个，徐州、郑州等地列车经常堵塞，京沪等地的重要干线不能畅通。据 1974 年 1 月至 5 月统计，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2．5％。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6．2%，钢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9．4％，化肥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3．7％。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5 亿元，支出增加 25 亿元。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是他并不愿意全国再重新陷入混乱，不愿再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因此，当江青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时候，他有意地给江青泼了一瓢冷水。1974 年 3 月 20 日，他在回江青的信中说：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为制止混乱局面继续发展，中共中央 4 月 10 日发出通知，明确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针对流行的所谓“反复辟回潮”的歪风，批评极“左”思潮，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通知》严厉批评“只要造领导反的就是反潮流”和“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明确指出：“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对于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的行为，决定指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通知》下达后，八月份工交生产有了回升。

第二十五章 谁来“组阁”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面遭到破坏，进一步恶化了全国的经济形势。一些造反派头头日夜想的是：“造反派要打天下，要坐天下”，派性斗争烽烟四起，各派势力称王称霸，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被打倒、被打跑。

谁能够挽救日益危急的形势呢?

1、“请来一个参谋长”

毛泽东想到邓小平。

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 1969 年 10 月 26 日，被流放到江西新建县望城岗一个原是步兵学校的地方了。

在 1956 年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邓小平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毛泽东说，邓小平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比较有才干，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1956 年 9 月 28 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领导岗位上，他以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想，果断的魄力，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把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贯彻到全党的政治生活中。他连续十年担任总书记职务，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

但是即使在“打倒一切”的高潮里，毛泽东也没忘记他，并且对他做出高度的评价。在危机时刻，仍然寄希望于他。

1991 年 3 月 12 日，笔者访问王力。70 岁的王力谈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时说：“1967 年 7 月，毛泽东在武汉单独与我谈话。我向主席请示说，你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

毛泽东当即对王力说：“刘少奇与邓小平不同。邓小平一直在军队工作。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比。林彪如果身体不行了，还是邓小平出来。”

毛泽东这次重提 1957 年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过的话：“你别看他(指邓)个子小，把苏斯洛夫那个大个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小平指挥两个野战军，还没有另外一个人指挥过两个野战军。”

这个曾“指挥过两个野战军”的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被流放了。

流放邓小平的空旷校园内的小丘顶上，有一座两层红砖小楼。楼里住着三位老人：时年 65 岁的邓小平，以及他的继母夏柏根和夫人卓琳。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 200 多岁。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在江西的日子里》的回忆文章里，真实感人地记述了那三年多的生活。

“在我们的小院子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

“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

从 1969 年下半年到 1973 年初，邓小平曾在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配件厂参加劳动。邓小平做的是钳工，妻子卓琳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劳动中同工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在这几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曾和邓小平在同一车间劳动的陶端缙，回忆起那段日子十分动情地说，无论刮风下雨，每天上午邓小平都要从住处步行两公里左右到车间来。

在那条被称为“邓小平小道”的坎坷小道上，他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一次，他晕倒在车间里，女工小程从家里端来一碗糖水，帮他苏醒过来，用一台拖拉机将他送回家里。

当时厂里每年生产的 100 多辆拖拉机挂车件和螺丝，几乎都是这位已经 60 多岁的“老钳工”做出来的。他非常肯干，不愿接受任何照顾，车间专门配给他的电风扇和休息间他都不用，坚持和工友们在一起，他还经常打听工友们几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几口人，生活得怎么样，家里有没有收音机等等。陶端缙说，我们清楚地记得他多次启发大家的话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就必须把经济搞上去。”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经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路。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

1993 年夏天，邓小平曾对人谈到下放江西的那段难忘的生活，他深情地说：“这首先要感谢党、毛主席和周总理了。他们照顾我，也可以说保护我，让我全家到江西，连老母亲都同去了，我又主动上一次劳动大学。”

卓琳在旁边插话说：“他白天到工厂上机床，下午回来经营我们的小菜园。我还养了一群鸡，副食可以自给自足，日子过得很充实，身体都长结实了。”

但对于一代伟人来说，工厂的天地究竟是太小了。

邓小平多么渴望自由呵！

1972 年，届时已经 68 岁的邓小平同志，日夜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军事家，时刻思念的是，民族的兴衰，人民的幸福和苦难。他脱离沸腾的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快六年了。他像一只被关在铁笼里的雄狮，每天注目着自由的天地，壮丽的山河。他再也无法忍受孤寂的受折磨的生活；于是，他怀着无限深情和渴望，在 8 月 3 日这天，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写道：

"在去年(1971 年)11 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1972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写了很长一段批示，指出：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笔者注：1933 年 3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推行"左"的政策，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进行斗争。)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次充满关怀和热情的评价，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了条件。"批示"发生的深远影响，为后来历史性的转折，开拓了灿烂远景。

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立刻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便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进行讨论。

周恩来又马上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他指示："可以让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他还指示立刻将邓小平原来的秘书、公务员派到江西邓小平的身边，协助他工作，帮助照顾他的生活。

2、邓小平的历程

邓小平生于 1904 年 8 月 22 日，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是他的故乡。在曲折漫长而又艰巨辉煌的革命历程中，他 1920 年 9 月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年仅 16 岁。1922 年他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 年初邓小平离开巴黎，先后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春他受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党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他参加了 1927 年在武汉举行的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八七会议”。1928 年 23 岁时，他在上海任党中央秘书长。

1929 年 12 月，他同韦拔群、张云逸将军一起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第八军，担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1 年 8 月，29 岁的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瑞金、会昌任苏区县委书记，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和错误处理。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1935 年 1 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贵州，邓小平任《红星》报主编，并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

抗日战争期间，1938 年 1 月邓小平任八路军 129 师政委。他同师长刘伯承亲密合作，在血和火的斗争中，浴血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5 年抗战胜利，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

解放战争期间，名震世界的刘邓大军 1947 年 6 月南渡黄河。8 月刘邓大军甩开敌人，千里跃进大别山区。1948 年 11 月，邓小平作为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同志并肩战斗，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消灭国民党军 55 万多人。

1949 年 4 月，第二、三野战军在长达 500 公里的战线上，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西南进军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云、贵、川、康四省，消灭敌军 93 万人。

1950 年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领导西南人民迅速恢复并建设新的生活。

1952 年 8 月，邓小平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1954 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他被列为“最大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打倒之后下放到江西三年零四个月。

1973 年 2 月，党中央通知邓小平回北京。

1973 年 2 月 20 日，邓小平带着一家祖孙四代，近十口人，离开江西，告别了长期被隔离的生活。

2 月 22 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进花园村的一栋楼房里。

积极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周恩来，随即连续几次抱病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3 月 10 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 年 4 月 12 日晚 7 时 30 分，穿着中山装，留着小平头的邓小平，踏着红地毯，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他迈着稳健的步伐，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晃动着宽阔的肩膀，伸出刚强有力的手，热烈欢迎从柬埔寨解放区来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他举起右手，向出席宴会的外交官、新闻记者频频招手致意。

顿时，大厅里响起一阵掌声。当他同周恩来等中国其他领导人一起坐在主宾席时，几十只摄影机对准他微笑的面孔。

这天晚上，外国新闻记者向全世界发出一条震撼人心的新闻：邓小平复出!邓小平重返政坛!外国媒介形象地称："邓小平是打不倒的小个子!"

邓小平的复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文化大革命"风暴里被停止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邓小平，被称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从流放的"罪犯"又回复到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成为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代表。这在国内外都是独一无二的。

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好了，搞久了就油了。他说，为这件事，他想了好几年了。

在这次会上，他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指出：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毛泽东说，他和叶剑英商议，提议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毛泽东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庄严雄伟的歌声，激荡着每个人的心。

毛泽东再次重复一句："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

12 月 1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再次指挥到会同志，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 月 15 日，毛泽东对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问题、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作了长篇讲话。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人才难得，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

他面向到会的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他接着又说："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工作本身就是错误。"

12 月 21 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

毛泽东对到会的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我不是对你讲过吗?对这个世界上的事，心放宽些，胆子要壮，心要宽，胆要大……”

会上，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后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从后排叫到前排，鼓励他要读书，要学点文学。毛泽东语重心长向到会同志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重厚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毛泽东紧接着又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拿主意。

许世友当时回答说：“出了修正主义，就把它消灭掉!”

后来，许世友在京西宾馆同笔者谈起大区司令员对调运件事时，谈起他怎样理解了“当代吕后”的阴谋。他说，他读了《汉书》，知道是周勃跟刘邦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汉朝。刘邦去世以前；吕后向他请示，谁可接替萧何的职位?刘邦答：“曹参”。“曹参以后?”刘邦答：“周勃”。“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刘邦死后，吕后结党营私，要诸吕篡汉夺权。大将周勃等人揭穿了吕后的阴谋，把诸吕消灭了，保卫了汉朝的江山。

许世友说：“毛主席是要我们保卫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这一下更加擦亮了我的眼睛。毛主席讲周勃，江青却大讲吕后，分明是同毛主席唱反调嘛。后来，毛主席一再批评‘四人帮’，我的心更亮堂了，更心中有数了。”

3、江青多方破坏

1974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让机要秘书给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打电话，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在亲笔写的电话记录上这样写着：“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召开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四人帮”对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安排和“以安定为好”的指示，极为不满。江青一伙暗地活动，多方制造事端，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

因癌症而住进 305 医院的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连日便血，不得不进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在极度的痛苦里，他每日每时都在关心着国家大事，而他特别牵挂心头的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接替他现在的职位。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1974 年 1 月 18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及紧急作战事项。

会后，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从此，邓小平进入军队领导核心。

1974 年 4 月，第六届联合国特别会议召开会议。派谁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这次特别会议呢?

政治局为此专门开会。会上，有人建议邓小平去参加，但是江青却坚持不让邓小平去。

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当即把政治局开会的情况报告毛泽东。

3 月 27 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劝阻她不要拦阻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全文如下：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　3・27”

在毛泽东写信之前，王海容、唐闻生早在 3 月 20 日左右就为此事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主动提出要邓小平去，外交部长乔冠华当他的参谋。毛泽东并嘱咐她俩：“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应由外交部名义写报告请示中央。”

毛泽东对中国参加联合国会议十分重视。1971 年 10 月 25 日，当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心潮起伏，十分高兴。这一次，他又亲自提名让邓小平去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

据王海容、唐闻生后来的证言，外交部于 1974 年 3 月 22 日送去请示报告，周总理 3 月 24 日批示，同意邓小平去；同一天，毛泽东也批示同意邓小平去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

但在 24 日晚上，拼命阻拦邓小平出席联大的江青，却把王海容、唐闻生俩人找到钓鱼台，蛮横地强令王海容、唐闻生撤回外交部给中央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向她解释说，第三世界国家特别重视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许多国家元首出席，我们宜派副总理去。王海容、唐闻生并且说，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圈阅批准了，怎么能随便改变呢?

可是江青仍不死心。3 月 25 日夜间，江青连续给王海容、唐闻生打来四次电话，继续纠缠逼迫她俩要撤回外交部伪报告，王、唐十分厌恶江青的泼妇劲头，理直气壮地把她顶回去了，说：主席已经批了，你还要撤什么呢?

3 月 26 日，政治局开会。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在另一小房间，像解释又像表功似的，对她俩说：“主席从来是允许我保留个人意见的，主席原来不同意批彭真、吴晗，但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就组织人批判评海瑞罢官文章，这样才开始点燃了文化大革命啊!”

邓小平在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4 月 4 日，毛泽东批示："好，赞同。"

邓小平 4 月 10 日在联大的发言，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原则和立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当邓小平说到"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对邓小平提出的国内工作意见以及采取的措施，毛泽东都欣然同意，并说："这样办好，由你定。"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支持、鼓励，使江青一伙感到威胁和压力。周恩来、邓小平成了他们"组阁"夺权的不可跨越的障碍。为加快"组阁"夺权的步伐，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她指使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大肆鼓吹历史上的吕后、武则天，大造反革命舆论。

1974 年 6 月 11 日、14 日，江青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两校大批判组"、中央党校写作组成员，宣称："儒法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问题。"

江青吹捧武则天说："武则天是个法家，这个人了不起，她是搞男女平等的。""武则天做皇帝，全国几十万人上书拥护她"。

6 月 19 日，江青亲自带着她的一伙人，到天津召开了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她在会上大讲：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的。她标榜自己是法家的"女中豪杰"，无耻地为自己的丑恶行为辩护，公然大讲"女人……可以有'面首'，……'面首'就是除了自己的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6 月 23 日，江青窜到河北省宝坻县小靳庄，吹嘘"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随后，她借打乒乓球的机会，故意说："周总理是我手下的败将。"

她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鼓吹"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梦想当"女皇"。

江青还在天津大力推广所谓"江青裙"。她要服装设计人员按唐、宋、元服特点，制作"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要裙子下摆一寸一褶，褶褶都绣有梅花。她还计划给妇女设计什么"国服"，制作"开襟领连衣裙"，给她登上"女皇"宝座做准备。

江青的丑行，引起毛泽东的警惕。

7 月 17 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你也是难

改呢。”

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伙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4、“风庆轮”事件

1974 年 10 月 18 日 9 时左右，一架银白色的专机，从北京起飞了。

坐在这架飞机里的，是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他背着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偷偷地从北京起飞，赶在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向正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

江青一伙的诬告，要从他们炮制的一出反革命闹剧——“风庆轮”事件说起。

1974 年 5 月 9 日，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启程，经过大风大浪的好望角，驶往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往返航程 3．2 万海里，历时 150 天，在 9 月 30 日，国庆前夕返回上海了。

1974 年 8 月 13 日，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说：“风庆轮回来要好好宣传一下。不能只一条消息。这是路线问题。这条船即使在海上沉了，也是很大的成绩。这次要好好批评洋奴哲学。”

9 月 29 日，“风庆轮”一到吴淞口，市委书记徐景贤第一个登上轮船迎接。

从 10 月到 11 月，《文汇报》发表了 44 篇文章和报道，其中有九个整版；《解放日报》发表了 20 个整版，有 66 篇文章、通讯、评论，借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疯狂攻击国务院领导同志。

连日，上海等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大量文章、新闻、通讯，大吹大擂风庆轮的业绩。邓小平一眼看穿江青一伙的借机哗众取宠的诡计。他气愤地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 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航行途中，“风庆轮”曾发生一次故障。交通部派往船上的副政委李国堂，是位有着 20 年远洋经验的老同志。他认为应该把“情况”立即向国内报告，这本是正常的航行规则。可是有人却诬陷他是“要电报员发出呼救”，胡说什么“这是向全世界宣布风庆轮不行了”。李国堂因反对这种说法，被说成是唱“对台戏”。在船上，因为他和顾文广抵制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因而受到迫害，被诬陷为“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返航上海后，李国堂、顾文广遭到批斗，被定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10 月 13 日，新华社对“风庆轮”航行中的情况，写了一篇内部情况登在《国内动态清样》。

10 月 14 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不问青红皂白，马上大笔一挥，气势汹汹地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号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

江青胡乱编造的大帽子，立即得到王洪文的支持。他随手在传阅件上下达命令："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批判。"

同一天，张春桥也恶狠狠地批示："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姚文元也紧跟批示："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媚外思想是由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

长于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紧跟在"四人帮"的后边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周恩来对他们五个人的批示未表态。只是圈了个圈，批示："已阅。"

江青一伙人，为什么要对一个普通的革命干部大动干戈，进行围剿，扣上各种大帽子呢?他们是要借着这颗炮弹，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在四届人大前夕，实现由江青"组阁"的目的。

江青的阴谋早为邓小平识破。当他们的批示传到邓小平的手里时，他只轻轻地划了一个圈，即不批示也不表态，惹得江青火冒三丈。

1974 年 10 月 17 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借机发难挑起争端，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气势汹汹质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邓小平严正地说："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

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当场批驳江青："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邓小平愤然走出了会场。

政治局会议无法继续下去，不欢而散。这时，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江青一听，神经质地说："政治局不务虚，又不向主席报告。今天这个问题要辩论清楚。

邓小平同志这样说，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几个要马上碰碰头，得想个法子对付。”

第二十六章 幻梦的破灭

1、长沙告状

1974 年 10 月 17 日政治局散会后的当天晚上，江青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她的住处“碰头”。

据王洪文、姚文元交待，在碰头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搞串联。总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又说：“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 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邓在民主革命时候会打仗，社会主义革命时候不一定会打仗。”他诬蔑造船工业是“崇洋媚外”。

姚文元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同志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每次到开人大的时候，总要出点事，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知道邓小平很快就要陪同丹麦首相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所以提出，是否要把江青同邓吵架的事报告主席，同时把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选举、总参谋长人选等问题也报告主席。

几个人密谋以后，都同意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

恶人先告状。江青说：“你要去就早去，最好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以前去。”

王洪文立即打电话到长沙，由机要秘书张玉凤转报毛泽东，征得同意。

第二天，10 月 18 日一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委员，匆匆忙忙坐飞机向长沙出发了。

81 岁高龄的毛泽东，当时正住在长沙养病。10 月 18 日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

文。当时在场的有机要秘书张玉凤。

1980 年 7 月 18 日，张玉凤在给特别法庭的证词里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总理还在休息，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要赶回去，他们几个人还等待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另据王洪文交待，毛泽东听他说到他也同江青吵过嘴时，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还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姿势，说：“顶起来了吗?”

毛泽东告诫王洪文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参观了湖南师范、橘子洲头，于当天下午飞回北京。在长沙时，主洪文当面向毛泽东说，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但是一回到北京，他不是去找周恩来、叶剑英，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等人汇报他的长沙之行。

当天夜里，“四人帮”再一次聚集到钓鱼台 11 号楼。他们还特地把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记录、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找了去，争取她俩的支持和同情，再向毛泽东汇报一次。

碰头会上，张春桥先介绍了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收支不平衡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再次把 17 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到长沙，在陪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再次诬告邓小平。

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既然王洪文已经向主席报告过了，何必还叫我俩去报告?当即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

江青一再坚持要她俩再去报告。她俩深知江青的为人，感到江青又要“闹事”了。第二

天，俩人到 305 医院向病中的周恩来，汇报了同江青等人的谈话情况。

面容消瘦的周恩来，静静地听着，皱着浓眉说：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很久，这回是忍无可忍了。”

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唐闻生把这几天北京发生的事情，把跟周恩来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听后，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2、“江青还在闹”

为扭转社会混乱，逐步实现安定团结，10 月 20 日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还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同唐、王二人谈话时，还赞扬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顶江青。并指示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文件。

11 月 12 日，邓小平同志陪同也门外宾再次来到长沙。毛泽东在接见邓小平时，再次谈到邓小平在 10 月 17 日政治局会上顶江青的事。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着说：“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接着，他用手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只好担起来了!”

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把工作担子担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这里谈的去见江青，是指政治局会上吵架以后，邓小平依照周恩来的建议，主动去看过江青一次。

据姚文元交待，邓小平看过江青以后，江青很高兴地对姚文元说："小平同志来看了我，谈得还好。邓说：会上吵架，钢铁公司碰上钢铁公司了。延安时，我也被叫过钢铁公司……"

3、"不要由你组阁"

王洪文长沙告状，没有达到江青一伙的预期目的。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利用掌握的报刊阵地，连篇宣传"法家路线"，为争夺领导权鼓噪不息。

《红旗》杂志刊出署名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鼓吹要坚持法家路线。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等文，公然叫嚷，要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必须"不断提拔坚持法家路线的新人"，"使中央政权中法家领导集团中既有老一辈法家人物，又有在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法家力量"。

江青一伙还积极通过调整四届人大代表，将他们物色的骨干塞进党政要害部门。

1974 年 3 月，王洪文指示："上海要尽快物色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1974 年 4 月，上海市委组织部还提出一个 88 名中央各部部长备选名单，报送到中央来。

早在 1973 年，江青一伙就开始网罗帮派骨干。据上海帮派骨干朱永嘉交待，张春桥曾向在上海的一伙心腹交底说："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现在这个'换'字不够了，要改成'撵'字。旧人不肯走，就要撵!"

党的"十大"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同到京西宾馆上海代表团驻地，向他们交底。

王洪文说："从上海选出这么多中委和候补中委，准备把你们调中央来。"

张春桥说："你们要做出思想准备，把你们调出来，调各部掺沙子。"接着又说："我和文元、洪文商量，准备调一个工人中央委员到人民日报当社长，他不管编辑业务，那些知识分子也攻不着他。他在那里至少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些情况。"

江青一伙私下多次密谋以后，1974 年 11 月 12 日，由江青出面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她的"组阁"计划名单。例如，让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党中央未来的"接班人"来培养。

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完，毛泽东问站在一旁的汪东兴：“你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坦率地说：“江青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提笔又在信纸上加写上：“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这一天，毛泽东让唐闻生、王海容给江青带去三句话：“第一，不要出风头；第二，不要乱批东西：第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

对毛泽东批评江青的“积怨甚多”，就连王洪文也都深有体会。他对江青的恶劣作风，曾在一次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她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例如，有时斗争不讲策略，处理问题不够冷静，动不动就要态度，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霸道。对政治局的同志不够尊重，往往一个电话叫人家去，一个批示叫人家办。不管老同志、新同志，多数挨江青同志训过。一次，登奎同志被训得当场流泪，而事情又往往无关原则。据说，对待身边的服务人员比较粗暴，群众有些反映。江青同志曾提出，搞外事的人一律穿民族服装。外交部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没有办法，她就给扣上对抗中央的帽子。去年马科斯夫人来访，计划上并没有要江青同志陪同去天津，她事先也没有跟政治局打招呼，临走时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去天津。特别是批林批孔开始，脱离中央集体领导，单独搞了些活动，提出批判‘走后门’、‘三箭齐发’是很错误的……”

尽管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多次严正告诫江青，可是江青本性不改。11 月 19 日，她又以“检讨”为名，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她在信中说：“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 20 日在江青信上批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但是，江青不听劝诫。她马上找到姚文元商量，提议由姚文元出面报告主席，任命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据姚文元交待，他当肘很吃惊，对江青说：“难道党的副主席，不是党的职位?”

江青发火了：“照你这样说，我就不提什么意见了?”

江青根本不把姚文元的话放在心里。她坚持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到长沙时，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她就提议，让王洪文任人大副委员长，名次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听了汇报，再次尖锐批评江青：“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4、“不要搞四人帮!”

“9·13”事件毛泽东失去“最亲密战友”后，1972年9月7日，中央调上海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到北京。从那时起，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及国务院会议，开始了全面的学习与“实习”。

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一边坐着周恩来，一边坐着王洪文。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30日，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位。

这之后，王洪文一连多次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国党和政府首脑，成为国内外政坛上的显赫人物。

共同的阴谋野心，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是“第一夫人”江青，军师是张春桥，笔杆子是姚文元，战将是王洪文。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的同时，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

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四人帮”是何时形成的呢?

对此，王洪文在1976年10月28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我的检查》中交待说：“我回忆是从1973年11月开始形成的。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谈判时的错误开始的。这之前，虽有来往，但并没有一道研究过什么工作问题，一般看电影有机会(除开会)见面。从批评周总理的会议以后，我们四个人的碰头机会才多起来。”

毛泽东对“四人帮”问题曾多次批评。王洪文写道：“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1974年5月1日，主席接见我和江青时候就指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

但是，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作耳边风。据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交待：

“有一次，江青找我们去。我说，主席已经批评了，少数人议论问题，这样不好。”

“张春桥说：毛主席讲了，可以少数人议论问题嘛(我不知是毛主席什么时候讲的)，给了我很大错觉。”

“江青说：你怕了吗?怕什么?我们也没有做坏事。”

5、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下旬，第四次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保证开好这次会议，12

月 23 日，两架专机从北京出发前往长沙。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另一架是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的专机。为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两人一同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毛泽东在 23 日到 27 日，同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四次谈话。

12 月 23 日，—毛泽东一见面，就请周恩来坐在自己的身边，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

毛泽东批评坐在一边的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王洪文满脸通红，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说："他(邓小平)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用手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比他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茶几的纸上，用红蓝铅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强"字。周恩来看了"强"字，连连点头。

周恩来汇报到政治局决定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材难……"

说到这里，主席又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并且用手指着脑袋，一时想不起什么似的。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马上接着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点点头，完全同意周恩来的表述。毛泽东还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接着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

沉默片刻之后，又说："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又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交给了邓小平，是毛泽东稳定大局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坚持要周恩来任总理，江青想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的幻梦破灭了。

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的 81 岁寿辰。毛泽东让王洪文到韶山参观。这天，湖南省委负责人请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吃了一顿简单的寿面。

12 月 26 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到自己的卧室，两位革命老人长谈到深夜，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重要谈话里，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了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一直不让提出这个问题。

这次尽管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提醒，仍没有产生什么作用，以致江青、张春桥都继续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75 年 2 月 3 日，春节前夕毛泽东在湖南住了 114 天之后，结束了在长沙的休养。这是他最后一次告别故乡，取道上海，于 2 月 6 日回到北京。

这时，因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管东西南北中”了!

“四人帮”的地位削弱了。“女皇”组阁的梦幻破灭了!

6、邓小平的重任

1975 年 1 月 1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名单及机构设置。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上，周恩来讲话。他说，在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说，主席说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8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庄严的会场上，主席台第一排右边，坐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左边坐着王洪文、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两个阵营，界线分明。

当周恩来走上大会讲台时，全场 2864 名代表用热烈的鼓掌向他表示致敬。他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激情地报告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

大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等 22 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 12 人为副总理。邓小平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

江青提议的“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否决了。江青提议的“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否决了。

这次大会粉碎了江青的“组阁”阴谋。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肯定了“批林批孔”，并且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做了肯定。左倾的指导方针在党和国家工作中，仍占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大会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及选举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领导，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鼓舞，增强了信心，唤起人民对生活的新希望。

江青对四届人大的成功极为不满。大会一结束，她立即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气急败坏地在她俩面前，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一遍，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受到重视，当上了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一再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在陪外宾到长沙时，一定要把她的意见报告主席。

1975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陪同前来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不满。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惊异地问毛泽东。

毛泽东摇摇头，愤然地说：“不在她眼里!”

一阵沉默之后，毛泽东头向后仰，预言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正当政局发生演变的时刻，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 8 号楼，向她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

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7、反经验主义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它像进军的春雷，召唤着深遭磨难的人民。

1975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要求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春桥，1975 年 3 月 1 日，利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机会，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胡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他提出要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用大量篇幅论述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认为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之后，张春桥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 月 1 日在《红旗》杂志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说：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 月 4 日，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在“四人帮”指挥下，全国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倒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

4 月 18 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坦率地表示不同意

江青等人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的请示报告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步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在批示里严正批评江青等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他明确提出建议，"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揭露他们想利用"反对经验主义"这个口号，重新把四届八大确定下来的国务院领导体制搞臭，让开始稳定的局势重新大乱起来。

叶剑英激动地说："现在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把"经验主义"当作主要危险，严重阻碍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贯彻。

8、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

1975年5月3日，近83岁高龄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参加了。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了。

毛泽东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周恩来消瘦的脸容上，漾起了微笑。他深情地望着毛泽东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主席关切地问："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开了三次刀，消化还可以。"

然后，毛泽东逐个同政治局委员握手，风趣地谈话。

在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上，他再次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之后说："我说的是安定团结，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又要批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毛泽东边说，边打手势)。"

毛泽东自我批评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我放过了。"

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再次警告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针对“四人帮”提出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说不上……”

毛泽东谈话中再次提到，“三箭齐发”。他批评在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 1931 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在场的邓小平说：“当时我们只见过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未作一句检查。毛泽东神色严峻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后，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同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表态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一个翻来覆去的手势，警告说：“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9、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谈话中触及的“反经验主义”问题，是 1975 年在开展全面整顿的同时，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提出来的。

1975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转述了毛泽东 1974 年 12 月 26 日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他长期以来左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他提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不翻案，为左倾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里，寻找“理论根据”，从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进行辩护。他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

些必不可少的、有益的东西，错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并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遵照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经过同周恩来商量，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于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两次开会，讨论如何贯彻 5 月 3 日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发言就江青等人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题，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5 月 27 日的会议上，邓小平神态严肃而郑重地说：5 月 3 日主席在政治局的讲话，提到了党内生活的很多原则，这是告诫政治局这个党的核心机构的。这对于我们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这样，才能给全党做出榜样。

邓小平尖锐地批评江青一伙的错误，说(去年的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说成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意思，后来由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提出要批走后门，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却又提出主要危险来自经验主义，并且来势凶猛。主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但是却钻出来这么三件事，倒是要提一个问题，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三要三不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值得警惕。

惯于胡搅蛮缠的江青，心里窝着一团火，可是不敢发作。她明知这次批评他们一伙，是根据毛泽东授意，如果当场顶撞，岂不惹起大火，炸了锅？她只得悄悄地低着头，默默地静听着。

6 月 3 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四人帮”。会上，两方阵营分明，迎面对垒。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的一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坐在桌子的另一边。

叶剑英首先发言。他讲了三个问题。首先讲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 月 1 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

在讲团结问题时，叶剑英说，要团结，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

讲到第三个问题时，叶剑英说，要严守纪律。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为什么不请示。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不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不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来纠正。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这次会上，李先念、陈锡联等同志相继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评。

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敷衍塞责地作了点自我批评。他说：“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指批孔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反经验主义，我没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

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主席批评，主要错误是他。

江青迫于形势，在6月3日会上表态说：5月27日的会，我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强认识。上次会，我有体温，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还要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会议。他说，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10、“风向快要转了”

1975年5月27日、6月3日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对“四人帮”进行的初次交锋。尽管话没有全部讲完，但却大杀了“四人帮”的威风。在正义的剑锋前面，“四人帮”一伙被迫认错了，形势所逼，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

江青在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书面检讨里写道:“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关于“四人帮”问题，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到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发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

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王洪文也写了检讨。他在检讨批林批孔中的错误以后，写道：“虽然对于两个大会的召开我未提交政治局讨论，未报告主席，关于反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江青一伙虽受到批评，但很不甘心。邓小平与江青一伙之间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会后不久，6月份，在一次会见外宾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邓小平兴奋地对毛泽东说："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说："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陈锡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文革"时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四届人大前毛泽东自提议陈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体委工作。但体委主任庄则栋有事不找陈锡联，总是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所以，毛泽东再次同邓小平提起此事。

谈到政治局的动向，毛泽东形象地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们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

毛泽东肯定地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说："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泽东说："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毛泽东进一步鼓励邓小平："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这方面我还有决心。"

毛泽东很高兴："那好!"

邓小平庄重地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了起来，并引用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对"四人帮"的批判，为后来开始全面整顿工作，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十七章 刀尖上的战斗

邓小平把自己比作一把刀子。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时。

这时，毛泽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这时，江青反革命集团仍然猖狂作恶，到处制造混乱；

这时，武斗之风重新泛滥，坏人兴风作浪，资产阶级派性掌权，一派整一派，生产下降……严重的社会危机，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

改变混乱的局面，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他不止一次说，要像在战争年代一样，杀开一条血路!

1、杀开一条血路!

邓小平肩负重托，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他为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奋力进行着"刀尖"上的战斗。

1975 年是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重任的一年；

1975 年是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左倾方针仍占主导地位情况下，同猖狂作乱的江青"四人帮"一伙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一年；

1975 年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旗帜鲜明地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一年；

1975 年是十年动乱年代经历艰险斗争，全国形势出现转机的一年。

被毛泽东赞誉为"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的邓小平，如今，在"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废墟上，带领人民开始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历史进军!

1975 年 2 月 1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任命的总理、副总理的名单，新任命的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 12 位副总理出席了会议。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特地从医院出来主持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会议。

周恩来一开始就真诚坦率地说："我的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医院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

接着，周恩来庄严地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他说：“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周恩来亲切地环视全场，脸上洋溢着喜悦，嘴角上挂着微笑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他的讲话，激起一阵热烈掌声。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

邓小平这篇气势凌厉的讲话，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2月10日，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号召全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抓住突破口

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到会讲话。参加会议的有不少人是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过的干部。当他们看到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会场时，有些人走上前来与他握手。这时，邓小平却突然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今天不握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沸腾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他望着大家，声调缓慢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

许多武斗严重的地区，“大动脉”被切断，车站趴满一列列卧倒的列车，没有了汽笛高歌，没有了车轮的飞转。冷冷清清的车站，是凄凉的死的沉寂。这怎么能行?

邓小平说：“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把整顿铁路当作突破口。

邓小平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一支烟，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

主义强国。”

讲到“反对派性”时。他把茶杯盖“哒”的一声盖在茶杯上，高声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他说，现在的大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他针对一些到会领导干部的思想顾虑，指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他的铿锵有力的讲话，是对各地领导干部的鼓舞，也是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和鞭策。

为贯彻 3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亲自点将，要铁道部长万里亲率工作组，马不停蹄，奔赴“卡脖子”的徐州、南京、南昌、郑州等铁路枢纽，解决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大铁路干线的阻塞问题。沿途万里同志反复向职工讲：“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九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就没理。”

整顿中，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帮助，限期改正，不改的即撤职、调离；对煽动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逮捕法办。

由于整顿了领导班子，唤起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实现了万里一个月前提出的口号：“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四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 53700 多车，比二月份多装一万多车。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工业战线的转机，打破了工业战线长期停滞的局面。但是钢铁工业的落后局面尚未改变。为扭转一年多来几乎月月未完成国家计划的钢铁工业，5 月 8 日至 29 日，中央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

邓小平在会上两次发表重要讲话，一再强调“要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找一些不怕被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

邓小平鼓励大家要大胆工作，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他还强调要落实政策。特别注意把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著名的口号，以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生活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武器，对“四人帮”进行斗争。

3、一不做，二不休

6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文件指示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钢铁工业座谈会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一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嘴里喷火”的打砸抢分子，被清除出了领导班子，钢铁生产迅速扭转欠产局面。六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 72400 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6 月 16 日至 8 月 11 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议。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是散和乱，必须狠抓整顿，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七月中旬，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7 月 17 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在形势转机的情况下，7 月 20 日至 8 月 4 日，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拖着尚未治愈的伤腿，奔走在混乱不堪的国防科工战线。在有名的"老大难"单位七机部，他号召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严肃地说：在问题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他们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通过办学习班，调整企业领导班子，迅速扭转了局面。

邓小平顶住"四人帮"的攻击，一不做，二不休，努力纠正左的错误。

军队是国家的支柱。7 月 14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深入分析了军队情况，尖锐提出要整顿军队，消除"肿、散、骄、奢、惰"现象，认真解决领导班子中的"软"、"懒"、"散"问题。他说："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写出来照着稿子念就没有错误?"他强调指出："要敢于负责，不要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

叶剑英在发言中指出："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

叶剑英在发言中把锋芒直指"四人帮"。他气愤地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同意，任何人不能这么做。"

接着，叶剑英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负责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对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严肃指出，决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会后，军队各级领导班子迅速作了调整，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出去，落实了干部政策，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军队的整顿，对顶住"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4、"老九不能走"

教育、文化、艺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1975 年 7 月，毛泽东多次谈到文艺政策的调整问题。他明确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要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针对文艺工作“百花凋零”的状况，提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鼓励文艺界知名人士向中央反映情况。

7 月 25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转给他的电影《创业》导演张天民的来信做了批示。毛泽东针对“四人帮”加给张天民的十大罪名，写下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在写这段批语前，毛泽东分两次看完电影《创业》。看完这部宣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电影，他从大厅回到卧室，像往常一样，半卧半躺地靠在床头。从床头小柜上拿起笔和纸。护士知道毛泽东要写东西了，马上拿来一本硬皮精装书，垫着供他写字。护士见他写字的手抖得厉害，就对他说：“您的手抖得那么厉害，以后就别写了，您说，我们给写不行吗?”

毛泽东坚持还是自己写。他说：“还是我自己来，不能以嘴代劳。”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亲笔批示，立即批准放映被江青禁演的诬为毒草的电影《创业》和《海霞》，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66 年 6 月，因“文革”灾难而被迫停刊的《人民文学》，于 1975 年夏天开始复刊工作。张春桥压制《人民文学》复刊，他指示亲信说，不是复刊而是要创办“新生”的《人民文学》，“要夺权，不要原来的人。”

邓小平在复刊的报告上，写下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批示。《人民文学》终于克服重重阻碍，在 1976 年元旦复刊了。

接着，在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时，又批准重新演出《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十月底还举办了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死气沉沉的文艺界焕发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有力地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

工业交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为搞好工业交通企业的整顿，8 月 18 日，邓小平在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发表了《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邓小平明确提出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他说：“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他还提出要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说：“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这个简称“工业二十条”的文件，强调要整顿领导班子，要加强企业管理。它对整顿企业、纠正工业生产中“左”倾错误，发展生产办，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初步整顿，1975 年夏季工业生产形势明显好转。1975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1．9％，其中，工业增长 15％，农业增长 4．6％。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中国科学院、国防

科委等单位都处于瘫痪状态。邓小平指出，七机部现在两派这样闹，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对于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只等一个月。邓小平说，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

5、“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为加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等到科学院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胡乔木的协助下，于九月由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9 月 26 日，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对《汇报提纲》做了充分肯定，他还指出，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他说，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他明确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还说，要提高教师地位—。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科技人员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

他对胡耀邦说：“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他强调，外行要关心内行，诚心诚意地搞好后勤工作，解决他们的房子、孩子及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会后，《汇报提纲》送交毛泽东，准备在他同意后发到全国贯彻执行。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它部门也适用。”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听到文件中讲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说，我没有讲过这话。

邓小平当即回答说：马克思曾这样说过。

邓小平冲破“文革”中的禁区，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这个文件由于毛泽东不满意，而没有下发。后来，“四人帮”诬陷《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之一。尽管如此，《汇报提纲》还是在科技界广泛流传起来。许多科学家和职工从《提纲》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提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像夜航的灯塔给人民指明了方向。

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恢复惨遭破坏的农业生产，中央在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9 日先在昔阳县后在北京召开了有近四千人参加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他说，农业是基础，不管工业发展得怎么快，不管我们科学技术的水平提高到怎么样，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在会上说：“毛主席讲，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讲，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说：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小平讲话时，江青不断无礼插话干扰，这不仅引起与会同志的义愤，而且当场受到邓小平针锋相对的斥责。农业学大寨的会场，实际上变成了邓小平和“四人帮”面对面交锋的战场。

江青在会上恶意挑拨，大讲与农业无关的事，大谈什么“评水浒”。她阴险地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无理取闹，要大会放她的录音。

华国锋为此事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批评江青是“放屁，文不对题”。

毛泽东的指示，又一次支持了邓小平，又一次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

6、抢救重灾区

教育、文化、艺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也是同“四人帮”进行争夺的重要阵地。筹备四届人大期间，江青一伙妄图把他们的黑干将迟群捧上教育部长的宝座，经过一番较量，他们的阴谋失败了。

老干部周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针对教育工作存在的左的错误，主持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严正批评了把知识分子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大力进行教育战线的整顿工作。10月底，他在一次讲话中批评所谓的“两个估计”，驳斥江青一伙对湘剧《园丁之歌》的诬蔑。他无所畏惧地说：“我这些话是刺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打倒，我也不怕一要横下一条心，做邓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有了新的进展。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报告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傅连章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乎哀哉!”

毛泽东的批示，推动了对干部的解放和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而这封信正是贺诚的女儿写给邓小平并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

7月2日，毛泽东对周扬一案也写了批示：“似可放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根据批示精神，在周恩来和邓小平推动支持下，有300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走出监狱，其中一部分人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昭雪。

这个时期，随着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整党问题也越来越显得重要。邓小平在 1975 年 9 月关于《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党要整顿的问题。他说："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各地方在整党中，突出了对领导班子的整顿。各地根据邓小平讲的"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对派性严重的单位进行了整顿。例如，有的地方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做了处理，对大批"火箭"干部挂职下放，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1975 年 10 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系统地从理论上说明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批判了左倾错误，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文章论点的矛头都是指向"四人帮"的。

"四人帮"对邓小平主持下的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并伺机提出反对。这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连同《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后来被"四人帮"一伙列为"三株大毒草"，印发了 8000 万册，发行全国各地供批判。

但是，广大群众看了这"三本小册子"，不但不批判，反而把它看作是挽救国民经济的"大香花"，不仅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的面目，而且对敢于坚持党的正确方针的邓小平，更加信任和敬佩了。

这种"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反效应，完全出乎"四人帮"的意料!

1977 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7、"你这一年干得好"

在毛泽东支持和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全面整顿工作虽然只进行了九个月，全国形势却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极大地鼓舞了深受"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人民群众。他们从日益转好的形势，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邓小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迅速提高了。

周恩来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工作。1975 年 10 月，他在第五次动大手术之前，躺在手推车上，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没有?"

邓小平听到呼唤，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一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邓小平在三次复出之后，曾多次向国内外人士回忆起“全面整顿”的情景。1983 年 7 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1975 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分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 365 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整顿实质上就是改革。

1987 年 10 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 1974 年到 1975 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 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 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 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 年到 1975 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第二十八章 风暴中的劲松

在十年“文革”大动荡大混乱的日子里，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像屹立在风暴中的劲松，排除干扰，迎接着险风恶浪的一个又一个冲击。

1、第一个冲击波

作为国家首脑机关的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委，全部遭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领导干部倒的倒了，死的死了，被批斗的批斗了。在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的日子里，日夜忘我工作，像参天大树一样支撑动乱局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遭到了突然袭击。

1967 年 1 月 10 日，突袭陶铸的第五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群众代表时，隐晦地暗示说：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靶子，至少!

他们说的“有个靶子”，指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1967 年 2 月 16 日，主持“怀仁堂会议”的周恩来，被江青一伙人指责为“大闹怀仁堂”的总后台、总代表。

2 月 17 日，张春桥受江青的指使，直接约周恩来到钓鱼台 11 号楼谈话，逼周恩来交出中央党政大权。

张春桥说：“主席跟江青交代过，今后，要把中央文革当中央书记处看待。林彪副主席也做了明确指示，今后党和国家大事，都要通过中央文革。”

这实际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夺取中央党政大权。

周恩来被迫写出检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很不得力。“总之，觉悟甚晚甚慢。”

周恩来参加中央碰头会时，多次当面受到江青指责训斥。一次，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他建议请李富春副总理去处理一下。江青一听火冒三丈：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反驳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对周恩来越加骄狂：“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还有国务院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我们中央文革不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

周恩来当即驳斥：“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任务。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中央文革没住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诬蔑说：“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批，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不相信群众，只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了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主席指示，要解放干部，为什么不执行?”

江青威胁说：“你说的解放干部，就是要为走资派翻案!”接着又说：“你不要忘了自己的错误，不要忘了自己的检查!”

周恩来不分日夜地接待来自各省市的造反派代表团，又要亲自出马保护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被迫同外交系统造反派短兵相接。在批陈联络站等造反派的围攻里，过度紧张疲劳的周恩来，额头上沁出滴滴汗珠。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来。

8 月 7 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病床上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八·七”讲话。8 月 9 日，师大校园内，有人马上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他们油印的长篇材料里公开质问：1. 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干了什么?2. 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3. 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叛徒 14. 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

2、“伍豪事件”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在天津领导进步学生成立“觉悟社”。加入这个社的人都以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他便以“五号”的谐音取化名“伍豪”。当时，周恩来多次用“伍豪”为化名、笔名，撰写文章。邓颖超抽到一号，化名“逸豪”。

三十年代，中共中央设在上海。1931 年 4 月 25 日，原为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

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陈云等人的帮助下，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将中央机关转移，同时改变了一些负责人的住址，挫败了特务机关的阴谋。

6 月 22 日，又发生了党中央负责人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又机智地采取一系列断然措施，再次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

敌人完全知道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于是，9 月 1 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等，并于 11 月底又在上海各报登出《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紧急启事》，妄图收买叛徒告密。在这些阴谋都失败之后，敌人又使用卑鄙手段，于 1932 年 2 月间，用周恩来化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妄图在我地下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制造混乱，瓦解英勇战斗在国民党地区的革命力量。

亲自炮制“伍豪启事”，用八万银洋悬赏周恩来人头的是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张冲。(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张冲，他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通过与周恩来的亲身接触，对共产党人有所了解，并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此受到国民党内部责难，38 岁就郁郁而终。周恩来还为他写了“风雨忆同舟，患难谁与共”的悼词。)

针对敌人伪造的启事，党组织派人给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送去戳穿敌人谣言的启事。但《申报》没有刊登。

2 月 20 日，党在上海散发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中写道：“最近的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 243 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造谣的一例。”

同一天，经党再次派人交涉，《申报》用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 18 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

1972 年 6 月 13 日，陈云谈及此启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事实上，周恩来早在 1931 年 12 月，即敌人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已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了。对于这件事，1932 年 2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布了布告。内称：

“……申报等于 1932 年 2 月 10 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 243 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士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时间过去 36 年。天津的红卫兵把在旧报纸上发现的“伍豪”启事影印件，于 1967 年 5

月 12 日抄送给江青。江青如获至宝，不经任何调查，马上在 5 月 17 日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上了“启事”，开始了对周恩来的突然袭击。

江青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江青妄图用这种方法，逼迫周恩来对此事做出交待。

周恩来接信后，马上给予严正驳斥。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造谣。只举出 243 人，而无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立即查阅了上海各报，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了有关材料。他在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的‘伍豪启事’，就是 1932 年 2 月 18 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和材料，作了批示，存入档案。

1968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江青，说：“此事在 1931 年、1932 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 1943 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及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 年 1 月 16 日，毛泽东在另一封涉及这件事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72 年 6 月 13 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陈云以当事人的身份郑重证明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到达中央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了个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康生也在 1972 年 2 月 18 日，口述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1972 年 6 月 23 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中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保存一份，以防今后再有人利用伪造启事制造事端。

忍受着癌症巨大痛苦的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继续同“四人帮”做最后的斗争。1975 年 9 月 20 日下午，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用很长时间又仔细看了他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伍豪事件”，在周恩来、毛泽东、陈云等亲自澄清下，江青一伙妄图利用这一案件进行夺权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

3、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一生，邓小平在 1980 年 8 月 21 日、23 日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时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1967 年 1 月 4 日，江青一伙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了。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对造反派说：“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 月 6 日夜，周恩来得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采取欺骗办法揪斗王光美时，连夜打电话给蒯大富，下令要他立即放回王光美。第二天，周恩来严厉地批评清华红卫兵说，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现在必须肃清这个坏作风。

7 日、8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围聚了三四千人，天天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

七日，江青一伙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策划了 100 多个群众组织共 5000 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对准中南海喊叫。

周恩来面对危局，挺身而出，亲自打电话批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

周恩来多次制止揪斗陈毅、贺龙、谭震林、陶铸等同志。1966 年 12 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陪同陶铸、陈毅、贺龙等人，站在群众批斗大会的主席台上，保护几位老战友。摄影师留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人们特别难忘的是，1966 年 8 月 30 日，周恩来亲自制定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著名党外民主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楷、沙千里、张奚若等人，都在保护之列。

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红卫兵运动，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 年冬，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面对汹涌

的浪潮，要能冷静对待。他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就会被浪头冲掉。"他对一位领导同志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奋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

1967 年 5 月 15 日，当周恩来得知街头出现"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他对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代表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

周恩来对来看望他的彭雪枫将军的儿子、烈士子弟彭小枫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7 年 8 月，发生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数千红卫兵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进入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附近，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次风波，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外交关系与声誉。

8 月 27 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要揪斗陈毅外长。周恩来虽然多次劝说，造反派都不听话。他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了。当医生扶他离开会场时，造反派仍在叫嚷："我们就是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

这时，周恩来从门口转过身来怒斥造反派说："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1979 年 2 月 15 日下午 5 时，笔者在国务院办公室访问了谷牧同志。谷牧深情地谈到周总理怎样保护老干部。他说：

"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一开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当天就去向毛主席汇报。周总理一向保护老帅，迟迟三天不去汇报，就是想把这件事压下来，不要闹大了。接着，他又相继把各省市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谷牧说："总理把余秋里、谷牧保到中南海，当了他的幕后秘书，起草文件。总理带余秋里、谷牧参加会议，造反派问，总理说，我带他们来开会，他们要是走资派，能来吗?当余秋里被石油学院揪走时，总理马上对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说：'你去，现在就把余秋里接回来!'他们闹了三天不放人，总理发了脾气。一天他在碰头会上借批评李富春给文革小组戚本禹看：'你为什么不把余秋里同志找回来呀?'戚本禹听了说，我们想办法吧!后来，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才把余秋里要了回来。"

当时流传说，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的，"只剩下三只胳膊了!"(余秋里长征战斗中被截去

一只胳膊)。

1967 年 1 月，全国“夺权”期间，各地连续发生党、政、军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因抗议江青一伙迫害而付出了生命。1 月 8 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1 月 21 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陶勇；1 月 22 日，煤炭工业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1 月 29 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等同志，都相继含恨逝世。

谷牧回忆说，周恩来手拿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伤痕累累的照片时，极度悲愤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由于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战友和同志，我们国家才得以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4、周恩来纠“左”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开始着手肃清“左”倾路线的流毒，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1972 年 5 月 21 日至六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议系统地揭发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是并没有总结“9．13”事件的教训，没有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问题，反而把粉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当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根据自己的体会，做了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六次党内路线斗争的报告。他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时，严于解剖自己，使大家从对历史上“左”倾路线的反省，进一步认识“左”倾路线的危害。他在 6 月 23 日会上，还对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所谓“伍豪事件”作了透彻的批驳和说明。周恩来的威信更高了。

周恩来主持工作后排除“左”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得到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指示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指出，“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陈云等一批受冲击的高级干部，恢复了名誉，参加了庆祝建军 45 周年招待会。一些长期下放劳动、身体受到摧残的干部，回到北京得到体检治疗。

为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先后进口化肥、化纤等几十亿美元的成套先进设备，促进了化肥、化纤的生产。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务院主持起草的《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进行企业整

顿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质量检验、技术操作、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以及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指标。

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由于“1970 年大膨胀”，国民经济失调，造成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了 5000 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 300 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 800 亿斤。不注意解决这“三个突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要犯错误。

会议《纪要》在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报请中央转发。但是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纪要》中批“空头政治”。他说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因之，否定了《纪要》文件。

尽管文件被否定了，可是反对“空头政治”以及整顿企业的精神，还是广为传开了。

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党中央还做出关于分配问题的指示，纠正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

经过整顿，被破坏的生产秩序开始恢复了。1973 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9．5％；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8.4％。

文教科技事业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国务院科技组提出加强理论教学，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7 月 14 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他还根据杨振宁教授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加强理科基础理论的学习。

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但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干预下却不能发表。后来，虽然在 10 月 6 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却遭到《文汇报》的围攻。尽管如此，文教科教事业还是逐步得到恢复，教育部门的混乱现象逐步得到整顿。

5、批林该批什么?

在批林整风过程中，对批林彪该批什么?开初，报刊主要揭发批判《“571”工程纪要》。接着，又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错误。林彪在这次战役的指挥中虽有错误，但他还是按毛泽东的指示，胜利地进行了辽沈大决战，歼灭敌军 47 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这段胜利的历史，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可批的呢?

到底批林彪该批什么?许多人不清楚，中央也没有明确指示。在报刊宣传上，批林彪批不下去，冷冷清清。《人民日报》有时提反“左”，有时也提反右，各省报刊宣传也不一致。

周恩来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正确地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

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2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国驻

外使节时，在讲话中批评他直接主管的外交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还会抬头。”

这个讲话精神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笔者和编辑部许多同志听了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贯彻执行。

但是没过几天，张春桥、姚文元在接见人民日报社领导班子时，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却另说一套：“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

据人民日报参加这次接见的王若水回忆：

当时张春桥还表示不赞成批“精神万能论”，理由是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也不同意批“唯意志论”，硬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他认为这些都是“过头”的例子。

张春桥、姚文元给批极“左”思潮泼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九月，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时候，再次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72 年 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反极“左”思潮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还加了一篇《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和一篇介绍《巴枯宁》的书评。

这块版马上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法新社记者当天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据王若水回忆，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打给人民日报鲁瑛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很有意见。”

十天以后，《文汇报情况》刊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导。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

11 月 6 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

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的“新精神”显然出于张、姚的授意。

11 月 28 日，中联部和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根据周恩来的思想，提出外事工作中“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周恩来 30 日批准同意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关于批判林彪主要是应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以及他为清除“左”的影响在各条战线做出的努力，不仅是针对林彪的，而且也是针对江青一伙的。江青等人清楚知道，按周恩来的意见把批林批下去，批判的烈火不久就会烧到他们自己头上。因此，周恩来的意见刚提出，就遭到江青一伙的反抗。

12 月 1 日，张春桥看到周恩来刚刚签署同意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马上写了批注意见，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张春桥提出，要把他的意见“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第二天，江青马上做出积极响应，公开否定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江青批阅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她也提出“供总理参考”，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12 月 6 日，张春桥、姚文元又一次对人民日报同志谈话。

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

张春桥说：“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6、毛泽东：要批右

王若水听了这些，怎么也不相信毛泽东会在当时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于是，他在 1972 年 12 月 5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据他回忆，信中说，现在人民日报宣传上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 8 月 1 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 8 月 8 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得是对的，周总理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报纸宣传。

王若水信中反映的意见，同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针锋相对，尖锐对立。

毛泽东看了王若水的信以后，12 月 17 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仍然迷醉于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担心经过批判“左”倾思潮，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之，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肯定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以致做出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迫使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停顿下来。

1972 年 12 月 19 日 8 时半，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鲁瑛、吴冷西和军宣队负责人，应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

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是他们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从容而又亲切，江、张、姚却面带愠色。

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面朝王若水说：“收到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陈浚的、理论部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周恩来接下去讲：王若水听到 8 月 1 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 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是批林彪的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

周恩来讲了至少一个钟头。他还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

7、江青放炮

周恩来讲完之后，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她说：“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这不是对着林彪，对着群众!……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某一个问题上的话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个时间、某些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和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

江青讲完，张春桥接着讲，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怎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的工具?这是极右思想!”

姚文元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只脚跷得高高的，显出一副胜利者得意神情，并不时在别

人讲话的空隙中插上自己的一段话。

张春桥说："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571'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怎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的，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王若水回忆说："我以为我是批张、姚和文汇报，实际上是批到谁的头上去了呢?我感到闯了大祸了，自己倒霉是小事，还连累了总理。张、姚早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意图，而周恩来看来事先不知道。这就是张、姚把事'隋弄得如此神秘的缘故。"

这次会议，从 19 日晚 8 点半开始，到凌晨二时结束，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

会上，张春桥还说，要解决人民日报内反张春桥、姚文元及代理人鲁瑛的所谓"一股邪气，一股力量"问题。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批一股邪气"。

接着，一场暴风雨刮向人民日报社了。编辑部一大批同志陆续受到批判和斗争。这场"批邪"的运动，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超过报社历史上任何一次批判运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人民日报内部"批邪"，建立了忠于他们的领导班子，牢牢掌握了宣传大权，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人民日报内部开展的批"右倾回潮"，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8、周恩来保驾邓小平出山

被邓小平称为"兄长"的周恩来，两人自 1920 年 11 月去法国勤工俭学以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战友之情。"文革"风暴中，周恩来多方面支持、保护邓小平。

1969 年 10 月下旬，当邓小平下放江西监督劳动之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叮咛说：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10 月 26 日，邓小平夫妇和母亲三人，被安排住进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度过三年多被监督劳动的谪居生活。

1973 年 2 月 22 日，邓小平回到北京。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立即将这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复"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给邓小平本人阅看。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汪东兴特地向邓小平通报他遵照周恩来嘱托送交有关文件的情况。

不久，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前来看望邓小平夫妇。这是相别七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邓大姐向邓小平夫妇通报了周恩相别七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邓大姐向邓小平夫妇通报了周恩来患癌症的情况。

3 月 28 日晚，周恩来、李先念和江青一块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

3 月 29 日，毛泽东在住处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 1966 年 9 月之后，相隔七年多，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这次会后，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在国务院担任的副总理的工作。

十个月过去了。1973 年 12 月 18 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这表明，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周恩来不能工作时，能接替周恩来的工作。

周恩来对邓小平寄予厚望。1975 年 1 月，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由毛泽东确定，担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领导全国开始了全面整顿……

9、“我少活十年”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个小时不能休息，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1998 年 2 月 25 日，在拥挤的人群中，笔者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展览。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陈列柜里记录周恩来工作活动的几页台历。从台历记载里，读者可以深切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会说“少活十年”。

现把台历记载事项照录如下：

1967 年 1 月 4 日：

上午十一时，周荣鑫来谈话

中午十二时，接见文艺、体育、新闻、学生代表(工人体育场)

下午一时三刻接见从武汉来学生

下午二时半约中央文革小组、军队文革小组、中央少数民族同志研究会成立

下午四时半接见高等院校同学代表(东会议室)

1967 年 1 月 5 日：

下午三时参加全国在京工人造反派誓师大会

下午四时半，陈总(陈毅)来谈

下午五时约汪东兴、童小鹏来谈问题(笔者注：据童小鹏回忆，当时周恩来交办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让住中南海内国务院宿舍楼的部长、副部长钱之光、钱正英、王铮、黄树则、陈正人等，利用在里面“写检讨”，有一个休息的机会)。

下午五时半秘书局见机要员

下午六时汪、童继续来谈

下午八时文革小组开会

晚十一时见体育学院 11 名同学

1967 年 1 月 7 日：

下午二时约谭震林、许家屯、许川庆谈话

下午三时三刻约南京学生谈

下午五时约李先念、谭震林同志谈问题

下午七时应主席处开会

下午九时半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

晚十二时接见矿业学院两派学生

晨一时接见冲中南海各部的学生、工人

晨四时继续接见七机部 9·15、9·16 两派

晨六时接见南京大学同学和许家屯同志

1967 年 1 月 8 日：

下午三时约刘西尧、李先念、刘建勋、王进喜

下午四时出席石油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工人体育馆)

晨六时见外交部机要局造反联络站干部

晨三时四十分接见外事系统代表(造反派)

晨八时哈尔滨红色造反团

1967 年 1 月 9 日：

下午四时半，见贺总(贺龙)

下午五时半，先念同志来谈问题

下午六时半，见各地政治干部(人大会堂)

晚十一时见体院 6 个同学

晨一时同先念同志谈话，同昆明打电话

晨三时见铁道部联络站和北京部分代表

晨六时半见全体服务员 350 余人

1967 年 1 月 10 日：

下午二时半见昆明军区来的同志

下午四时见昆明来的十二位学生工人

下午五点见财贸系统代表 20 人

下午五时半中央碰头会

晚九时三刻见各左派学生工人代表

晨二时见上海里弄工厂、工人代表

晨三时见军队工作组同志

晨六时接见六、七、十院代表

……

在漫长的灾难岁月里，周恩来度过了没有休息的日日夜夜。他就在繁忙紧张的忘我工作

中，为国家，为人民，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二十九章 在“批邓反击右倾”的激流里

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每深入一步，无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特别是被看作“三株大毒草”之一的《总纲》等出现以后，已经逐渐发展成系统纠正左

这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四人帮”不断制造事端，一有机会，总是伺机进行反扑，打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健康力量。

1、评《水浒》运动

1975 年初，毛泽东因患白内障，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聋了，说话也不清楚了。老人家看书、看文件全靠机要秘书给他读。

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笔者说：一天，毛泽东要她念《水浒》，有些字句她念不通，字认不准，更解释不了。后来，请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女教师给毛泽东读《水浒》，住进距毛泽东住地 500 米的一幢楼里。

毛泽东很忙。即使身患多种疾病，仍日夜操劳着国家大事，听汇报，发指示，接见外宾。要读书只能挤闲暇时间。有时在深夜，有时在清晨。毛泽东要读书了，就要秘书打电话叫教师来。

1975 年 8 月 14 日凌晨 2 时，教师按毛泽东秘书的电话通知，准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在场。

这天晚上，毛泽东谈兴很浓。他谈到古典文学时，谈到李白、柳宗元，随着又谈起《红楼梦》，又从《红楼梦》把话题转到《三国演义》和《水浒》。

“主席，听你说过，‘《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女教师回忆 1974 年在北大听说的一件往事，当面询问毛泽东。

毛泽东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

女教师当即请毛泽东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这部书。毛泽东讲了他对《水浒》的看法。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逑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当天，这位教师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送给毛泽东复核，得到毛泽东的点头认可。

姚文元得知此事以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毛的看法。他认为毛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他并且提出几条具体措施，要《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等“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毛泽东看信后批示：“同意。”

随即，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江青、姚文元等人马上利用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在全国报刊上掀起评《水浒》运动。他们用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说：“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评《水浒》“有着重大意义”。

8 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长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社论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接着，全国各地报刊一轰而起，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文章，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2、“江青比资本家还厉害”

1975年9月4日，江青坐着专列，带着随从50多人，带着汽车和几匹马，来到大寨。

带的东西上自冰箱冰柜，下至大小便盆，无所不有。她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大院，占用十几孔窑洞，三个套间，分别做她的休息室、卧室、会客室、餐厅、打扑克的娱乐室。江青规定，在她住的地方，不准参观，不准开水管，不准进汽车，不准开有线广播，不准用吹风机，三十里内不准开山放炮。群众气愤地说：这那里像共产党、简直比资本家还厉害!

江青一到大寨，就对支部书记郭凤莲说："你知道我这次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对我的……"

江青头戴草凉帽，腰挎小黄包，骑着白马奔驰在大寨山峁上。她时而抱抱小白兔，时而逗鹿玩耍，时而探访她那条被人填成猪场的"战壕"。

这天，江青走进供销社，一气买了 40 多件东西以后，要售货员写下自己的名字。江青看见售货员只写了自己和父亲的名字，而没有写母亲的名字时，她突然发火了："为什么不写你妈的名字，你们不是妈生的?没有母亲，你从哪里来的?这是大男子主义，你们要把妈放在父亲上面，造他们的反，将来女的要掌权，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

她来到虎头山大寨公社牧场，一批男社员来迎接她，她又生气："怎么都是男的，没有女的?给我找几个女的来!"

后来，她发现群众平了那不足三尺深的"战壕"，大发雷霆，责怪大寨干部："为什么不给我报告?是不是邓小平让你们填的?"江青对郭凤莲说："你要写检查，陈永贵也要写检查!"

9 月 7 日，江青对毛泽东批示的电影《创业》，发泄不满。在一次座谈会上，她对特地从吉林叫来的《创业》作者张天民和吉林省委负责人说："你告了老娘一状呵，你不要以为通了天就了不得，就翘起尾巴了，他们是逼着毛主席表态批示的。""你告老娘刁状，老娘今天就教训你……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她还胡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9 月 12 日，她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用教训人的口吻说："小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篡夺了领导权"。

9 月 17 日，江青在大寨对 100 多新闻界、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她说："为什么主席批示《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接着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啊，我看是有的……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江青攻击影射邓小平的讲话，引起了新华社记者的气愤和重视。记者立即将江青讲话写成汇报材料，送交新华社通讯社副社长穆青。

穆青认为事关重大，当即打电话给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吴冷西说，有重要事同他商量。

吴冷西马上乘汽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等候的穆青接上汽车。穆青把汇报材料交给吴冷西，请他设法上转。两个人在车上交谈，认为事态非常严重。江青不仅要再次整掉邓小平，还把矛头对准支持邓小平的周恩来总理。

1996 年 10 月，笔者在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上，听到吴冷西详细讲述了他们这次向毛泽东状告江青的经过。

吴冷西说，他接到材料后，立即把材料送给胡乔木。胡乔木一看便和他一道来到邓小平家中。

邓看了材料，严肃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不能由我交主席。你们要另找渠道，把材料报告给主席。

吴冷西用车再次从新华社把穆青接出来，俩人商量决定，请新华社采访中南海的记者李琴想办法转上去。新华社社长朱穆之、穆青和李琴三人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讲话是攻击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江青利用权势，对敢于向中央反映的三位新华社同志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连续批斗，隔离审查。

3、半路杀出个毛远新

1976 年 2 月，江青曾向人谈到主席和政治局对她的批评，江青说：“我们几个人那时候，日子不好过，挨了半年整，大家也不敢来往了，我这里连鬼都不上门!……一批邓，政治局就不一样了，我也可以说话了，主席给了我发言权。”

江青又说：“最重要的是儿子回来了，就是远新，他叫我妈妈。儿子一回来，当了主席的联络员，政治局批邓一搞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江青这里说的叫她“妈”的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1941 年 2 月，他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国民党的监狱中，母亲是革命干部朱丹华。

1946 年 6 月，他同一批革命干部从新疆回到延安。以后在小学、中学读书，1960 年考入清华大学，1961 年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64 年 7 月 5 日，毛远新从哈尔滨回北京度暑假。毛泽东同侄子毛远新作过一次“七月谈话”。1964 年 11 月 9 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远新从此名闻全国。1965 年夏天，毛远新从哈军工大毕业，到第 7 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工作。1966 年 9 月初，他申请回到哈军工。9 月底，加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成为造反派头头。1968 年 5 月，毛远新调到辽宁，先后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政委，直接管吉林、黑龙江、辽宁三个省军区，成为“东北太上皇”。

1975 年 9 月，毛远新从辽宁来到北京。他以毛泽东侄儿的特殊身份，取代了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一跃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由于有这个“传话人”的联络员，负责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更难于直接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处于完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集体的状态。毛远新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和最高决策机关之间的联系纽带，起了任何人都不能起的特殊作用。

毛远新搬进了钓鱼台。他几乎天天与“江妈妈”联系。他还经常来到江青住处聆听“江妈妈”的教诲。江青向他提供炮弹，灌输她对邓小平怎样“恨之入骨”。

“去年邓小平对我可凶了。”江青说：“去年他专门开会整我，整我是假，整主席是真。邓用林彪的办法，打着 B52 旗号，反对 B52 力量。他这一套，你该看清楚了吧!”

江青煽动说：“今年夏天主席双目白内障，小平以为有机可乘，要另搞一套，很多文件要王海容、唐闻生读一遍，就要主席批，‘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这样强加主席的……邓用三项指示为纲，代替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改忠义堂，背着主席镇压左派，就是打方腊，七机部整‘9·16’左派，王洪文就是上海的方腊。”

江青还说：“走资派还在走，他要把 1966 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过来，把全国造反派重新打下去。小平说，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所以不要，其实年轻人没有民主革命经验，有社会主义革命，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命的经验。”

江青又说：“小平制造舆论，说我是一花独放，说举目望文坛，茫茫一浩然，样板戏没人看，票也卖不出去。他还要把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请上舞台。邓审查《海霞》，说好，好什么?还不是好山、好水、好姑娘，女演员根本不像海岛上的姑娘，又白又胖……今年右倾翻案风也是文艺战线刮得最厉害。”

毛远新在 1980 年 7 月 1 日交待材料中写道：“……像我这样眼中只有主席，一切以主席为转移的人，听到这些别有用心的煽动，同邓小平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1975 年 10 月，百病缠身的康生，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康生说：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1975 年 11 月 2 日，毛远新参加中央慰问团从新疆归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形势前，先找政治局委员陈锡联谈了谈，“一是摸他的底，二是争取他。”随之，他准备了一个歪曲情况，肆意攻击邓小平的“汇报提纲”，向毛泽东“吹风”，挑拨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在评价上是三分不足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现在，只在口头上讲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的“汇报”，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不允许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所以，当毛远新“汇报”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时，毛泽东立即表了态。

毛泽东说：“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毛泽东肯定毛远新的意见以后，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谈，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到我这里来，当大家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

按照毛泽东指示，11 月 2 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三个政治局委员找来谈话。

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门见山地讲了“意见”。邓小平抽着烟，沉静地听着毛远新说完“意见”，随后发言，从容而尖锐地驳斥了毛远新的“意见”。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在所有领域里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最后，邓小平简练地向与会者申明：“昨天(11 月 1 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对这次谈话，毛远新在 1980 年 7 月写的材料里说：“晚上，我向毛主席念了当时的谈话记录。我说我顶了小平同志……我的情绪影响了主席……”

毛泽东当时比较激动，指示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

当天，毛远新又来到钓鱼台 11 楼，把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告诉江青。江青兴高采烈地说：“好!……小平利用主席双目失明，白内障，……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没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三板斧，好啊!”

4、“桃花源中人”

毛泽东自 1971 年冬身患重病以后，他对国家的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和他接近和信

任的人也越来越少。

1975 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对许多大事，只能靠通过联络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进行不多的联系。这样，他就更难了解全面情况。

“四人帮”及其一伙亲信，乘机而入，在他耳边反映了许多歪曲的挑拨性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错误做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

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给“文化大革命”翻案。他在说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估计，同邓小平等人通过“全面整顿”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毛泽东不允许超越他的“既定方针”。

1975 年 11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达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统一认识，并且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出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评价的基础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坚持正确立场，不屈服政治压力，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批邓”。

1975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场气氛紧张，“四人帮”猛烈向他开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是由被批判人邓小平主持的。邓小平在同家人谈到这些会议时说，他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时间，他都是沉默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1975 年 12 月 20 日和 1976 年 1 月 3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被迫作了两次“检讨”。实际上，他是借“检讨”的机会，申明自己的立场。

1976 年 1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再次作“检讨发言”。当晚，邓小平主动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解除他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他说：“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

1 月 21 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向他汇报 20 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毛泽东说：“邓与刘(少奇)、林(彪)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谈到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进一步试探地问：“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谁来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呢?

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议，请主席确定国务院一个主要负责人牵头，他们三个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

"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5、"小平偏袒刘冰"

形势急转直下。对邓小平的批判开始还是在政治局小范围进行，但在清华事件之后，很快波及全国了。

刘冰的信是导火线。1975 年 8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同志，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由邓小平转交。

他们在信中揭发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的严重问题，反映他们在清华大学争权夺利，颠倒黑白，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等罪行。他们还揭发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之后，因为未能当上部长和中央委员，心怀不满，公开发表攻击党中央和领导人的言论。

与此同时，刘冰还将基本内容相同的信，写给北京市委，要求调查处理。

10 月 23 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把迟群、谢静宜叫到人民大会堂，让他们看了刘冰等人的信。

1975 年 11 月 3 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看了刘冰信后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于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迟群、谢静宜和刘冰同是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在信中对迟、谢提出一点批评，竟然触发了毛泽东的大怒。这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

1975 年 11 月，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了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

迟群看后，立即找到吴炜煜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的影响，你应当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在迟群的指使和具体指挥下，吴炜煜连续炮制了 10 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反动文章，其中有三篇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这些文章诬陷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还乡团'，'复辟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动，向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猖狂进攻"，并说："我们要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停顿地向走资派发动进攻，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用臭名昭著的“梁效”笔名炮制反革命舆论，写了大量所谓批判文章。恶毒诬蔑革命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右倾翻案势力”等等。其中直接诬陷邓小平的文章即达 60 多篇。

他们无中生有，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梁效”实际起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中心的作用。

江青指示“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与机会主义头子言论对照》、《批判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参考材料》和评所谓的“三株大毒草”等十多种诬陷材料。其中仅《评三株大毒草》就印发了八千万册，散发全国。这些材料，把邓小平同古今中外二十多个反动派代表人物相类比，编造了上百条罪状。

对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邓小平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197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汪东兴打电话给邓小平，要他过目一下“两报一刊”的 1976 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篇社论中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促生产”却谈的很少。邓小平问：“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汪东兴告诉他说：“这篇社论主席已经圈阅了。”

邓小平听了以后，放下电话，不言不语，陷入沉思中。

迟群按照江青的指示，以“梁效”署名，1976 年 2 月在《北京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反动文章。迟群在文章中亲笔加上恶毒诬蔑邓小平的话，说“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公开强加到邓小平身上。

江青一伙人利用诬陷材料，到处煽动“揪一层人”。2 月 6 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党委会上公开点名批邓，别有用心地提出“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迟群在各种场合多次煽动说：“民主革命的民主派们是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这也是规律”，“走资派还在走，不只是哪一个人，要看到一层人”，“既是还乡团，就不止团长一个人，在批邓时，不批判、不联系下面的队长行吗?”

江青一伙为了煽动打倒邓小平和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迟群、徐景贤和刘庆棠等人利用电影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组织编导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所谓“重点”影片，任意诬陷“刻画走资派”的所谓“顽固性、欺骗性、危害性、残暴性”。至 1976 年 10 年底，“四人帮”一伙共炮制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剧本 32 部，拍成影片 7 部，大量发行拷贝，煽动打倒中央至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

江青、王洪文一伙，还暗中整福建、四川、江西等省领导人的黑材料，1976 年 1 月至 9 月，王洪文、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先后派出记者，到一些省、市了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说什么“要把眼睛盯住省委”，诬陷他们是“还在走的走资派”，“执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组织还乡团”，“搞翻案复辟”。

6、“打招呼会议”

1975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和要点，要求在各级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讲话。《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点》还说，对此展开辩论“是完全必要的”，“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

《要点》，是个新的转折点。它表明，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这场大辩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但是，经过十年动乱，深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干部群众，再也不相信这些“高论”了。他们从邓小平主持的卓有成效的整顿工作里，普遍认识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仅违背事理，而且也不得人心。因之，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

1976 年 2 月 2 日，经毛泽东提议和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四人帮”十分不满。没有实现当国务院总理野心的张春桥，立即写下充满怨恨的《1976 年 2 月 3 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张春桥诅咒去年一号文件邓小平“来得快，垮得也快”，今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也将“来得快，垮得也快”。内心深处仇恨毛泽东不肯把大权交给“四人帮”，以诗来表达他的心愿：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 月 5 日，中央通知将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以《毛主席重要指示》为题，经毛泽东审阅，传达到党内外广大群众。其要点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二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毛主席重要指示》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左倾错误观点，混淆敌我矛盾，把革命同志当作革命敌人。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当然为毛泽东所不允许。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他就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月上旬至三月上旬，中共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继续打招呼”，许多干部想不通。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要求大家，“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7、“江青干涉太多了”

江青反革命集团恨不得一棍子将邓小平打死。

3 月 2 日，江青擅自在京西宾馆第 9 会议室，召集 12 省区负责人开会，从下午 3 时 30 分至 5 时 20 分，她发表长篇讲话，恶毒攻击辱骂邓小平，诬蔑“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个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江青惊恐地说：“他要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过，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是一一个头吧……”

江青俨然以“红都女皇”的口气，夸夸其谈地说：“别人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呵，同志们，不简单呵，不简单。”

毛泽东发现江青胡闹，十分生气，批示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了十二省讲话。”

当天晚上，联络员毛远新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上作“长篇报告”的情况。毛泽东说：“如今江委员的权力大得很哩，私自召集十二省的省委书记训话，竟然都听她的，可见拉虎皮，做大旗，也很吓人哩，她都讲了什么呀?”

毛远新汇报了江青讲话，并说还要把“讲话”印发给政治局全体同志。毛泽东摇了摇头说：“这样做不妥。你告诉江青，不要不自量力，不要干涉太多，政治局有副主席，有常委，轮不到她召集会议。要改一改老毛病，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

8、清华大闹政治局

3 月 24 日。江青、毛远新指使迟群、谢静宜带一伙人到政治局“面对面批邓”，狂妄叫嚷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

谢静宜连夜赶到清华，进行部署。谢静宜鼓励大家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不要怯阵”，“既要有分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

3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听取“汇报清华大学运动”为名，江青煽动迟群、谢静宜等人，面对面围攻邓小平，诬陷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会后，江青一伙攻击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没怎么发言”，搞得他们很被动：说叶剑英没到会，“那是可以理解的”；骂邓小平在会上一句话不说，不理睬他们，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清华大闹政治局”这场闹剧是怎样出台的呢?请看，1979 年 12 月 3 日，一位当年“荣幸”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受到江青“鼓励”的×××写的交待：

“3 月 24 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开会。……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说：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经过商讨，最后确定由×××、××和我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个人插话的内容。谢静宜鼓动说：‘中央首长派我们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要我们去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面对面的斗争，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勉励，我们决不能怯阵。发言一定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要给政治局一颗重磅炸弹。’迟群还详细布置说：‘汇报内容就以两校接待参观人员介绍提纲为基础，重点突出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剥画皮。’他还说：‘到政治局主要由你们讲，我和小谢见机插话。’

3 月 26 日，迟群、谢静宜带我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诬蔑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

××在发言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论’……他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在发言中主要指责邓小平同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

谢静宜插话时说：‘75 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 32 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她站起身，指着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同志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张霖之的追悼会?’邓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没吭声。

谢静宜气急败坏地叫道：‘邓小平你为什么不回答?’

邓小平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

这时，王洪文接话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本来政治局并没有安排他去嘛，可总理听说给贺龙开追悼会，就自己从医院跑去了。’

江青也尖着嗓子喊道：‘他们是向党和群众示威!是复辟的典型!’

张春桥板着面孔诽谤邓小平同志：‘是老牌机会主义，连托洛斯基都不如!’

姚文元说：‘去年，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面对‘四人帮，一伙的攻击，邓小平始终神态自若，一言不发。

迟群恼怒地责问：‘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抗到底!’

江青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开水烫嘛!’”

从上述这份交待里，可以看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清华“大闹政治局”作了多么精密的安排。

配合批邓，迟群指使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于 1975 年 10 月 25 日写信给毛泽东，诬告教育部长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

毛泽东阅后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据此，副总理张春桥立即责令周荣鑫作检查。

11 月 8 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等人大会，校园内贴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

11 月 22 日，迟群、谢静宜按照江青的旨意，把收集到的周荣鑫讲话材料送给江青。他们指挥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印了《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 8 种材料，铅印两万册，广为散发，诬陷周荣鑫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

1976 年 2 月，为再次打倒周荣鑫，江青、张春桥指使新成立的“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夺了周荣鑫的权，诬蔑他是“东风来就装病，西风来就大搞翻案”。轮番对他批斗了 50 多次。周荣鑫在残酷折磨下，心脏病更加严重，不得不带着氧气袋，步履艰难地爬上楼梯挨斗。一个星期，连续批斗五天，上午、下午，有时还加上晚上，大会、小会被批斗。

1976 年 4 月 12 日，周荣鑫昏倒在批斗会上，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当天夜里，这位人民的教育家含恨去世了。

9、邓小平二次被打倒

1976 年 4 月 5 日，在悼念周恩来总理而爆发的“天安门事件”里，数十万群众同“四人帮”进行了血与火的战斗。

血迹斑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万千群众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歌颂周恩来总理的丰功伟业，拥护邓小平治国建业的宏伟纲领。

身体陷入极度衰弱的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歪曲真相的汇报以后，对被诬蔑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做了如下指示：

“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4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与此同时，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了!

第三十章 清明起春潮

1976 年 4 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是人民推进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四・五”运动以它特有的内容、形式和气势，震撼了中国，震动着世界。

在这里，眼泪凝结着仇恨，热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

1、周恩来逝世

1976 年 1 月 8 日 9 时 57 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因久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 78 岁。

身患肠癌和膀胱癌的周恩来，到 1975 年底，已经做过大小十多次手术了。病中他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痛得两手颤抖，痛得额上沁出大颗大颗的汗粒，可是他总紧闭着嘴唇，不肯哼一声。

周恩来在与病魔搏斗的同时，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据有关同志统计，他在病中：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161 次；同中央部门同志谈话 55 次；接见外宾 63 次；在医院召开会议 20 次：离开医院出席会议 20 次：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 7 次。

据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自 1975 年下半年卧床以后，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到床前看望。他一再指示医生说：“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叶剑英一次次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原来还能谈话，后来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他俩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动，一样地说不出话来了。

自1975年12月中旬以后，周恩来吃东西就全靠管子往胃里灌了。身上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可是头脑仍然清醒。天天坚持听读报、听国内动态、听广播。一次他在昏迷中醒来，用细微的声音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医生小声报告：“没有大的变化。”

周又问：“刘帅、刘帅，身体……”

他突然屏住了声，说不下去。

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都来看望周恩来。

共和国的几位元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都在他昏迷之际，伫立在床脚，像雕像一般，默默地望着他，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滚下来。

1月8日晨9时57分，守在周恩来身边的张医生，绝望地凄凉的叹息一声:“不行了……”

2、光辉的一生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光辉的一生。

周恩来 1898 年 3 月 5 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13 年他以翔宇名写的手迹“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至今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1917 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后东赴日本留学。1919 年归国后，他作为天津学生界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与创办进步团体“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20 年 11 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参与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1924 年秋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25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参加领导了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 年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事委员。1927 年 3 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五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书记。七月中共中央改组，任政治局临时常委。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1927 年 8 月 1 日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辗转到上海。1928 年 7 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并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工作。1930 年 9 月，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1 年 12 月，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3 年春与朱德等人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的第四次围剿。

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红军进入贵州后，周恩来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上，支持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选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会后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曾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参与领导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

1936 年 4 月，曾赴保安与张学良秘密谈判，达成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的协议。西安双十二事件爆发后。1936 年 12 月，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 年 2 月至 9 月，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同国民党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多次谈判，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 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1937 年 8 月在洛川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在重庆，负责领导华南、华中、西南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3 年 8 月，回到延安。1945 年 6 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抗战胜利以后，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参加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谈判。1946 年 11 月回到延安，参与领导人民解放战争。1947 年 3 月，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延安时，周恩来随毛泽东留在陕北。同年八月，兼代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与指挥参与人民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 1956 年 9 月的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3 年底，他代表中国政府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间的准则。1954 年参加日内瓦会议。1955 年参加万隆会议，为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和亚非国家的团结反帝做出了贡献。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969 年 4 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 年 8 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勤奋工作，鞠躬尽瘁，尽力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他为中美、中日实现关系正常化做出卓越贡献。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1 月 15 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3、愤怒的浪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擎天巨柱，陷入深切的悲痛。从首都到边疆，从北方到南方，从工厂、矿山到农村、军营，到处是擦不干的眼泪，咽不住的悲声……

在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大施淫威。他们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凛冽的寒风里，正当人们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时，在周恩来追悼大会的前一天，1976 年 1 月 14 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标题抛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说“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妄图用这种强奸民意的卑劣宣传，转移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感情。

人民愤怒了，许多读者撕毁了当天的《人民日报》。有的还直接向编辑部提出严重抗议："你们是什么感情?""全国八亿人民，全党三千万党员要审判你们!"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广大人民按捺着心头的怒火，注视着斗争的动向，用传单、小字报、大字报等各种方式，像呼唤暴风雨的海燕，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愤怒，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二月初，山城重庆解放碑贴出一张大字报：《请注意当前斗争新动向》，尖锐提出"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的问题，提醒人们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二月中旬，北京天安门、王府井、西单等地贴出传单："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3 月份，杭州市连续三次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四人帮"在浙江的老巢。

贵阳贴出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任务的几点看法》，系统地从理论上宣传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福建省三明市贴出点名"张春桥是个坏人"的大字报。"为了把他揭露出来，我杀头也甘愿!"

3 月 5 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里公然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3 月 25 日，《文汇报》又在一篇文章里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直接攻击周恩来总理。

联系南京路上刷出的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当天，上海工人到《文汇报》贴出大字报："反周民必反，反周国必乱!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是周恩来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总理事件发生之后，南京青年学生最早带头奋起战斗。

3 月 24 日，南京医学院的师生抬着"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花圈，走向雨花台，在街上写出"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大标语。3 月 28 日，南京大学数学系四百多名师生，抬着周总理遗像和用白玉兰花制成的花圈，特意绕道市区最繁华的街道，去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许多工人、干部自动加入悼念队伍。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淹没在花圈的海洋中。

3 月 29 日，南京大学师生又分成 20 多个小组，奔向街头，在大街小巷，在开往苏北、

安徽、浙江等地的长途汽车上，贴上“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大标语。当晚 6 时，南大学生来到南京车站，在车站工人协助下，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用油漆刷上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把声讨“四人帮”的信息，扩展到北京、成都等地。

3 月 31 日，南京汽车厂职工公开贴出“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进一步鼓舞了斗争热情。

南京人民的英勇斗争，深深刺痛了“四人帮”。3 月 30 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电话，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党中央的，是转移批邓大方向。”4 月 1 日晚，“四人帮”一伙就南京事件向江苏省委发出电话通知：“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4 月 2 日下午，江苏省委向南京市和全省传达“通知”，同时出动大批人马，冲刷南京街头的大标语、大字报，并贴出大字报，诬蔑群众的行动是“为反革命复辟、政变制造舆论”，对南京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

南京人民无所畏惧，继续英勇战斗。就在传达《通知》的当天，南京大学就出现了《捉妖战歌》，号召“学习总理，革命到底!”南京部队宣传站、虹桥、兰桥等地也相继出现了“捣毁《文汇报》土围子，向张春桥的修正主义文化部、宣传部开炮”的传单标语。4 月 3 日，南京工学院的师生举行示威游行。4 月 4 日清明节这天，南京市各单位到雨花台的人数达七八万之多。

4、声讨“四人帮”

南京人民的斗争，鼓舞全国人民掀起声讨“四人帮”的怒潮。

在北京，成群结队的人群，海潮般涌向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人们抬着花圈，送来花篮，把朵朵雪白的纸花扎在广场周围的松柏枝上。笔者多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目击广大群众用花圈和诗歌为武器，向窃居高位的“四人帮”展开的特殊的战斗。

1976 年 3 月 19 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师生，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花圈。接着，无数的花圈、挽联相继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3 月 30 日凌晨，第二炮兵部队 24 人，冲破重重威胁，怀着“宁愿把头掉在天安门前”的决心，用八朵大红花和洁白的挽带，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来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中午时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 29 位同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的浮雕下面，第一个贴出悼念周总理的悼词。悼词凝聚着对周恩来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一群群人围拢过来，朗读着、抄写着讨伐“四人帮”的檄文。“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您庄严宣誓，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

夜幕降临的时候，尽管黑暗笼罩着天安门广场，可是黑压压的人群，却用火柴、用手电点燃了点点光芒，屏声静气听一个女青年朗读诗文。那充满悲伤而又刚强的声音，呼喊着迎来了战斗的黎明。

4 月 1 日，纪念碑汉白玉的栏杆上，用透明塑料布罩着崇文区化纤厂一位青年党员的悼词。他举起拳头，率领大家在一片哭泣声中庄严宣誓："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

在悼词中有一篇署名"革命继承人"的悼词，被人们辗转传抄，反复朗诵。"我们革命人民一定要撕下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假面具，把他们丑恶卑鄙的伪善的嘴脸暴露在人民面前……"

群众在悼词、诗歌中热烈歌颂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一份唁幛写道："在周总理病重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群众愤怒抗议"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诬蔑。广场变成了怒涛汹涌的海洋。从 4 月 1 日到 2 日下午 5 时，广场人数约 20 万左右，广场上经常有 8 万人，花圈 1000 多个，纪念碑四周栏杆贴满了各种悼词。

4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 109 厂职工队伍，由四辆汽车开道，浩浩荡荡，穿过王府井大街等闹市区，走进天安门广场。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宽约 6 尺的高大诗牌，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诗牌用铁丝固定在纪念碑最高一层的飞檐上。周围群众边抄边欢呼，不到半天功夫，诗句传遍了北京城。

国营曙光电机厂 3000 多职工，抬着 34 个大花圈，一清早就汇集在东长安街上。他们组成 8 路纵队，以周总理的遗像为先导，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交通民警为他们开放绿灯，鬓发斑白身穿军装的老战士肃立敬礼。他们在广场上绕场一周，在隆重的悼念仪式上，高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4 月 3 日，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北京广播器材厂的 1000 多职工，胸佩白花，臂缠黑纱，由 200 多辆自行车开路，高举红旗、花圈、花匾，许多职工边走边哭。他们把白花铺底、红花镶嵌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的 13 个大花匾，高高地挂在纪念碑前的 13 根旗杆上，广场上数万群众长时间向他们欢呼致敬。

广场的果皮箱上，站着一个青年小伙子。他高高举起挂在松墙上的一首诗，向着波涛起伏的人海，高声朗读："好儿子，莫揩泪，总理灵前排成队。驱妖邪，莫慈悲，要以刀枪对!"周围人群以阵阵掌声、喊声，响应诗词的战斗召唤。

5、熊熊的火焰

4 月 4 日是清明节，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四人帮"下令不许悼念，但是，首都人民不怕打击陷害，不怕跟踪盯梢，继续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向洪流巨浪一样涌向天安门广场，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 200 万人次以上。

广场上空，在蔚蓝的天空中飘着两束黄色大气球，白色飘带上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气球随微风飘动，广场气氛变得更加肃穆，更加悲壮。

天安门广场上，人如潮，花如海，泪如雨，哭声如泣如诉，断人心肠。纪念碑周围的松墙上，松树林上，全部挂满了白花，犹如覆盖了一层白雪。纪念碑四周花圈挨着花圈，挽联挨着挽联。在花山人海中，几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门上，挂着巨大的横幅：“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奋起灭豺狼!”成百成千的花圈、花篮悬挂在每一根华灯柱上。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一名青年工人，在一块署名“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的长方形白绸上，用鲜血写成血书。血书像火红的战旗，在空中迎风招展，在人潮里激起巨大的反响。

一个青年乘势登上台，接过一份传单，高声宣读《告全国人民书》：“要社会主义的中国，要现代化的中国，不要乱糟糟的中国!”顿时，掌声、口号声和《国际歌》声，响彻了云空。

一名 30 多岁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也登上平台，深情地向群众说：

“同志们，阳春三月的连绵雨水，那是我们八亿人民流不干的眼泪。”说到这里，他声音哽咽，泪水夺眶而出。他继续说：“同志们，总理得人心，人民爱总理，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彻底打垮!”他的讲话不断为四周的掌声打断。

有些诗篇短文点名声讨“四人帮”。“牛鬼动，众人皆愤，妖邪惊而颤，欲把乌江斩断，焚桥必捉鳖元。”有的标语口号中提出：“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

广场变成了诗的海洋。这些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像轰鸣的炸弹，闪光的火炬，把人心照亮，激发着人们的爱和恨，使人变得更勇敢，更坚强。

纪念碑前，贴了一首《清明节的呐喊》，被人传抄朗诵：

“今朝扫墓，变本加厉。言称‘四旧’，用心何毒!‘电话通知’，诬人造假。‘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裹挟天子，以令万家，宁左勿右，一如林家。”

华灯柱上挂满贴满诗词和花圈。围看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挤不进，看不见，有人高喊：“谁来念一念?”一个身穿油污工作服的工人，奋力攀上灯柱，高高地站在灯柱座上大声念了起来：

“怀念周总理，日日泪满颊。生前爱人民，遗骨遍中华。小雀敢鸣秋，挥刀斩贼家!”

北京化纤厂一青年工人把他写的诗传单贴在纪念碑北侧。他大声念了两遍，群众很快就围聚过来，一个青年高声替他朗读：

“昔日扫墓为知己，今朝清明悼总理。右倾翻案不孤立，人心所向谁能敌!……三人一小撮，八亿人民才成众，赫秃清江翻恶浪，敢反潮流碎资梦。”

天安门广场是历史的见证。为了记录下这历史的画卷，许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录下了时代的呐喊。外语学院童怀周小组，把集抄的几百诗篇，汇成《天安门革命诗抄》，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留下了壮丽的篇章。

6、血与火的搏斗

面对人民的怒潮，“四人帮”及其爪牙惊恐万状。他们连日策划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有计划有预谋地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活动。

4 月 1 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说：“南京的事件可能影响北京。这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你们派记者去看看，在广场的人在干什么?是不是在闹事?”“可能要闹事。”姚文元还说：“送花圈的都是什么单位?这些情况可以在情况汇编上反映，未登之前，先送我看看。”他说：“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

当天他还给中央广播事业局打电话说：“清明节是个旧习惯。现在天安门前送花圈悼念周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

四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的性质。”

“四人帮”还下令对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人，采取特务手段进行跟踪盯梢。王洪文亲自给他们在公安部的亲信打电话，下令对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人采取法西斯的跟踪盯梢。北京市公安局还做出“进行跟踪，查明下落”，在“适当地点处理”、“监视跟踪，查明下落”、“揭露扭送”等八条规定。

4 月 4 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会议上，介绍了天安门广场情况：在纪念碑前，花圈有 2073 个，单位 1400 个，有的不写单位，大的花圈有六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一部分写总理。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

会后，毛远新立刻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周总理，少部分有影射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为：‘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

会议并且决定：“从当晚(4 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

这个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4 月 4 日晚 11 时，“四人帮”及其爪牙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的行动。

连日来，王洪文亲临现场指挥，他多次从人民大会堂坐着小汽车来广场窥测动静，4 日晚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又一起来到大会堂，策划镇压广场群众。

江青板着铁青的面孔，训斥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你们就不管，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人，该抓的抓，该判的判!"

王洪文马上附和说："对首犯要判重刑!"

深夜，王洪文又坐车到广场兜了几圈，然后，偷偷钻进西南角上的小灰楼，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 200 辆大卡车和几千民兵、警察和解放军战士，开始搜捕、殴打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当即将 57 个抄诗歌的群众押往中山公园"审查"，把成千上万个花圈清扫一空。

4 月 5 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呈现一片凄惨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标语、条幅都不见了。军警民兵组成的三道森严的封锁线，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一摊摊雨水，在水泥地上闪着亮光。

天亮了，成千的群众继续拥向广场。北京 127 中学 30 多个同学，抬着"周总理永垂不朽"的花圈挽联，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近纪念碑。但被人以"纪念碑要修理"为由拦住了。

"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

"人民英雄纪念碑不让人民献花圈，还叫什么纪念碑?"

愤怒的学生们冲破拦阻，在四周群众的声援下，将花圈高高放在纪念碑基座上方。

9 时左右，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大门口的很多人，继续喊"还我战友，还我花圈"的口号。

这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说："送花圈没有用，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

在场的群众立即跟踪追赶，将他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通道里揪了出来。

"联合指挥部"得到群众"要冲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他们除马上增派军警外，还调来两辆广播车，在大会堂大门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讲："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被激怒了的千百群众，立刻把广播车包围起来，将其中一辆车推翻捣毁了。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十时左右，汇集在大会堂东门外的数万群众，高唱"国际歌"，同奉命而来的守卫人员发生了对峙和冲突。

中午，群众从一个工人民兵口中得知："三联指挥部就在小灰楼上!"

很快，群众排成十路纵队，手挽手，肩并肩，高唱"国际歌"，自西向东横穿天安门广

场，向小灰楼走去。几名群众代表，走进小灰楼谈判，但到处找不见指挥部负责人。人们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在下午一点五分，将指挥部负责人坐的上海牌小轿车烧毁了。接着，又烧毁了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工人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也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烈火中。下午 5 点多，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群众冲进了灰楼，点燃楼里的稻草，把小灰楼烧着了。当时，在场的几万群众，不去救火，反而用欢呼、喊口号，表示自己对法西斯暴行的抗议。

7、血腥的镇压

4 月 5 日清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天安门情况，送报政治局，并经毛远新转报毛泽东。

《情况汇编》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的胜利。”

4 月 5 日上午，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江青，气势汹汹的，手里拿着一条木棍，走到毛泽东病床前，对毛泽东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毛泽东看了看她，没有讲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做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儿，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拿着政治局会议关于“四 • 五”事件的决议，向毛泽东汇报来了。

据毛远新交待，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昨晚政治局连夜开会。大家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有邓小平、邓纳吉支持。会议讨论要处分邓小平。会议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花圈烧掉，要吴德在广场上讲话，通过了他的讲话稿。”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默无语。后来，又倏然睁开眼，缓缓地说：“就按政治局的意见办吧。邓小平不是纳吉，对他还要作思想工作，要让他写检查，一遍不行就写两遍、三遍。总之，他要认错，要把问题讲清楚。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君子动口也动手嘛。”

1980 年 10 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毛泽东的这次失误：

“‘四 • 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

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做出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4 月 5 日下午二时，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经过讨论，当即决定：

一、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一次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会议通过他的讲话稿。

二、立即组织民兵，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包围，分割后对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小时，三点钟散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随即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坐镇，指挥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

4 月 18 日，张春桥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4 月 5 日，我是中午来到的人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

五日下午，邓小平也到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吧，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次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还不是暴力革命吗?今后还是要使用暴力的。”他显得十分得意：“我通知《红旗》杂志编辑部，要他们每人准备一根棍子。一旦暴徒冲过来，有棍子就好和他们格斗”。

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笔者了解，被“四人帮”诬陷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确实来到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观望过天安门广场上那雄伟的人民海洋。但是，他并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为了斗争的需要，邓家一家人一个月前就不出家门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后，邓家被迫搬家。女儿在帮他收拾东西时候，偷偷给他行李里面夹带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扑克牌陪伴他度过了三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扑克牌成了他孤寂中的一种寄托。

据在场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回忆，当愤怒的群众把汽车接二连三点燃的时候，王洪文一伙趴在窗前，拿着望远镜了望广场。姚文元连声叫嚷：“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呵!”

张春桥提高嗓门喊："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现!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付这些闹事的暴徒，在广场上不能开枪，可以用水龙头冲他们嘛!"

江青接着说："也可以用大棒打嘛!"

"四人帮"的一个走卒也凶狠地说："我手里有枪，枪上有刺刀，刺刀是不吃素的!"

有人指着一辆刚点燃的汽车，说："看，又点燃了一辆!"

王洪文故作镇静地说："怕什么呀，这样可以变成好事嘛!"

江青歇斯底里地说："你们赶快分头布置，要立即采取行动!"

下午四时左右，他们开始分头布置行动。王洪文负责指挥调动部队、警察和民兵，姚文元负责广播，讲话稿和播放录音，张春桥担任总指挥。

在"四人帮"直接参与下，制订了以民兵为主的"十万人的大包围"方案。

对此，后来王洪文交待说："这次行动，主要是靠民兵，开始也是调不动呵，人都不来。后来做了工作，这才是十万人的大包围!"

调集来的大批军警民兵，分别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等地待命。民兵总指挥部则设在中山公园里。

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就要开始了。但是数万群众仍在继续涌往天安门广场，在夜幕掩护下往纪念碑前贴出新的诗篇。

一首诗里写道：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纪念碑北侧，贴出一首诗《告别》：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

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

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能向那九霄轻扬，

我只有这哀悼的诗句，

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

晚上6点30分，天安门广场的全部播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吴德的讲话：“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播放吴德讲话时，在天安门附近集中大量的民兵和卫戍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出动。为防备事态扩大，又在天安门一带集中大批待命出动的民兵，派出部队在北京市区随时应急调用。

晚上9点25分，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天安门广场灯光全部熄灭了。过了三分钟，电灯又全部亮了。

耀眼的灯光下，隐蔽在广场四周的上万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棒、警棍、皮带，黑压压一大片，一齐向广场冲了过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自南北两个方向，向广场中心合围。

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伤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请听听受害者的控诉吧!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名共产党员说：“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我心想不好，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许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到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人。不远处传来有人挨打的惨叫声。我想你们打我们手无寸铁的群众，算什么能耐?后来，他们发现我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监狱。”

北京第二汽车公司一名工人控诉说："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地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跑到广场东南角，只见一些人从纪念碑那里走来，恐吓驱赶群众。有一个还叫着：'革命的同志快离开广场，反革命的留在广场……'我气愤地说：'好!我们走，我们是革命的，留下的可是反革命的。'那个人大喊：'抓住他!'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外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等我醒来，只见一个人用皮鞋把我流在纪念碑上的血迹擦掉。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被押到中山公园，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后来，我被关进牢房。"

北京牛街房管所一名干部说："我看他们打群众，就骑着车子往东行。刚骑到纪念碑东侧的那排旗杆下，就被包抄过来的人挡住了。一个警察一把拉住我的车后架喊道：'你往哪跑?'我连忙说：'我是过路的。'话音刚落，他抡起皮带朝我头上打来。皮带上的铁扣打破我的头，血立刻喷了出来，绿军帽也被打破了一个大口子。我立刻摔倒了。这时，十几个人围了上来，用木棒、皮带朝我身上乱打一顿。我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两次，想和他们分辩，但他们不准我说话，反而打得更狠了，边打边骂：'让你们闹事，打死你这个王八蛋!'一直打得我动不了，才把我从地上揪起来，往纪念碑押送。"

北京市第二服务公司修建队一名架子工说："我下班后到纪念碑看诗。正看时，纪念碑被包围了。十来个人一下围了上来打我，打得我头流着血，两腿站不住。我想，我看诗犯了什么罪?索性两手护住头，让他们打。一个人说，别打死了，就用皮带绑我……我明明是带工具下班，他们硬说我是拿凶器的暴徒，多么卑鄙啊!随后就给我带上铐子，押进监狱。"

这天晚上，388 名革命群众就这样在白色恐怖里被抓走了。

9 点 45 分，血腥镇压结束了。广场上留下了一摊摊血迹。

深夜 11 时，上百个干警来到广场，自北向南，一字排开，用水和墩布清洗地上的血迹。

地上的血迹干了，可是留在人民心灵上的血迹是永远擦不干的。

8、墨写的谎言

4 月 6 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民兵拿起武器的情况。11 时，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天安门情况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7 日上午 7 时，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民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总编辑等人到了大会堂，姚文元一见面就鼓励说："大好事，大好事!"要求他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

中午时分，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有关人员人带到东大厅，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见面。

王洪文赞扬说：“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四人帮”欣喜若狂，饮酒欢宴。

乘着酒兴，张春桥杀气腾腾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有的坏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是要为邓小平树碑立传。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

酒足饭饱之后，总编辑带着记者去改编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了。

姚文元亲自督战，再次指示：“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进去。还要把《情况汇编》反映的‘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写进去，这样更有力量!”

为了争取时间，姚文元一再叮咛：“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子。”

就这样，从上午 8 时到下午掌灯时分，一篇颠倒是非，制造大冤案的黑文，匆匆写好了。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 11 名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专门讨论审查这篇新闻。会上，姚文元读一段，讨论一段，由王洪文秘书肖木执笔修改。

张春桥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就像匈牙利事件差不多，反革命事件，背后有人支持，邓小平就是总后台。他像纳吉一样的人物，在稿件里要写出来。”

王洪文又说：“这次事件中，首都民兵起了很大作用，应该写几笔。”

肖木写上了。

张春桥还说：“在开头的地方，应该写上是在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上，是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是在毛主席检阅群众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反革命事件。”

肖木照写上去了。

当姚文元念到烧房子的那一段时，张春桥说:“应该改为这伙坏蛋烧人民解放军的军营，全国人民一听就会愤慨!”

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是根据 4 月 1 日到 6 日，人民日报记者突击采写的 10 多期《情况汇编》改写的。这些情况完全是按照“四人帮”事前定的调子，精心挑选炮制，再送姚文

元修改审定印发中央的。

姚文元看了4月3日《情况汇编》中提到一条“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的标语，马上加了一句批语：“这同外地煽动性反动口号完全一样。”

《情况汇编》清样里登了一青年工人写的《倡议书》，揭露“四人帮”“说共产主义空话”，“穿着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姚文元把《倡议书》全文删去，诬蔑作者“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姚文元还将101厂写的“碧血再开革命花”的诗句加上一句：“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姚文元一伙在炮制《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时，都是“要鲜明地标出邓小平”，凡是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新闻、评论、文章，都把什么“邓纳吉”，“谣言公司总经理”，“总根子”等等，加在邓小平的头上。

姚文元一伙还精心编写了一本所谓纳吉的资料。

张春桥批道：“要讲他们如何复辟，如同还乡团一样摧毁劳动人民。”

江青批道：“纳吉等人利用了匈牙利人民对裴多菲的怀念，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裴多菲俱乐部，搞反革命叛乱活动”，影射攻击邓小平。

1976年4月8日，这篇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联合署名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文中将手无寸铁的群众写成是“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的暴徒；把千万人传抄吟诵的革命诗篇，说成是“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等等。

姚文元还把原稿引用的诗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后边，加上他的观点：“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他还把诗中“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硬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联系在一起。

5月16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等黑文，胡说什么：“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

姚文元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亲笔写上“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接着，他们相继发表《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等文章，狂热地宣传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派，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是整个资产阶级主体。江青一伙特别强调：邓小平被打倒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不仅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即正在台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迟群几次讲话提出：“有一层人势力很顽固”，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

歪曲事实真相，制造谣言的《情况汇编》，深得“四人帮”赞赏。姚文元说：“这个小报《情况汇编》，有时比百万张报的作用大。”

张春桥也夸奖说：“你们提供了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很高兴，新闻工作有新的经验，好好总结。”

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4 月 8 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强烈抗议。12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位署名“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里装着的《人民日报》4 月 8 日一、二版报页上，用蓝墨水在报纸上写着：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予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说指向毛主席!”“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封锁得住吗?

“明明是你们要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导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日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读者来的这封信，代表了亿万革命人民对“四人帮”镇压人民的回答!

9、历史在曲折中前进

4 月 7 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广场情况。谈到《人民日报》的稿件时，毛泽东说：

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把发生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毛泽东亲自对事件批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

据此，毛泽东批准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泽东还提议，让已代总理的华国锋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

后来补充说：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以上四件均登报。

4 月 7 日晚 7 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 月 7 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在头版地位登载了《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全文。

历史在曲折中前进。

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要求和利益的四五运动，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天安门事件作为一次伟大的人民运动，强烈反映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愿望。

“四・五”运动是人民力量的一次伟大检阅。它以鲜明的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空前巨大的规模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的主人。

在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中，人民群众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事实证明，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基础。正是伟大的“四・五”运动，才引发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行动，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1978 年 11 月，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了，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欢迎。

第三十一章 十月春雷

1、最后的岁月

健康情况一直较好的毛泽东，曾以矫健的体魄，乘风破浪，横渡万里长江。

但是从 1971 年“9·13”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他的身体就日渐走下坡路了。林彪，这个被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上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的驾机逃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精神创伤。

这次事件的打击如此沉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饱经沧桑，扭转了历史巨轮的伟人，也是难以承受的。

1971 年 11 月下旬，毛泽东曾患过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脱险，但是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一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先的鞋不能穿了，身边的人员只好赶制了两双大拖鞋，让毛泽东散步时穿。

由于受健康情况的限制，他只能在中南海住地的“游泳池”，被人搀扶着往来散步。他走过一段草地，沐浴着温柔的阳光，倚在栏杆上，迎着水波荡漾的湖面，从郁郁葱葱的树林间，眺望着远处的红墙。

1972 年 1 月 6 日，曾在井冈山同毛泽东一起坚持战斗的陈毅元帅，患癌症逝世了。

八日这天，毛泽东在病床上签发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记住了召开追悼会的时间与地点。10 号下午三时，午睡过后，他准时缓缓从病床上坐起身，自己摸索着穿上拖鞋。他身上只穿一件睡衣，便急匆匆地走出卧室，他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身边同志急忙给他加了一件大衣，就急匆匆地扶他进了汽车。

周恩来一听到毛泽东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立刻通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他自己坐进大红旗车，加速赶在毛泽东的汽车的前面，提前到达八宝山。在灵堂的休息室内，周恩来临时为毛泽东调来十多只电炉。尽管如此，休息室里仍然很冷，顶不住寒冷的吹袭。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看见陈毅夫人张茜进来，握住她的手，无限深情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西哈努克亲王来了。毛泽东坦率地向他谈了林彪事件。“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逃跑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毛泽东移动一下身体，面向在座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地说：“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

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歉意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责怪地说：“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在场的几位老帅，一个也没有说话，他们相互望了望，不自然地笑着。

哀乐响起，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灵堂，工作人员在他那件银灰色的大衣袖上，缠上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摆满花圈挽联的灵堂中央，沉重地致悼词。他读着不足600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全场一片呜咽声、抽泣声。当毛泽东在灵堂陈毅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时，全场呜咽之声，再次震响瓦屋。

毛泽东参加这次追悼会时，因为身着睡衣开会，天寒受凉，回来就感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引起气管炎、肺炎、心脏病。肺气肿又复发了。据医生说，毛泽东的左肺上有三个大的空泡，呼吸困难，他常常只能借助呼吸器呼吸，几次急救中出现了虚脱的危险症状。

2、病中的会谈

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刚到北京两小时，就在中南海那间陈设简单、朴素的房间里，开始了举世注目的中美首脑会谈。

当时，毛泽东脸部、手部浮肿，眼皮下涌起几道皱纹。两只脚浮肿得也很厉害，只在有人搀扶时才能艰难地移动脚步。周恩来原计划让他只会晤15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关系的新纪元——23年没有交往的两个国家，从此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拖着脚步慢慢陪送尼克松走到门口。他对尼克松说，他身体不好。

尼克松说："不过你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长期被慢性肺炎折磨，心脏患病，1976年5月、6月、9月曾连续三次发生心肌梗死。在他与死神搏斗期间，报刊广播的新闻里，却仍然千篇一律地称呼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隐瞒了真相。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89年10月5日上午9时，我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办公室，访问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在毛泽东逝世后，回到铁道部做老干部工作。她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大而明亮的眼睛，文静、大方、端庄的神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张玉凤出身工人家庭，14岁参加铁路工作，18岁在长沙专列上，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工作。她说，她虽在主席身边工作，但拿铁路服务员的工资，每月只有四十多元。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两袖清风。毛泽东病逝以后，她提着小包离开中南海时，说了一句话："我来时是这样子，走时还是这样子，没有享过清福!"

张玉凤脸色苍白、憔悴。主席的逝世，精神的压力，流言蜚语的创伤，使她过早地显老了。1989 年她刚刚 45 岁，黑发里已露出丝丝白发了。她用手指按着自己的脸庞，一按一个坑。她说："你看，我的脸上还有点肿!"

张玉凤的丈夫刘金生在铁路部门工作。他们有两个聪明、漂亮的女儿，都已上中学，一家四口过得很幸福。

张玉凤回忆说："1969 年，'文革'进入第四年，毛主席被无数'万寿无疆'、'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颂词所神化，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并非如此，而且被严格保密，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很难知道。但他毕竟是 76 岁高龄的老人了，加上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平常又过分自信、不愿请医生看病。因而多种疾病逐渐缠身。从 1970 年开始，每到开春、冬日时节总要生病，患的是老年人最怕的大叶性肺炎，又因气管炎，昼夜咳嗽。有段时间，老人家已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繁重的日常护理工作大都落在我和一些服务员身上。1971 年'9·13'林彪叛逃事件给老人家精神上的打击极大，健康情况越来越恶化。这年冬天，老人家曾经昏迷休克过一次……"

毛泽东说话口音不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惟有张玉凤能听懂他的话。所以，张玉凤在毛泽东接见外宾和中国同志时，总是担任不是翻译的"翻译"。

张玉凤说，在病中，毛泽东睡眠时间很少，醒来就躺在床上，或靠在沙发上忙着批阅重要文件。1973 年到 1975 年，他走路虽困难，但肺气肿、心脏病却都有好转。

1975 年到 1976 年初，毛泽东的心肺病加重了，不能起来，成了半瘫的老人。他不能进食，全靠医生给鼻饲。说话也很困难，说不清楚，但是可以用一只眼睛，看大字印刷的报纸。1974 年春，毛泽东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有一次，对江青的一封信，是毛泽东躺在床上批的，有几个字都叠在一起了。眼睛的白内障病也日益严重起来，以致发展到双目失明。

眼睛失明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特别是像他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都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全国的党政军大事，从全国各地向他涌来，文件堆在办公桌上。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文件、信件、报纸由机要秘书为他念，遇有请示报告，有时靠毛泽东口述，由秘书代写。

在毛泽东眼睛失明的近两年时间，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穿衣、吃饭、服药、走动，无一不要人照顾。张玉凤更是付出辛勤劳动，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好感。张玉凤日夜为他一口口喂水、服药、吃饭连续达四年之久。

一次，毛泽东一口痰没吐出来，医生不在身边，听到喉咙里咯咯地响，张玉凤立刻跪在床边，亲手为他掏痰，避免了危险。

毛泽东晚年多病，心情又不好，容易发脾气。有一次，因为弄录音机的事，毛泽东生气了，他对张玉凤说："不高兴，你就给我滚!"

张玉凤脾气也很直。她二话没说，拿起小包就走了。回家后，心情很不平静，不愿见人，更不愿与人讲话。

后来，毛泽东又请她回中南海工作。毛泽东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

1975 年 8 月，唐由之医生非常成功地为毛泽东进行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恢复视力以后，他又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他不听医生、秘书的多次劝阻，不顾病弱的身体，躺在床上，一手举着书报，一手拿只放大镜看，一连几个小时阅读批示文件。有时，他实在疲累了，无法工作了，便仰卧在床上，背后垫上枕头，暂时休息一下。

有时，他的手抖个不停。这双大而柔厚的手，过去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批示过千万文电，书写过多少瀚海书林，如今却显现出条条青筋，连自己拿书和文件的能力也没有了。

毛泽东常常咳嗽不止。他每次带着极大的痛苦呼吸着，嘴唇抽搐地一张一合。他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了。有些日子，每天都吸氧气，听不清楚讲话，每餐只能吃一二两饭。

1975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 82 岁生日。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共进晚餐，度过他一生的最后一个生日。

这天中午，江青来看毛泽东，给他带来两个菜。毛泽东见了她，久久沉默不语，没说一句话。

这天，金日成派人给毛泽东送来生日礼物大苹果，毛泽东拿着一个红艳艳的大苹果，看了又看，露出了笑容。

1976 年 1 月 8 日，当他在病床上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手捧报告，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关于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和有关悼词的请示报告。他让秘书递给他一支笔，在自己的名下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他的眼睛红了。他嘴唇痛苦地抽搐着，两行老泪顺着面颊流下，滴在胸前的睡衣上，他悲痛得泣不成声。

守在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看见主席如此悲痛，一边扶着他的肩膀，替他擦着眼泪，一边轻声向他请示：“主席，你要不要去参加周总理追悼会?”

毛泽东点点头，脸上现出凄凉和悲伤，闭着双眼，痛苦而又吃力地拍拍腿，无力地说：“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76 年 5、6 月间，毛泽东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积极抢救，一面把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各省市负责同志通报。后来，经过抢救转危为安了。

七月初，朱德委员长突然逝世。不到半年时间毛、周、朱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这三位老战友痛失两位。老人家精神上很受刺激。他通常以诵诗读赋寄托自己寂寞悲凉的感情。

一天，他让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在床边给他连续朗读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就自己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地背诵：“……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以何堪。”

7 月 28 日清晨的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又是一次重大震动。后来，当他得知地震中死伤几十万人的时候，毛泽东已成了半瘫痪的病人。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在强烈余震中将他由中南海的游泳池，搬进附近新建的一座坚固的抗震力很强的“202”办公室。他虽然不能多讲话，但仍十分关切灾难的情况，亲自批阅有关地震灾情的报告。

8 月 28 日，毛泽东与前妻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来看望他。在问了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以后，紧紧握住女儿的手，泪水盈满了眼睛。他闭目沉思良久，准确地说出了李敏的出生年月。

毛泽东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变得极烦躁，他不愿多讲话，也不愿多见人，心情也很悲凉。他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望着宽敞的卧室，注视着窗帘缝里射进的阳光。有时，他像想起了什么事，轻轻地摇着头，低声地说着什么，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一天，张玉凤给毛泽东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自己也跟着背诵起来，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

他常常独自饮泣，含泪背吟《史记・汲郑列传》的最后一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一天，毛泽东用手势招呼张玉凤走近跟前。他要她准备笔墨纸张，亲自把这几句话书赠给她。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别人展览的偶像!”

3、诀别和哀悼

1976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回顾自己的一生和往事，曾这样感叹地说：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他接着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的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第二件事，他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许多曲折，并且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巨大的错误。即使如此，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伟大的功绩。

从 1976 年 6 月起，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开始轮流在毛泽东身边值班。经常值班的，有毛泽东保健医生率领的医疗组，有党中央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

毛泽东尽管病情日益严重，头脑却一直很清醒。直到他逝世前五小时，还在看书报文件。

毛泽东病危期间，江青却带着她的人马在大寨“蹲点”、“视察”。9 月 5 日，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打电话催她回北京。9 月 7 日下午，江青从她住地赶来，一进门就对医疗组高声大嚷：“你们谁来报告情况?”接着就气汹汹地对医疗组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华国锋劝说江青：“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尽到职责了。”

9 月 8 日凌晨，在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的时候，江青却要给毛泽东翻身。医务人员根据毛泽东病情，不同意翻身，但是江青根本不理医生的劝告，坚持要给毛泽东翻身。值班医生特地跑到 202 号大厅请示王洪文。他赶到毛泽东病床前说，可以翻身。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晚上，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来到毛泽东遗体旁边，向领袖告别。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即使对最亲密的国家和兄弟党也没有透过口风。政治局委员们看到毛泽东安息的遗容，大家都悲恸地大哭起来。

哭声中，江青却莫明其妙地突然大叫一声：“大夫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啊，你为什么不救救啊!”

在场的政治局委员知道，专家、医生为抢救毛泽东的生命，日日夜夜付出了及其艰辛的劳动，这怎能说是“不救”呢?这不又是新的栽诬陷害吗?当时大家对江青的叫喊都未理睬。

在 202 号房间举行告别仪式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毛泽东卧室旁边的房间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许世友、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研究料理毛泽东丧事的问题，但是江青俨然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和口气，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现在政治局要团结，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要拥护他。”接着，她声色俱厉地说：“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盛气凌人，骄气十足，当即引起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愤怒。他不等江青把话讲完，立即站起来，怒斥江青：“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穿一身黑套服，坐在沙发上，连忙辩解：“我并没有说你嘛。”

许世友气愤地说：“你不能血口喷人嘛!你张狂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

经几位同志劝说，争吵停了下来。

接着，讨论姚文元起草的《告人民书》，江青嘶哑着嗓子喊："这上头为什么不写批林批孔?为什么不写批判邓小平，是不是主席死了，要给邓小平翻案了。"

王洪文睁着哭红的眼睛，顶撞了一句："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要扣帽子!"

江青把话题转到批邓问题："你们知道吗?毛主席是被邓小平迫害死的，他在临终前惦记着的头等大事，依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江青的话越讲越多，并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你们知道吗?毛主席为什么不久前还在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里有重大的战略问题。我建议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批邓的问题，并且我建议，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公布政治局的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实在忍不下去了，气呼呼地站起来："江青同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主席的治丧和悼念活动还没进行，你拉扯那么多干什么呀?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

华国锋说："批邓当然是不能停止的……不过眼下嘛，我们首先要把主席的治丧问题先定下来，我们总不能把主席的遗体放在一边谈批邓嘛!"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决定：把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让各族人民世代能看到他老人家的遗容；立即向全国全世界广播毛泽东逝世的讣告，组织各界人民代表、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9 月 9 日下午四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当噩耗从电波传向全国全世界的时候，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从城市到农村，从首都到边疆，亿万人民为失去自己的领袖而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我走上街头，庄严的《国际歌》声在晴空回响。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半降的五星红旗在微风中飘动。匆匆的行人行列里，有人一边走，一边擦着热泪。

在连续七天的吊唁里，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 30 万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科学家和各族代表，排成整齐的队形，身着素装，臂戴黑纱，默默地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冒雨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

我跟着泣不成声的人群，向主席致哀。毛泽东的遗体安放在松柏常青树中，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身上。他那坚毅安详的遗容，仿佛刚刚入睡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旁边守灵。

敬献的花圈中，有一个由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组成的花圈，上写：

"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长长的队列，悲恸的人群，大声哭泣着从毛泽东遗体前走过。他们默默地在心底呼唤着：

“毛主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连日来，中南海紫红的古老院墙里，笼罩着特别令人悲恸的气氛。那漾着波光的湖面，那散着芬芳的花木，那盖着黄蓝色琉璃瓦的亭台楼阁，无不使人触景生情，仿佛感觉到毛泽东的身影仍在这里走动。

4、罪恶的黑手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走向哪里去？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共产党，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谁来做东方这艘巨轮的舵手呢?

全中国注视着北京。

全世界注视着中国。

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北京的声音。

北京发生了什么呢?

“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快了妄图篡夺中央领导权的活动。

毛泽东逝世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好遗体的问题。

“四人帮”认为，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保护遗体的水平。如果失败了，对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不好交待。江青怕负责任。因此，他们决定不插手遗体保护工作。一旦遗体处理不当，就嫁祸中央领导人。江青说：“我心情不好，我不管!”

笔者两次访问过华国锋同志。1989 年 10 月 5 日上午，华国锋在住宅里再次接见笔者。他说，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党中央决定通过外交部，派人乘飞机到越南河内了解胡志明主席的遗体保护情况。虽然得到了一些技术知识，但能否保护好，还没有把握。这时江青一反常态，立刻要往里钻。华国锋反问她：“你不是说，对保护遗体，你不管，不参加吗?怎么这时候，又来参加，又要管了呢?”

江青红着脸，无言答对。

“四人帮”把黑手直接插进了中南海。9 月 10 日晚上，时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

文，带着秘书廖祖康、米士奇来到中南海，在紫光阁架起 17 部电话机。他要秘书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

华国锋听到情况汇报，十分气愤，这么大的事请，他们竟瞒着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是想干什么?他马上打电话要汪东兴来到他的住处。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进屋听华国锋说的情况，心里很是不安，连忙说：“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的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华国锋气愤地拍着茶几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配合王洪文的夺权活动，江青孜孜追求当党中央主席的迷梦。她搬回中南海以后，当面讲要和华国锋“团结”，背地却又进行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

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毛远新去看望江青。一见面，江青就向毛远新发牢骚。她闷闷不乐地说：“昨天开的追悼会，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人和我握手。华国锋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不尊重我。”

毛远新说：“主席逝世了，他是主席了，应当尊重他。”

江青冷笑地说：“他是主席谁承认?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远新惊愕地望着江青：“为什么?”

江青将肩头一扭说：“还要看一看。”

江青日夜做着当女皇的美梦。主席病重期间，她连续窜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北大等地，欺骗群众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她到处散布，俾斯麦、梯也尔、拿破仑死后，他们的妻子都受到迫害。她还要随行的记者，为她撰写一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新闻。

8 月 28 日，她第三次窜到天津小靳庄时，尽管是大热天，她却打扮的像陕北农民那样，头上包一块毛巾。坐在凉篷里，故弄玄虚地说：“我这次来可不容易，是深夜请示主席，主席批准我才来的。”江青大讲要破“男尊女卑”，“我们中央就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义”，“在政治局我是单干产”，“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江青说，“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8 月 30 日，江青到了解放军某部连队，她讲了一阵“我是大女子主义”之后，于 9 月 3 日乘着豪华的专列，有七个客车厢，两个货车厢，还带上四匹马，第二次窜到大寨，继续做她的女皇美梦。

毛泽东刚刚去世，迟群、谢静宜就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师生的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他俩在信上说：“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他们还秘密串连一些人写“劝进书”，要江青当中央主席。

虽然毛泽东多次说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但江青仍然把自己看作是毛泽东身后理所应当的接班人。

5、谁当接班人

谁当接班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经常考虑的问题，也是他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也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据张玉凤写的一份材料说，一天，毛泽东要张玉凤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一个地给他念。他一边听，一边陷入长久的沉思。

念到周恩来时，张玉凤说：“主席，我们的周总理多好啊，德高望重，很得人心，为什么不选他作你的接班人啊?”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接着，他高高地扬起右手，用力猛向下一砍，遗憾地说：“周缺乏这个……”

毛泽东的意思是，周恩来缺乏统帅全局的果断和魄力。

严于解剖自己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坦率承认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和不足。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几十年的左右手，像擎天柱一样支撑着国家大局。他的病逝，对毛泽东是个很大的打击。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俩让一下。”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华国锋同志好一些。”主席提议：“让华国锋当总理!”

毛远新连连点头：“好，好，选得好!”

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提名，马上向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

会上，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张春桥。

江青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拥护主席的提议。

会后，汪东兴特地来看望毛泽东，激情地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得实在好!我双手赞成。对这项决定，政治局的同志都很满意。”“主席，你要吃好睡好，其他的事我们来办!”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他搬着指头说：“华不但有地方工作经验，省委工作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嘛!”

1976 年 4 月 30 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华国锋陪同外宾去见主席。会见完毕的时候，华国锋走上前对毛泽东说：“我送外宾走后，还要向主席报告几件事。”

毛泽东点头说：“好!”

华国锋送外宾归来，向毛泽东汇报说：“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有一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主席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呢!”

当时，毛泽东说话已不大清楚，华国锋听不清楚。在场的张玉凤，又把毛泽东的话翻译一遍，向华国锋重复一遍。随后，毛泽东又讲了一句话，连张玉凤也听不清楚。

毛泽东示意张玉凤拿来纸和笔，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句话，交给华国锋：

“慢慢来，不要招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笔者访问华国锋时他谈到毛泽东亲笔给他写的“三句话”，谈到粉碎“四人帮”的经历。在一间宽大的客厅里，华国锋对笔者说：

“‘四人帮’急于夺权，形势相当紧急。一天，李先念来看我，我拿出毛主席给我写的三句话，对先念同志说，他们盗用毛主席的临终遗嘱的话，欺哄全党，其实，毛主席真正是写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不但说了，而且写了!”

李先念很激动，拍着茶几说：“好极了，快，快，拿来我瞧瞧!”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纸。果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

李先念一边看，一边鼓励华国锋说：“国锋同志，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你的身上。毛主席的这三句话，好比尚方宝剑嘛。江青他们别看是主席的亲属，他们有啥?有的是毛主席多次对他们的警告和批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轮到他们掌了大权，怎么会有我们的活路?”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贺龙元帅创建的晋绥解放区工作。1940 年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45 年担任交城县的县委书记

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 年建国前夕，他随军南下湖南，任湘阴县委书记。两年后又调到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任县委书记，领导互助合作和大跃进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很快改变了湘潭的面貌。1952 年，他又从县委书记升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毛泽东回湖南，华国锋多次向他汇报工作。他那稳重的言行、忠实憨厚的性格，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好评。1959 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跟湖南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站在一起，进入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1968 年 4 月 9 日，担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0 年 8 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下山来到湖南找华国锋谈话。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建设工业省的计划。临别，华国锋请示毛泽东：“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坏人是谁呢?毛泽东没有点明。当时，华国锋还以为是指大闹庐山的陈伯达呢！

8 月 25 日，华国锋再次应召来到武汉。第二天，华国锋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华国锋胸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很不高兴地说：“你戴那干什么?”接着又说：“取下来!”

毛泽东问了湖南的情况，深思了一阵，再次告诫华国锋说：“你满脑袋是农业，我满脑袋是路线!”

华国锋至此才明白：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次谈话后，华国锋随毛泽东到了广州，做广州方面的工作。一天，毛泽东向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谈起他怎样从信仰孔夫子到信仰马克思。在谈到江青时，毛泽东当众夸奖汪东兴：“汪东兴有办法，能顶住江青，不让她来干扰我的工作!”

汪东兴谦顺地说：“这全靠主席。若不是主席支持我，我怎能管得江青啊?!”

1971 年，华国锋调到中央，任国务院业务组长。毛泽东指示华国锋要多调查研究，并且制定了要跑二十多个省市的计划，但是，走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上海七省市后就病了。参加处理“9 •13”事件后，1973 年 8 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 年 1 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几次提议，让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日常工作。

1976 年 4 月 5 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经常以毛泽东的代理人自居的江青，对于华国锋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内心深为不满。

9 月 1 日，北京召开唐山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叶剑英等领导人出席大会。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召开“四人帮”一伙人的紧急碰头会，她针对华国锋、叶剑英，大发脾气，破口大骂：“他凭什么坐第一把椅子?还发表重要讲话?还有那个老家伙竟然也出来亮相，坐在第三把交椅?真是太不公平了!”

张春桥立刻说：“那个执掌军队实权的是个核心人物，华也要靠他才能立得住。最令人头痛的是军队……”

江青马上吩咐王洪文：“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毛泽东逝世，按通常程序，理所当然的应当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可是，江青却兴风作浪借机发难，妄图窃取党中央主席的职位，这就不能不引起华国锋的警惕。回忆到毛泽东向他亲自讲述的刘邦关于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的故事，感到自己肩上责任更加重大了，他决心制止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

华国锋向李先念透露毛泽东的三句话后，为争取更多的政治局委员支持，他又专门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当时公布了前两条。到会的江青、王洪文均有记录。姚文元在审改人民日报送来的社论时，却别有用心地同意了社论中提到的“按既定方针办”，而没有按华国锋传达的“照过去的方针办”改正。

这篇社论中的“按既定方针办”，并不是姚文元的发明，而是社论的撰稿者从新华社的一则电讯中看到的。于是作者就把它作为毛泽东嘱咐写进了社论。自此，姚文元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的毛泽东临终嘱咐。要求新华社在处理各省悼念毛主席新闻时，都要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也要添上类似的话。

9 月 18 日，毛泽东主席追悼会刚开完，江青来不及换衣服，身上穿着黑衫丧服，头上披着黑纱，径直来到主席秘书张玉凤那里，取走了毛泽东 9 篇文章的原稿和一些手迹。毛远新还伙同江青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泽东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两次谈话的记录稿。

江青走后，张玉凤马上把此事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指示她要立即追回文件。

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包含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毛泽东刚逝世，叶剑英亲自给汪东兴打电话，严肃地说：

“东兴同志，你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你还要看管好主席的文件档案。”

对此，汪东兴又向华国锋作了请示。、得到批准后，他立即打电话给江青。听到是汪东兴的声音，她故意拉长腔调，傲慢地说：“什么?让我把毛主席的文件交给办公厅?笑话!天大的笑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主席的妻子，是主席的继承人，我有这个权利!”

汪东兴坚定地说：“主席的所有文件档案，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和遗产。因为主席是全党

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你拿走的文件档案还是应该交回来，由中央办公厅保管。”

这话更加激起江青的怒火。她大声说：“你有什么权利敢对我这样说话?!主席遗骨未寒，你就想赶我走吗?你想干什么?”

汪东兴再次严正警告江青：“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我是奉命办事的，希望你也要按照共产党员的纪律办事!”

江青冷笑一声，“砰”的扔下话筒，转过身子对站在电话边的张春桥说：“你看到了吧?主席刚刚归天，他们的面孔就都露出来了。这是好事，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得很哟!”

江青虽然碰了钉子，但是贼心不死，继续纠缠不休。深夜三点钟了，她突然打电话给华国锋，大哭大闹地说：“为什么不把主席的文件交给我?我是主席的妻子，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待我……”说着就在电话上嚎啕大哭起来。

华国锋按捺住心中的怒火，镇定而平静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吵闹。我不是早就当面告诉过你吗?毛主席的文件，是党的财富，应该一律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保管，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四人帮”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抢夺毛泽东的文件?叶剑英说，一是怕，怕主席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要找打人的炮弹。

如果“四人帮”真要掌握控制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他们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掩盖自己的狐狸尾巴。他们还可以以正统自居，任意歪曲篡改，制造种种理论，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还可以任意制造“最高指示”，“临终遗嘱”，独揽一切权力，为所欲为了。

9 月 21 日，党中央封存了毛泽东的文件。“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6、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四人帮”加快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9 月 19 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

江青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次会议，她要和姚文元、毛远新来参加。而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政治局常委，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江青蛮横不讲理地说：“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我们几个人都要参加，叶帅病了，不要来参加!”

“为什么不让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呢?”华国锋径直问她。

江青一时说不出话。华国锋立刻明白了她的阴谋，顶撞她说：“不让一位副主席参加会议，那还讨论什么重要问题呢?这件事，过些天再谈吧!”

第二天早晨，张春桥来到华国锋家里，充当江青的说客，对华国锋解释说："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对张春桥说："毛远新的联络员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张春桥注视着华国锋的表情，说："我主张安排毛远新为三中全会起草文件；他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我这意见，你不会反对吧?"

华国锋坦率地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张春桥仰着脸说："有什么不合适!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不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名单中就有毛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华国锋接过话头，反攻过去："是呀，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意。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局势统筹考虑。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显得比老人家还高明呀!"

华国锋接着又说："再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就在 9 月 23 日这一天，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他要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催促赶快把民兵武装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万一。

王洪文刚放下电话，就来到张春桥的屋里，姚文元、江青也都在。王洪文到不多久，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一边听，一边说："好，好"，最后说："我们研究一下。"

王洪文放下电话以紧张惊讶的神气，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是叶帅的电话。"

王洪文讲了叶剑英电话的内容，谈到关于批邓的问题，以及他和江青吵架的问题。王洪文深为忧虑地说："我和江青吵架，他怎么会知道呢?是谁告诉的呢?叶是想拉我。叶打电话前是否跟谁商量过?"

姚文元深有所思地说："难道这么凑巧?原来两边都在开会!"

姚文元指的"两边"，一边是指王、江、张、姚四个人的议论：一边是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毛泽东逝世以后，姚文元日夜都想着毛泽东生前讲过的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谈话，早就心慌意乱了。

有一次，姚文元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到中南海开会。?散会后，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辑交待说："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你们要继续做好报纸的出版工作。

现在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还要看一看。”谈话中暗示，可能要出事。

早在 1975 年，王洪文受到批评后，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第二武装”，他说他“要搞 40 万民兵，要有 40 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

这期间，他们制造大批枪支弹药，准备装备 30 个步兵团，十个高炮师，三个地炮师，一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团，配备一三〇火箭炮 108 门，高射炮 780 门。

这些武器按规定应由解放军统一保管。可是王洪文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发到民兵手里。”

王洪文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9 月 21 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特地来到北京，向张春桥报告了他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的密谈情况。

丁盛向他们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说：“已有所准备。”

其中重要准备之一，是根据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亲笔批的“立即发枪”的命令，突击发给“民兵”大批枪、炮、弹药。

张春桥听了上海情况，表示满意，同时又不放心。他再三叮嘱徐景贤：“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垮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现在形势紧张，要谨慎小心，要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深夜，张春桥又写信给上海的同党。信上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斗争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也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的。“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张春桥把写好的密信交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要他亲自送给上海市委。9 月 28 日，临行前，张春桥又把肖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他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传达他的口信：“上海要提高警惕，也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由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上海会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

他们要同谁打仗呢?

7、公开的挑战

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匕首出鞘了。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恬不知耻地向人游说，她要担任党中央主席。

9 月 23 日下午，江青通过秘书联系，把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接到钓鱼台 11 号楼。

张玉凤试探地问江青：“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党的主席未定。”江青说：“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听了很高兴，满有把握地说：“不错!”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主席从前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接到钓鱼台 11 号楼，嘱咐他说：“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拥护谁?”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江青面授机宜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在分别做了这些安排以后，江青急不可待地出马了。

9 月 29 日，江青大闹政治局会议。

人民大会堂比往日显得更加庄严、宁静。耀眼的灯光下，辉煌的大厅里，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政治局会议准时在深夜开始了。

这次会议，事关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紧迫问题。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15 名政治局委员，四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许世友、李德生、苏振华、韦国清、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吴德、赛福鼎、吴桂贤、倪志福、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环坐在长排沙发里，等待着华国锋宣布开会。

华国锋事后告诉笔者，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

在会上，江青首先发言。她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著作最好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那里召开“工、农、兵、学、商”群众国庆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

讨论时，这个意见很快通过了。

江青接着又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望了大家一眼，哭泣地说：“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 40 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是对我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

坐在一边的王洪文说：“是谁反对呀?”

叶剑英挺身坐在沙发里，轻轻扶正老花镜，神情激动地说：“我，是我叶剑英反对!”

“我跟毛主席干革命快 50 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你江青深得多。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合适?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稿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管。至于毛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政委，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的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叶剑英的话，像在会上点了一把火，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李先念马上发言表态：“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他的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

张春桥板起脸，咄咄逼人地说：“口头上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叶剑英听到张春桥话中有音，他想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掌握中央领导权。叶剑英马上说：“春桥同志，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不严肃的，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我们毛主席相提并

论呢?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主席并驾齐驱。”叶剑英拍着桌子，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光芒，说：“主席已经分配了她的工作，政治局委员就是她的工作，还要分配什么工作?要讨论，也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

李先念急起呼应叶剑英，连忙插话说：“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应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翻开党章看一看，哪一次主席，不是中央全会选举的。”

王洪文打着手势说：“政治局有权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会议议程原来根本没有关于江青工作的安排问题，张春桥突然提出，完全是突然袭击。他说：“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不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立即将话题引向讨论关于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我收到毛远新的一封信。他在给中央的信里说，他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在办完毛主席的丧事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如果中央有事，他可以留下来。”

毛远新写信的本意是要中央批准他留在北京工作。

对这，江青曾亲自向毛远新作过交待。9 月 21 日，在毛泽东住的 202 号房间，江青对毛远新说：“我找张春桥谈过，让他找国锋谈一下，要你留下，不能走，清理主席的文件。不同意你回辽宁工作。”江青并且说：“毛主席要我们五个人团结，就是要留你在中央工作。”

毛远新缺乏社会经验。他对江青留他在中央工作的恶毒用意，并没有理解。所以他对江青说：“过去我是主席联络员，主席交待一些工作，参加一些会议。现在主席逝世了，我又不是中央委员，留在中央干什么?”

江青劝他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前段不是这样吗?”

毛远新没有同意江青“妈妈”的意见。于是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时，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原来的意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地吵闹起来。她扯去披在头上的纱巾，从沙发上站起来，挥着手，尖声地叫嚷：“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脸色一阵变白，一阵又变红了。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

张春桥说：“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

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

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她傲慢地说：“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他尽力遏制住自己，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用响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他坐在那里没走，看看江青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泽东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还是不同意。

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

叶剑英说：“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华国锋顺水推舟，说：“好!散会!”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8、夺权与反夺权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的丑剧被挫败了。但是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更加尖锐地进行着。

10 月 1 日这天，江青起床很晚。她中午刚刚吃完饭，就急急匆匆跑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这是她第八次接见清华学生了。她疯狂叫嚣："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以后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歇斯底里地挥着胳膊，声嘶力竭地喊着："小将们，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她明目张胆地煽动年轻人："你们要把好东西留着，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10 月 2 日，毛远新不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给沈阳军区打电话，要把一个装甲师调到北京来。沈阳军区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命令停止执行，并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谁也不能调动部队。

张春桥在他的亲笔写的提纲里，赤裸裸地提出"镇反"、"杀人"的计划。他在"镇反"一项写道："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10 月 2 日，王洪文拍了"标准像"。接着，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4 人一起，还特地拍了"历史性纪念的彩色合影"，准备登台大典。

二日上午，华国锋审阅外交部长乔冠华 9 月 30 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当他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时，提起笔来在稿子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三句话，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华国锋把稿子交给秘书，要他将文件交中央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交外交部。华国锋并亲自找到耿飚、韩念龙谈了这件事。

文件很快传到张春桥手里。他仔细推敲着华国锋的批示，心里一阵惊慌。他敏锐地感觉到，华国锋在向他们反攻了。为了稳住阵脚，他立即在文件上写了一个批示："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向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打电话。江青又通知迟群、谢静宜、钱浩亮、刘庆棠等人，深夜赶到钓鱼台会议厅。

正当大家相互问好的时候，江青穿着一身新军装，像导演样板戏那样，神气活现地走进

来了。她板着脸，皱起眉头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吗?我们都是并肩战斗过多年的战友，我们有事不能不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

江青厉声高叫着：“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他批倒批臭，他还会东山再起的。因为，中央有他的人!”

王洪文插话：“倒了邓小平，还有邓二平、王三平!现在他们要背叛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要和我们斗，要夺权，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江青同志!”

张春桥耷拉着脸，胸有成竹地说：“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哪!”

江青像被蛇咬了一下，尖声怪气地说：“但是我不怕!我现在每天都在练太极拳，把身体锻炼好，好和他们斗啊!”接着又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让华国锋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吗?”

大家还没有弄清楚她提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这时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江青，摆出傲慢的架势，又大谈起历史来了。

江青说：“刘邦死后，是吕后在掌大权。因为只有吕后能继承刘邦的事业。太子太幼，没有威信，还不能亲政嘛。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江青的话，对她的追随者说来，真是“一点就明”。曾扮演过《红灯记》李玉和的钱浩亮，被江青提拔当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会上，他首先站起来，挥着手势，大声说：“同志们，我们要向中央请愿，请江青同志担任党的主席!”

刘庆棠马上响应说：“对!我们要坚决拥护江青同志任党的主席!”刘庆棠原来是中央歌舞剧院副队长，被江青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

张春桥看到大家情绪很激昂，连忙摆了摆手：“现在有人已经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他们要篡改毛主席的本意，要同我们较量了!我们今天穿着军装接见你们，就是要迎接他们的挑战!”

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坚决拥护江青当党的主席!”

会后，“四人帮”的夺权活动更加猖狂了。

配合城里的活动，10 月 3 日，王洪文窜到平谷县，向一些干部发表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 月 4 日，“四人帮”爪牙用“梁效”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

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四人帮”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看到文章，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径直骑着脚踏车，带着《光明日报》急速赶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把报纸交给他，请汪东兴把报纸转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接过报纸，仔细看着，特别是对李鑫划了粗线着重点的地方，看得尤为认真。看完最后一句，他愤怒地高声说：“这还了得，这是公开向党中央挑战!”

9、夺权的信号

李鑫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华国锋送去“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内中有一段少为人知的经历。

毛主席病逝以后，9 月 15 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想要直接插手毛选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李鑫于 1948 年 5 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 年由高教部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康生办公室秘书，跟随康生犯过错误。他在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后，主要精力编阅毛泽东选集。当他听到姚文元询问毛选五卷文稿情况时，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别有用心的。拒绝交出毛主席的文稿。

过了一个星期，9 月 23 日，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 5 卷的文稿送给他。李鑫还是不给。

9 月 24 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李鑫说：“形势愈来愈清楚，他们是要夺中央的权。事情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了!”

9 月 25 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他在信上写道：“送上姚文元的信，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毛选问题。”

继姚文元来信之后，9 月 28 日，张春桥把李鑫找到钓鱼台谈话，盛气凌人地说：“我是中央常委，五卷工作我是脱不了身的。”

李鑫归来，立即把张春桥谈话的内容，汇报给汪东兴。他并请汪东兴转告华国锋，要求当面向华国锋汇报一次。

汪东兴当天向华国锋报告了李鑫的要求。

华国锋马上约李鑫在 9 月 29 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

李鑫向华国锋汇报了张春桥、姚文元要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的情况，同时向他讲了“四

人帮”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

华国锋神态严肃地听着，思考着。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主要是听李鑫讲。李鑫建议中央要采取果断措施，把他们隔离审查!

华国锋微微点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华国锋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李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自此以后，李鑫每天仔细阅读当天的首都报纸。10 月 4 日这天，当他读到《光明日报》的文章后，立刻向汪东兴报告，请他火速转告华国锋。他说：“这是‘四人帮’向党中央发起夺权的信号，建议党中央赶快行动，采取果断措施!”

10、无声的惊雷

深为党和国家命运担忧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像飞翔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肩负着历史的责任，私下一直在商议着、谈论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976 年 7 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立刻派出中央代表团奔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

这时，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却发表了署名忻启明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胡说什么“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文章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胡乔木读到了这篇文章，文中的火药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联想到江青到大寨等地的活动，有一天，他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里。他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汪东兴，有着长期共同工作的友谊。所以，今天他特地找汪东兴，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埋在心中的问题。

胡乔木送给汪东兴一本《学习与批判》，问：“你有没有这份杂志?你看了里边的文章没有?”

汪东兴说：“我没有这份杂志。”

胡乔木把脸凑到他跟前，低声而又坚决地说：“你看看吧，这里透露了他们的野心。”

胡乔木说：“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要动手啦，应该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汪东兴微微一笑说：“搞他一个人不行。抓了他一个，还有别人哩!”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促进作用，每当遇到“四

人帮”在中央会议闹事时，他都想到关于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中已开始酝酿了。

王震将军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在 301 住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多次找叶剑英谈心。他以军人豪爽的姿态，单刀直入地说：“叶帅，他们几个人这样猖狂，为什么还不把他们弄起来，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摆手制止他说下去。见到四周无人，叶剑英才低声慢气地说：“老人家刚去世，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他比着手势：“需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委托王震去征求陈云意见，共同商量对策。一天，陈云同邓颖超先后来到叶剑英的住处。

叶剑英住地的后山上，在茂密的树林中，有一座古雅、精致、宁静的小凉亭。他常常到这里休息吟诗，看清晨的日出，看西山的雄姿，听潺潺的溪流，迎着晚风吹来的花香，放声背诵苏东坡的《放鹤亭》。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把这间凉亭改名为“风雨亭”。“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常和一些老帅、将军们在这儿谈话，议论国家大事。这里没有安放窃听器一类的东西，他们可以在这里发牢骚，说心里话。

叶剑英听秘书报告，陈云同邓大姐先后来到，连忙请他们到风雨亭来。

陈云走进风雨亭，拉住叶剑英的手，拍着他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快想办法才行呀!”

叶剑英幽默地说：“办法得大家想啊，只靠我怎么成呢?你瞧他们把我参加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叹息说：“那几个行事，既不要党纪，也不要国法，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就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恩来在世时，对他们也是头疼得很。为了毛主席，他委曲求全，任劳任怨，终于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就连总理这样的人，他们都不能相容，那伙小宗派还能放得过谁呢?邓大姐，总理生前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邓颖超深情地摇了摇头，郑重地说：“恩来的性格和脾气，你们都熟悉，他从不对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一定时候党是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地表达他个人的意见的。”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老的政治家之一。叶剑英十分敬重陈云。叶剑英问他：“你看该怎么办：”

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接着又说：“从前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现在，我看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

理他们的问题。”

叶剑英道：“你估计党要收拾他们，全国人民会拥护吗?”

陈云说：“保险赞成!他们几个人，倒行逆施，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和这四个人斗，党心、军心、民心，都是向着你的!”

陈云希望再做一些工作，争取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华国锋，他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从组织观念讲，也要争取他，争取他能担起斗争的责任。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陈云的话，使叶剑英很受鼓舞。

在这期间，叶剑英多次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说：“研究时局，掌握形势，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叶剑英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要注意“四人帮”的活动情况。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他对国内全面局势，了如指掌。

9 月 21 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委托老部下杨成武到叶剑英住地，转达他的期待。他对杨成武说：“那几个东西，闹腾得很厉害。这伙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不得了，中国革命就会倒退几十年。现在，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情况很紧张，请叶帅快拿主意，早下决心，他得挺身而出啊!”

叶剑英听了杨成武的汇报，神情激动地说：“你回去报告聂老总，请他放心。他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我已有思想准备了，你回去报告他，有事随时同他商量。”叶帅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要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中央曾发出文件，“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可是叶剑英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指战员。

叶剑英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肖华等高级将领，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

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狱中出来后，住在 301 医院。

傅崇碧告诉笔者，一天，他来到西山探望叶剑英。刚进客厅，还没开口，叶剑英就转过身来，伸出手，向他走来。

叶剑英幽默地说：“我们是同案哟!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是杨余傅事件的后台!”

傅崇碧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差点被他们整死!”

“鹿死谁手，等着瞧吧!”叶剑英说着大笑起来，伸出四个指头，又对傅崇碧精辟地分析形势说：“一、不要紧，他们没有抓到我们什么东西；二、他们积怨甚多；三、要进行斗争；四、要讲究方法。”

回到医院，傅崇碧立刻把会见叶帅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断腿重伤的罗瑞卿和其他高级将领。寂静的病房，顿时喧嚷沸腾起来。

11、“无事不登三宝殿”

1976 年 9 月 21 日晚，华国锋在中南海值班。为避开“四人帮”的监视，华国锋说要去北京医院看病。然后，他坐车到北京医院绕了一圈，随即坐车驶向西城区西黄城根的李先念住地。

这座青砖铺地的老宅院，院当中挺立几株大树，遮得满院子都覆盖着树影，沿墙栽种着葡萄。靠西边一座新修的高房子，正当中砖墙上开一道侧门。

华国锋走进侧门，穿过正屋走廊，来到向南的客厅。这屋里靠玻璃窗伫立着一长排书柜，紧靠书柜摆了几只半圆形．的沙发。

李先念让华国锋坐下后，华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单刀直入地对李先念说：“形势很紧迫。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四人帮’的问题，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我想请你请示一下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这是一件大事。我想知道叶帅的意见。”

李先念问道：“你下决心了吗?”

华国锋说：“现在不能再等待了，情况太紧急了。问题是什么方式解决，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华国锋再次陈述毛泽东的遗志：“主席生前就交待过，今年不解决，就明年解决，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

李先念用兴奋的目光盯着华国锋，连声说：“好呀，国锋同志，我马上去见叶帅!”(写到这里，笔者需要做一更正声明：笔者以前对这个细节的记述有误。当时，华国锋并没有写条子交给李先念，要他转交叶剑英。另有人写报告文学说，华国锋到医院去看李先念，而且写了一封信给叶剑英。经笔者向当事人核对，并无此事。他们在做高度机密的决策时，是不允许写出文字的。)

1976 年 9 月 24 日，李先念以参观西山植物园为名登车出城。这时大概是十点钟。晴朗的天空下，车子沿着笔直平坦的柏油路，穿过市区，疾速向西郊军事科学院驶去。

1982 年 11 月 24 日上午九时，五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在西山的住宅里，激情地对笔者谈到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他那雪白的长眉下，两只深深的眼睛，在珐琅质眼镜下闪动着熠熠的光亮。这双善于观察风云的眼睛，看上去显得特别机敏、刚强，蕴藏着

深邃博大的思想、烈火似的力量。

叶剑英说："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那时候，李先念同志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刮来了?他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叶剑英又问："你是奉命来的吧?"

李先念大声地说："我是奉命来的呀!"

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得赶快想办法，事情太紧急了，你得下决心啊!"

叶剑英面容骤然焕发亮光，他兴奋地抓住老战友的手，连声地问：

"华下了决心吗?下决心了吗?"

"我看他是下了决心的!"

"那好哇!"

叶剑英为了防止有人窃听，又把收音机声放大了一些。顿时，客厅里响起一阵高昂的音乐声，优美的旋律回荡在敞大的客厅里，掩护着两位战友的谈话声。

李先念贴近叶剑英的耳朵上，大声地说："江青把华闹腾得无法工作，是逼上梁山啊!"

叶剑英问道："华有什么想法?"

李先念说："华要我来听听你的意见。他说，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早有交待，但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他请你拿主意啊!"

叶剑英连连点头，陷入深沉的思考。接着他问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态度，特别问了陈锡联和吴德的态度。李先念一个个简要作了介绍。至于华国锋，叶剑英过去不曾一起工作过，对华国锋了解不深。毛泽东病逝后，他为做好对华国锋的团结工作，曾亲自主动第一次登门看望华国锋。

那次，俩人在交谈中，叶剑英以试探的口吻，批评了王洪文破坏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企图建立民兵指挥部，搞"第二武装"的错误做法。华国锋赞同叶剑英的意见，但是对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没有表态。因之，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叶剑英才提出关于华国锋的决心的问题。

叶剑英神色严肃地说："我们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

李先念说：“是呀，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小平同志被他们打下去了，如果我们再被他们打下去，他们就要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叶剑英说：“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要迅速采取行动，以快打慢，最好一两天就行动!”

李先念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好主意，你们几个再分别交换一下意见。”

12、“西山不可久留”

送走李先念以后，叶剑英来到幽静的庭院，又信步沿着石梯，登上院后的山岭，走进一座被他称作“放鹤亭”的凉亭。

四周一片寂静。叶帅望着蔚蓝的夜空，银色的月光，黑森森的山峰，思绪如大海汹涌。他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宋代大诗人苏轼的《放鹤亭记》。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同行的秘书知道首长有背诵诗的习惯，但为什么这阵子总是反复吟诵这两句呢?她不了解沸腾在首长胸中的伟大战略决策!

笔者向叶帅问道：“西山为什么不可以久留?”

叶剑英说“那时候，王洪文搬到了西山，他住在离我 15 号楼不远的 25 号楼里。这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监视我的行动来了!”

说到这里，叶剑英的脸孔气得涨红，炯炯闪光的眼睛湿润了。他靠在椅背上，默默地凝视着，颤动的手，抚摸着胸前的军服。我注视着他那安详的神态，红润的面容。他那稀疏如雪的银发，宽阔而突出的前额，白眉下炯炯发光的眼睛，无不显示着元帅刚强的性格，果断机智的气质。叶帅稍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危险的时刻到了，王洪文很注意我啊!”

叶剑英决心摆脱“四人帮”的监视。为便于同其他同志共商国家大事，当天他离开西山，转移到玉泉山九号楼了。

王洪文发现叶剑英搬家，气急败坏地质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叶剑英怎么搬走了?你为什么要让他搬进玉泉山?”

汪东兴理直气壮地回答：“那是周总理批给他的房子，他为什么不能搬进去呀?”

“快打慢，快打慢”

听了李先念的传话，1976年9月25日，叶剑英乘车进城。他为争取现任领导华国锋的支持，特地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住地。这里原是西哈努克住的地方，唐山地震后，华国锋从史家胡同搬到这里。

这一次，他俩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叶剑英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叶剑英还建议华国锋要多到老同志那里去，找他们谈谈。

华国锋神情激动地问："叶帅，我经验少，资历浅，老同志能看得起我吗?"

"你去，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和'四人帮'斗，老同志不会不欢迎你的。"叶剑英鼓励华国锋："老同志支持你，我们军队支持你，全国人民支持你，你只管干!"

华国锋得到叶剑英的鼓励和支持，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的力量，坚定了除掉"四人帮"的决心。他神色严肃地说："只要有老帅的支持，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有军队的支持，我一定干!"

华国锋搀扶着叶剑英，送老帅上车。叶剑英回到玉泉山的当天，对前来探望他的粟裕、宋时轮高兴地说："华的态度很坚决。你们要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取利乘时，间不容息!"

为加快粉碎"四人帮"的步伐，第二天，叶剑英又来到华国锋的家里。他们共同分析了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一致认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中央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捍卫党的团结统一，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原则斗争。这个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一般方式，必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采取特殊的手段。但是为了避免动乱，又要做到合法解决。叶剑英说："对付他们，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先把这四个人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再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特殊矛盾，只有用特殊的办法。"

华国锋听了叶剑英的分析，十分高兴："叶帅，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他们几个犯有严重罪行，可以隔离审查!"

"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叶剑英进一步分析形势："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只要方法妥当，也可以避免。至于北京，一切优势都在党中央方面。"

说到这里，叶剑英尽管早已胸有成竹，但他仍然再次征求华国锋的意见："你认为有把握吗?"

"有把握!"华国锋坚定地回答。

叶剑英提醒华国锋说："郊区南口有个坦克团。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去过这个团。如果城内有行动，坦克开进城里，该怎么对付啊!"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周密考虑，十分敬佩。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

华国锋随即通过陈锡联、吴德对南口坦克部队的情况做了调查。证明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虽然曾来过这个部队，但坦克部队一直是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直接掌管的。“四人帮”虽曾想插手，但一开头就碰了壁，他们根本调动不了这支坦克部队。而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需有中央警卫部队参加。

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汪东兴作为8341部队政委、中央警卫局局长，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同江青之间多次发生矛盾。江青曾辱骂过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批评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毛泽东保护了身边工作人员。江青要往8341部队派人，也遭到汪东兴拒绝。江青向他要毛主席的文件，汪东兴也坚决顶住不给。

毛泽东生前曾对汪东兴说过：“江青是个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你们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还有我在嘛!”

华国锋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问：“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有军队支持就有把握!”

汪东兴脸色严肃，神色激奋，紧紧握着拳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

“好!好!就这样办!”华国锋握着汪东兴的手，眼睛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里，同他个别交谈。他俩进一步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以及他们近几天的动向。汪东兴滚动着焦急的眼神，说：“事情非常紧迫。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

“不能再等待了!”叶剑英皱着眉头，感慨地说：“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叶剑英以他几十年做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才华和经验，立刻意识到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果断地说：“我们要快打慢，快打慢!”

13、小会议室的聚会

华国锋告诉笔者说，自9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江青冲突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个问题：江青一伙干扰党中央无法正常工作。江青的目的很明白。她公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敢于提出要给她分配工作问题，不断纠缠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大吵大闹，泼妇骂

街……这不是明明想当太上皇、当党中央主席吗?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毛泽东生前早就警告，说江青有野心，要当党的主席，要王洪文当委员长。江青根本不把第一副主席放在眼里……

华国锋说，毛泽东早在 1975 年就做过交待:“四人帮”的问题，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去世了。他没有完成的遗愿，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去完成它。现在是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了!

10 月 1 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建国 27 周年大会以后，当他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的时候，这些日夜在华国锋脑海里翻腾的问题，又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银幕上的故事、镜头，他全像没看见似的。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思索最近“四人帮”的活动上。他腾地从沙发前站了起来，大踏步走出电影厅，向休息室走去。

同华国锋坐在一排沙发里的李先念，看见华国锋中途退出，立刻意识到他一定有什么紧急事情。于是，他随即跟着华国锋快步走出影场。他在后边大步紧走了几步，在靠近休息室的走廊里，赶上华国锋，低声问道:“国锋同志有什么事吗?”

“有!”华国锋回答。接着又说:“到小会议室谈吧!”

同华国锋一起看电影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他看到华国锋、李先念相继退出影场，也随即跟着他俩来到小礼堂小会议室里。

当李先念、吴德同华国锋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华国锋开门见山地说:“我考虑再三，鉴于现在的舆论工具全部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召开会议的形式，用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必然会开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会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带来很大损失。为避免引起混乱，我认为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比较稳妥一些。你们认为这样行吗?”

李先念、吴德听了华国锋的陈述，两人都表示同意。

李先念说:“国锋同志，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只要你来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

华国锋对吴德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北京的任务是稳定形势，解决问题，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

吴德说:“北京市委和全市人民，坚决拥护国锋同志的决策，只要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市委坚决去办!”

李先念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北京市不出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大局!”

紧张、热烈而又短促的会晤，把三个人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相互握手，悄悄并肩走出晚会会场。

14、“必须万无一失!”

“必须万无一失!”

叶剑英的嘱托，时刻响在汪东兴的耳边。两天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仔细考虑着组织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日夜同参加行动的人员个别谈话，布置下达任务。

汪东兴回忆说：“在组织具体行动时，我依靠的是张耀祠、李鑫、武建华三同志。”

10 月 3 日深夜，李鑫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的电话：“东兴同志要你马上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机旁边。”

临走，李鑫对妻子樊宁说：“我走了。我这是去做件杀头的事!”

妻子是李鑫地下党的战友和同学。解放后，两人又共同经历风浪。今晚，他要走了。此行是福还是祸?她清楚地知道，对她个人可能是祸，而对千百万人民一定会是福啊!

樊宁告诉笔者，面对可能发生的严酷命运，两人都很平静，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妻子睁大两只闪光的眼睛，镇定地说：“你去吧!你杀头，我最多是当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吧!要牵连也只有我和孩子……”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李鑫登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走进汪东兴的家里。汪东兴握着李鑫的手，激情地说：“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高兴地回答。

汪东兴立刻将李鑫引进家里的一间小屋里，向他交待说：“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我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

李鑫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

李鑫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在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同意后，即由李鑫从 10 月 3 日到 6 日，在“关”起来的三天三夜里起草出来。

李鑫和汪东兴、武建华三人还具体商议了行动方案的细节。李鑫说：“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

华国锋、叶剑英批准了汪东兴、李鑫的行动方案。

事情就这样定了!

扭正历史车轮，结束文化大革命灾难的特别行动，就这样决定了!

10 月 5 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再次商议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他们根据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充分考虑了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稳妥可靠的办法，解决这一尖锐复杂的问题。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已经同陈锡联、吴德作了部署。我告陈锡联说，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由吴德指挥。陈锡联在我家里，马上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部队，归吴德统一指挥，负责维持北京的社会秩序，负责解决‘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对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策，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 10 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15、四只螃蟹

1976 年 10 月 6 日 3 时，中央办公厅发出当天晚上八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会议议程是：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建筑方案；

三、研究毛泽东故居的安排。

通知除送给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外，还扩大范围送给了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请他列席会议，以便把姚文元从钓鱼台调到中南海。

1976年10月6日——这个铭刻在历史纪念碑上的日子，时间仿佛过得特别快。

华国锋为此特地打电话给姚文元说："今天晚上，常委开会研究毛选五卷的修改问题，请你来参加一下。"

姚文元说："好!我一定按时参加!"

提前两天集中到中南海执行任务的人员，紧张期待着夜晚的到来。院里静悄悄的，没有笑声，没有人语，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像一锅沸水在翻腾。叶剑英办公室的警卫参谋对笔者回忆当时情景说：

"我们提前到了秘密集合点。临走，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我不能给你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也不要告诉孩子们。这是秘密行动!"

他准时到了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汪东兴也在那里。汪东兴数了数到场的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简短地作了动员。

大家低声而坚决地表示："一切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1976年10月6日下午八时，华国锋通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时间到了。

执行任务的同志，提前三个小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他们各自坚守在预定的岗位上。

夜晚降临，月亮升了上来，在满地重重的树影上，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穿过柏油路，从玉泉山向城内驶去。一盏盏路灯像飞飘的流星，一闪而过。向远处看去，黑沉沉的市郊乡村里，徐徐闪光的灯火，仿佛夜航的军舰，驶进了繁华的军港。

叶剑英仰靠在后垫上，两目看着夜里的灯光。这位在战争年代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革命家，此刻心情欢快而平静。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来的战斗，他紧紧握着曾经在"二月逆流"会上拍桌折伤了的那个手指骨，脸上泛起了微笑。

叶剑英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一下车，就见华国锋、汪东兴的车已停在那里。俩人站在大红门前迎接他。

华灯向夜空射出白光。怀仁堂如同往常一样宁静。所不同的是，今天来到怀仁堂的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微微感到一点紧张。集中在大门过厅里的执行人员，机警地听着门外传来的汽车声。经验已使他们能够从汽车声里，辨认出这是谁的车辆。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走进怀仁堂的会议室。

这宽敞明亮的老式会议室，天花板装饰有淡淡的图案花纹，一串串玻璃吊灯射出柔和明

亮的光线。四周地面上全铺着地毯。四壁又高又宽的玻璃窗，全都拉上洁白的窗纱。正厅中间摆设着几排沙发、茶几。沙发后面靠门的地方竖立一架雕花屏风。简朴的陈设，使厅堂显得格外古朴、雅静、端庄。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简单交谈了几句，就各就其位了。

华国锋脸上带着平静而严肃的表情，挺立在正厅会议室中央的地毯上。

叶剑英庄严威武地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会议室进门的走廊。意料中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汪东兴走进紧挨沙发的屏风后面，隐蔽了起来。他为保障华国锋、叶剑英的安全，右手提一支手枪。

时钟将近八点钟。

张春桥第一个到了。他像往常一样，仰着脸，戴着眼镜，慢条斯理地走进怀仁堂。他穿过走廊，刚走几步，四个警卫干部强有力的手扭住了他。这时是 8 点零 2 分。

“干什么?干什么?”张春桥扭头挣扎了两下，手铐“咔”的一声响了，执行人员把他连推带拉，弄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声音高昂地向他大声宣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王洪文第二个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穿一身军装，一下车，快步跃上台阶，跨进怀仁堂大门。在他穿过走廊时，四位高大体壮的警卫干部把他扭住。

王洪文拼命反抗，大喊：“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

接着他拳打脚踢，猛力挣扎着，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扑了过去，企图扼住叶帅的脖子。就在离叶帅只有一两米时，几个警卫猛冲上去，将他扑倒在地，死死摁住，给他戴上手铐，扭着两臂推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庄严向他宣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姚文元第三个到来，他还没有走进大厅，就在侧面的休息室里，毫无抵抗地束手就擒了。他惊恐地瞪着两只眼睛，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向他宣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审查!”

姚文元听完，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警卫战士出了门。

江青没有来怀仁堂开会。

这天上午，据一位摄影记者回忆，江青集合毛泽东身边和江青身边的七八个工作人员在

学《毛泽东选集》。她自己也很清楚，这只是装装样子，标榜她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

下午，江青又同工作人员一起，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入景山的苹果园。她得意地对摄影记者说："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

摄影记者按动快门，留下江青最后自由的瞬间。

下午三点钟，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少将团长张耀祠打电话：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张耀祠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红色中华首都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央警卫连，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站岗放哨。1953年5月调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一直担任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工作。

张耀祠是汪东兴的老同事、老战友。当他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也来到了这里。

汪东兴以缓慢的声调，严肃地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接着，汪东兴指定张耀祠担任拘捕江青小组的负责人，并对张耀祠、武建华说："你们准备一下，今晚八点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一起解决。"

张耀祠、武建华离开后，把这项高度机密的使命向几位警卫作了交待安排。而他们对于如何逮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安排则不清楚。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穿着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随身带的几个警卫，虽穿着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首先来到距江青住地很近的中南海颐年堂后院。毛远新就住在这里。

张耀祠走进毛远新屋内，向他宣布：根据中央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立即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三下两下将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和武建华带着三位警卫，来到江青住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离开钓鱼台，住在这里。

张耀祠对江青住地的警卫十分熟悉。门口警卫见警卫团长来了，点点头就让进去了。这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穿着丝绸睡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说："江青(往日他总称'江青同志'，这一回没有了'同志，二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张耀祠又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江青听罢，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

江青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保险柜的钥匙，并不交给秘书保管。

江青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当即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押上她平常乘坐的那辆专车。武建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中南海的地下室。

10 月 6 日夜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捕后，也都被关进地下室，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里。而不是像传闻所说的"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江青对自己的末日，早有准备和预言。据张玉凤 1976 年 10 月 22 日揭发，1973 年 10 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痛心地对张玉凤说："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

说着，毛泽东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叫张玉凤去办。当张玉凤把钱给江青送去时，她一边接钱一边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

江青的预言，为后来的事完全证实了。

北京卫戍区的执行人员，也在同一时间，在迟群、谢静宜的住地逮捕了他俩人。

中央政治局顺利地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

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很快汇报到怀仁堂正厅。正在焦急等待的叶剑英元帅，听到胜利的喜讯，脸上露出了笑容，兴奋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

这场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的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16、玉泉山的黎明

逮捕“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同到了玉泉山。

1976年10月6日晚上十点钟，党中央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叶剑英住的九号楼，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等同志，由汪东兴在电话上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们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

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深夜。在通向玉泉山的公路上，各种喧闹的车辆已经稀少下来。但是，一辆辆闪着灯光的小轿车，响着急促的喇叭，从四面八方疾驶而来，向西山涌进着，消失在茫茫的山影树丛中。

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激动、兴奋、欢腾的气氛弥漫着全场。

好多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了。老同志们都像一下变得年轻了一样，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喧嚷，相互紧紧握手、拥抱、拍肩膀，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有什么好消息呀?”“别急，等等就知道了!”

大家把专注的目光集中在小小的主席台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正在商量着什么。突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叶剑英，以宏亮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人语声。“同志们!今晚召开一个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叶剑英满脸笑容：“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一阵热烈的掌声迸发起来，久久不停。一个个凝神屏息的面孔，立刻又肃静下来。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政治局扩大会议详述了“四人帮”的罪行，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

华国锋回顾了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强调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遗志。

华国锋说：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华国锋说：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

叶剑英说：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第一着棋，是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多次强调：“‘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伺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做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紧张而热烈的会议，从 10 月 6 日夜 11 时一直开到 10 月 7 日清晨六时，连续开了七小时。

10 月 7 日黎明，当与会者散去分片分口传达的时候，一道亮光从东方升起。淡蓝色的晴空下，朝霞辐射出红艳艳的光芒，照耀着玉泉山的山峰。

这时，九号楼仍然灯火通明，电话铃久响不息，叶剑英将喜讯通知许多老同志。

“四人帮”被抓的消息，迅速在一些老同志中传播开来。人们奔走相告说，现在逮住了四只螃蟹，三只公的，一只母的。

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胜利，感到万分喜悦。10 月 10 日，他在写给党中央的祝贺信里写道：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在家庭里，在招待所里，在街道的酒馆饭铺里，人们自发地狂欢集会，庆祝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

17、中央电台的插曲

这里需要写一段控制中央广播电台的插曲。

占领并控制舆论阵地，例如，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央舆论机关，是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决战的重要部署之一。

控制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由中央指定的专门工作组执行。而控制中央广播电台，则是由耿飙将军执行的。耿飙同志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参谋长、19 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建国后曾任驻几个国家的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联络部部长。

10 月 5 日下午大约两点钟，华国锋打电话给耿飙，要他到家里来一下。耿飙随即来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刚向他谈起“四人帮”的问题，耿飙就性急地说：“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爽朗地一笑，单刀直入地反问：“我还没有跟你说呢，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干什么呢?”

耿飙笑着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

“那好吧!”华国锋开门见山，说话不再绕弯：“这几天你呆在家里，不要离开。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

华国锋又交待：“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你明白了吗?”

耿飙严肃地点点头，心领神会地说：“我完全明白了!”

耿飙呆在家里，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焦急地等待着。往常他都由秘书或家人接电话，可是，这两天只要一听见电话铃响，他就像士兵接受命令那样，心里激动得直打颤，急忙抓起电话机。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打了几十年仗的人，竟然也会被即将到来的事激动得寝食难安。

突然，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响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脸上显出狂喜的神色，抓起耳机来。

“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浓重的山西口音从对方电话中传来。

“听出来了。现在就去吗?”耿飙又问。

“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飙立刻跳上汽车，直奔中南海。当他到来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都已等候在会议室里。华国锋兴奋地对耿飙说：“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王、江、张、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到中央广播电台去，控制广播电台。还有一个卫戍区邱巍高副司令跟你一块去。”

叶剑英紧紧握着耿飙的手，慢声嘱托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邱巍高副司令员来到了。耿飙将军望着他，径直问他：“你带武器没有?”

邱巍高坦率地说：“没有!”

“你要带武器。”耿飙威严地望着他：“光你一个人不行。你下边有部队吗?”

邱巍高说：“广播电台有一个警卫营。”

耿飙又问：“这个营是那一团的?要团长跟我们一块去。”

华国锋问耿飙：“你要不要带枪?”

耿飙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需要你的手令。”

华国锋说：“好!”当即给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长写了一封信：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耿飙挺直高大的身躯，默默把信看了一遍。他转身对邱巍高说：“光我们不行。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卫团长找来，和我们一块去。”

临出发前，华国锋又一次向耿飙交待说：“一切交给你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耿飙、邱巍高各人带一支手枪和一位警卫团长三个人，马上乘车急驰中央广播电台。这时已经夜晚十点钟了，警卫团长马上按照指示，挑选了 20 名战士，耿飙随即带着 20 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把华国锋的信交给邓岗。

邓岗仔细看着信，愣愣地看着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

来这里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那好!”耿飙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突然浮起了微笑。他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请你把电台党委的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开紧急会议!”

邓岗和耿飙两人相对而望。这两位同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文革”中都被当作“走资派”、“民主派”挨过批斗，对“四人帮”的共同仇恨，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

中央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准时到来了。待他们都在办公室坐下以后，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立即命令两个卫兵，在门口站起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在紧张的沉默里，党委委员们立刻明白发生的事情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耿飙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同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他说：“各位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吗?”

大伙连忙说：“明白了!明白了!”

耿飙宣布纪律的目的，是确保秘密，不使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过早泄露出去。他和电台的领导成员挤在办公室里，同吃、同住、同睡、连鞋袜也不脱，在地板上睡了十夜，夜以继日地战斗了十天十夜。

18、接管中央党报

党中央在决定派人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还决定接管人民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

这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顶着酷暑炎热，冒着余震，夜以继日在废墟上战斗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深夜，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他明天赶回北京。

迟浩田一时迷惑不解，不知等待他的是凶还是吉。他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回忆里写道：“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想想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带来的巨大灾难，自己就是再受点委屈，甚至做出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笔者同迟浩田同志相识于 1970 年内蒙前线指挥所。多年保持友谊和联系。他在一篇回忆里，详述了接管人民日报的经历。

10 月 7 日，他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的卧车接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迟浩田回忆说，“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飙、孙轶青、刘西尧同志。耿飙同志一见我，呼地站了起来，迎着问：“你是迟浩田同志吗?”

我说："是。"他一把握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迟浩田回忆说："耿飙同志伸开双臂就要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耿大使所用的西方礼节虽不习惯，但又毫不迟疑，也张开双臂迎了上去。我们终于胜利了!一种解放了的轻松感、胜利了的幸福感，顿时充溢了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双臂久久地相抱，我们的泪眼久久地对视，总觉得有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

不一会儿，耿飙同志的脸色严峻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我们要去夺权，我们要把'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

正说着，纪登奎同志走了进来，热情地与我握手，他说："浩田同志，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顿了一下又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呀?"

人民日报?!一听说又是到报社去，我不由得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这时纪登奎同志说："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飙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罢就走了。

耿飙说："浩田同志，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我们先分分工吧，我到广播电台，刘西尧到光明日报，你和孙轶青到人民日报去。你先拿出个方案来，看怎么办好。"

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我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用句军事术语，就是赶快抢占阵地。

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耿飙同志让我和孙轶青商量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

我和孙轶青同志商定，首先和"四人帮"的亲信、也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那个负责人谈话，把我们商量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我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飙同志很赞成我们的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

他们几位坐到里间屋内，我和孙轶青在外间屋里等那个负责人。

中央的介绍信很快就拿来了。

不一会儿，那个负责人坐着红旗车来了。他稍高的个儿，长长的面庞，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一声不吭，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二郎腿一翘，摆出一种莫明其妙的威风。

迟浩田回忆说：我强压了压火气，极力用缓和的语气说：“你是鲁瑛吗?”他“嗯”了一声，我说：“你认识我吧?”他眼皮也没翻，慢腾腾地说：“你不就是那个曾在解放军报干过的迟浩田吗?听说你到北京军区当副政委去了。”

我没再理他的话茬，该谈正事了。我说：“既然认识，那就不用介绍了。”“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那封信放到他的跟前。他满不在乎地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收缩了。

信的内容大体是介绍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方面的问题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

看过信后，鲁瑛的二郎腿就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眼神一个劲地打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中央里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现在我向你宣布三个问题：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的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回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呆呆地看着我。我问他：“听明白了没有?”

鲁瑛赶忙站了起来，答非所问：“是，是。”

到了人民日报，立刻通知报社领导小组开会，我对鲁瑛说：“你先给大家念念中央的通知吧。”

鲁瑛说：“是。”他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念道：“中央决定，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迟浩田回忆说：我开门见山：“先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党和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是要清算的。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要执行正确路线，不能宣传那些奇谈怪论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受着考验。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的，我们会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照中央的政策办事。”

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日报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场战斗一一突击写社论。当时，大家多么想利用夺回来的这块阵地，首先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告诉给全国人民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议论了一阵，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确定社论的题目为：《亿万人民的共同

心愿》。写的是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同时，也把大家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溶化进去了。

10 月 8 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10 月 9 日，《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以大字标题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两项决定。

10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断然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

从 10 月 21 日起，首都军民 580 万人，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天津、沈阳、成都等全国各大城市都先后举行了集会游行，欢呼：

“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是的，我们的党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在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非常手段取得的。

从血的历史教训里，党和人民不能不思索许多问题。怎样才能避免类似十年浩劫的灾难呢?

答案只有一个：必须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军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进行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三十二章 末日的挣扎

粉碎“四人帮”之前，党中央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可能出一点乱子；出不了大乱子，会出一点小乱子，乱子可能出现在上海，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成了“四人帮”控制下的一个重要据点。粉碎“四人帮”之后，稳定上海局势对全国具有重大作用。

1、调虎离山

如何才能迅速稳定上海的形势呢?在讨论时，有人主张，驻在无锡、杭州一带的野战军，借拉练的机会，向上海靠近，来个“兵临城下”。

但是，多数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很快形成与上海民兵的对峙，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甚至会导致发生小范围的战争，势必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

党中央在作了慎重考虑之后，决定采用“调虎离山”办法，调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到中央开会。

1976 年 10 月 7 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到北京。

上午九时，马天水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当时，大家都感到惊异。

按往常习惯，每次上海市委到北京开会，张春桥、姚文元都预先向他们通气、打招呼，为什么这次事先不打招呼了呢?这次为什么中央首先通知的是警备区，而且叫周纯麟司令员同去，不是让徐景贤同去呢?从这些情况，大家心里已经预感到不祥之兆。于是，商定马天水一到北京，两小时后就给上海回电话。

十点一刻，马天水在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虹桥机场，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周纯麟告诉马天水说，专机要在南京停一下，接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一块到北京。临上飞机，马天水再次向徐景贤叮嘱：“你不要光抓笔，还要抓枪!眼下，枪比笔重要啊!”

飞机上了天空。马天水依然闷在葫芦里：这次开会，为什么不是春桥、文元亲自通知呢?

这个 1931 年在河北家乡当小学教员时入党的老干部，四十多岁当了上海市的工业书记。最初，马天水对“文化大革命”也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1967 年 1 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他马上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说，跟着首长有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光明感”，表示“今后愿做一匹好马，在两位书记不断鞭策之下，拉革命之车，走革命道路……”

马天水拼命为“四人帮”卖力。1972 年，王洪文调中央工作，张春桥安排他主持上海工作。从此，他与在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建立起“热线”联系，是张春桥在上海最赏识的头头了。他准备这次也像往日那样，一下飞机就找张春桥……

晚上八点，飞机到了北京。他们随即来到京西宾馆，不一会，又到了一座大院里，走进

会议厅。在一片严肃的气氛里，他们看到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都神态庄重地坐在一排桌后，注视着每一个进场的人。

同机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到了，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到了，济南军区杨得志、王平、曾思玉，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到了。此外还有湖北省委的两位同志。

晚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会议。继华国锋讲话之后，叶剑英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跟大家打个招呼：昨天晚上，中央己采取断然措施，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隔离起来了。"

叶剑英的话，说得平静而缓慢。但是，他的声音却像春雷震撼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心。全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有的人还未来得及辨清是否听错了话。突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领导同志相继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阐述了党中央采取这一重大决策的原因，鼓励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维护全国团结安定的新局面。

会议开到深夜 12 点。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十分高兴地走出会场。上车时，扬手扔掉了拄了两年多的拐棍，一见马天水就说："大家都高兴，你为啥不高兴啊!"

马天水连连摇头，叹着气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

2、热锅上的蚂蚁

马天水走后，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急切要探听北京"首长"的消息。

根据罪犯的交待，10 月 8 号上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议论形势，一致肯定北京出了事。其他"小兄弟"们一早就围住电话机，争相打问：可有"首长"的消息?

他们当天，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打电话，均未找到人。

好不容易找到马天水的住处，马天水却不接电话。他对秘书说："我们一到北京，中央就作了四条规定：参加会议的人不准私自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客!"

当上海市委又来电话问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只好在电话中说："马天水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王洪文秘书廖祖康抢过电话，急忙问房佐庭："你们到北京机场时，谁来接的?"

房佐庭答："是穿军装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同志?"

房佐庭回答：“没有。”

廖祖康问：“你们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的规定，是谁通知的?”

房佐庭说：“是我问其他省的同志知道的。”

当廖祖康再追问时，房佐庭没头没脑地回答：“我的老胃病复发了!”

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分头往北京打电话，也都找不到主子。后来找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他吞吞吐吐说：“……出大事了!”

王秀珍把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全叫来，悄悄地说：“你去北京打听一下消息，立即打个电话回来。”

他俩相互约定三个联络暗号：平安无事报“健康”；有点小事说“胃病”；“四人帮”出事就说“心肌梗死”。

八日下午，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的门口站了双岗，在通往院内的巷道里，每道门口也都加了岗。周围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小汽车进进出出，人来人往，每张面容都呈现出惊慌神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谁也都暗暗猜想：大概北京“首长”出事了。

市委学习室里，聚集着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等人。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民兵指挥部的人也都赶来了。徐景贤分析了北京传来的“不正常情况”：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了；鲁瑛讲话吞吞吐吐；在京的“领导”都联系不上；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又暗示“老胃病发作”等等之后，他心慌意乱地说：“可能出问题了!”

晚上八点半钟，缪文全按照约定的暗号，从北京打电话来了：“我娘心肌梗死!”

接着，“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任党组成员的祝家耀来电话：“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四人帮”提拔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来了电话：“我们这里也有病情。”

这些信息，像晴天霹雳，把“四人帮”的一群党羽震懵了。

3、群魔乱舞

八日下午五时，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相互通报了情况，分析形势。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晚八时，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开有民兵、公安局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市委会议。最后发言的是王秀珍。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原是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员，“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当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她说：“各位当年造反的老头头们哪，实话实说吧，今儿个可大事不好啦!”她接着说：“江青首长今年 3 月 2 日，亲自当我面讲过，我已有精神准备，杀

头、坐牢……而我只不过一个头吧。春桥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文元呢，说得比算卦还灵，无产阶级的预言家呀，他说，'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他们的话如今都应验啦!告诉你们吧，北京发生宫廷政变啦，右派政变呀!"

她的话，像在人群里丢了一颗手榴弹，把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

有的人从后排椅子上站起来，探着身子问：北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什么政变呀?

徐景贤把头低垂在桌子上，掏出笔记本："我给大家通个气。马老昨天半夜接到通知，已经到北京去了，走得蹊跷，一去无音信。我们给洪文、春桥、文元挂电话，不但首长找不见，秘书、警卫也都没人接电话，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出事了。于会泳昨天半夜来电话说，八号出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也取消了。……我们打了多少个电话，条条都断了。"接着，他翻了翻笔记本："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按事先约定的暗号，中午 12 点，打电话回来说，我的老胃病发了。这就是说，北京出事了。"

看到会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徐景贤故作镇静地安慰大家："我们现在就是等这最后的消息，判明情况，再决定采取行动。"

后来，几条情报渠道都证实一个铁的事实：他们最想知道而又最怕知道的事发生了。他们的四位"首长"被抓了!

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哎哟，我的天哟，现在该怎么办?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了不起!"

民兵总指挥施尚英，是王洪文一手破格提拔的小兄弟，曾任江南造船厂常务副书记、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受王洪文委托，执掌"第二武装力量"。听到"首长"被抓，他拍着胸膛说："同志们，二位书记，三位常委!只要市委一声令下，我们可以动员几十万和他们对着干，抗战到底!"

坐在旁边的写作组的王知常，慌忙问他："什么?抗战?他们要上台，我们就完蛋，靠谁也不行，只有靠自己保卫自己。你手头调动的兵力有多少?"

施尚英说："集中待命的 2500 人，进入一级战备的 13000 人，召之即来的还有几十万人!"

王秀珍说："要注意敌情。要准备失掉联系，要准备独立作战!"

"由谁指挥呢?"施尚英说，"你们四位领导的口音我都熟悉，反正听你们的!"

王知常出谋献策说："我们要向中央发电报，提出抗议!要发表宣言，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呼吁兄弟省市支援我们!啊，先礼后兵，在道理上站得住脚。"

这时，原上海阀门厂工人、市总工会副主任、总揽上海市革委工交大权的陈阿大，听得不耐烦，一下推开王知常，攥起拳头，往台子上砸下来，说："大事全叫你这帮文绉绉的家

伙给误了。现在，眼前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英雄好汉挑头干，孬种靠边站，要干就留，不干就滚!走也没那么便当，一只脚进来，就别想活着拔起另一只脚出去!”

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一捋袖子说：“时间不早了，我马上下令调一批饼干、罐头、救急包到第一线，做充分物质准备。当年造反我是拎着脑袋干的，有什么好怕的，这次也要拎着下决心干，破釜沉舟!”

连日来，一直携带五四式手枪、匕首，汽车上放着小口径步枪的黄金海说：“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到江苏去抢!”

被吵得六神无主的王秀珍叹着气说：“光这么吵有什么用。我说景贤，马老不在家，主心骨就是你啦，你倒是出个点子呀!”

徐景贤有气无力地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上海写作班子头头朱永嘉，蹦跳起来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由于有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提拔。他们倒了，我们也就完了。我是准备杀头了!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要在早上六点钟主动出击。民兵立即去夺取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国全市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四个还我!‘文汇’‘解放’要同时发表我们的行动纲领，工会密切配合，在马路上刷标语，组织工人上街游行。这样，上海就会乱。只要坚持一个星期，就能迫使他们把四个人放出来!还要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切断对外通道，防止从外面开进军队。现在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就是要大干，否则一个一个等被收拾!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还可以用鲜血教育下一代!”

王知常在一边连忙帮腔说：“我和老朱，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二十七年的交情了，反正活了这么多年了，顶多失掉个脑袋!杀一千刀也是死，决不能当叛徒!”

廖祖康也火上加油地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要马上暴动!”

肖木嘶声喊：“要就大干，搅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陈阿大拍着胸膛说:“我脑袋是挂在裤腰带上的,非决一死战不可!先用沉船堵住黄埔江，再用万吨轮沉在吴淞口封锁航道，用大型钢锭封锁机场，把铁路翻轨搞断运输。这样，我们就可以挡住陆海空的来路，不怕上海不死，不乱!”

上海市工会副主席叶昌明，是原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他挥着拳头说：“我双手拥护陈阿大的意见，北京发生了右派宫廷政变，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同他们血战到底，决不做投降派。我们市总工会可以立即发动工厂工人大罢工，停水、停电、停工，造成全国影响，给中央颜色看看!”

4、垂死挣扎

面对群魔乱舞的会场，徐景贤伏在王秀珍耳朵上嘀咕了几句，强打精神做总结发言：

时间不早了，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根据当前形势，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莽撞行事。我们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干。我们首先要组织起来，分头行事。一切听我指挥，我要指挥一切!

会上，决定兵分三路，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两个指挥点的地点和分工是：

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王少庸、张宜爱、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是文的一路；二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率领，抓枪杆子，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是武的一路。再一路由张敬标负责，留守市委机关，负责各机关的联络。

当场，徐景贤还给王秀珍写了调动民兵发动武装叛乱的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 人集中，31000 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九日凌晨两点多钟，二号指挥点用红机子打电话找徐景贤，说是警卫电台和市委的两个解放军连队要归他们指挥。徐景贤当即在一张有横格线的信纸上写了调动手令。

散会后，朱永嘉立即秘密潜回写作组，纠集几个人策划制造武装叛乱的舆论问题。他气焰嚣张地说："我们要发表个宣言，对着干，还要写个提纲，整理一个赫鲁晓夫是怎样篡党夺权的资料。"接着他又说："北京广播了中央两项决定，出五卷、建纪念堂，他们这一手高明。但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要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

朱永嘉接着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编辑部，给报社人员下命令说："你们要坚守阵地，要登我们的东西，如果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整我们的消息，你们通通不要登!"

朱永嘉又窜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楼下窜到楼上，检查了各个广播室，把在报社讲的重复了一遍。他命令说："你们台不要广播中央台的消息!可以把干扰敌台的机子全部调过来，干扰中央台!"

在同一午夜，王秀珍率领三十多人到了市民兵指挥部。王秀珍向大伙布置了任务。为了躲避目标，他们在九号凌晨，又匆匆将二号指挥点移往东湖路招待所。

10 月 9 日上午，民兵指挥部施尚英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具体部署兵力，研究作战计划。经过一番紧张讨论，最后决定总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点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各指挥点上架设 15 部电台，拟定了通讯网。

施尚英一伙还制定了作战方案。这个意在"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方案，在地面上标明三道防线，即所谓"控制圈"。方案不仅部署了每道防线上的兵力，而且规定如何封锁，设置路障，封闭轮渡、隧道，控制水、电、煤气、油库等。

"方案"规定了七个"重点保卫目标"。除了"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等地外，

还有徐家汇、静安寺、南京路、北站、大世界、隧道周围等七个最热闹的繁华地段。

“方案”安排了两支“机动力量”。第一梯队 3240 人，配备各种新式武器，再加上卡车、-摩托车 100 辆；第二梯队 12000 人，随时支援各道防线和要点的急用。

按照这个方案，全市准备动员兵力 33000 余人，枪炮 27000 余支(门)，各种弹药 200 多万发。此外，还有“民兵 101”武装巡逻艇一艘及其他摩托车、自行车等。

这一天夜里，上海到处弥漫着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一批批荷枪实弹的民兵，排列成小队，向集合点跑去；250 辆卡车载满人员、物资驶过市区，奔驰于各个武装叛乱据点之间；15 部电台，在各个指挥点嘀嘀嗒嗒，拍发着相互联络的电报；市公安局的 1300 多公安人员都增发了枪支，王秀珍还发出民兵、公安两家“联合行动”、“协同作战”的指示，要把重点“对象”严密监视起来，要逮捕一批“危险分子”……

午夜，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长桌上摆满冷盘酒菜。市总工会副主席叶昌明，一面啃着鸡腿，一面向委员们“吹风”：“全市动手干起来的话，要通知造枪的一些工厂，要日夜加班突击生产，可以发五倍加班费!管他妈物质刺激不刺激……造好的枪要一律发给民兵指挥部。仓库里枪支、弹药，要赶快拿出来发掉，不然被部队一看守就派不上用场了。”

这时，有人俯在叶昌明耳边说：“发动武装行动，单靠总工会发布命令，干不起来，下面各级党委不会听你指挥的。”

坐在旁边的陈阿大，一拍胸膛，跳了起来：“实话告诉你们，这次武装行动是有来头的!在中央，我们有那四位首长指挥，在上海，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哪个敢不听?老子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原是上海搪瓷机修工人、市工会常委的马振龙，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摔，尖声叫喊：“要握住枪杆子不放!枪不能交，天皇老子下命令我也不交，杀了头我也不交!谁他娘的当叛徒去告密，老子第一个把他干掉!谁投降了就枪毙他!”

会场上出现了紧张可怕的沉寂。坐在一边的原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市总工会常委黄金海，突然从人群中站起，嘶哑地叫喊：“怎么?有动摇分子吗!妈的，当年大；碗喝酒大锅吃肉，你们比谁都张罗的欢，今儿个三心二意啦，哥儿们，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上船容易下船难!事到如今，只有一心向前啦，好样的站出来嘛!”他瞪着红眼珠子，拍拍胸膛：“有什么好怕的?如果他们派来镇压，我们就把水厂、电厂停掉，要完蛋大家一齐完蛋!”

黄金海等人还拟了反动口号，叫嚷“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反革命武装暴乱已箭搭弦上了!

5、群魔无首

10 月 8 日晚，在中央第一批向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的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坚

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但是马天水却支支吾吾，他最后一个发言表态，竟然说什么：是不是可以把“四人帮”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同他一起前来参加会议的周纯麟司令员，听了马天水发言，十分气愤，当场打断他发言：“老马，你这样讲话是错误的!你中‘四人帮’的毒太深了!”

在回京西宾馆的路上，周纯麟同马天水同坐一个车上，再次对他说：“主席健在时就说要砸烂‘四人帮’，你还讲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今执迷不悟，回去之后如何向上海人民传达?!”

马天水一路不言语。第二天上午，参加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的各地党政军负责人都回去了，中央却要马天水、周纯麟两人继续留下，等待新的决定。

马天水叹气说：“我是完了，回不去了，你自己回上海，看着办吧!”

周纯麟进一步劝马天水转变态度。他建议说：“应该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来，请中央领导帮助他们认清形势，这样我们回上海，才能做好工作。”周纯麟说：“徐景贤、王秀珍离开上海，可以使‘第二武装’群魔无首，釜底抽薪!”

中央领导同志当即批示，同意让徐景贤、王秀珍立即来北京开会。

马天水看了批示，犹豫了几分钟之后，给上海“康办”，挂了电话……

王秀珍在电话上说：“马老呀，你这次见到咱们上海在中央的那四位领导了吗?……你怎么不吱声呀?”接着又说：“叫我跟老徐到中央开会去?好，好，好!明天出发……会议是什么内容呀?什么?……你也吃不准……好的，请代表上海市委，还有我和老徐，问候中央四位领导同志好，请他们保重身体。我们永远忠于他们几位首长的!”

王秀珍放下电话，面向大家，喜洋洋地说：“电话你们都听到啦，快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吧!”

廖祖康最先发言：“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这里面大有文章。我劝你们二位不要去，去一个，抓一个，我担心你们，去时容易回来难了。”

徐景贤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有什么办法哟，日子真是不好过。若想不去吧，马天水说他见到四位首长了；如果大权如今掌握在他们四位首长手中，或是开三中全会什么的，机会难得，不去是不对的。如果这是圈套呢?他们把我们扣留在北京怎么办?”

围绕着去不去北京的问题，丁香花园的会议室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朱永嘉看到两位书记举棋不定，突然站了起来说：“我是主张你们二位去北京的，在矛盾激烈的时候更应挺身而出，不可畏缩不前。在古代，这样的先例是很多的，关云长单刀赴会，汉高祖鸿门赴宴去，当然是要冒被扣在北京的风险的!我们就按这两天的既定方针办，发动上海武装大暴动，并且呼吁全国、全世界声援我们!……”

王秀珍说："我们两人豁出去啦!准备到北京回不来了，家里面要做好应变的充分准备。总工会的老头头们哪，妇联和青年团的骨干们哪，要多分析形势，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放松呢……啊?要做最坏的打算!还要把春桥、洪文的家属，我的两个孩子，都转移到工厂去。这事交给马振龙安排一下。"

快散会的时候，徐景贤一再叮嘱："你们各位同志也要马上回去，通过各条系统，向基层单位、向群众'吹风'，使群众有个思想准备，可得抓紧往下边打招呼啊!"

10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从虹桥机场飞往北京。

临行，徐、王一再关照各位小兄弟："有事要请示少庸、国柱、敬标，自己不要乱动。"

6、北京召见

十日傍晚，徐景贤、王秀珍一走下飞机，就坐上开往京西宾馆的汽车，他们俯在车窗上窥看着街道的行人，竭力想从人群的表情上探寻出什么信息。

来到京西宾馆不久，王秀珍就给上海市委值班室打电话：

"我们已经平安到达北京，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定。可要注意抓紧向下边吹风啊!……"

晚上，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讲了"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通报"，像一声炸雷把他们震懵了。"什么?果然把他们抓起来了?"

徐景贤和王秀珍几乎同时惊叫起来。一下瘫坐在沙发里。

"我问你凭什么抓他们?"徐景贤直冲着周纯麟责问。

"凭什么?"周纯麟"唬"地站起来，拿起一个笔记本，说："就凭这个!"

周纯麟的文化不高，学识不多，但他把"四人帮"的主要罪行，一条一条都写在小笔记本上。为了回上海传达，他还专门向江苏、湖北的同志，核对了笔记。

徐景贤接过笔记本，仔细地翻看一遍，然后把笔记本一放，说："见鬼!就凭这几条七拼八凑的东西能把人抓起来?!"

王秀珍也跟着吼叫起来："什么?毛主席说'四人帮'，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时候说的，跟谁说的?"

"党中央说的。你怎么敢不相信啊?"周纯麟说。

"莫急嘛，总会弄清楚的。"马天水插进来说。

“前几天我在北京，见了张春桥，他对我一字没提过!”徐景贤说：“什么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这明明是搞宫廷政变嘛!”

马天水连忙安慰说：“莫这么讲。详细情况你们俩会知道的。”

11 日清晨，周纯麟来看马天水，想了解徐景贤、王秀珍的情况，要他继续做两个人的工作。可是，徐、王仍然吵吵嚷嚷，说根本没有想通。

中午时分，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他们一方面了解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的反应，二是让马天水看一份影印件。

陈锡联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影印件，送给马天水看，他接过一看，原来是张春桥写的《1976 年 2 月 3 日有感》。

马天水看着这熟悉的钢笔字，仿佛一下跌进了深谷，连声说：“我要与‘四人帮’划清界线!我要与张春桥划清界线!”

12 日晚 10 时。玉泉山的一座会议大厅里，灯火辉煌。在摆满沙发的厅堂里，在北京的党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几乎全体出席了会议。这是政治局为接见上海市的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而专门安排的。

马天水等一走进会议厅，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一份张春桥《1976 年 2 月 3 日有感》的影印件。

等他们几位坐下以后，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现在，徐景贤念一下。”

徐景贤只得照本宣读：“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首先发言，讲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历史背景。

叶剑英看了看几位上海的来人，诚挚而热情地说：“上海是受蒙蔽的受封锁的。你们这次来了解情况就明了。张春桥《有感》，把界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叶剑英继续说：“中央对上海几位同志寄予很大希望，有电报说，上海民兵有行动!中央信任你们，对你们放手，希望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都讲了话。当马天水等四位离开会议大厅的时候，已经是 13 日凌晨一点半了。

13 日上午 9 时 40 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一行，从首都登上一架伊尔 18 飞机，向上海飞去。

在飞机舱里，周纯麟把马天水等三人找在一起，研究回上海后的工作问题。当场研究了

三条规定：一、回上海后马上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二、上海市委组织全市，层层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

周纯麟作为一个老红军、老干部，他特别强调在这关键时刻，听从中央指挥比什么都重要，他说：“最后还要加上一条，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的指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听周纯麟一讲，相互看了看，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7、土崩瓦解

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以后，11、12 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吹风”活动，一号点的那些人，继续进行煽动。二号点的那伙人，每天碰头，探听消息，窥测方向。这时，警备区的几个人因为接到南京军区首长的警告，不再参与活动了。

朱永嘉回到市委写作组三楼办公室，他一边地整理东西，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我们就这样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春桥、姚文元他们!”

肖木眼珠瞪得大大的，两手按着椅子，说：“我们究竟怎么办?”接着，又自问自答，用暗语订攻守同盟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

《朝霞》杂志主编喘着气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感到走投无路，对肖木又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起去死吧!”

11 日，他们探听到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并作了加强战备的部署时，他们惊慌起来，频频碰头，继续在亲信骨干中进行反革命吹风。

12 日晚 8 时，上海的余党聚集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会前，这些人已经确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会上，马振龙、朱永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痛哭。朱永嘉、陈阿大等人都主张要大干，决一死战！

13 日凌晨，马天水的秘书从北京来电话说，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四人上午 10 时返沪，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

陈阿大、朱永嘉等人认为，可能是个骗局。于是，又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喧闹……

按照预定的部署，10 月 13 日上午 11 时，虹桥机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欢迎仪式。

冷清清的候机坪上，站着三个老头：孙卫标、王知常、马家栋。附近的一辆中型吉普车里，却隐藏着扛着两挺机枪的亡命之徒。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舷梯，仿佛不是欢迎书记归来，而是准备一场火拼。

马天水移动着肥胖的身体，步下舷梯，徐景贤迈着碎步跑下来。王秀珍在空中摇了几下白手帕，然后问道：“那几位老头头怎么没见呀?”

孙卫标吞吞吐吐地回答：“他们，正在候机楼里，等候三位书记啊!”

王知常踮起脚往机舱张望，只见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手里拿的唯一“武器”是吸尘器。

马家栋说：“哪里有什么诱捕?神经病!见他妈鬼啦!”

他顺手打了一个手势，一伙余党头目，一窝蜂似的跑了出来，把三个书记团团围住，问长问短。

马天水对小兄弟们说：“下午三点，在东湖路宾馆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向各位传达精神。”

传达会准时召开。会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森严。当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进门时，哨兵把肖木挡住，不准他进会场。

传达会仿佛变成了追悼会。一伙余党头目，哭得如丧考妣。

写作组头头王知常问施尚英、黄金海：“武装暴动准备得怎样?要想干还可以在四点以前大干一场，再晚就来不及了。”

施尚英、黄金海完全同意王知常的意见：立即打电话给上海民兵指挥部下命令，在四点三刻全市开始行动!

正在这时，马天水再次要求大家对中央决定表态。他扳着指头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都听清了没有?每个人都得表态，这么闷坐着不行。”

“老子表个态!”陈阿大一个箭步窜到前台，把手中的匕首往会议桌上一插，大喊大叫起来：“实话告诉你们吧，众位想不干也不行啦，上了船就甭想再下来，四点三刻一到，大上海就要大乱了，我们的民兵就要动手了!”

就在武装暴乱即将发生的时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基层。党中央派出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三人工作组到达上海。许多工人民兵很快识破了“四人帮”余党的阴谋。久久被“四人帮”禁锢的上海工人阶级，火山爆发似地涌上街头。游行队伍的爆竹声、口号声、锣鼓声，像江海奔腾，响彻天地。

“打倒‘四人帮’!”

“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定!”

南京路上，黄浦江边，到处红旗如画。这是人民在历史长河里又一次掀起的春潮。为党除奸，为国除害，千万上海市民拍手叫好!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阴谋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动，陷入人民愤怒的汪洋大海里!

8、上海的判决

历史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

198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

这天，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原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出庭作证，揭露了张春桥、王洪文等指使他们发动武装叛乱的经过。

王秀珍供认，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和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长期经营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分不开的”。同时，她又交代，上海民兵发生暴乱，是肖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起了作用。张春桥说：“出修正主义在中央，要提高警惕，要经得起大的考验，要准备打仗。”王秀珍供认，我是照张春桥的话去干的，张春桥是不在场的指挥，张春桥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

王洪文曾多次对她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下令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

法庭审判员当即问王洪文，为什么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领导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王洪文回答说：“在成立民兵队伍时，张春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由他们控制的‘工总司’去干，这实际上夺去了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王秀珍还证实说，王洪文 1976 年 9 月 23 日在电话中对她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王秀珍说：“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严重的考验时刻到了，就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审判员问王洪文：“你多次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些话的涵义是什么?”

王洪文回答：“‘修正主义’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老干部(上台)，所以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就上山打游击，是张春桥的思想。”

徐景贤出庭作证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了反革命指令。1976 年 9 月 23 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话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斗争还有曲折，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准挂帅”。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有大的考验”，“要打仗”。

徐景贤还供认：“到了 10 月 8 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候来到了。我根据张春桥 9 月 28 日‘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82 年 7 月 13 日开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八名重要案犯，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公开审判，有一万多群众参加旁听。在大量罪证面前，罪犯们不得不低下头来。

徐景贤供认:“我应该负策划和指挥的全部罪行。”当法警将徐景贤写下的策动武装叛乱的笔迹交给他辨认的时候，他连声说:“这是我的亲笔，是我的亲笔。”

徐景贤、王秀珍都供认:“上海武装暴乱我们是罪魁祸首”。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于 1982 年 8 月 21 日开庭宣判，判处徐景贤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8 月 23 日开庭宣判，判处陈阿大、马振龙有期徒刑十六年，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有期徒刑十五年，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

陈阿大在他判刑的最后陈述时，预先写了六页纸。他说:

“十年动乱，我私心恶性膨胀，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往上爬，死心塌地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我对一伙小兄弟讲，只要大胆造反，不怕死就能当上头头，将来能当大官。我当时己窃取了市革委常委、市委列席常委的位子。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我就死心塌地干了!”

这个陈述，不仅是他个人的自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小爬虫的内心写照。

第三十三章 历史的审判

1980 年春，我再次来到了大别山的红安县。这一带从 1927 年就燃起革命火焰的山野，在长达数十年的斗争里，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这里的土地。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看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沉痛地说，林彪“四人帮”欠下的人民的血债，一定要清!一定要算!

一位 70 多岁的老赤卫队员，再三叮嘱记者，向国务院、党中央转告他们的心愿：公审江青，我们要在电视上看一看!

人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1、开庭时刻

1980 年 11 月 20 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开庭审判了。

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是用极大牺牲和痛苦换来的日子。

特别法庭庄严、肃穆，银灰色的帷幕正中，悬挂着巨大的国徽，右侧墙上，挂着一幅投影罪证材料用的白色长方形屏幕，身穿灰色制服的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和身穿黑色制服的特别法庭庭长、审判员，端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席的两侧，坐着五位辩护律师和书记员，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的法警，威严地分列两旁。

下午三时，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了，耀眼的强光灯，把法庭照得通亮。记者在法庭的旁听席上，清楚地看到审判台下一米左右的地方，在竖立着一排灰白色的铁栏杆上，挂着一块写着“被告人”三个字的木牌，铁栏里摆着为被告人准备的 10 把铁椅。

下午三时三分，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下令传被告到庭。

法庭开出传票，交法警去候审室带被告人。随即，被告由法警押着，从右侧门进入，穿过中间过道，一个个地被押上被告席。

顿时，灯光齐明，场内的电影摄影机、录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全部对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把全国人民久久盼望的审判场景摄录了下来。

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终于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这起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被人称之为“超级审判”。从被告犯罪时的地位和权力看，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林彪，是写进“九大”党章的接班人；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是有特殊身份的人物，是“第一夫人”。

受审的 16 名主犯(包括已经死亡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六人)中，有三人是共产党中央的副主席，五名是政治局常委，13 名是政治局委员。

属于军界的首脑罪犯人物，包括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总政治部主任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四名正副参谋总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三名空军高级军官。他们还分别把持过总后勤部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务。

王洪文被第一个押上被告席。这个从上海滩一步登天的造反司令，面容憔悴，脸色发黄，穿身灰色衣服，两只眼睛机械地眨动着，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有 800 多旁听席的法庭。几天前，他读完起诉书副本时，曾对审判员说：“起诉书列举的都是事实。”他表示开庭不需要辩护律师。

接着，被押上法庭的是十年浩劫的舆论总管姚文元。他光秃着脑袋，鼓出两只金鱼眼，哭丧着脸，发呆地望着审判员。这个“四人帮”的笔杆子，今日走上法庭也没忘记在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支钢笔。他拿到起诉书的副本时，表示要委托律师出庭辩护。

江腾蛟，这个曾经组织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戴着黑边眼镜，穿着淡咖啡色上装，双手垂放在小腹上，神情恍惚地左右张望。

邱会作，神色阴沉，步履缓慢地走上法庭。他灰白的头发直立着，双手垂在背后。看了起诉书后，表示服罪说：“对我自己盖棺论定了，我成了一个罪人。”

吴法宪，这位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空军司令，穿身蓝制服，两道浓眉，一脸横肉，厚厚的嘴唇外翻着，低垂着脑袋，像一只肥胖的笨鸭，一摇一摆地被押进法庭。他把起诉书看了几遍，说：“我深深知道自己的罪恶太大，这个起诉书写得实事求是，非常公道，是谁的罪就是谁的罪。”

曾是参谋总长的黄永胜，高大个子，背微微有些佝偻，脸上长着不少黑斑，头不时颤动着，显得特别苍老。他说：“在起诉书的 48 条罪中，涉及我的有 10 条。”

陈伯达在法警扶持下，步履艰难地蹒跚移动。他穿灰色棉罩衣，光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满面是愁苦危惧的神色。这个在“文革”一开始就发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央文革组长”，被人民押到法庭被告席上。他在出庭前写了委托书：“我要律师，为我辩护。”

李作鹏，脸色发黄，微驼着背，他取掉了过去公开露面时戴的那副装腔作势的墨镜，神情沮丧，站在被告席的第八个位置上。他看了起诉书后说：“把康生列到里边来，非常正确，应该把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诡计多端的张春桥，今天在法庭上一直斜歪着脑袋。他吊着三角眼，微斜着平顶头，穿黑色中式对襟上衣，提着肩膀，敞着领口。他的灰白胡子长的有半寸长，两个嘴角向外撇着，两只眼睛左右斜视，脸上一直不住地冒汗。这个做了十年“改朝换代”黄粱梦的三十年代的狄克，在法庭递交起诉书副本时，先装着不看，后来又偷偷拿起，急匆匆地翻阅着，想知道指控他的是什么罪。他站在被告席上，还是那副阴阳怪气的模样，眼睛透出敌视的目光。

3 时 15 分，江华庭长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在两名身穿蓝制服的女法警押送下，67 岁的野心家江青走进法庭。今天她身穿黑色上衣，脚穿绒鞋，满头黑发梳得溜光，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架在鼻梁上。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像当电影演员时那样，做作地挺直身子，仰着头，把脚步放得很慢，满不在乎地左右张望，掩饰着内心的恐慌。几天前，当法庭送达员让她在收到《起诉书》副本的“送达证”上签字时，她故意发出冷笑。她由于心慌异常，竟把“十一月”写成“一十月”，送达员几次向她指出写错了，她想了好久，才改过来。

3 时 17 分，江青等十个被告都已站到被告席上候审。每个被告席前都安装有耳机，供被告人使用。

这十名被告，面对着即将来临的审判和亿万人的仇恨，有的神态紧张，有的故作镇静，有的低着头，甚至不敢向四周偷看一眼。

台下坐的800多位旁听者，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见证人。他们当中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的代表，有深受迫害的干部及其家属。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罗瑞卿将军的夫人郝治平坐在一起，用愤怒的眼光注视着罪犯们。

记者问她们有何感想。

王光美说："这是罪犯们应得的惩罚，我对罪犯有深仇大恨，我的直系亲属中有四人被他们迫害致死在监狱里。这次不是私仇家恨，这是国仇，党仇，是全国人民的仇恨!"

薛明说："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审判林彪、江青等人，不是个人的家仇，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国家啊!"

郝治平激愤地说："他们害了多少人啊。在他们手下，全国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不判他们严刑，不足以平民愤。"

现在是清算血海深仇的时候了!

是呀，请想一想，算一算吧，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猖狂的年代里，中国大地上哪一个城镇不遭受他们魔爪的蹂躏?哪一个农村听不到寡妇孤儿的哭声?有多少革命干部被迫害致死?有多少科学家、专家横遭拷打?有多少学校遭到了破坏?有多少工厂停止了生产?有多少村庄荒芜了田野?有多少工人、农民受到迫害……

在史无前例的灾难岁月里，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艺术到社会风尚，都倒退了好多年，在这伙反革命阴谋家的煽动和指挥下，真是冤狱遍全国，灾难铺大地啊!

3点20分，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铁证如山地控诉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桩桩、一件件罪行，字里行间充满了九亿人民的血泪。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四大罪状，48条罪行。其中根据起诉书材料统计，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人民解放军中制造了大批冤案，使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有近142000多人。受诬陷、受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53000多人；文艺界受迫害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有周信芳、赵树理、吴晗等2600多人。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的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

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罪事实的二十天开庭调查中，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从各方面无可辩驳的事实中证实了被告人的各种犯罪活动。11月24日、26日，第一审判庭调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到长沙诬告周总理，阻挠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阴谋。

26日上午9时，江青被押上被告席上，她强打精神，极力装出镇定自若、满不在乎的

样子，但她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和恐慌，她的两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垂下，眼睛茫然地望着法庭，女皇梦似乎还没有醒。

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1974 年 10 月 17 日夜，你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钓鱼台 11 楼密谋策划，这是不是事实?江青眨巴眨巴眼睛，先说了声是，又改口说："不知道。"

审判长问他们四人在一起策划了什么，江青摇晃着脑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凶狠地说："前面问的不知道，策划了什么我怎么知道!"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江青否认《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应记录在案。

9 点 15 分，王洪文被传到庭作证，他再次供认 24 日在法庭调查的一切事实，但是做了补正。王洪文说，是他自己提出到长沙去的，江青立即表示同意，并且说，你要去，最好是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

法庭宣读王洪文 1974 年 10 月 4 日，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电话记录。这时江青好像相当注意，她左手扶着助听器，在木椅上坐不安宁，两条腿不时地跷上放下，歪着头倾听着，一会皱皱眉头，显得若有所思。

法庭工作人员还当场用幻灯投影了记录：张玉凤同志来电，首长说，政府报告有 5000 字就不少了，副总理要多几个，谁当第一副?(邓)

在 26 日的法庭上，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

王海容说，她到 11 号楼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在场。会上，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把批孔后国内财政开支和外贸•中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还把 17 日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江青说，17 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她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

这时，江青似乎听得津津有味。她的眼睛半闭着，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一丝奸笑，而当王海容讲到她诬陷周总理、邓小平时，江责顿时变了脸色，马上扭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王海容一眼。

公诉人要求发言。他说，从长沙告状这件事的过程可以看出，江青是主谋，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王洪文是中央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江青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什么能够使这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不是公认江青是他们的头子，这是不可能的。

12 月 3 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江青直接控制专案组，诬陷和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的罪行。江青出庭时穿一身黑衣服，外穿黑色毛背心。她在法庭上，多次否认这个专案是她直接控制和指挥的。她狡辩说，在专案组工作是"受了委托"，只是个"助手"，

2、到底是“主管”还是“助手”？

办案人员走访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他们证实，谢富治等曾经多次当面交代，专案组是江青亲自抓的。

办案人翻阅了刘少奇、专案组整理的几百本案卷，公诉人出示了 1968 年 2 月 26 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起诉人估计到江青很可能狡辩说谢富治的批示与这无关，又查到江青的亲笔信。她在信中强调刘少奇专案是“我负责的专案”，批评没有送原材料给她，是对她的夺权。她说，只把材料摘录送给她，是对她“有夺权的现象，如果我不尽责任或犯了大错误，撤我的职好了，否则你们就要做出自我批评，认真改正”。同是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和汪东兴，赶忙写出书面检讨，说“特别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首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请示不够，正如林副主席指示的，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

法庭工作人员给江青看了检讨复制件以后，审判员问江青听清楚?了没有，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点头说：“我没有记忆，没有印象，忘记了，对我写的也没有记忆。不过那是我写的。”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江青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然而她又狡辩说，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抄刘少奇的家是“合理的，合法的”，抄家不是犯罪。江青摘下眼镜紧握右手，打断审判员的话，说：“破四旧必然抄家，是革命行动。”

江青问审判长曾汉周，我是否可以拿“九大”报告?

审判长说，“九大”、“十大”报告，你已经没资格看了。

江青说：“为什么?”

审判长说：“你是罪犯，你只可以在起诉书的范围进行申诉、辩论。”

江青顿时破口漫骂。审判长警告她侮辱法庭，将成为新的罪行，江青像泼妇一样，大闹法庭了。她说，“我就是无法无天，我不怕你呀。……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能演成功吗?我是孙悟空，我能变几个脑袋，砍一个，我能多长几个……”

审判长再次按响铃声，警告江青不要胡言。

公诉人在发言中对江青的狡辩进行反驳。指出《16 条》中没有任何一条，可以作为对一个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的依据。黄火青指出，按国家组织法第 36 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非经人大常委许可，不能逮捕或者审判人大代表。他说，对于一个人大代表是如此，对人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江青几个人有什么权力决定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他呢?这完全是违法行为。

法庭还出示了江青批准拘留、审讯王广恩、丁觉群和孟用潜，采用“小型批斗会”等残酷手段，逼迫他们承认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江青等为陷害刘少奇，1967 年 7 月组织三百多人，历时三个多月，清查沈阳地区敌伪档案 245 万多卷。结果仍没找到一点刘少奇“自首叛变”的证据事实。江青为制造刘少奇是大叛徒的证据，刑讯逼供 1927 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丁觉群。丁不久就翻了供。1967 年 9 月 25 日，丁觉群在狱中写给专案人员的信中声明，他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

孟用潜曾任原满州省委组织部长，1929 年 8 月，他同满州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沈阳奉天纱厂同时被捕。江青诬陷刘少奇是叛徒，连续逼供孟用潜。他在狱中二十多次写信声明，他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都是编造的，没有事实根据，但均被扣押不准上报。

江青为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是特务，从 1967 年 5 月至 10 月，擅自决定逮捕关押的还有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天津市民王广恩，刘少奇的厨师郝苗等 11 人。

在刘少奇家当过十几年厨师的郝苗，12 月 3 日也出庭作证了。郝苗是经江青批准逮捕的，可她却说：“不记得了”。法庭出示了 1967 年 6 月 8 日，江青批准谢富治逮捕审查郝苗的报告，江青批示“照办”。

江青歪着头，看了批示原文，承认字是她写的，“是我批的，是我的字。”

郝苗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他被捕以后，审讯的人一再要他揭发刘少奇、王光美的罪行。郝苗回答说：“刘少奇是这样大的干部，我是一个厨师，成天在厨房，怎么知道他的情况呢?关于王光美的事，解放前我是一个学徒，从来没有见过她，她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郝苗说，他就这样戴着军统“特务”的帽子一直被关了六年多。

3、疯狂的迫害

1980 年 12 月 9 日上午，第一法庭调查被告人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史，伙同叶群、江腾蛟等人，查抄上海文艺界五位著名人士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等人的家。

审判员审问江青，1966 年夏天，你是不是叫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要郑君里交出你 30 年代的信件，照片?江青开始说，不知道，后来又说，看了起诉书才知道，江青承认“委托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要书信。

法庭传上海抄家的同案犯江腾蛟、刘世英出庭作证。江腾蛟供认，1966 年 10 月，他接受叶群，吴法宪交给的一项紧急政治任务，欺骗一部分战士和干部子弟，化装成红卫兵，在 10 月 9 日凌晨，抄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

郑君里的夫人黄展出庭作证。她站在证人席上，愤怒地指着江青说，“你不认识我吗?你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我是清楚的。”黄晨说，1966 年 10 月，来了一伙人抄了她的家，片纸不留。1967 年，又把郑君里秘密地抓走，两年后惨死在狱中。

江青歪过脑袋说：“阿黄，这我完全不知道。”

黄晨愤怒反驳：“我不跟你讲话，你没有权力跟我讲话。”黄晨又说：“郑君里去世后，他们对他的儿子也不放过。”连她也差点整死。她怒斥江青：“蓝苹，你这个鬼，多么毒辣!”

审判员问江青：“1967 年 1 月你和谢富治一道到叶群家，把抄来的材料当场烧掉，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回答：“不知道。”

法庭当即读了空军司令部原党委办公室主任的证词。林彪办公室秘书也出庭证明，这一天，江青、叶群、谢富治在毛家湾林彪住处的后院小厨房，消毁了这些材料。他说，叶群、谢富治把材料一件件投进火炉，江青在一旁踱步，监视着焚烧。

12 月 12 日上午，第一审判庭就被告人江青被指控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88 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等犯罪事实进行庭审调查。被害人全国政协委员廖沫沙在法庭上证实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诬陷干部，血口喷人，凭空捏造他是“很厉害的特务”。廖沫沙激愤地说，1933 年他在上海认识了江青。“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诬陷我，故意制造冤狱。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又流放劳改了三年，肉体上受尽了酷刑。”

廖沫沙气愤地用手捶打证人席的桌子，流着泪指控江青说：“遭受你们这样残酷迫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你们扣上特务帽子，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也穿不了，只能披在身上。一个从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革命家，就这样被残酷迫害，惨死在监狱里。”他还诉说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一家被整得家破人亡的情景。

被害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王昆仑由他女儿陪同出庭，代他向法庭宣读证言。在监牢里关了七年的王昆仑，在证言里说“我从 30 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过，而你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带上手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掉，头被打肿，双脚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嫌疑分子。甚至我的第三代，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王昆仑证言说：“蒋介石所不敢做的，你江青竟然干了，你江青破坏了我党的统一战线，迫使我们许多好同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多少同志饮恨而死，”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审判员问江青，你向康生要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名单的目的是什么?江青承认名单是她要的，但却胡说什么这是正常的，合法的，说什么当时准备开十二中全会。她要“了解情况”。

审判员当即指出，江青当时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合什么理?合什么法?

江青竟然胡说：“当时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就等于中央!”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起来。

江青耍无赖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公诉人批驳江青的狡辩，指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康生到处点名批斗和诬陷许多中央委员。仅康生就直接点名诬陷了 592 人，其中有中委、候补中委 120 名。仅据江青从 1966 年底到 1970 年 7 月的一小部分录音讲话，其中就点名诬陷了 172 人，内有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 28 人，这些人都遭到迫害。

江青在 1968 年 9 月 18 日的一次讲话中，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诬陷胡乔木“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等等。

江青点点头，承认诬陷胡乔木、周扬。

审判员问江青：是否谈过陆定一是“军统特务”，江青说；“我没有材料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可能你们的记录搞错了吧，你们可以请证人来。”

法庭当场宣读并播放了 1968 年 9 月 18 日，江青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讲话录音：“陆定一是军统特务我们现在才知道，可能还要复杂。”

江青被迫承认：“这是我讲的，是我的声音。”

审判员问江青：有什么根据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

江青无法回答，公然耍赖起来。一会儿说，“我不能承认是诬陷，你得让我想一想，你先问别的。”一会竟诬陷说陆定一有个兄弟可能是“特务”，这跟陆定一“有关系”。

12 月 23 日，在最后一次法庭调查中，法庭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证实，江青迫害诬陷原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王昆，迫害致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等人的罪行。

上午法庭刚开庭，江青就大闹法庭，诬蔑法庭是“国民党法西斯”，攻击检察员是“讼棍”。庭长江华当即警告江青：“你吵闹法庭，要罪加一等!”

法庭播放了 1967 年 9 月江青接见部分大专院校代表时的讲话录音。她说：“人大孙泱，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务，不仅是国民党特务，他很可能是日本特务，还可能跟苏联有关系。”由于江青信口开河的诬陷，孙泱被迫害致死。后来，她在 1970 年 7 月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继续诬陷“孙泱参加了复兴社，复兴社是军统”。还说：“孙泱也是写《朱德传》的呀!”

12 月 24 日、29 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就江青被指控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江青在 24 日做了长达近两小时的辩护发言。江青的《我的一点意见》对指控的犯罪事实，避而不谈，说什么“那是小事”，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对受她迫害而致伤致死和家破

人亡的犯罪行为，竟然说是法庭用“这点小事，那一点小事，丑化我”，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江青攻击法庭对她的审判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她一再反复说什么“逮捕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主席”，“通过丑化我，丑化毛泽东主席”，“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等等。

江青还说什么“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等等。

针对江青的狡辩，公诉人用大量事实进行了批驳。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席确有责任，但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伟大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江青妄图用毛主席崇高威望掩盖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是徒劳的。

公诉人说，全国人民对江青的罪行记忆犹新，江青胡说什么“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这是对亿万人民的侮辱。江青代表谁呢?江青只代表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打砸抢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公诉人建议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对被告人江青从严惩办，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铁证如山

审判江青的同时，第一法庭分别对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的罪行，进行了法庭调查。

12 月 6 日，上海柴油机厂的党委书记徐潘清出庭证明，1968 年 8 月 4 日，王洪文策动指挥受蒙蔽的 10 多万人，用近干部车辆和船只，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武斗事件。徐潘清说，“在这场武斗中，被关押打伤 650 人，至今有 100 多人仍留下后遗症，或成了终身残疾。”“工厂除停产停工外，仅有账可查的物资损失就达350多万元，厂房修理花费了14万多元。”

当时参加指挥武斗的一位证人在证词里说，在这次武斗之后，张春桥称赞王洪文是“我们的司令”，“8·4 行动的英雄”，“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

王洪文在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时说：起诉书的指控和证人讲的，“都是事实，这次武斗打伤数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应向全国人民认罪。”

12 月 4 日，第一审判庭就被告人张春桥曾在上海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法庭调查。

张春桥在大量活的证据和证人面前，坐在被告席上，歪斜着脑袋，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拒不回答。

法庭投影的第一份证据，是张春桥亲自批的 244 特务小组头目游雪涛，1968 年 11 月 30 日写给张春桥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总结里写道：“从 1967 年 9 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

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

法庭出示了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记录在笔记本里一段原话：“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可搞的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参加游雪涛小组的原上海京昆剧团一演员，在证词里对特务小组的内幕情况，向法庭作了揭露：这个小组手段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大搞逼供信、体罚、殴打、“冒充国家有关机关”，利用群众组织名义，“搞情报”。

游雪涛小组的原名是扫雪纵队。1967 年初，因为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的情报，受到张春桥的赏识。同年四月，游雪涛本人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以合法的身份掩护他们的特务活动。

在12月8日的法庭上，姚文元承认，1976年在中央报刊发表的诬陷文章，矛头是指向一部分重新工作了一个时期的老干部，把大批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老走资派”，“复辟狂”，“翻案派”，“还乡团”。

1976 年姚文元在他修改审定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必须批判》一文，亲笔加上“老走资派”。当法庭出示证件之后，姚文元只好说：“这个我不推卸”。

公诉人在十日的法庭上问姚文元，你要枪毙一批人是针对谁的?

姚文元说：“指一部分群众，但这只是一个闪念、一个感想，没有形成观点。”

公诉人批驳说，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他后来的行动证实了他这些反革命意图。

姚文元精神极度紧张。他的全部精力，似乎集中到塞在左边耳朵上那个小小的白色耳机上。他的动作失常，几次耳机掉下来以后，他自己戴不上，需要法警帮助。

5、罪恶的谋杀

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设立在西郊的空军学院里。1971年9月8日至11日，空军学院驻地曾一度成为林彪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的秘密据点之一。如今这里却成了审判他们的法庭的地点。

1980年11月25日下午，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江腾蛟，穿着淡咖啡色的上装，身板挺直地站在法庭上。这个曾经组织谋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戴着黑边眼镜，不住地向法庭四周张望。

江腾蛟供认，1971年3月31日晚，林立果在上海原少年科技站，召开了有王维国、陈励耘、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和他参加的会议。会议从10点多开到第二天凌晨，林

立果在作结论时明确规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你们老政委(指我)联系。”

11 月 26 日，江腾蛟在法庭上供认，1971 年 9 月 8 日晚，林立果让他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

审判员问：“林立果给你指定什么指挥员名称没有?”

江腾蛟答：“让我到上海去做第一线指挥。”

审判员问：“指挥干什么?”

江腾蛟答：“指挥谋害毛主席的办法。”

审判员问：“你们策划了哪些办法?”

江腾蛟答：“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条是用火焰喷射，用火箭筒打毛主席专用列车；二是用 100(即 100 毫米口径)高炮平射毛主席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在毛主席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江腾蛟还供认，他们还提出在苏州硕放炸路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派飞机炸火车，炸上海虹桥机场停车场附近的油库。

法庭传同案犯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鲁珉(空军司令部原作战部长)，到庭作证。鲁珉在证言中说，1971 年 9 月 11 日晚约 8 时，江腾蛟和他到西郊机场。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有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指毛主席)搞掉。林立果指着江腾蛟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去上海，把家也一块带去。这时江腾蛟说，顾不了这些了。现在主要是把“B52”搞掉。

1 月 27 日，江腾蛟第三次出庭受审时供认。1971 年 9 月 12 日晚上，他参加周宇驰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会上，周宇驰说，明早八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和他，在早晨六时到北京西郊机场，等黄、吴、李、邱到齐后，一起飞往广州，并要负责他们的安全。

江腾蛟还供认，林彪还打算争取苏联援助。

同案犯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出庭。法庭用幻灯投影出示南逃人员名单的原件时，刘世英指着名单说：“是我写的，是我写的。”他说，名单上的“江”和“江家”，指的就是江腾蛟。

12 月 1 日下午，江腾蛟在特别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说：“我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我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并愿接受任何我应该得到的惩罚。”

6、黄永胜是主犯

反革命集团主犯、前参谋总长黄永胜，11 月 25 日在特别法庭受审时供认，1971 年 9 月 6 日黄昏，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听到李作鹏向他密告了毛主席在南方针对林彪一伙的谈话内容之后，迫不及待地给在北戴河的叶群密报。

审判员问："你把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告诉叶群，造成了什么后果?"

黄永胜答："基本上我都如实告诉她了，我没有多大保留。"

审判员问："你把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告诉叶群，造成什么后果?"

黄永胜答："促成林彪下决心杀害毛主席。"

法庭还审问了黄永胜诬陷、迫害彭德怀、聂荣臻、罗瑞卿等罪行。12 月 8 日，法庭审问了黄永胜制造广东地下党冤案的罪行。中共广东地下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由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黄永胜诬陷广东地下党"招降纳叛"，使七千多人遭到迫害，其中广东省原副省长林锵云等 85 人被迫害致死。我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母亲、儿子以及烈士的侄儿、堂弟、堂侄等也惨遭迫害致死。

黄永胜在罪证前面承认："我是拿竹竿子打人，竹竿子很长，伤害了很多人，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使许多为革命英勇奋斗的人遭到诬陷、打击、迫害致死。"

起诉书中还指控黄永胜伙同刘兴元，在 1967 年 5 月至 1970 年 11 月期间，在广州部队制造"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夺权搞政变，株连七百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

黄永胜在法庭辩论时，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辩护。他反复强调："现在我承认我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我犯有严重错误，在若干问题上犯有罪行。我对自己是这么一个看法。"

7、"假的空军司令"

1980 年 11 月 23 日下午三时，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厅开始对吴法宪进行审问。笔者在旁听席上，看到吴法宪拖着臃肿的矮胖的身躯，迈着艰难的步履，由法警押到被告席上。

这位林彪手下俯首贴耳的干将，在亲笔供词中承认："是林彪把我提拔出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

审判员问：吴法宪，起诉书指控你在林彪指使下，任命他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是不是事实?

吴法宪满脸是汗，连连点头回答："是事实，是事实。"

他承认，1967 年 3 月他把林彪称作是“眼珠子”的儿子林立果安插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后来他又亲自介绍林立果入党，目的就在“追随林彪、讨好林彪”。这个年仅 23 岁，没有当过兵，没有经过基层锻炼，没有空战实践的林立果，在两年时间内，火箭式上升，从一个战士提拔到师级干部。

审判员严厉地高声审问他:“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你当空军司令员,你的职责是什么?”

吴法宪沙哑地回答：“我私自把空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林立果，支持、纵容林立果，出卖给林立果，我犯下了滔天罪行。”

审判员连续追问：“你为什么把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支持、纵容林立果在空军进行反革命活动?”

吴法宪哭丧着脸，擦着汗说：“实际上我就是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为林彪阴谋杀害毛主席，提供了方便，提供了条件……”

公诉人问他，知不知道 1971 年 9 月 12 日晚，256 号飞机调动和林立果组织武裝小分队的事时，他嘟囔地说：“不知道，我把权交完了……”说到这里，法庭上响起一片笑声。他不顾大家笑什么，继续嘟囔：“我承认林彪是真正的空军司令，我是个假的空军司令。”

吴法宪还大力鼓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为空军“指明了方向”。林立果直接指挥的“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等，大讲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他们成立的“上海小组”，在“入组须知”上明文规定，对“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是吴法宪的办公室主任。她虽未出庭受审，但因为“她积极参加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被开除党籍、军籍。她曾多次写信给林彪、叶群献忠心：“永远忠于副统帅林副主席，海枯石烂志不移……”她还伙同吴法宪，从空军派出 20 多人为林立果“选美”……

8、李作鹏供认不讳

第二审判庭经过四次开庭，12 月 4 日上午结束了对李作鹏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出示的证据证实，由于李作鹏的点名批准，海军干部 120 人受到诬陷迫害。

李作鹏供认，1968 年 4 月 3 日，他伙同海军原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等联名写信给党中央，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扣上 9 条罪状，诬陷他“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军反党。”

李作鹏看了法庭投影的原稿，供认：“对，是我批的。”

法庭出示了李作鹏等三人给林彪写的诬陷罗瑞卿的信的底稿。林彪赞赏他们三人“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对此，李作鹏供认不讳，并说：诬陷罗瑞卿的“功越大，罪就越大”。

审判员问他：“你们写这封诬陷信，有什么事实根据?”

李作鹏回答说："没有事实根据，这都是诬陷。"

被告人李作鹏在法庭辩论中承认，他诬陷贺龙、罗瑞卿"是犯罪"；对迫害海军大批干部和群众、制造三千多件冤假错案，他不但有领导责任，还有直接责任。

对他在"9·13事件"中，篡改周恩来总理关于林彪专机必须有四个首长联名指示才能起飞的指示，过去"只承认有错，不承认有罪"，现在"既承认有错，也承认有罪"。

9、邱会作跪下请罪

独霸总后勤部长职务的邱会作，在总后实行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大批反对林彪和他的人，被邱会作直接诬陷、迫害的有462人，其中八人被迫害致死。

当被迫害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出庭作证，悲痛控诉邱会作私设监狱，对她丈夫汤平刑讯逼供致死时，法庭上传来了一片哭泣声。

邱会作把脸从审判员方向转向证人刘伯音，说："我现在人民法庭上严肃地承认，迫害汤平致死是我的罪行。我现在向过去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汤平的妻子请罪。"

说着，他"通"地一声向刘伯音跪下。法庭顿时陷入悲痛的沉寂中。

笔者回忆到战争年代的汤平同志。这位少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经历长征，在贺龙元帅的领导下活跃在黄河两岸，为晋绥军区的后勤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他文质彬彬，相貌清瘦，是一位勤于思考的将军。

邱会作一伙在后勤部制造了 113 个冤假案，株连大批干部、群众及家属。比如，1968年10月，邱会作伙同原后勤部副部长陈庞在机关制造的"特务叛国外逃集团"冤案，就株连了26名军职以上干部和269名师职干部。

邱会作对受害人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叛国外逃分子"、"反动学术权威". 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诬陷；同时要"狠斗"、"狠审"、"狠专"、"要学习打砸抢派的劲头"，进行残酷迫害。他煽动说："不武斗，我看四斗、五斗、六斗都可以"，"16 条也没有规定要赔命"。

邱会作指使陈庞等人，把"主要的人一定要关起来"，"要武装看管"。他在后勤部私设许多监狱，先后关押了1700多人。其中在北京由他们直接控制的监狱就有七处，滥用几十种酷刑，使许多人致伤、致残、致死。

从基督教徒走上革命之路的傅连章，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肩负着为中央首长保健的重任。他在会诊林彪的疾病时，发现林彪吸毒，并报告了毛泽东。为此，林彪长期怀恨在心。邱会作按照林彪的旨意，串通军队和地方的造反派，日夜对傅连章往死里整!1968年3月19日，70岁的老人傅连章，戴着手铐，惨死在秦城监狱。

法庭辩论时，邱会作说："我向法庭低头认罪，我没有什么要辩护的。"

他在《认罪书》上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

10、正义的判决

1981 年 1 月 25 日，古城北京笼罩在严寒里。这天一大早，天安门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附近，挤满了探听判决消息的人群。警察结成长长一道人墙，阻挡围观群众靠近。全国各省市派来的 800 多名旁听人员，提前一小时步入法庭。

9 时整，铃声三次响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以高昂洪亮的声音宣布：现在开庭!

穿着蓝色制服的法警依次将十个主犯逐个押入庭，一字排开在审判台前听候审判。

从旁听席上看去，自右至左是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笔者清楚看到 10 名主犯的紧张表情。吴法宪的两条腿不停地战抖，黄永胜、邱会作、江腾蛟低下头……

法庭经过 42 次的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十名被告进行了 45 次法庭调查，有 49 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 873 件进行了审查，宣读出示大量的物证、书证。验证的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都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江华庭长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后面"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词还没出口，江青像遭到雷击一样，神经质地大喊大叫起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装疯卖傻地躺倒地上打滚。两个法警立刻将她抓小鸡似的从地上拖起，"咔喳"一声，戴上了手铐。大厅里的听众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江青以为要拉她去枪毙，不住挣扎尖叫。庭长传来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法警告诉她，不是枪毙，她才安静下来，被扭进囚车。

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张春桥，尽管早就说过"我早就准备杀头了"，今天仍多次用手摸额角和下巴的冷汗，一直仰着脸，显得十分心惊。

神情呆滞的姚文元，听到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颓废地闭上眼睛，耷拉下了头。

判处被告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他挺着腰，眼睛一直呆呆地看着法庭。

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黄永胜，为了听得清楚，他身体向前倾斜，然后又挺直了身子。

两条腿一直战抖个不停的吴法宪。听到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心情似平静下来。他望了望挟住他的两个法警，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判处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李作鹏，两条腿站成八字形，仅有的一只眼睛半闭着，看不出什么表情。

邱会作听到自己被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时，表情轻松，一直站着，保持军人的立正姿势。

当十个主犯被依次押出法庭，大厅旁听席上响起震耳的掌声。人们兴奋地拍肩、握手，欢庆大快人心的历史审判!

笔者挤进人群，访问连日坐在旁听席上的王光美时，她说："刘少奇同志的愿望实现了。这次判决，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任何触犯法律的人，必受到法律的惩办。"

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判决，表明亿万人民的心愿：十年浩劫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结束语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从危机中挽救了党，结束了一场民族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惨重损失，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在此期间，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直进行着斗争。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人造卫星、核技术、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丰硕成果，外事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历史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顽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不仅给人留下伤痛，更留下深刻的教训。我国人民只有从过去的左倾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十年动乱的教训是什么呢?

〖HTXBS〗(细黑)1．历史教训我们：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次又一次把人民内

部矛盾扩大化为敌我矛盾，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2．历史教训我们，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是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1956 年中共八大会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林彪、“四人帮”狂热鼓吹个人崇拜，神化毛泽东。毛泽东个人也公然认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党的领袖为了推行错误的方针，需要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导致严重损害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形成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党章、宪法遭到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我们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个人崇拜，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组织和群众之上。

3．历史教训我们：十年动乱的原因之一，是“无法无天”。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实行人治，没有法治，以致全党无法监督约束自己的领袖。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4．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保证。“文革”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全社会陷入了“天下大乱”的无政府状态。经过拨乱反正和不断整顿，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党的历史的教育，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要看到时代在发展，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转折里，经过拨乱反正，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在 21 世纪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后记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65 年 5 月 30 日，我在北京市房山县担任“四清”队长时，接到报社紧急通知，火速赶回编辑部。在大今上，陈伯达宣布，中央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陈伯达说，他来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开始了为患十年的动乱。

“文革”进程中，我作为中央党报的记者，绝大部分时间在作采访和编辑工作。有段时间还列席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所谓“中央首长”的接见，目击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反革命分子的现场表演。

我用十年时间，收集积累“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粉碎“四人帮”后，我在完成岗位业务的同时，断断续续又花了十多年时间来写。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眼下还难于了解“文革”全部真情。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是这样。

我的晚年，有 18 年时间献身于老年事业。1983 年，以我和几位老同志为主体，创办了《中国老年》杂志，任总编辑。1987 年，又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创办了《中国老年报》，任第一副总编辑、社委会主任。邓小平同志先后亲笔为这一刊、一报题写了刊名、报名。为党的事业，为社会发展的远景，办起这一刊一报，是我晚年的两个心愿。《史无前例的年代》这部书，也是在这个期间里，用十余年时间写完的，实现了我晚年的第三个心愿。

我的体会是：干党和人民的事业，必需有坚强的意志，饱满的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老朋友、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晋绥日报》老战友、著名编辑傅真、著名编辑周毅之，朋友任贵银等同志，帮我校正全部稿件。我还感谢党史工作者苏采青、高级编辑钟立群，老伴丁帆、儿子纪晓军及家人，对写这部书的关心和支持。对我参阅了有关书刊论著的作者，在此也表示谢意，我向他们学了不少知识。我真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高级编辑宋世琦同志。他对出版本书不仅始终如一的关心和支持，而且以高度负责精神，认真核对，仔细加工了全部稿件。

纪希晨

2001 年 3 月时年 79 岁

1996 年 6 月 20 日建党 75 周年前夕完稿

1999 年 9 月 19 日第三次修改

2000年“八一”建军节第四次修改

2000年11月30日第五次修改定稿

《史无前例的年代》作者：纪希晨